

乌家培



乌家培教授，1932年生，现为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导师主席团执行副主席、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工作，学术造诣高。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在我国创立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主要代表作有：《经济数学方法研究》（1980年初版）、《经济数量分析概论》（1983年初版）、《数量经济学若干问题》（1985年初版）等，并主编《投入产出法在中国的应用》（1984年版）、《经济计量方法在中国的应用》（1986年版）、《数量经济学大辞典》（1986年初版）等书。自1987年1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国家信息中心领导职务后，最早在我国开创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创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要代表作有：《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1991年版）、《信息经济学与信息管理》（2004年版）、《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1999年版）、《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2002年版，2004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等，并主编《信息经济学》（2002年初版）、《新兴的经济信息系统建设》（1991年版）、《网络经济丛书》（2000年版，共5本）等书。乌家培在经济学其他研究领域的著述也颇丰，1987年就出版了《乌家培选集》，还在1994年出版了英文版著述《Information and Economy》。在管理学领域他也相当活跃，历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评审组成员、《管理科学学报》和《管理科学文库》编委。

“问题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笔谈)

[编者按]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无疑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我们要把握条件，抓住机遇，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就必须把思想认识从那些制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众所周知，学术刊物是推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是展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对社会科学期刊的办刊模式进行自觉的检视和反省。2004年1月8日，孙麾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从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一文。文章提出，综合类社科期刊必须站在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综合化前沿趋势的高度调整发展战略，实现从“学科综合”办刊模式向“问题综合”办刊模式转变。该文发表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1月29日，《光明日报》又以《由〈从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引起的》为题，发表了俞吾金、郁建兴等对孙文的回应。几位学者在回应中一致肯定，孙麾的文章触及到一种正日益变得清晰的学术发展趋向，即每门学科内部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然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越来越具有综合性，从而使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单学科的范围得到彻底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抽象地谈论“学科综合”是没有意义的，不如具体地谈“问题综合”。要言之，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具体的问题导向，而不是抽象的学科导向，真正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的、综合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上来。

本刊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不仅为综合类社科期刊下一步的办刊实践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路，而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工作也不无启发意义。为此，我们约请几位青年学者撰写了这组笔谈，以期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为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献计献策。

〔中图分类号〕C0；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9-0005-15

问题研究与学科建设

◎ 杨学功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很强调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真正搞好学科建设，并不是在本学科既有的知识结构里自动循环就可以实现的。事实上，学科建设离不开问题研究。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学科建设的真正基础。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归宿，而研究就贯穿于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当这个过程所达到的结果能够构成新的知识增量，从而能够有效地纳入到学科建构之中时，学科建设才能切实推进。因此，我想围绕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的关系谈几点看法。

一、分清两类问题及其真假

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归宿。正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着学术研究的进展。马克思在写于1842年5月的《集权问题》一文中，说过一段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精辟地阐述了抓住时代迫切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写道：“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不仅强调了应该善于抓住问题而不要迷信现成的答案，而且区分了问题的两种类型：一类是“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犹如一道“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的代数方程式，这类问题是能够找到答案的；另一类问题马克思没有明言，但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推断出来，这就是与上一类问题相反的问题，即“在内容上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问题”，这类问题在原则上是无解的。“答案”与“问题”的区别在于：答案中包含着个人的意图和见识，有的答案反映了时代的呼声，有的则纯属个人私见；而真正合理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公共的、公开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遗憾的是，人们一般只从这段话中看到了抓住问题的重要性，而对两类问题的区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然而，正是这种区分对于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学术研究可以用如下两句话来概括：以真正学术的方式研究问题，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所谓以真正学术的方式研究问题，就是按照学术共同体长期形成的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所谓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就是要分清问题的真假。学术研究中的问题，要么是学术史上流传下来的问题，要么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问题。学术史上流传下来的问题，有的是由于提问方式不当而引起的，如果不改变提问方式，就容易被假问题所纠缠；现实问题的提炼也有个提炼是否准确的问题，如果提炼不当，就会形成假问题。正如维纳所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②当然，要辨别问题的真假，非得有相当的功力和“老练的眼光”才行。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学术要研究当今时代的现实问题。这在一般意义上并没有错，我赞成这种说法。但是在具体操作时，只有当把生活、实践中，或者某一时代、人群的特殊境遇中的现实问题转化成学术问题时，才能以学术的方式去加以思考、研究。而如果它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没有加以学术的处理、转化，在学术上就很难讨论，或者说这样的讨论也是以非学术的方式加以讨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多得很，例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凭经验或个人感受发表议论，但是经验性的谈论并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要从大量经验性材料中发现本质和规律。因此，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哪一个你能把它转化为在学术上有分量的问题，直接决定了你的学术研究的状况。比如说研究哲学，往往是某一时代提出了重大的问题，哲学家们又能把它们转化为哲学问题，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研究这些重大问题，就会把哲学推向前进。而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发展，就表现在这个时代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属于它这个时代的问题。而不是搞表面上的热闹，大家都在谈论日常的具体问题。就是说，你必须对日常问题进行一种本质抽象，把它转化为哲学问题，才能以哲学的方式去加以处理、研究。当然，由于学科的多样性，不同学科的学术问题具有差异性，因而学术问题也是有差异性和层次性的，它们可以属于同一学科，也可能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例如，许多问题需要经过高度抽象才能被提升为

哲学问题，而有的问题虽然没有达到哲学层次的抽象，不是哲学问题，但它们可能是其他学科的学术问题，如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法学问题等等。即使如此，也必须凭借相应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手段，才能把这些问题转化为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并以学术的方式去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在当代条件下，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都离不开特定的知识背景。

二、学术研究的社会担当或社会服务功能

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知识背景，而知识背景往往是由一定的学科框架提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只需关心知识增长和学科完善，而可以无视自己的社会担当功能。当然，这是一种知识的担当，或者说以知识的方式去担当。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为学科而学科”抓学科建设，而要在应对和解决问题中促进学科建设。这就需要认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社會担当或社会服务功能。

实际上，只要正视历史和现实就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正是在应对和回答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古代世界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产物。15 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就是适应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着的市民阶层及后来主要由这个阶层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而出现的，它们对近代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华勒斯坦所说：“当时，主权在‘民’正迅速地成为一项通则，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③19 世纪，在西欧和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各门不同的学科纷纷形成：人们为了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形成了历史学；为了解决商业经营和财政管理中的问题，形成了经济学；为了探寻制约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逐渐建立了社会学；为了探寻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变化的规律，形成了政治学；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入侵和征服，他们遇到了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被称为人类学。1945 年以后，在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领域是地区研究，这是因为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就需要了解全球不同地区的情况和问题，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后来，苏联、西欧及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计划，其主旨也是如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复兴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开辟了另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这就是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研究。地区研究和现代化/发展研究都需要多门传统学科集结在一起进行共同研究，这就导致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跨学科”和“多学科合作”的新的发展趋势。^④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的，反过来说，也只有充分担当起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充分地适应或满足社会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繁荣和发展起来。社会一旦有了某种强烈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会把科学推向前进。不仅对自然科学是如此，对哲学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无的放矢。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担当功能，主要是针对那种完全游离于民众和社会需要之外的所谓“纯粹”学术研究而言的。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学术研究，尤其像人文学术研究，比如古代文献和语言的研究，都要直接地满足社会需要，那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观点，我并不赞成。但是就整体而言，学术研究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担当应有的社会功能，才能发展和壮大自身，这也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一条规律。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提到一个口号，叫做“为学术而学术”，即是说，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不应该左顾右盼，不应该受外在于学术的东西左右，而要保持学术自身的独立性。但我认为，这只是在较低层次上对学术提出的要求。“为学术而学术”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在探讨学术的时候，仅仅是为了玩概念的游戏。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学

术研究，都有自己的社会担当功能。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做到像张载所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担当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一定要宣传既有的、现有的道德或政治原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有自己的价值负载，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学术研究变成了闲来无事的诗词，无病呻吟的咏叹，那它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或者说它可不可能存在就很值得怀疑了。何况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天下太平、万事大吉、歌舞升平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术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或者说不能适应时代和事业发展的需要。例如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都感觉哲学被边缘化了，这可能与哲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有关，因为哲学不可能是那么立竿见影的东西。但是哲学并不是无用的东西，它也可以满足甚至提升社会的需要。黑格尔讲，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研究者，有几个人在把握时代精神？在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疾苦？在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从而使自己的哲学创作，自己的哲学研究的成果，确实能带给读者一种内心的震撼。其实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老百姓有很多问题，包括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你就是把哲学当成一副安慰剂，那也有必要提供出这样一副安慰剂。可是我们的哲学做得怎样呢？我觉得从这个要求来看，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即如何正确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担当功能。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为了探索 and 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其社会担当功能比较容易理解。至于人文学术所担当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可能需要反思一下人文学术担当其社会功能的方式。这就要充分理解人文学术研究的特点。一般来说，你不能像期望技术科学那样期望人文学科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人文学科不能提供这样的东西，你不能期望它提供它不能提供的东西，而只能期望它提供凭它的本性能够提供的东西。反过来说，你也不能因为它没有提供你想要的而它又不能提供的东西就说它不重要，从而忽视它。事实上，人文学科对于传承文明、促进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提供精神产品以满足民众的文化和精神需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等，都起着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作用。

三、学科分割过细既不利于问题研究也不利于学科建设

现在学术体制的弊端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现行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学科分割过细、壁垒森严，这既不利于问题研究，又不利于学科建设。

其实，现实生活中哪怕最细小的问题，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例如“吃饭”这件在生活中最普通最经常的事情，如果认真地细究起来，几乎可以关涉到人类的所有学科——生理学、营养学、经济学、美学等等。但是，正如人类不是在有了营养学等等之后才学会吃饭一样，人类也不是在有了语言学之后才学会说话，有了生理学之后才学会消化。在人类生活中，问题总比学科更根本，问题是起点和归宿，学科则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分析性思维的习惯是先把问题肢解为各个不同的部分或方面，然后再由不同的学科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对于认识问题来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但对于解决问题来说则远为不够。如果我们认定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潜在地蕴涵着“解决问题”的诉求，那么分析性思维就不是自足的和充分的了。更何况学科的划分也是相对的，必然会随着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图景的变化而改变。恩格斯在谈到分析性思维时曾经说过，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⑤其实，人类生活的土壤本身是统一的，并无所谓学科之分。只有扎根在这土壤之中，生长出来的植物才会是茁壮的，至于这些植物被怎样分类则是次要的。

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从而使这些问题永远不可能在单一学科的范围得到彻底的解决。当代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现代性的建构和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显然已不再是某些个别学科领域的问题，而是包括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在内的各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例如全球化中的价值和文化冲突问题，就不仅是哲学，也是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又如现代性问题，现在不仅是哲学，也是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如孙麾在《从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一文中所说，当代学术前沿的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综合特点，单凭一个学科的资源已无法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跨地域性发展趋势，使得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失去了解决人类面对的文明冲突和生存困境的意义和价值。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谈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没有一个概念图式可以把一个社会现实描绘穷尽。每个概念图式都是在各种特征中遴选某些特征的棱镜，以便突出社会变迁，或者更具体地去回答某些问题。”“社会科学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想通过一个凌驾一切的单一概念去观察一个社会的特点，使得人们对现代社会复杂的特征（重叠的甚至矛盾的特征）产生误解……。任何社会都混合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体系（有的特征是所有体系所共有的，而有些特征则是历史的和特殊的），要根据人们心中的问题，从不同的有利点加以分析。”^⑥事实上，我们总是可以在各种学科交叉重叠的地方及空缺环节寻找到生长点，在不受任何学科成见束缚的思想空间中产生出新的研究课题。

近日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对跨学科交流发出了呼吁。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教授在演讲中提到该校颇富特色的“主题研究所”。据他介绍，在早稻田，志趣相投的教师可以就他们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跨系科自由组成“主题研究所”。每个所员缴纳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的会费后，研究所就可以在学校注册成立。同时，研究所也可以邀请社会上或产业界的一些人士参加进来。这些“主题研究所”的研究资金必须由研究所的人自己到企业或是政府中寻找，资金到位后由校方管理。中方校长认为，“主题研究所”在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甚至在人员确定上拥有的开放性，很适合目前跨学科交流的趋势，有利于一些新型的交叉学科的建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教授的见解也让我们认识到打破学科壁垒的开放性在大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演讲中以艾滋病的研究举例，在他们学校，生化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以及文化方面的专家都在研究艾滋病，虽然他们之间研究的问题非常接近，但却从来没有合作过。伯林格校长在演讲中还反思了目前大学的高度专业化，认为这使大学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服务社会的机构，也使大学失去了与公众交流的机会。事实上，学术界由于学科领域的限制使他们的作用发挥总是有限的，而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就需要采取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合作方式，打破不合理的学科壁垒。^⑦

这无疑对那些习惯于在传统的学科框架内讨论问题的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真正面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必须调动各种学科的资源，只有通过纵横立体化的综合，才能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达到充分的相互促进、相互结合。目前国际学术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由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交融，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人文社会科学正在走向面向现实的综合化，而且正是那些学术大家、学术高手和思想巨匠们在带头做这样的努力。^⑧例如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等当代学术大家和思想巨匠，对于他们来说，现行的学科和专业已无法概括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思想本身更无法以学科和专业来限定。研究大师的人可以大师的思想为专业，但大师本身并不属于这个专业。在这种趋势下，过去那种学科分割过细、各自封闭、自我满足式的研究模式，将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然而，要打破狭隘的学科疆界，有时比划定学科的疆界更困难。不仅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

界限难以突破，就是哲学各二级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之间的界限也难以逾越。学科划分被不恰当地绝对化乃至凝固化，变成了互不往来、互不沟通的封建行会式的分工。“学科意识”在一些人那里也变形为“阵地意识”，借以保护自身的利益，拒绝他人介入。我就听说过多例因为从事跨学科研究而到处不讨好的真实故事。看来，要打破狭隘的学科界限，还需要突破某些僵化的体制性障碍。但我相信，打破陈旧的学科专业划分，确立“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研究体制，势在必行。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②《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75页。

③《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第10页。

④参见吴元梁《问题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光明日报》2004年7月27日B4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⑦参见《大学未来变革的“灵魂”》，《光明日报》2004年8月6日A2版。

⑧参见《由〈从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所引起的》，《光明日报》2004年1月29日C1版。

哲学如何面对现实问题

◎ 邹诗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湖北 武汉，430074）

哲学研究当然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但不能总是跟着问题跑。问题往往是散在的、复杂的和流动性的，并且杂陈于不同的层面，而哲学研究则带有相对的确定性，敏锐的问题意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驾驭问题、剖析问题并获得实际的解决问题的理论思维能力。可见，问题意识，乃是进入哲学研究的入口（往往也是调整和变革既有哲学研究路数的助推器），但还不能代替实质的哲学研究。而且，并不是所有现实问题都可以看成是哲学研究的直接前提，现实问题需要经过某种筛选、甄别和提炼，方能成为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当然十分重要，但坦率地讲，提出问题还只是一个开始，哲学研究应当以问题为先导，但更重要的是提升到一个相对确定的研究领域，并进行相应的理论清理、探讨、分析与思想引导。问题本身只是话题，还不是课题，从话题转化为课题，需要经过一种学术及学科的转换与提升，但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常常是直接把话题当成了课题。

哲学的研究成果必须与相应的学科领域结合在一起，并且要求对该学科领域研究的推进具有学术积累与学科建设意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固定于一定的学科领域，在问题与学科领域之间原本没有一一对应关系。问题是真实的，但学科领域常常是设定的，问题的形成是实践的产物，它并没有也不可能遵循领域既定的规则。但人们会时常把领域看成是一个确定的东西，而且在这样看时，常常有一个所谓学科领域的依据。目前在某些哲学研究领域的确存在一种研究倾向，即在对问题进行研究时，过于将问题学科化，甚至于削足就履，把问题处理成学科领域所要求的样式，但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其意义显然就要大打折扣。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甚至超出哲学学科进行研究，

但是，重大问题之所以重大，恰恰就在于涉及到哲学的全部问题，并由此带动不同哲学领域甚至于整个知识学科研究的深化或创新。有些新的重大问题的提出，往往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学科领域。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到近代哲学认识论，再到随着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状况的重大变化而形成的诸多哲学领域，本身也见证了由问题到学科领域的凝结与提升。

我国现行哲学学科乃至整个理论学科的学科制度安排模式及研究范式，亟待进行一场全面的反思及调整。我国的哲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八个二级学科。上述八个二级学科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如何系统性地体现出与哲学的关系？都是难以说清也不可能说清的问题。哲学就是哲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领域，如形而上学、知识论、价值论、社会理论，等等。对任何一个领域而言，不同的哲学思想及学术都是向它开放的，研究者也应当享有获得相应哲学思想及学术的权力——至于能不能做到，则属于研究者的兴趣与能力了。但目前，相应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总是与某一二级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某人的研究领域，在同仁心目中总是首先与他（她）所从属的那个二级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领域被完全二级学科化了，从而既失去了哲学的整体性，也失去了应有的跨学科性。应当说，时至今日，我国哲学界的学科壁垒现象仍是相当严重的，某一二级学科领域的专家，一旦涉足另一个二级哲学学科，往往会陷入学科认同麻烦，通常会被看成是“不务正业”而受到本二级学科领域专家的轻视乃至蔑视。但事实上，这种二级学科式的哲学研究模式，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哲学研究的总体质量与水平，也影响到哲学学术成果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由相应的二级学科设置，来确定研究领域，的确是中国的特色，这种情形据说在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整合以及研究水平。但是，由于这种学科划分结构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并与既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深深地牵扯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道理与利益向来是两回事，道理是“讲得通”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但一旦与利益挂钩，大概也就“行不通”了，因而也只好“将就”既定的利益机制。

哲学研究领域难以从量上确定，这正是由问题的杂多性决定的。由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刺激而形成的诸多哲学领域的活跃，应该说是当代哲学的特征。相对于当代哲学林林总总的领域，传统哲学的领域显然要单纯得多，这是由整个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决定的。但现在看来，问题丛生的现时代带来的难以计数的哲学领域，是当代哲学失去自我把握、理解与引导能力的病症所在。

一般而言，一定的哲学领域包含这样几个要素或内容：问题意识、哲学资源及方法的利用与整合、哲学信念的论证或调适、对问题本身的求解。问题意识是贯穿始终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领域的具体理论结构与环节中，作为前提性与求解方向的问题往往是隐性的和不在场的，因为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在场会干扰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过程。问题总是具体的，并带有意向性与倾向性，但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却要求理性推导与必要的抽象，并保持适当的中立立场。有些领域哲学研究之所以难以让人心服，就因为被过多的问题及情绪缠绕。其研究既难以使问题本身得到清理，也难以形成一种解答问题的方案，不仅如此，最后从“学术”层面摊开的“问题”远比“问题本身”更复杂。这里面同时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看似中立的理性推导与思维抽象，实际上隐含着一种超越于问题层面的旨在解决问题的思想信念。一种好的哲学，不仅要提供理解问题的方法，还有义务提供解答问题的信念。但如果过多地沉湎于问题的复杂性与不可理解性，就可能出现上面这种糟糕的情形，即从理路与信心两个层面封住了问题解答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和令人失望的研究路数，是不应该提倡的。业内人士常常讲，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只是强调了问题的重要性。看来，能够解决问题、甚至至少从问题的提出及剖析向问题的求解开放，同样是值得重视的。人们经常批评某些哲学常常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看来应当引起业内人士的足够反省。

由一定的问题意识引导的领域哲学的背后，都包含着一定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硬”的内涵或结构。在这里，传统哲学的经典领域与现代哲学的复杂领域之间构成一种内涵上的关联性，问题是通过领域支撑起来的，而领域又是建构在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应有的关联之上的。这就会引起人们对于现代繁杂的领域哲学的兴起提出实质性的批评。一个时代的问题再多，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哲学问题，即理性的时代际遇问题。我曾提出，目前哲学界诸多领域哲学之间虽然使用了不同的称谓形式，并且都蕴含着这一时代特有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但在话语与概念操作系统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①实际上，在更大的程度上讲，诸多领域哲学，也都可以归结为这一时代形而上学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性社会与文化处境下的不同体现与运用形式。

领域哲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的繁荣，而且，应当承认，最近这些年来哲学界出现的诸多哲学领域也都有其兴起的问题背景及学理依据。但是，看来，没有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新的哲学领域。所谓声称确立了一个个新的哲学领域，如以前所说的创建了“××学”，甚至于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哲学体系，恰恰表现了当代哲学的不成熟。而且，领域哲学的兴起，一旦与某种学科建设上的需要及其正当性关联在一起，必然会造成种种学术泡沫，于健康的学术研究及其积累有害无益。我们发现，更多的哲学领域，看来是夸大了所在领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价值，这的确是值得学界深入反省的。我个人近些年来一直在从事生存论问题研究，最初甚至也有建构一套生存哲学的设想，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到，我对生存论的研究，不过是通过生存论这一领域而展开的形而上学研究，或者说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境遇研究。所谓生存哲学，就是哲学本身，但哲学却不限于生存哲学。

当代哲学诸多学科领域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关联，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而是内在的和思想意义上的。一般而言，任何一个课题，都有该课题的“前史”，这是研究者需要充分重视的，也应当花足够的精力去整理和梳理的。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史的追溯与训练工作是相当重要的，忽视不得。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并不是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存在一条可见的哲学史线索。现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但凡有学者发现一个自认为重要的领域，都要花去相当多的精力进行哲学史的清理，好像不做这种工作，研究成果就显得没有学术价值。事实上，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许多研究成果中，对哲学史相关理论的考察，与论者本人关注的问题及领域，完全是风马牛不及，由此形成的东西，当然也就成了伪学术，害人也害己。应当说，大多针对现实问题的领域哲学研究，哲学史往往是不在场的；或者，要进入该领域研究，本身就需要反思和处理相关哲学史资源，并转换问题的思考角度，进而深入相应的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本身才显出学术含量与学科积累意义。

问题本身也是需要区分的，有现实的问题，也有理论的问题。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区分，但却有形式上的差别，有表现方式和层次上的差别。现实问题有其偶然性，体现着实存性，而理论问题则蕴含着理论把握或解释现实的问题性，并体现出理论发展本质要求的实然性；理论问题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映，同时也必须是一种提升。哲学的问题主要说来是理论问题，或者说是被一定的现实问题激活的理论问题，是融汇了现实问题的理论问题。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提醒甚至警醒着哲学家的工作，这意味着哲学家总需要对现实问题高度自觉，但这种自觉并不在于要时时刻刻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通过特有的方式实现的，这就是通过思考形而上学的命运反映时代的现实问题，这是哲学家的主业。因此，相对而言，哲学家这一群体对于现实问题的反映向来较迟钝，这种迟钝里面其实包含着哲学学科应有的沉静与从容。因此，大可不必抱怨哲学家们对现实问题“失语”，其实，如果哲学家们一窝蜂地关注和介入社会现实，倒真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当然应当鼓励哲学家积极关注现实问题，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现代公民社会，哲学家作为普通公民，而且应当说是具有较高素质与身份的公众人物，本身就承担着相应的社会参与义务、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公共参与变成哲学家的主业。实际上，大体上说来，哲学家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角度

关注着不同的现实问题，而且，具体的关注样式也不一样，有的是直接的关注（甚至是直接介入），他们对现实的关注与他们哲学的“文本”工作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更多的还是间接的关注，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潜在的、不在场的，包含于字里行间，或者干脆在话语之外。

哲学疏离生活的情形当然是有的，传统哲学就是如此，这一点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不过，马克思是不是就由此认定传统哲学缺乏生活的理解与自觉，看来还值得重新审视。我觉得，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两种情形：一是抽象的理性形式肢解了人的生活；二是直观的经验没有达到人的生活深度。至于传统哲学所强调的超越性对人的生活意义的肯定，马克思部分地认可了。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借助于超验性的宗教实现的对人的生活的肯定，仍然只是一种外在的规定性，而马克思强调的则是人通过自我解放的方式实现的超越性。因而，在传统哲学看来是超验的形而上学，在马克思看来则是通过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实现的生存论形而上学。对于传统时代而言，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是自在的，并不存在哲学与生活的疏离。换句话说，哲学家们纯粹的精神构造所反映的正是对应然生活的构想，对自在生活的内在理解与超越，恰恰是通过哲学表现出来的。传统哲学的超验性与传统生活世界在本质上的自在性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哲学精神的超验性从绝对性上表明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超越性诉求，同时也映证了人们具体生活样式的自在性，一种自在的生活世界必须需要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学。在这一意义上，现代人对传统哲学与生活样式的疏离的批判其实只是基于现代人的哲学观与生活观，对于传统哲学而言，这种批判其实是外在的。“当生活以其自在的方式展现出来时，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并不成问题，反倒是：当自为的生活成为时代的主题时，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才变得问题重重。”^②因此，当我们说当代哲学疏离生活时，其实是说当代哲学尚未达到对当代生活的内在理解。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哲学主张。但是，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把时兴的问题及话题转换为课题性的学科领域，依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①参见拙作《“领域纷呈”与“家族相似”》，《学术界》2002年第2期。

②参见拙作《生活世界转向：意义及其边界》，《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后学科：背景、中介和关键词

◎ 张立波（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在各种前面冠以“后”字的词组纷纷扬扬之时，谈论“后学科”似乎有追逐时尚之嫌。但另一方面，“后学科”一词的含义是不难揣测的，后工业、后结构、后现代之类词汇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后学科的意指。我犹豫再三，感到在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中，引入“后学科”的观念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有助于问题域的开阔和深化。

—

依据我们有限的视界，詹姆逊的《论“文化研究”》一文中出现了“后学科”这个词。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概括地说，文化研究是适应当代多元范式要求的超学科、超学术、超理论的研究方式。它可以说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

为一项促进“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①这里，詹姆逊表明了两个意思：其一，后学科是对当下时代状况的一种体认；其二，后学科是一种知识和社会的规划。

从理论背景来看，后学科的兴起和后现代科学（知识）直接相关，对此，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有明确的阐述。众所周知，在传统知识的表达中，叙述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它一方面可以规定能力标准——这是叙事被讲述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评价社会实现的或可能实现的性能；叙述形式不同于知识话语的发达形式，它自身接纳了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叙述往往需要遵守一些规则，这些规则确定了叙事语用学。叙事的传统同时也是标准的传统，这些标准的传统界定了三种能力，即说话能力、倾听能力和做事能力，共同体与这些能力本身以及这些能力的环境的关系在这里成为游戏。一组构成社会关系的语言学规则与叙事一起得到传递。利奥塔强调，在前现代社会，叙事之所以被视作知识，只不过是它们遵从社会准则，这些准则严格确定了谁有权言说，对谁言说以及何时言说。只有遵从了这些社会准则，所讲述的故事连同讲故事的人就都具有权威性。

现代性就是现代理性、启蒙、总体化以及历史哲学，其特征是攻击叙事性知识，宗教和神话之类的叙事被视作愚昧、迷信而遭到摒弃。现代人用他们看来能够产生客观真理的科学，取代了以诗体讲述的故事和追悼亡灵的神话。在传统社会中，叙述知识并不重视自身的合法化问题，只要故事以及讲故事的人遵从社会习俗，不借助辩论，也不提出证据，就使自己获得了信任。现代科学陈述却不能从它讲述这个故事本身获得任何有效性，只能从外部寻求其合法性来源，只认可外延性的叙述。换言之，只有“真实的价值”决定科学陈述的可接受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知识与其他那些组合起来构成社会关系的语言游戏分离了，成为一些特定的职业和机构的活动方式，不再是社会关系的直接的因素，和社会共同体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样，问题就产生了：科学有什么社会与道德意义？利奥塔认为，现代科学是通过抛弃叙事来宣扬其优越性的，但事实上，只要科学语言游戏希望自己的陈述是真理，只要它无法依靠自身使这种真理合法化，那么借助叙事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叙事与科学之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其实都是语言游戏，后者的存在并不比前者的存在更必然，也并不更偶然。不过，科学所依据的叙事模式有别于前现代叙事，利奥塔称之为“宏大叙事或元叙事”，也就是说，它们是综合性叙事，能够赋予较小的或地方性的故事和实践以内在联系和意义。比如，启蒙运动所讲述的由科学知识进步所推动的人类进步的故事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践正了名。

利奥塔把后现代界定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所谓元叙事，是指“求助于某种宏大叙事……如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创造等。”面对其合法性有赖于叙事这一矛盾处境，科学逐步摒弃了宏大叙事。由于没有统一的故事或基础，科学便分崩离析为各种各样的学科、专业领域及范式。通过关注不可确定的现象、控制精度的极限、不完全信息的冲突、量子、“碎片”、灾变、语用学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使自身的发展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利奥塔的分析符合后工业社会和消费主义的主题。后工业技术特别是电信和计算机方面，使我们关心的重点由知识的内在价值转向对它在组织系统中获取效率或实际运作效果的作用评价上。尤其是在科学中，知识的评估、研究的进行不再依据内在的品质，而是依据它是否能转化为计算机语言。简言之，知识将碎裂成片断并商品化。

在现代的学科建制中，不同学科都分享了关于科学性的共同的原则和标准，拥有一些共同的深层的理论前提和逻辑。依据科学性的不同，这些学科形成了等级关系，也就是科学的、次科学的、非科学的。当然，各门学科都在不断增加自身的科学性，忙于就晦涩的概念和方法论进行争论。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理论已经变得脱离现实，和公共生活日益疏远，陷入狭隘的学科问题，只和理论专家有关了。由此，伴随理论的成功，理论对现实的反应越来越迟钝了。塞德曼说：“要使社会学重新恢复活力，就要求我们抛弃科学主义，即那种越来越荒谬的认为自己在讲述真理，自己是认识论上享有特权

的话语的断言。”^②这也就是要求社会学理论恢复、强化和社会理论的关系，而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至少从18世纪以来，一直是同时存在的，并经常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后现代是现代的初始状态，那么，与之类似，后学科也可以说是现代学科建制的初始状态。在学科建设中，我们有必要一再返回到这种初始状态，抛弃对于我们概念策略的终极的、普遍的、基础的追求，转而追求局部性、实用性的辩护根据，充分发挥各门学科的实践和道德的特点。

二

对身为教师的我们来说，学科建设的具体环节或者说中介是课程。后学科的具体实施，也要通过对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的把握来体现，包括：对课程的哲学基础、历史基础、心理学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对课程设计、编制、实施、评价的具体过程的更具包容性的把握；对课程的目的和具体目标的新的认识；还有，教科书的重新编写，等等。教科书是否可能被取代？或者寻求一种替代性的教科书？如何处理课程中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教师在课程中的责任和角色应怎样调整？对后现代课程做出深入研究的Willam E. Doll，在《后现代课程的基础》、《走向后现代课程》、《课程的后现代视界》等著述中强调，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的影响非常深远，势必促成对教育秩序的新感觉和师生之间的新关系。

从后学科的角度看，没有哪一种方法能解释课程或提出真正的课程理论；不存在大师叙事；没有一种主导范式；没有一种通用的对课程的看法；没有哪种课程是永恒的。课程不是单一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课程理论看作是精确的、系统的假设和对假设的检验。斯拉特里说：“在后现代时代……课程所强调的是这样一种话语，即它们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课程对人类生活条件、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在文化、历史、政治、生态、美学、神学和自传方面产生的影响，而不是用于理解对不涉及背景和价值中立的学校教育事件及无关紧要信息所作的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价。”^③

三

在后学科及其课程建设中，文化、文本、话语和叙事是毋庸置疑的关键词。

文化 在后学科中，文化的定义是由文化研究确定的。这个定义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和通俗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它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意义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和经济似乎都可以被视为在文化范围内和通过文化运作的。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意味着过去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划分不再有效。而且，这种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间充斥着宰制与抵抗、屈从与抗争之间的斗争。由此，文化研究似已成为当代最富有左翼精神的学术运动。文化被理解为文本、图像和再现，而不是被理解为社会关系，或者被精简为消费品和消费的对象。霍尔指出，从一开始文化研究就是作为一种激进的质询出现的，它反对简化论和经济主义，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比喻，抵制虚假的觉悟概念；但不管文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离开得多远，它毕竟还是保留了某种紧迫的政治责任感。^④文化研究的理论始终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同时是一种理论的实践，与其说文化研究的理论旨在提供某种范本，不如说它旨在将不同的本土文化研究实践纳入一个全球的参照视野之中。

文本 文本最初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一个概念，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文本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都熟悉德里达的名言：文本之外没有他者。文本由表述性符码组成，具有物质形态，它可以是书籍、录音带、照片，也可以是服饰、饮食、手势、建筑。罗兰·巴特探讨了从作者到写者、从作品到文本的转换过程，指出文本中包含了“意指实践”、“意指活动”、“生产性”、“互文性”等概念，并需要由这些概念来说明其内涵。文本的结构是开放的，是离心的、解构的。基于罗兰·巴特对“读者式文本”和“作者式文本”的区分，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新概念，

意在强调，大众文本展现的是浅白的东西，内在的则未被言说，正是这些文本中的裂隙和空间，使得“生产者式”读者可以填入其社会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间的关联。

话语 所谓话语，是指对主题或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表述方式。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方法的流行，在相当程度上要归于福柯的影响。在话语和权力、社会主体对于知识的话语建构，以及话语在社会变迁中的功能等方面，福柯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在其思想发展的某个阶段，福柯关注医学、精神病学、经济学和语法等人文科学话语，强调的是话语“可能性的条件”，是知识领域的种种“构成规则”。话语是生产与再生产意义的社会化过程。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而且建构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位置。尽管话语可以追溯到文本中，话语本身却不是文本性的。法国的佩奇尤克斯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出发，提出一种用来进行话语分析的批判的方法，这一方法试图将社会的话语理论与文本分析的方法相结合，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书写的政治话语。

叙事 给叙事下定义是困难的。叙事、叙述、故事、话语、历史等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相互置换。History 同时意味着“故事”和“历史”。叙事无所不在。日常生活中，电影、广告、神话、绘画、唱歌、笑话等都属于叙事。在更为学术化的语境中，人们都承认，在个人回忆和自我表述中的个人身份表达中，在诸如地域、民族、性别等集体身份的表达中，叙事都占有中心地位。利科把人看作是叙事动物。如果我们将课程看作不同的文本，将文化看作一系列相互影响、生成、附加文本的文本，将教学法看作不同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的很多叙事。

四

后学科的旨归是更多新奇的思想。在研究和教学中，概念不断被讨论并发生改变。不存在一种描述现实的正确方式，所谓独特的科学方法或科学叙事是不存在的，科学家所讲述的也只是各种故事而已。并不存在与科学相联系的宏大叙事，存在的仅仅是一系列包含着新思想的产生和需要证明的小型叙事，亦即有关一系列局部游戏的共识和有待进行的行动。由此，后学科改变了知识一词的意义，它生产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后现代科学的目的不再把知识统一起来，而是趋向局部的、地方性的、实验性的知识，致力于创造更多的范式、方案和策略。后现代知识不仅仅由学科内部的传统和争论所推动，而是积极参与有关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公共世界的争论，因而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事物的承受力。

在这个意义上，后学科表征着一种生活态度和社会图景。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说，教化哲学以使一场谈话得以继续而不是发现真理为目的。为了使谈话能够持续下去，所需要做的只是一种悠闲自在、没有任何压制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新的洞见和视角得以产生，并促成种种新的、不规则的观点。后学科的建设也就是一项去发现新的、更好的、更为有趣和更富有结果的谈话方式的工程。我们研究，不是为了寻求最终的答案；我们教学，也不是为了急急忙忙地达成所谓的统一，而是激发更多的差异，更多的可能性。

①参见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400页。

②史蒂文·塞德曼：《社会学理论的终结》，载《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③转引自艾伦·C. 奥恩斯坦、费朗西斯·P. 汉金斯《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

④参见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问题意识、体系精神与学科特性

◎ 崔唯航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732)

一、话题与论题: 问题的两个层次

体系都是学科体系, 学科也都是面向问题的学科。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对问题的研究, 没有问题, 也就没有学术研究。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说, 任何问题也都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呢?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一否定同时意味着, 在我们看来, 学术研究所探讨的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部分, 而非全部。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学术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问题, 而其他问题却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问题呢? 换言之, 决定是否成为学术研究所探讨问题的标准是什么?

在提出这些问题之时, 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前提, 即问题可以分为不同性质的两类, 其中一类是学术研究的问题, 另一类则是非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两类问题的差别, 早在古希腊时代, 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所认识。例如柏拉图就认为, “什么东西是美的”和“什么是美”是两类不同的问题。关于前者, 可以用一个个具体的美的东西来回答, 而后者则不能用任何具体的东西来回答, 而只能着眼于使美的东西成其为美的那个美本身, 亦即美的共同本性。这个美本身, 美的共同本性无疑不再是感性具体的存在, 而只能是一个思想性、观念性的存在——概念。在这里, 柏拉图初步区分了两类问题: 第一类是纯粹感觉经验意义上的问题, 对其可以用感性具体的存在来回答; 第二类问题则超越了感觉经验的层面, 进入了思想的领域, 因此对它只能借助于思想性、观念性的存在——概念来完成。由于前一类问题完全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 人人都可以在常识的意义上加以谈论, 因此我们将其称为话题; 而后一类问题建立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之上, 只有运用概念范畴的方式才能予以专门的研究论证, 因此我们将其称为论题。在柏拉图看来, 只有后一类问题——论题, 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柏拉图哲学在最深层意义上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哲学的发展方向, “纵观整个哲学史, 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①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又源于哲学, 于是, 话题与论题的划分也“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

随着时代和historical的变化, 话题与论题也“有所变化”。具体而言, 就是话题逐渐挣脱感觉经验的“完全”束缚, 在某些“侧面”进入了抽象概念的层面。即人们在日常的谈论中, 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概念范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于是乎话题与论题的界限似乎日趋模糊。你的论题使用概念, 我的话题也使用概念; 你在学术研究中研究正义, 我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谈论正义; ……这是否意味着话题与论题的日趋融合呢? 绝非如此。事实上,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日益专门化, 话题与论题的距离不是更近了, 而是更远了。所谓更远了, 就是说学术研究与常识意义上的谈论逐渐分离为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 学术研究与日常谈论还都采取了相似的形式——对话的话, 那么到了现代, 随着学术规范的日益完善, 学术研究已经完全从日常生活中独立了出来, 成为了一项特殊的工作。随着这一“独立”的完成, 话题与论题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曾以对芝诺“飞矢不动”命题的分析为例, 深刻阐释了话题与论题之间的根本差别。借用黑格尔的论述, 列宁认为, “芝诺从没有想到要否认作为‘感觉确实性’的运动”,

而“问题仅仅在于运动的真实性”，也就是如何以“概念”的方式来说明“运动”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它。”^②可见，在列宁看来，有没有“感觉确实性”的运动，乃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话题，并非理论研究的问题，理论研究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它”。这就揭示了话题与论题之间的根本差异，即是否“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而“概念的逻辑”，亦即概念的辩证关系，“概念的相互依赖”，“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过渡”。^③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概念的框架或网络。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框架或网络之中，概念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离开特定的框架、网络，概念就不再作为概念，而仅仅作为一个“名称”而存在。所以，严格意义上讲，话题中的概念，由于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概念框架或网络，因此，它不再是一个概念，而仅是一个“名称”而已。

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即只有建立在“概念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论题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判断一个问题是否为论题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建立在“概念的逻辑”基础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话题与论题的差异，并非实体性的，而是关系性的。也就是说，一个问题属于话题还是论题，并非天生注定并永世不变的，而是随着其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自由问题，当人们在常识意义上进行谈论时，它就是一个话题，而一旦人们将其纳入特定的概念框架之中，比如探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由问题时，它就变成了一个论题。可见，同一个问题，既可以是话题，也可以是论题，决定是话题还是论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它。

二、体系自身与体系精神：体系的两种形式

在学术研究中，与问题研究相对应的是体系建构。在普通意义上，人们往往以为二者是对立的，即进行问题研究就意味着反对体系建构。进入20世纪以来，学界出现了一股反体系的浪潮。M·怀特在其《分析的时代》一书开头第一句就说：“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④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一向以其恢宏而庞大的体系而著称，“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就是对建构体系哲学的批判。

这一批判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致它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学界对体系的看法。“我甚至认为，‘体系崇拜’已经成了理论界最大的障碍。因为到头来这些体系不过是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一版不如一版的翻版。”^⑥这段颇具代表性的文字鲜明展现了我国学界反体系的呼声和倾向，在这一倾向的作用下，任何建构体系的企图都被视为一种“不自量力”的狂妄和无知。事实上，彻底否定体系既无必要，更无可能。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借助于“概念的逻辑”来进行的。而“概念的逻辑”又必然暗含着一个特定的概念框架或网络，这样的框架或网络本身就是一个体系。只不过这样的体系往往是以“潜在”的形式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最终意义上引导并决定着学术研究的系统化和整体性的基本走向。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内在”的“精神诉求”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所以我们将其称为体系精神。与体系精神相对应的乃是由“外在”的具体的概念、范畴组成的体系自身。体系精神与体系自身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完整的体系。

如果说体系精神乃是体系的内在形式的话，那么体系自身就是体系的外在形式；如果说体系精神作用于一切研究过程之中的话，那么体系自身则仅作为一部分研究成果的构成形式而存在。这也就是说，体系自身乃是一种特殊性的存在，而体系精神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因此，从理论上讲，否定体系的最大限度仅在于否定体系自身，而绝无可能否定体系精神。否则，这一否定只能是零乱的闲谈，而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从事实上看，即使在那些试图彻底否定体系的研究之中也同样贯穿着体系精神，甚至在那些宣扬思想的碎片化和片断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所隐含

的趋于整体性和系统化的“建设”维度。因此，任何彻底否定体系的努力都像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腾空一样荒谬和自相矛盾。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当“德国知识界”“平庸的模仿者们”把黑格尔看作一条“死狗”而予以抛弃的时候，马克思却“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⑧至此，我们就可以知道，问题研究与体系建构并非水火不容的两极，而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

三、以合乎学科特性的方式进行问题综合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问题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日趋呈现出一种复杂化、综合化的趋势。与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科内部的分化却越来越细，这意味着单凭任何一个学科的资源已经无法解决这些综合性的问题。^⑨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应当也必须实现一个研究模式的转换，建立一种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跨学科、自觉沟通和配置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术资源的综合研究模式。应当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需要经过我们长期实践摸索的问题。在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基本的方向或原则，即必须以合乎学科特性的方式来进行问题综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⑩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问题，并且认为每一种方式都以其“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就是每一学科都应当也必须运用其“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亦即以合乎学科特性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这一观念对于我们所要建立的以问题为中心的综合研究模式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这一研究模式必然要涉及到多个学科，这就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之中很容易出现那种不顾学科特性，盲目综合的现象。在此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太多的教训。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一些学者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旗帜下，不顾美学自身的学科特性，盲目引进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一味热衷于系统层次的繁琐划分和信息流程的简单比附，从而把美学理论变成了数学符号、公式、图表和数学推导过程的堆积。在文艺学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同样打着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旗帜，热衷于借助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手段分析大脑的机制，力图揭开形象思维的秘密，结果却把这一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问题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问题。这些事例对于我们所欲建立的问题综合研究来说，无疑是前车之鉴。

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在论述围棋时曾做过一个比喻，他说布局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跑车，布局好了就像跑车的方向对了。只要方向对了，无论快一些还是慢一些，总会到达目的地。但是如果方向错了，开得越快，离目的地就越远。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工作。

①《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44页。

②③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6、167页。

④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

⑤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页。

⑥范景中等：《理想与偶像》，译者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96页。

⑨参见孙麾《从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载《光明日报》2004年1月8日C1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

•经济学 管理学•

与时俱进的经济学和管理学

◎ 乌家培

[摘 要] 工业革命的结果,促使经济和管理在社会实践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经济学和管理学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信息革命产生了新的“产业革命”,对现代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经济与管理的现代化发展,金融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了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本文分析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对信息社会条件下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作努力的探索。

[关键词] 工业革命 经济学 管理学 信息革命 金融学 与时俱进

[作者简介] 乌家培,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10。

[中图分类号] F01;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4) 09- 0020- 06

一、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工业革命,即恩格斯最早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的“产业革命”,是农业社会中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向工业社会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厂制度转变的过程,它既是生产力的革命,又是生产关系的革命。工业革命的政治前提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殖民主义战争。工业革命的科技基础是16-18世纪数学、物理学、机械学等自然科学的进步和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纺纱机、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工业革命发轫于英国,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以纺织业为先导,遍及印染、冶金、采掘、化学、交通运输、机器制造、印刷和造纸等各种产业,历时100年左右,至19世纪30年代基本完成。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从19世纪20-30年代至70-80年代。而俄国、日本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顺序以50年或稍多的时间陆续进行和完成了工业革命。其中,美

国由于没有封建残余的束缚,在工业化过程中还实现了资本主义大农业。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由于法国和德国,特别是美国在工业化长过程中抓住了重点发展钢铁、电力、汽车、信息通信等产业的历史机遇,使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由东方转移到西方的基础上,完成了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最终到美国的历史大转移。

工业革命推动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促进了市场化、社会化、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彻底取代了封建主义,并催生了社会主义,使经济和管理学的实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和管理学就逐步发展起来。

经济学出现于工业革命酝酿期17世纪中叶,形成于工业革命中后期的19世纪初。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集中在工业发达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尤其是英国,从马克思称其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配第(1623-1687年,其

代表作是 1676 年写成 1690 年出版的《政治算术》) 开始, 有斯密 (1723- 1790 年, 其代表作是 1776 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李嘉图 (1772- 1823 年, 其代表作是 1817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后来还有主张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的凯恩斯 (1883- 1946 年, 其代表作是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法国有重农主义学派的布阿吉尔贝尔 (1646- 1714 年, 其代表作是 1695 年出版的《法兰西详情》) 和魁奈 (1694- 1774 年, 其代表作是 1758 年出版的著名的《经济表》), 以及抨击把财富积累作为目的的西斯蒙第 (1778- 1842 年, 其代表作是 181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德国除历史学派李斯特 (1789- 1846 年, 其代表作是 1827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 外, 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创立于 19 世纪中叶) 的创始人马克思 (1818- 1883 年, 其主要代表作有 1885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1 卷等) 和恩格斯 (1820- 1895 年, 其主要代表作有 1876- 1878 年陆续发表的《反杜林论》等)。经济学在美国出现比较晚, 最早的代表人物有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研究的克拉克 (1848- 1938 年, 主要代表作是 1907 年出版的《经济理论要义》)、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 (1857- 1929 年, 主要代表作是 1934 年出版的《我们正在变化中的制度论文集》)、研究经济周期的权威米切尔 (1874- 1948 年, 主要代表作是 1951 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发生的现象》), 但美国经济学发展特别快, 至 20 世纪达到了高峰。从 1969 年以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绝大多数是美国经济学家,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与之媲美。

从经济学的形成过程看, 它是在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是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 主张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他们自己的研究范围并没有限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研究, 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也作了论述和预见。

工业革命对管理学形成的影响不同于经济学, 是在工厂制度普遍建立后管理经验在英国的

积累和向其他国家的推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个过程进展缓慢。直到 19 世纪中下叶, 美国出现了铁路建设热潮, 开始有了“股份公司制”, 并扩展到全部工商企业, 产生了“经理革命”。当时美国持续了近 100 年的社会性管理研究潮流即“管理运动”。这一运动使经验管理演变成为由美国工程师泰勒 (F. W. Taylor) 在 1895 年提出的“科学管理”。泰勒于 1911 年发表了重要著作《科学管理原理》。嗣后, 分散的、偶发的、不完备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就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包括企业制度、组织结构和规则等)。从泰勒制 (企业通过科学的劳动组织来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管理制度) 到福特制 (1913 年福特汽车公司采用的大批量产品流水生产线作业的管理制度), 既是科学管理的进步, 又是工人对资本和机器的依附性的增强。由于管理学更偏重于实践, 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比经济学诞生要晚一个多世纪。在工业革命中后起的国家涌现的管理学先驱反而更有影响。例如, 古典管理学的三位先驱, 一个是前面提及的泰勒 (1856- 1915 年), 一个是德国的韦伯 (1864- 1920 年), 一个是法国的法约尔 (1841- 1925 年)。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泰勒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 他的贡献在于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法取代旧的经验管理。韦伯是三人中唯一的教授, 著有《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一书, 其贡献在于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的权力为基础, 这是有效地维系组织连续性和达成组织目标的需要。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在欧洲影响较大, 他认为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企业, 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①

二、信息革命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影响

信息革命源于 20 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它继工业革命掀起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运动之后, 又在此基础上发动了席卷全球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浪潮。这一浪潮冲击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每个角落, 使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社区、网络企业、网络金融、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数字地球、虚拟合作、智能网络、信息战争

等等新事物五彩缤纷，令人应接不暇，几乎来不及学习。应当看到，这次信息革命“目前仅仅是揭开了一个序幕”，“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在整个 21 世纪不断发展”。^②

信息革命既是科技革命又是产业革命，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但有一种观点把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信息革命仅仅归结为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和重化工业及电力工业、汽车工业为主导的前四次“产业革命”，之后以 IT 产业为主导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并认为以何种产业为主导尚未测准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正在到来。^③当然，产业革命应怎样定义、按什么标准来划分、历史上已发生过几次等问题，都可以探讨，但 IT 产业革命不等于信息革命，后者还包括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即使 IT 产业革命也远未结束，因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和电信等产业正在迅猛发展中。

信息革命对经济和管理产生的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上来。同时，信息革命还会通过研究手段信息化直接影响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

关于信息革命对经济学的影响，早在 1997 年我就撰写专文作过论述，^④这里只择要说明其主要表现：

1. 研究客体有变化。以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工业社会的经济及其发展规律性。随着工业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向信息社会转型，经济学还需要研究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以及信息经济及其发展规律性等新问题。以往经济学研究的客体局限于物质资源（包括能量资源）配置问题和物资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问题，由于信息革命的影响人们认识到信息（包括知识）也是重要的资源，信息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有与物质资料不同的特性，信息的流动还对物质资料的流动起反映和引导作用，因此经济学需要扩大自己的研究客体。可以说，经济学面临“新经济”的挑战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由萨缪尔森等主编的 2001 年出版的第 17 版《经济学》教科书，已对这些变化有所反映，如扩展了信息经济学的内容，包括信息定价、网络

效应、信息网络经济等等。

2. 研究视角也有变化。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不把信息视为变量而当作常数来处理，总是假设信息是充分的、完备的、对称的，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不需支付任何代价，但事实上，信息却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非对称的、有成本的，而且有时成本还很高。我们把这些前提引入假设，一系列经济理论就需要作相应的修正或改变。信息是研究经济问题一个新颖的视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信息的特性——非对称性影响着个人、企业、市场和政府的经济行为。在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风险程度在提高，为排除不确定性和减少风险，信息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现。

3. 研究方法和手段更有变化。信息革命加强了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巨大潮流，也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经济学作为最先与自然科学联姻的一门社会科学，分享信息革命的成果较早较快，它积极引入电脑模拟方法、信息与信息模型方法、未来研究方法等一系列源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方法，并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包括网络技术等先进手段，纷纷建立电子商务实验室、金融实验室等研究基地，以改进自己的装备。

如果说工业革命对管理学形成的影响慢于经济学，那么信息革命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却比经济学来得快和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管理学的实践性强于经济学，信息革命促进管理变革比促进经济变革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经济变革更多地涉及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调整。

关于信息革命对管理学的影响，我曾在 2000 年作的学术报告《论管理科学的发展》中有所论述，^⑤这里也只择要说明其主要表现：

1. 发展方向变了。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管理学正逐步从物本主义为主向人本主义为主进化，从科学理性为主向人文价值为主提升，从操作研究和战术研究为主向战略研究为主转变，从内部管理研究为主向内部管理与外部管理相结合而以外部管理研究为主发展。沿着上述方向发展的管理学具有同更多的其他学科（如信息学、工

程技术学等) 相交叉、不同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如西方的和东方的管理思想) 相互融合的趋势。

2. 研究内容也有变化。虽然管理学研究的组织理论、经营理论、管理方式方法这些内容没有变, 但由于信息革命的影响, 在工业社会形成的金字塔式层阶组织正在向扁平型和网络型组织转变; 经营思想已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改为赚取利润的同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以实现公共的社会目标; 管理范式由事先不管客户实际需要的批量化生产变为按订单生产, 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无论是组织理论还是经营理论或者管理方式方法, 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更大的变化还表现在传统的工业管理研究向现代的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研究转变, 创新管理、风险管理、网络管理、数字化管理、虚拟组织管理、结果驱动型管理、可持续发展管理等各种新管理层出不穷, 对它们的研究, 以及对合作竞争模式、管理非理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的研究, 也都极大地加强了。

三、经济学、管理学和金融学的关系

工业革命催生了经济学和管理学, 信息革命促进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现代化, 并使金融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 而同经济学、管理学相并列, 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自 20 世纪最后 20 年以来有着特别迅速的新发展, 非均衡理论、非线性理论、信息非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业规制理论, 以及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不断涌现。经济学为我们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提供了一整套分析方法, 也为我们分析各种经济问题扩大了视角, 确立了新的参照系。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 而应联系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环境等因素, 扩大视野, 所用的方法也不能单打一, 而应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各种经济分析方法备受关注, 有些方法如分析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计量方法、代理人在有限选择中进行选择的“分离选择”方法等, 这些方法的发明者赫克曼(J. Heckman)、

迈克法登(D. McFadden) 还因此而获得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经济学研究的任何创新往往是同分析研究方法的突破分不开的。1969 年至 2003 年共 35 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研究领域, 除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交叉科学研究 4 个领域外, 最后第 5 个领域就是经济分析新方法。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获奖的得主都是从事数量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在管理学方面,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由于管理不再限于完成既定的任务而需不断创新, 管理的对象不再只有体力劳动者而更为重要的还有智力劳动者, 管理不再是与文化无关的科学且已不囿于一国的范围, 管理不再仅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给经济发展以巨大推力, 这一切使管理理论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 出现了旨在提高智力劳动者生产率的激励理论和分配方法, 以及企业文化理论和企业形象管理方法等等。

金融学原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信息革命造就了新经济, 但新经济单有新技术的支撑而无新金融的孵化和扶持, 是根本不可能萌芽和成长起来的。如果说科技是经济的第一生产力, 那么金融可以说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授予研究资产组合理论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的三位学者, 他们是马克维茨(H. Markowitz)、米勒(M. Miller)、夏普(W. Sharpe), 这使金融学名声大振。随后 1997 年默顿(R. Merton) 和斯科尔斯(M. Scholes) 因研究期权价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又把金融学研究推进了一步。金融学从第一阶段的公司财务研究和第二阶段的资产定价研究, 发展到第三阶段金融行为研究。行为金融学日益成为金融研究的新时尚。与金融学理论发展相伴随, 以设计与实施旨在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或服务为内容的金融工程及其研究迅速兴起。

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三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并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就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来说, 我曾在 2000 年作过专门论述。^⑥经济学跟数学、心理学一样, 是管理学的基础之一, 并为管理学提供分析方法

如费用效益分析法等；而管理学使经济学更有力地转化为生产力，对经济学的实用化有着巨大作用。经济学和管理学还相互渗透、交叉与结合，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化，以致出现了经济管理学和管理经济学。特别是像企业组织、公司治理、经济预测、管理决策等许多问题的研究，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内容，属两栖性，难以分清究竟是纯粹的经济学还是纯粹的管理学，有时只是研究的角度和观点不同而已。有一种观点想以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如文科方法还是理工科方法来区分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这在经济学日益数学化、数量化、公理化、工程化的条件下也是行不通的。这样区分既不容易也无必要。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 A. Simon）就是美国的管理学家也是经济学家，他因“有限理性”和“决策程序”的开创性研究而获经济学奖，他认为“决策并不像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趋于最优，而恰恰是达到一个满意的结局，比如大家都寻求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⑦西蒙的名著《管理行为》第4版告诉人们：组织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的。

至于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关系，其联系紧密程度不难从下面的类比中看出：它们不仅有共同的研究方法，如计算机模拟、非线性混沌分析、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以及借鉴心理学原理的“临床诊断”研究方法等，而且还有类似的研究方向，如经济学中有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同样在金融学中也有实验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由于金融学与经济学的融合已产生了金融经济学。

最后，管理学与金融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随着管理学日益介入金融研究，已出现了金融管理学、金融工程学。尤其像金融风险及其管理这一领域，目前几乎成了管理学研究大举进军的一块热土。但金融学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一时还看不清楚。

四、信息社会经济和管理学的发展尚需探索

国际社会公认未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1995年2月发达国家七国集团在布鲁塞尔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共同面向信息社会的问题。1996年5

月在南非召开“信息社会与发展大会”部长级会议，进一步讨论发展中国家进入信息社会的问题。2000年7月在日本冲绳举行八国（七国集团加俄罗斯）首脑会议，通过了《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2002年12月又在日内瓦举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具体讨论到信息社会建设中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统一标准等问题。我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了其中的两次会议。虽然我国目前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仍处于工业社会，而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但是党的十六大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并明确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正是信息社会的另一种称谓。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必然会实现社会转型，同时促进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型，最终迎来信息社会。这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一致的。

信息社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同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相比，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发展的一面，继承中有发展，发展中也有继承，两者之间是不可能“砍一刀”而截然分开的，这正说明经济学和管理学是随着社会演进而与时俱进的。

从继承一面看，像经济学中企业制度、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经济周期波动等，以及管理学中组织理论、经营理论、项目管理、质量管理方法等，这样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无疑会延续下去，并会有所扩充。

从发展一面看，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都会增添许多新内容，显示出它们的变异来。在理论上，由于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性的凸现，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内容必然会有根本性变化，明显可见的就有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等等研究。目前人们在经济研究或管理研究中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IT”的“T”（技术）上，但迟早会转移和聚焦到前一个字母“I”（信息）

上去。在实践中，信息社会不同于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在“物质世界”（Physical Space）之外又营造了一个现实的“虚拟世界”（Cyberspace），也就是“数字世界”或“网络世界”。一切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均可“上网”，在另一个世界运作，使时间和空间对活动的限制减低到最小限度，而变成“实时”的、“零距离”的运作。这种“上网”、“运作”又非物质世界的单纯映射，而有一定的变化和特点。因此，复杂的、多样化的网络经济研究、网络管理研究，成了经济学、管理学重要的新内容。上述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还会引起或带动经济学和管理学其他相关部分的变化。

经济学和管理学伴随社会转型的发展，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探索。怎么探索呢？比较可行的选择是从实践出发，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工作的各个方面，开展对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例如：（1）研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中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2）研究信息技术在研制、生产、引进、推广和应用方面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3）研究信息资源（包括知识资源）在开发、存贮、传播与使用方面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4）研究信息产业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5）研究信息化所需各类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方面的经济问题和

管理问题；（6）研究与信息政策、信息法规有关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更艰巨的任务是在实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提炼、综合、集成，上升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还需要根据社会转型的环境变化，从理论、方法上直接来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问题。

为使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演变成信息社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需有几代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不畏艰苦攀登陡峭的科学高峰。这样，一定希望达到那个光辉的顶点，完成经济学和管理学两门重要学科与时代俱进的历史任务。

①关于管理学在整个 20 世纪的发展情况，参见乌家培《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长春出版社，2002 年，第 289—292 页。

②周宏仁：《信息革命与信息化》，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96 页。

③赵晓：《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方向》，原载于《深圳商报》，摘载于《光明日报》2004 年 5 月 25 日。

④参见乌家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38—246 页。

⑤⑥参见乌家培《信息化社会与网络经济》，长春出版社，2002 年，第 288—295、296—298 页。

⑦阿萨尔·林德贝克：《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纪回眸》，《比较》杂志第一辑，第 134 页。

责任编辑：黄振荣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 王艾青 安立仁

[摘要] 首先讨论了中国人力资本的度量问题,认为用教育年限法可以对中国人力资本进行更为精确的度量。其次,对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空间变化进行了计算分析,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数量大,总量呈下降发展趋势;城镇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数量少,总量呈上升发展趋势。第三,中国从业人员总体受教育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不断提高趋势。第四,人力资本水平呈递增趋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国。第五,中国人力资本单位产出率很低,总体水平不高,以基础人力资本为主。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专业人力资本数量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 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度量 教育年限法

[作者简介] 王艾青,西安邮电学院社科系讲师;安立仁,西北大学经济增长与计量研究所所长、博士、副教授,陕西 西安,710069。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26-07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1978~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率9.71%。1999~2000~2001~2002~2003年五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1%、8.0%、6.9%、8%、9.1%。影响中国20余年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是内在要素,包括科技进步、资本(投资)、耕地资源、劳动力(包括人力资本);第二类是外在因素,包括改革效应、产业结构、市场需求、政府调控、对外贸易等。

西方新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①已证明人力资本是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因此,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讲,开发配置和利用好中国的人力资本,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同时也是充分、有效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及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要开发配置和利用好中国的人力资本,就必须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存量或现状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更为合适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使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更加合理,更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为达此目的,首先涉及的是对人力资本的度量问题,其次是在度量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描述,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这就是本文研究的内容。

二、中国人力资本的度量问题

在有关人力资本研究文献中,有许多不同的对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度量角度:其一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角度度量;其二是从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角度度量。

1. 产出角度的度量方法

从产出角度度量人力资本,最常用的方法是劳动者报酬法,即用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所得来体现劳

动者身上所蕴藏的人力资本。从理论上说，由于劳动者报酬直接是产出的部分，用它来体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不仅精确明了、计算简单，而且将投入与产出紧密联系，关系清晰、简单。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这种方法却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差。其一，劳动者身上所蕴藏的人力资本同它在生产中实际的人力资本供给往往是不一致的，^②而劳动者在生产中实际供给的人力资本和他应得的劳动报酬也往往存在很大差异。^③因此，用劳动报酬体现实际的人力资本供给进而表示实际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不精确的。其二，从产出的增加值角度度量的劳动者报酬通常只是一个汇总的结果，并未对不同劳动者进行分类。而中国从工资、奖金、红利等方面统计的劳动者报酬又往往低估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也就低估了人力资本的实际存量价值。这就使得这一方法的应用效果大打折扣。

2. 投入角度的度量方法

大多数的人力资本度量方法都是从投入角度进行的。它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指标度量上的简易性和数据的可行性，具体方法包括：

(1) 学历指数法。对不同层次的劳动力赋予不同的学历指数，将学历指数作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公式为：

$$H_t = \sum_{i=1}^6 HE_{it} \cdot \omega_i \quad (1)$$

其中， H_t 是人力资本存量； HE_{it} 为第 i 学历水平的劳动力数量； ω_i 为学历指数。 $i=1, 2, 3, 4, 5, 6$ 分别表示大学本科及以上、大学专科、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半文盲。

不同学者对于学历指数的确定给出了不同的方法，其共同之处就是都考虑了知识的累积效应，将学历指数序列确定为几何增长或指数增长。这种度量方法的缺点在于主观性很大，学历指数序列的确定完全凭主观认识以及序列选取计算上的方便，缺少客观依据。

(2) 技术等级或职称等级法。按照劳动者的技术等级或职称加权。这种方法较上述两种方法更能反映不同劳动者所含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实际贡献，其应用的困难来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方面的障碍。由于统计上原因，在我国很难找到完全、统一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同时由于劳动力认证体系的不完善和劳动力市场的残缺，劳动者的技术等级和职称往往不能确切反映或者错误反映其人力资本存量及其贡献。尤其在中国，职称评定制度在应用上的狭窄性和主观性，也使其不能覆盖所有部门和所有职业的劳动者，因此，在数据可靠性方面 also 存在着很多疑问。这显然限制了这一方法的应用。

(3) 教育成本法。从人力资本核算的角度测算培养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成本，是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方法之一。培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成本可分为公共支出和个人支出，个人支出又分为直接支出与间接支出。公共支出部分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出中的公共教育经费，同时还应包括用于劳动力卫生保健和劳动保险的公共支出部分，来源于其他渠道的非财政教育经费，以及企业和公共机构用于劳动力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支出等。个人直接支出就是家庭和受教育和培训所花的费用；间接支出是指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人在接受教育或培训期间所损失的工资和其他收入（机会成本）。无论是个人的直接成本还是间接成本，其数据和统计很不完全，甚至没有统计，即使有的数据，由于不同数据来源的资料统计口径也存在很大差异，可比性很差。这种现象在个人成本的统计方面就更为突出。由于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的限制，该方法无法准确估计中国人力资本存量。

(4) 人才与非技术劳动分解法。西方学者对劳动投入的分解，最初的想法是将其分解为人力资本和普通劳动力，或所谓的人才和非技术劳动力，从而分别度量它们对产出的贡献。人才与人力资本二者之间有较强的联系。人力资本是人具有的知识、能力和才干；人才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人。然而，有关人才的定义和度量从来就是一个模糊而争议的问题。可以用受教育年限的长短来定义人才，也可以用职称、职务、工龄、学历、专利和科研成果等多种特征来给人才下定义。这显然带来了许多

矛盾和质疑。有些人才的定义往往同人才对产出的实际贡献不一致，甚至是相悖的。因此，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很大障碍，并且人才投入不能把生产中的人力资本投入全部包含，它往往低估了人力资本的总投入。

3. 受教育年限法

受教育年限法属于投入角度的度量方法，这里强调的是这种方法与别的方法不同并有自身的优点，强调受教育年限对人力资本的代表性。

为了度量不同劳动力之间所含人力资本的差异性，最一般方法是将劳动力分类，然后按照不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质进行加权求和，即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

$$H_t = \sum_{i=1}^6 HE_{it} h_i \quad (2)$$

其中， H_t 为 t 年人力资本总存量， HE_{it} 为第 t 年 第 i 学历层次劳动力的人数， h_i 为第 i 学历水平的受教育年限。这一方法简明扼要，数据的可得性和精确性都令人满意。

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或年限代表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不仅简明扼要，数据获得的可能性与精确性强，而且受教育年限与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成较强的正相关性，它排除了用货币计算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价格因素影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或年限与劳动力在“干中学”或“边干边学”的人力资本积累成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在劳动中积累经验的能力越高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越容易 (Ben- Porath, 1967)；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力的收入成正相关 (Mincer, 1958)。不仅如此，人的受教育年限越长，越注意保持自身健康；受教育年限越长用于选择合适职业的信息收集和迁移的成本越高。另外，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或年限代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可以排除“学历指数法”、“技术等级或职称等级法”的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可以排除“劳动报酬法”中的工资等分配政策和制度影响。受教育年限对人力资本存量具有代表性。

当然，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也是存在的：它忽略了或无法计算知识的累积效应，即认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呈算术级数增长；将小学教育的 1 年时间与大学教育的 1 年时间等同，不能充分反映没受教育阶段的时间价值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且基础教育与专业化教育不能给予区分，另外也不能将影响人力资本质量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充分地体现在该方法中，这也是其他方法存在的共同不足。

4. 人力资本存量度量方法的选择

不同的度量方法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之处，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手段、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等方面都是影响度量方法选择的重要方面。通过比较，使用受教育年限法估计的人力资本存量比其他方法更接近于实际，因此，使用该方法估计人力资本存量的文献比较多，本文采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来表征人力资本存量。

三、中国人力资本存量问题

1. 中国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及其基本水平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在空间上，如城乡之间的分布趋势是城市的劳动力比重呈增长的趋势、农村劳动力比重呈下降趋势。总人力资本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从 1964 年到 2000 年的 6 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见表 1 及图 1)。

但从总量上看，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就业的重点仍在农村。2002 年中国农村人口 78241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60.9%，市镇人口 50212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39.1%，2002 年全国从业人口总量 73740

万人, 占总人口的 57. 41% , 其中农村从业人口 48960 万人, 占从业人口总量的 66. 40% , 城镇 24780 万人, 占 33. 60% 。可见, 人口和劳动就业的重点仍在农村, 而从中国现实人力资本总的情况分析结果看, 仍呈数量大、质量低的特征 (见表 2 、表 3 及图 1) 。

表 1 中国 6 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 单位: %

受教育程度	1964 年	1982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大学(含大专)	0. 52	0. 68	1. 59	2. 24	3. 84
高中(含中专)	1. 64	7. 48	9. 04	9. 13	11. 84
初中	5. 82	20. 03	26. 50	30. 17	36. 08
小学	35. 26	39. 94	42. 27	42. 45	37. 93
文盲或半文盲	56. 76	31. 88	20. 61	16. 01	10. 31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1》及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表 2 世界部分国家 25 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教育构成比较

国家或地区	时间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文盲半文盲
中国	1995	2. 8	38. 1	38. 9	20. 2
美国	1994	46. 5	44. 6	8. 2	0. 6
日本	1990	20. 7	43. 7	33. 6	0. 3
韩国	1990	13. 4	53. 9	21. 7	11. 0
加拿大	1991	21. 4	62. 0	15. 7	1. 0
挪威	1990	17. 9	79. 3	0. 1	0. 1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1》、《国际统计年鉴 1997》。

表 3 1978~ 1998 年中国各年 15 岁以上人口各级受教育水平相对比例

年份	总计	大学本科	大专	高中含中专	初中	小学	文盲半文盲
1978	1	0. 0051	0. 0017	0. 0843	0. 2169	0. 2752	0. 4168
1979	1	0. 0053	0. 0024	0. 0912	0. 2276	0. 2776	0. 3959
1980	1	0. 0055	0. 0029	0. 0940	0. 2417	0. 2787	0. 3772
1981	1	0. 0057	0. 0033	0. 0969	0. 2505	0. 2826	0. 3609
1982	1	0. 0059	0. 0037	0. 0994	0. 2590	0. 2811	0. 3509
1983	1	0. 0061	0. 0043	0. 1014	0. 2668	0. 2825	0. 3389
1984	1	0. 0063	0. 0049	0. 1036	0. 2738	0. 2843	0. 3269
1985	1	0. 0066	0. 0102	0. 1050	0. 2801	0. 2866	0. 3153
1986	1	0. 0068	0. 0077	0. 1067	0. 2854	0. 2949	0. 2983
1987	1	0. 0071	0. 0090	0. 1084	0. 2907	0. 3073	0. 2774
1988	1	0. 0074	0. 0105	0. 1100	0. 2958	0. 3218	0. 2545
1989	1	0. 0077	0. 0120	0. 1117	0. 3024	0. 3412	0. 2250
1990	1	0. 0079	0. 0127	0. 1143	0. 3045	0. 3389	0. 2217
1991	1	0. 0081	0. 0134	0. 1171	0. 3109	0. 3362	0. 2142
1992	1	0. 0084	0. 0145	0. 1203	0. 3167	0. 3325	0. 2076
1993	1	0. 0088	0. 0159	0. 1234	0. 3213	0. 3259	0. 2047
1994	1	0. 0092	0. 0174	0. 1272	0. 3254	0. 3227	0. 1981
1995	1	0. 0096	0. 0187	0. 1319	0. 3298	0. 3185	0. 1915
1996	1	0. 0100	0. 0197	0. 1355	0. 3388	0. 3088	0. 1872
1997	1	0. 0107	0. 0211	0. 1426	0. 3320	0. 3088	0. 1849
1998	1	0. 0115	0. 0227	0. 1512	0. 3442	0. 3096	0. 1831

资料来源: 根据王金营的推算数据计算出来 (参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第 68 页) 及《中国统计年鉴 2001》。

2. 中国人力资本总体存量及其水平的评价

在本文中，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变化是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征的。表 2 说明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人力资本的一些基本情况。表 1、表 2、表 3 及图 1 说明尽管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一直在提高，受过较高教育者比重在不断上升（受初中及其以上教育者的比重从 1964 年的 7.98% 提高到 2000 年的 51.76%），未受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者比重在下降（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及半文盲数从 1964 年的 56.76% 下降为 2000 年的 10.31%）。但与一些教育较发达、人口质量较高国家比较，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仍很低下，人力资本结构极不合理。在 2000 年 15 岁及其以上人口中，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者比重仍高达 49.72%，而社会亟需的受过高中和中等专业技术教育者仅占 15.12%，即使将受过高等教育者考虑在内，其比重也不过 18.54%，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因而近年来，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熟练工人严重不足，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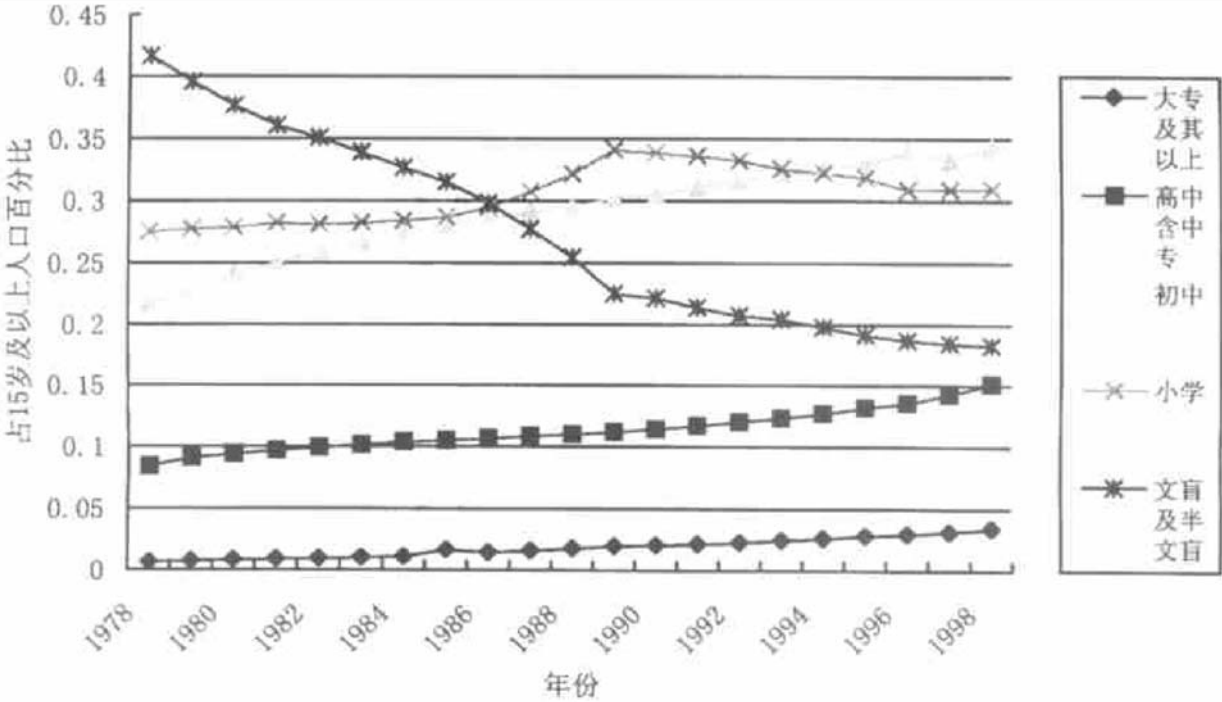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发展变化趋势图

3.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分析

以上我们从一般意义上对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行了描述，只是给出了中国人力资本的一个印象，仅仅是从从业人员或一定年龄段人口受教育程度来表示的，中国人力资本到底有多大，还未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值。

根据 2 式中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度量方法，即：

$$H_t = \sum_{i=1}^6 H E_{it} h_i$$

中国学者王金营将文盲半文盲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定为 2 年，小学教育定为 6 年，初中教育定为 3 年，高中及中专教育定为 3 年，大专定为 2 年，本科定为 4 年，硕士研究生定为 3 年，博士研究生定为 3 年。这样计算出中国各年从业人员总的人力资本存量简况如表 4 所示。

通过表 4 及表 5 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本。中国 1994 年的人力资本为 507010 万人/年，是美国当年的 2.32 倍；中国 1990 年的人力资本是 466153.06 万人，是日本当年的 5.37 倍。但表 4 及表 5 反映出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从业人员的平均教育年限也只有 7 年多，就是到 2008 年也平均只有 8 年。明显低于表 5 中各国家从业人员的历史中的平均教育年限，其中美国 1994 年

为 13.3 年，韩国为 12.4 年，加拿大为 11.8 年，日本为 10.6 年。这就是中国人力资本数量大、质量低。另外计算表明，中国从业人员中的平均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约需 10 年时间，如平均教育年限 1978 年为 5.68 年，1988 年为 6.95 年，1998 年为 7.71 年。这就是说，仅从人力资本目前平均教育年限的发展速度来看，达到美国目前职工的平均教育水平也需要 50 年。

表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简况

年份	从业人员(万人)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人力资本存量(万人/年)
1978	46670.30	5.680	264901.23
1980	49453.90	5.990	296424.95
1985	57809.10	6.560	379168.43
1990	65078.12	7.160	466153.06
1995	68379.98	7.540	515897.40
2000	71150.00	7.870	559950.50
2002	73740.00	8.000	589920.00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核算得来。

表 5 世界一些国家人力资本情况表

国别	年份	25 岁及其以上人口(万人)	平增受教育年限	人力资本存量(万人/年)
美国	1994	16451	13.296	218732.50
日本	1990	8199	10.578	86729.02
加拿大	1991	1741	11.826	20589.07
韩国	1995	2622	12.436	32607.19

国外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99 年。注：本文在这里只是为了进行探索性研究，在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使用了与国内同样的计算方法，这种算法存在很大的不准确性，但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明问题。

王金营将中国人力资本分为基础人力资本与专业化人力资本，到 1998 年为止，基础人力资本存量为 384490.06 万人/年，专业化人力资本为 153483.75 万人/年。这就是说，从总体质量上看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基础人力资本为主，1998 年基础人力资本占总人力资本存量的 71.47%。这些都说明中国目前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4. 中国人力资本的产出率

中国单位人力资本的产出率简况如表 6 所示。

表 6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的产出情况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人力资本存量(万人/年)	单位人力资本 GDP(万元)
1978	3624.1	264901.23	0.013681
1980	4517.8	296424.95	0.015241
1985	8989.1	379168.43	0.023707
1990	18598.4	466153.06	0.039898
1995	57494.9	515897.40	0.111446
2000	88189.6	559950.50	0.157495
2002	102398.0	589920.00	0.17357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3 年及表 5 的数据。

通过表 6 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的单位人力资本产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单位人力资本的产出率还很低，到 2002 年为止也只有 (GDP) 1736 元/单位人力资本。

四、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多,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本拥有国,但平均教育年限少。70%以上的人力资本属于基础人力资本,只有不到30%的人力资本为专业人力资本。从而导致:一方面表现为专业人力资源不足,另一方面是低级劳动力大量过剩,不能适应技术含量日益提高的现代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造成“有人无业”与“有业无人”并存现象。这种现象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方面,甚至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也极为不利。由于以基础人力资本为主,必然造成这种劳动力的过度竞争,使其人力资本价格下降,而专业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又造成这部分人力资本过度升值,从而使其人力资本价格上升。其结果是造成在人力资本收益方面的不公平度加剧,使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另外,王金营分析了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和间接贡献率都较高,分别达到9.99%和6.70%。进一步分析表明,专业化人力资本在总量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高于普通人力资本的作用,在第二、三产业中,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作用远大于普通人力资本的作用,而第二、三产业目前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加大,呈逐年递增趋势。这就表明具有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人才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继续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思路:就是要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这只能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来完成。所谓人力资本投入就是教育的投入,提高专业人力资本的投入意味着提高专业教育投资。所以大力发展专业教育对于改善中国人力资本的存量及其结构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①美国经济学家T·W·舒尔茨在他的《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中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在对教育资本构成分析中,主张把教育当作一种对人的投资,把教育所带来的成果当作人力资本。

②在中国专业不对口的情况大量存在,因此,用产出就很难度量其投入。

③在中国由于过去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行业之间的壁垒,人力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从而使得不同行业之间的人力资本报酬相差极大,一些国有垄断行业(如银行、电讯、石油等行业)更是如此。这就有可能造成人力资本相同的人,其报酬差别极大,如用报酬对人力资本进行量度则极不准确。

[参考文献]

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4月。

Yoram Ben-Porath.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Life Cycle Earning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5, 1967. p352~ 365.

Jacob Mincer.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6, 1958, p281~ 302.

赵秋成:《我国人力资源:现状、成因与开发战略》,《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黄振荣

论大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资产 “四轮驱动”模式

◎ 何小锋 李心愉

[摘 要] “四轮驱动”模式是我们提出的资产分类及它们形态的互相转化的循环运作模式，也即“资产运作的一般模式”，也可以看成是资本市场运作的道理。本文将资产分为现金、实体、信贷和证券四种类型，四种类型表现出资产现金化、资产实体化、资产信贷化、资产证券化四种不同形态，四种资产形态的互相转化构成推动广东和大珠三角经济高速前进的四个驱动车轮。

[关键词] 四轮驱动 经济发展 资产

[作者简介] 何小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心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4) 09-0033-04

巨大的经济价值的增加，得益于产权的市场化和金融的市场化的进程。我们把这个改革进程概括为“资产市场化”。在本文中，我们试图细分资产的类别，并构建一个“四轮驱动”的理论模式来重组分析因素，从而运用一个新的分析方法解释广东及大珠三角经济领先发展的根源。

因此，广东及大珠三角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有一定的压力。虽然在改革开放中，广东及大珠三角地区由于先行一步，保持了在国内的领先地位，但这种地位正受到中国其它地区的挑战；而在外部，和条件类似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对广东及大珠三角地区来说，保持过去 20 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势头，无论对其保持国内的领先地位还是加强其国际竞争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四轮驱动”模式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曾经对资产给出一个一般化的定义：“资产是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由此看来，资产和资本并没有多少区别。我们进一步认为，资产的运营是以经济价值的增加为中心的运作过程，它以资产的价值形态的管理为基础，通过资产的优化配置和资产结构的动态调整来实现经济增值的最大化，从而最终实现整个经济的资源的最优配置。^①尽管从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来看，在这一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土地、设备、劳动、科技等，但在现代经济的条件下，一方面，许多原先与资产独立存在的形态如土地、科技等，已经转化为资产形态，如企业中的科技投入及产出表现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则表现为与资产相交换的形式，如资产和劳动相交换。在这种背景下，资产就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取得了最重要的主导地位。

对资产的分类有多种，例如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等。为更好地分析和揭示资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性质与作用，我们特意把资产分为四类：现金资产（指 M1，即现金加活期存款）、实体资产（以企业形式存在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信贷资产（银行贷款和应收账款）、证券资产（各种有价证券）。

资产市场化的运营可以分为四种形态：资产现金化、资产实体化、资产信贷化、资产证券化。每

种形态都分别包含四种运动变化，其组合则是千变万化。四种资产和其四种形态，可以用下列的矩阵表现出来：

表 1：资产和其形态的组合

		形 态			
		现金	实体	信贷	证券
资 产	现金	现金资产现金化	现金资产实体化	现金资产信贷化	现金资产证券化
	实体	实体资产现金化	实体资产实体化	实体资产信贷化	实体资产证券化
	信贷	信贷资产现金化	信贷资产实体化	信贷资产信贷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
	证券	证券资产现金化	证券资产实体化	证券资产信贷化	证券资产证券化

我们下面分别解释这四种形态的转化，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的“四轮驱动”模式。

二、资产现金化

现金化是指资产的变现和取得的过程，这是资产运营的起点和目的。一项研究表明：从 1978 年到 1999 年，中国的实际货币现金余额 M1 增长了 50.32 倍，而同一时期实际 GDP 增长 6.88 倍，实际人均 GDP 增长 5.25 倍。M1 与实际 GDP、实际人均 GDP 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说明 M1 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②

资金的流动规模和速度成为广东和大珠三角经济活力的来源之一。我们从四个方面考察。

(1) 现金资产的现金化。在资产运营中它是指外汇兑换、现金的异地存款、取款和货币掉期 (SWAP) 的交易。大珠三角虽然面积不大，但存在着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币的流通，再加上世界货币美元的存在，可以说是世界上货币系统最复杂也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外汇市场。港币、澳门币是自由货币，人民币是正在走向自由兑换的强势货币。香港的外汇市场发展成熟，交易活跃，以成交额计算是全球第七大外汇市场。由于没有外汇管制，投资者在这里可以 24 小时与世界各地的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广东吸引的外资数量和进出口金额长期居中国之首，推动大量的外汇在交换和频繁进出，意味着其背后的经济活动及其效率与日俱增。此外，人民币的流动巨大，特别是注册在深圳的招商银行十多年前率先推行“一卡通”业务，使现金的异地存、取款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2) 实体资产的现金化。这主要指实物资产和非上市股权的出售和套现。在大珠三角地区这方面最明显的先行之处是大量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实物资产出售套现，使政府和集体不仅甩掉了包袱，而且得到了大量可用于循环运营的现金。同样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广东劳动力的现金收入。劳动力也是实体资产。在中国，十几年来流传着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1999 年在广东的外省农村劳动力数量为 1047 万人，占了同期全国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总量的近五成，为全国之最。如果按同期在广东就业的外来劳动力中农村和城镇的比例测算，1999 年整个外来劳动力在广东就业的数量为 1346 万人。这几年，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③这些与日俱增的劳动力是广东经济发展的最直接的得益因素，他们的收入又推动着现金的流动和储蓄的增长。据测算，最近 10 年，在广东就业的外来工累计达 8000 万人次，以每个劳动力平均年带回劳务收入 3000 元计算，为劳务输出地增加的收入为 2411.7 亿元。

(3) 信贷资产的现金化。这主要指银行业务的发展，特别是银行回收现金和票据贴现等多种业务，在广东的规模迅速扩大。同时也有失败的教训，主要指银行的不良债权，广东国投破产等事件也影响了信贷资产的现金回收。

(4) 证券资产的现金化。这是指出售证券、取得现金的过程，包括证券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证券出售和开放式投资基金的赎回。广东的股票市场和投资基金市场是全国最早形成的，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资金。证券化的方法能够更大规模地筹集和吸引资金是显而易见的。

三、资产实体化

这是指企业股权、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投资、购买、合并重组、抵押和互相交换的过程。包括

现金资产的实体化、实体资产的实体化、信贷资产的实体化和证券资产的实体化。人们都知道，直接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表 2: 广东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及广东经济与全国的比较

年 份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 (亿人民币)	广东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 (%)	广东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广东 GDP 在全国的比重(%)	广东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 (%)
1990	69.79	4.48	18.32	8.51	41.87
1991	96.98	5.12	20.29	8.90	41.75
1992	195.72	7.99	21.23	9.47	32.27
1993	431.31	12.57	26.46	9.95	27.21
1994	810.02	17.93	37.83	9.67	27.83
1995	850.03	14.82	36.53	9.80	27.13
1996	965.95	14.82	41.49	9.54	27.86
1997	970.84	13.27	42.25	9.77	25.88
1998	995.26	12.57	37.30	10.02	26.44
1999	1010.41	11.94	33.97	10.24	30.27
2000	1013.22	10.49	31.90	10.81	30.06
2001	1074.08	10.09	30.76	10.80	27.67
2002	1085.51	9.30	29.85	10.96	24.86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上表表明，十几年来，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推动了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它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 20% 左右，增加到中期的 40%，然后又回到 30% 左右，这说明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国内的投资，进而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表 2 最后两列所列出的是广东经济和全国经济相比较的情况，它们占 GDP 的比重远远高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反映实体资产的产出水平的 GDP 指标，广东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在增加；FDI 占全国的比重也一直在 1/4 以上，但最近 3 年有所下滑。

四、资产信贷化

主要指各种贷款和租赁业务的经营过程。包括现金资产的信贷化（债权经营）、实体资产的信贷化（租赁经营）、信贷资产的信贷化（债权掉期）、证券资产的信贷化（质押贷款、融券）。

信贷资产在统计指标上主要用“准货币”（QM）和国内信贷（DC）来表示，QM 由名义货币余额减去实际货币余额而得（即 M2- M1）；DC 在发展中国家主要被用来为国内企业的投资活动进行信贷融资，它代表了单一的最为重要的间接融资来源。因此准货币和国内信贷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项重要的银行融资服务，对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研究表明：从 1978 年到 1999 年，中国的 QM 增长了 376.7 倍，DC 增长了 50.67 倍，而同一时期实际 GDP 增长 6.88 倍，实际人均 GDP 增长 5.25 倍。QM 和 DC 与实际 GDP、实际人均 GDP 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

广东省信息中心提供的有关数据表明，近几年来，广东省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全国的比重一直保持领先地位。2003 年 8 月，广东占全国的比重约为 11.52%，大大高于其他各省市，居全国第一。广东信贷资产之庞大可见一斑。这也是和广东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分不开的，较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使广东省的企业具有较好的信誉和还贷能力，因此促进了它们利用信贷资金发展生产的能力。

应该说，大珠三角在信贷市场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香港本身就是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心之一，香港目前拥有本地和外国银行以及存款机构 224 家，其中外资银行达 107 家，全球最大的 50 家银行中 90% 在香港从事经营活动或设有办事机构。目前，香港银行业的财务状况依然健全，资本充足率为 15.8%，远高于国际 8% 的标准。CEPA 的安排大大推进了香港和内地经济尤其是和广东省的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

五、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指某一资产或资产组合采取证券资产这一价值形态的资产运营方式，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广义的资产证券化，包括以下四种运营：

(1) 现金资产的证券化，是指现金持有者的证券投资行为，包括在证券发行市场买入证券，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证券。香港和广东都有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但更突出的是有香港联合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重要优势。

(2) 实体资产的证券化，是指以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为基础发行证券并上市的过程，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证券和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行和上市。包括香港和深圳在内的大珠三角，在证券发行和上市方面无疑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作为全球第 11 大的香港股票市场，在 2002—2003 年度终结时，共有 985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为 34289 亿港元。香港债券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亚洲地区流通量最高的市场。去年的发债量超过 1700 亿港元，不少海外机构都纷纷选择在香港市场发行中长期债券。

(3) 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是指把信贷资产（如银行的贷款和企业的应收款）经过重组形成资产池，以此为基础发行证券。这是近 30 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最重大的金融创新之一。它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支撑的证券化（MBS）和资产支撑的证券化（ABS）。在香港，1998 年开始拓展了 MBS 业务，在中国内地，信贷资产证券化基本还是空白，仅有的试验也只是发生在广东，例如，珠海高速公路的案例和深中集股份的案例。但这项业务发展很快，特别是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方面大展身手。

(4) 证券资产的证券化，是指将某种证券作为基础资产，再衍生发行证券的运作。其最重要的形式是证券投资基金，即以证券资产组合的未来现金流为基础的证券品种，此外，它还包括各种金融衍生证券，例如，恒生指数期货、恒生指数期权、股票期权等。这些品种，香港在中国是独一无二地拥有优势。深圳和广州也在内地发展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资产证券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的高级形式。研究表明，证券市价总值的增长与 GDP 增长的相关系数很高，前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但是在中国，证券市场还很不成熟，需要更大的发展。^④

上面所述的就是所谓“四轮驱动”模式，它既揭示了大珠三角过去成功的经验，也可启示其未来的发展的政策倾向。也就是说，资产现金化、资产实体化、资产信贷化、资产证券化是推动广东和大珠三角经济高速前进的四个驱动轮。至于如何运营该“四轮驱动”，就是资产在四种形态上的互相转化的循环运作，我们将之称为“资产运作的一般模式”，也可以看成是资本市场运作的道理。^⑤

①参见何小锋、黄嵩《投资银行学》第 6 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②见史永东和武志《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载于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ccf.org.cn/>。

③《南方日报》2001 年 11 月 1 日。

④参见何小锋等著《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⑤黄嵩、何小锋：《关于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建构》，《学术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参考文献]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何小锋、黄嵩：《投资银行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何小锋等《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黄嵩、何小锋：《关于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建构》，《学术研究》2002 年第 2 期。

蔡志洲：《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全国与地区数据的衔接》，《经济科学》2003 年第 4 期。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广东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经贸年鉴》，有关各年。

责任编辑：黄振荣

并购绩效的整合模型

——协同效应实现观及影响因素探析

◎ 宋 耘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公司并购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分析,以协同效应的实现程度作为对并购绩效的衡量比财务绩效衡量更加重要。其中合并潜力、组织整合、员工反应直接影响协同效应的实现程度。

[关键词] 公司并购 绩效 协同效应

[作者简介] 宋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37-06

一、关于并购绩效的现有理论观点

并购与公司的绩效有关吗?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 50 多年,但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大多数从战略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根据并购后的财务状况和市场占有率情况来评价并购绩效,得出了不支持并购的结论,如 Goldberg (1983) 在参考了从 1935-1980 年发表的 30 篇重要文献后认为:通过并购,企业的规模是扩大了,但绩效却并没有改善;有过并购行为的企业的利润率并不高于没有并购行为的企业;管理能力没有得到提高,但高层管理人员在并购后却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虽然被并购企业的股东偶尔可能获利,但并购发起方企业的股东却会因并购而招致损失。而且当并购交易结束后,企业从并购中获得的收益会逐渐下降。Lubatkin (1983) 在回顾了早期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后指出:50 年的研究表明,如果并购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利润率或股票价格,那么并购的绩效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Ravenscraft 和 Scherer (1989) 对 1975-1977 年美国制造业中被兼并的 2732 个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并购后,它们的盈利能力大大恶化。Miller (1986) 的研究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1950-1972 年间进行并购活动的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未参加并购的企业。Porter (1987) 指出,1976 年以

前,美国 33 家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并购后,其中 56.5% 出现了股价下跌,并总结说:“大多数公司的战略损害而非创造了股东价值。”

金融经济学家通过衡量股票价格在并购宣布前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内的变化,来判断股票价格波动产生的净利得或损失。在剔除了综合性市场波动的影响后,若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市场价值在并购宣布后发生的净变化为正,金融经济学家就认为该项并购创造了价值。采用这种方法,金融财务学派的研究得出了与战略学派和组织学派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并购取得了积极的绩效。Jensen (1984) 在回顾 24 篇在 1973-1983 年发表的论文后指出:企业并购没有浪费资源,它们提高了资产的使用效率;虽然经理们关注自身利益,但他们所处的经营环境限制了他们中饱私囊、损害股东利益的可能性。Weston 和 Chung (1983) 认为:通过并购,企业能获得收益。并购发起方企业的股东没有遭受损失,如果把并购双方企业的股东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那么并购确实提高了股东价值,而且这些股东价值不会在并购完成后的几个月或几年中消失。

然而,在延长考察期后,金融学派的研究结论已无法保持一致。Magenheim 和 Mueller (1988) 运用案例分析法,以接管后 3 年为考察

期,发现收购方企业股东的非正常收益为负,数值在-16%~-42%之间。但Bradley和Jarrell(1988)选取了与Magenheim和Mueller相同的样本,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结果没有发现收购方企业出现巨大的负收益。Franks、Harris和Titman(1991)运用各种多因子基准股票组合对1975-1984年发生的并购进行考察,考察期为并购交易完成后3年,也没有发现出现负收益的情况。Loderer和Martin(1992)在对1966-1986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的并购案进行广泛取样后发现,在并购后3年内存在负的非正常收益,但五年内则不存在这种情况。

之所以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部分原因在于并购领域研究的非整体性。正如Lubatkin(1983)指出的,目前不同研究流派之间相互借鉴的程度很低。研究者们提出的并购的战略和产业组织的框架是偶然且未经验证的,与不考虑并购战略差异的财务经验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差距。虽然近期的研究开始在战略和金融观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它们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相互冲突的(Seth,1990)。其次,并购的战略和金融研究没有考虑组织和人力资源问题,而后者是并购整合过程的中心内容,在决定并购成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Chatterjee,1992);而许多从组织和人力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则没有把战略和金融文献中得出的重要概念整合进去(Schweiger,1990)。对于并购这样一个具有多面性的现象,运用不同领域的理论是无法很好地理解它的,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能融合不同学派的研究成果的并购绩效模型。

二、并购与协同效应

战略和金融学派对并购绩效的研究都没有注意到组织整合与雇员反应等因素对并购成功的潜在重要影响(Schweiger,1990),在他们看来,并购后的过程是没有区别的,因而也是不重要的。然而,正如Haspeslagh和Jemison(1991)所指出的,一次并购的大部分价值是在整合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购后的整合过程的质量至关重要。另外,金融财务学派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

是,通过衡量并购公告宣布后对并购双方企业的股价造成的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促进了股东财富的增长。这种研究方法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在这一条件得不到满足的市场环境下,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值得怀疑的。

为了克服并购绩效的会计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有效融合并购的战略、组织和人力资源学派的观点,可以把并购绩效定义为协同效应的实现,即通过并购所涉及的两个企业间的相互作用而创造的净利益(单位成本的下降、收入的增加等)。Porter在他的《竞争优势》(1985)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协同效应的概念,他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协同似乎只是一个好的概念,在实践中很少能实现……(但在我看来)协同失败的原因在于企业缺乏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而不是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存在什么根本的缺陷……甚至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使企业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实现协同,也常常因为缺少分析工具或无法克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组织方面的问题,而最终走向失败。”Porter认为,随着经济、技术和竞争的发展,相关业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容易被确认和开发,而这种相互关系是降低价值链中的所有活动的成本或提高与竞争对手的差异程度的机会。他提出了一个分析相互关系的框架,把相互关系划分为三种类型:(1)明确的相互关系(业务单位之间存在共同的活动);(2)不明确的相互关系(管理诀窍的转移);(3)竞争关系。

Larsson(1990)把协同效应与并购结合起来分析,认为并购所产生的协同效应可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市场力量协同——通过扩大交易规模或提高市场集中度,实现买方垄断或卖方垄断,从而从供应商处获得更低的买价或从顾客处获得更高的卖价。

经营协同——通过联合经营,扩大规模、范围,获得经验,以及纵向合并,降低生产和营销成本。

管理协同——通过分享和相互交流不同单位的管理诀窍,在对追加的(额外的或类似的)和

互补性（不同但与现有能力相配合）管理技术和才能的应用中获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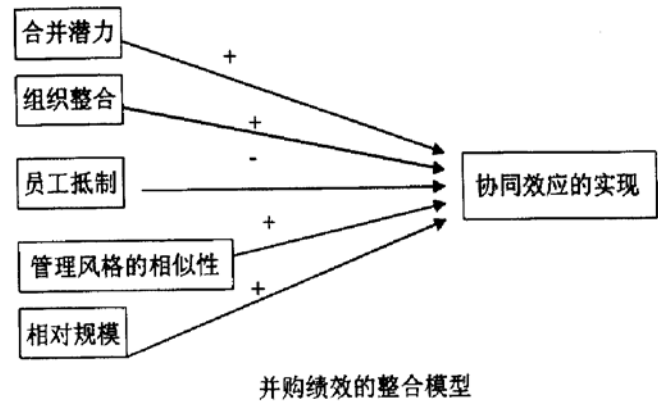
财务协同——通过财务市场力量、内部资本市场和多样化，联合获得和配置资本，降低风险，实现资本成本的下降。在充分套利、完全资本市场和由股东自己进行更有效的“自制”多元化等假定基础上，金融学家们通常不接受这些财务协同效应。但 Chatterjee（1986）认为，这些争论不能否定财务协同效应的存在，因为在实践中，不存在无成本的完全信息。而且，如果采用组织观点，承认存在除股东以外的其他相关利益集团，如雇员、贷款者、供应商和顾客，就会发现，他们都会从组织风险的降低中获利。

很明显，协同效应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从定义上来看，协同效应的实现更适合于考虑战略、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因素影响的整合性研究。另外，由于协同效应的实现只专注于并购后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因而避免了以会计为基础的衡量方法中存在的无法把合并带来的绩效和两个企业在独立状态下具有的正常绩效区别开来的问题。基于以上理由，协同效应的实现是一个更合理的衡量并购价值创造的概念。

三、影响并购的协同效应实现的因素

并购领域的研究可以分为战略、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四大学派，他们都有各自明确的研究方向：战略学派对合并的动机（Trautwein, 1990; Walter & Barney, 1990）和相关性问题（Salter & Weinhold, 1981; Lubatkin, 1983）非常感兴趣；组织学派专注于组织整合（Yunker, 1983; Shrivastava, 1986; Pablo, 1994）、文化冲突（Sales & Mirvis, 1984; Nahavandi & Malekzadeh, 1988）以及冲突解决机制（Blake & Mouton, 1985; Mirvis, 1985）；人力资源管理学派研究员工对并购的反应、沟通（Sinetar, 1981; Schweiger & DeNisi, 1991）和职业生涯问题（Hirsch, 1987; Walsh, 1989; Hambrick & Cannella, 1993）；金融学派关注并购绩效的衡量。如果把这些学派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可以得

出下面这一有关并购绩效的模型：



1. 合并潜力

一次并购的预期协同效应的来源决定了合并的潜力。Larsson（1990）采用美国商务委员会对并购的分类，分析了与各类并购相关的正协同效应的来源：

并购类型 正协同效应的来源	横向并购	纵向并购	跨行业并购		
			市场扩展	产品扩展	非相关多元化并购
规模经济性	✓		✓	✓	
经验效果	✓	✓	✓		
纵向一体化		✓			
市场力量	✓			✓	
多元化				✓	✓

协同效应的不同源泉定义了合并的潜力，它影响着在一次并购中协同效应将实现的程度。合并潜力很低的并购不太可能实现非常重大的效率，而合并潜力大的并购则会提供更大的实现协同效应的机会。

并购的合并潜力通常定义为它们的相关度，以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在行业上的联系来衡量。然而，对相关度的传统研究关注的是并购双方企业在经营上的相似性，对战略差异则不太重视，甚至把战略差异视为一种会导致组织机能紊乱的因素。这种传统定义显然没有完全抓住可能贯穿于价值链中的互补性协同效应。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在以前有关并购双方企业的业务相关性对绩效影响的经验研究中，才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①

事实上，战略差异能够创造机会，通过合并不同的业务可以实现协同互补，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地位。这种协同互补——相互匹配或相互增强的不同的产品、市场销路或技术诀窍——在并购的定性研究中被发现是关键成功因素。因此，

协同效应既可以通过“同一经济性”（合并类似的经营单位以获得规模经济性、经验效果和市场力量），也可以通过“匹配经济性”（合并不同但互补的经营单位以获得范围经济性）来实现。所以，合并潜力应该定义为并购双方企业的经营单位的战略相似性和战略互补性。

2. 组织整合

正如 Jemison 和 Haspeslagh (1991) 所指出的，并购战略产生的所有的价值创造都发生在并购交易完成之后。战略上的合并潜力不会自动实现，协同效应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整合过程的质量。而影响整合效果的关键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1) 计划。要整合两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组织架构、政策和文化，必须在并购前制定计划 (Marks, 1982)。在对潜在的目标企业进行分析时，就应对其组织方面的因素进行考察，并将其作为对目标企业进行选择的标准之一。也就是说，组织方面的匹配程度是除了战略和财务标准外的另一标准 (Diven, 1984)。所谓组织方面的匹配程度主要指管理风格、薪酬政策、感情和文化等方面的兼容性 (Diven, 1984; Finkelstein, 1986)。为了推动组织计划的制定，研究者们建议尽早让人力资源部经理和业务经理参与进来。另外，尽管计划在并购前的准备和谈判阶段已经得到强调，但由于并购中存在着太多的变数，所以计划在并购后的整合阶段还需要进行延伸和修订。

(2) 谈判。并购谈判不但对完成交易至关重要，而且对其后的整合也将造成巨大的影响 (Mirvis, 1985)。它既涉及组织计划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克服并购过程本身的壁垒和组织机能失调。应明确一个正式的整合者，对并购所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统一规划；调整向相关的管理人员、员工和投资银行提供的激励，使他们不会处于只想尽快结束交易而不考虑交易结束后如何一起工作的急功近利的状态：把注意力集中在关键问题上，而不太重要的领域则可留待以后进一步讨论。

(3) 沟通。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应就合并及

其后果与员工进行公开、充分和及早的沟通。尤其是承受了巨大压力和产生了强烈不安全感的被并购企业的员工，更需要重新得到承诺。Levinson (1970) 认为，管理层决不能欺骗员工。“占主导地位的管理人员必须尽可能坦荡和实事求是，如果管理人员对员工封锁信息，那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当团队冲突、利益冲突、沟通恶化导致双方的信任水平下降时，谣言和投机就会充斥沟通的空白 (Pritchett, 1985)。因此，尽早创建一个正式的内部沟通机制被视为减轻紧张情绪的一个途径，以避免外部的新闻报道及小道消息对员工的紧张情绪产生火上浇油的作用，提高成功整合的可能性。

(4) 社群化。对拥有自身文化的整个企业进行社群化的难度远远大于一个个单独招聘进来的员工 (Finkelstein, 1986)。必须对被并购企业进行实实在在的改造，才能使其与原有文化在精神上彻底分离。克服社群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障碍的方法之一是，并购双方企业的管理团队定期讨论各自的价值观、管理风格，公开对本企业文化的正面评价和对对方企业文化的负面评价 (Marks, 1986)。不同文化的部分可兼容领域能够为最初的整合提供基础。另一个方法是在组织中进行跨边界训练。Buono 等 (1985) 认为，文化作为共享经验的产品，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化的。在两家企业的并购中，在一段时期内，可再生出的这些共享经验的数量越多，发展出一整套受到被并购企业的员工认同的由符号和共同意思所构成的才能的速度就越快。这时，新的文化开始产生控制作用。

整合程度对并购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虽然一些学者认为组织整合应该审慎进行 (Chatterjee et al, 1992)，但有证据表明，大量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对于利用并购双方企业在战略上的相互依赖是必要的 (Haspeslagh & Jemison, 1991)。从概念上来看，组织整合可以被划分为：(1) 并购双方企业的相互作用程度，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诸如重构和物流规划等方式发生的；(2) 为了提高相互作用的质量，通过预先计划、特定的整合者、沟通、社群化等方式进行的协调努力的程

度。在并购双方企业间进行的组织整合的质量和数量都会对协同效应的实现产生正面的影响，因为少量或执行得不好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是不可能产生大量的合并利益的。

3. 员工的反应

目标企业的员工对并购的反应可以从个人反应和集体反应两个方面来分析。个人反应主要是指并购对员工的心理和职业生涯造成的影响，而集体反应研究的是并购造成的文化冲突。从心理角度来分析，被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控制、同事和经理们被辞退或自愿辞职、自己和所在的企业像商品一样被卖掉、丧失组织身份等是导致被并购方员工士气低落的重要原因 (Marks, 1982)。另外，员工退出企业是并购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并购后出于降低工资成本的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裁员将对所有员工造成伤害。对进一步裁员或调岗的恐惧，以及对并购方“屠夫”的憎恨，将降低协同效应的实现可能性 (Marks, 1982)。出于对并购的不满，许多有价值的员工 (尤其是担任管理职位的员工) 会自愿离开企业。Gaertner (1986) 总结说：“我们发现，并购带来的职业生涯的变化对大多数管理人员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职业模式被打乱，职业发展活动在并购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停滞状态，意味着对组织有效管理员工的能力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文化冲突是导致并购后组织机能失调的重要原因。不同的组织文化为冲突敞开了大门。并购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可能表现在基本行为规则 (集权式或参与式)、价值观 (注重财务结果或注重作业管理、崇尚精英统治或提倡知识管理)、人际间行为 (产品导向或流程导向、开诚布公还是相互隐瞒信息) 等方面。并购后，由于相互抵触的企业文化、贬低对方文化而抬高本企业文化、集团中心主义、不愿意从对方企业的角度看待整合等倾向，文化冲突表现为两极化特征。这种激烈的文化冲突将极大地破坏组织的能力。Texaco 收购 Gettv 石油公司后，由于文化差异导致激烈冲突，当 Texaco 在与 Pennzoil 的竞争中面临损失 101 亿美元 (相当于整个 Getty 石油公司) 时，Getty 公司的员工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同仇敌

忾，而是恶意和幸灾乐祸。

已有的研究表明，被并购企业员工的反应不利于并购，因此，可以把员工反应这一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进一步具体化为员工抵制。这种抵制既可能是积极的 (如发表意见、自愿辞职、破坏)，也可能是消极的 (如矿工、不服从、逃避)，不管采用哪种形式，都将会在整合过程中极大地降低协同效应的实现程度。

4. 管理风格的相似性

管理风格是指合并双方企业的管理者对风险承担、权力和结构等问题的强调程度，管理风格的相似性将通过作用与组织整合程度和员工抵制程度来影响协同效应的实现。首先，当两个组织的管理风格较为相似时，往往能提高合作水平，并能缓解员工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剧烈程度的判断 (Diven, 1984; Buono & Bowditch, 1989)，因此，员工对并购的抵制程度将会减弱。其次，在并购双方企业的管理风格较为相似的情况下，由于文化差异较小，并购成功所需要的相互交往和合作能够在争议较少的情况下推行下去，并因此提高实现协同的可能性。

5. 并购双方企业的相对规模

在解释协同效应的实现这个问题上，并购双方企业的相对规模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当并购发起方企业比目标企业大得多时，合并潜力肯定会受到规模约束的限制 (Seth, 1990)。Kuserwitt (1985) 提出了“临界规模”观点，认为相对于并购发起方企业，目标企业必须达到足够的规模，才能产生有价值的合并潜力。Kitching (1967) 以 69 次并购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被认为是失败的并购中，有 84% 具有同一个特征：目标企业的销售额不足并购发起方企业的 2%。近期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发现 (Hunt, 1990)，这说明，协同效应的实现程度与目标企业对于并购发起方企业的相对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Larsson 等人 (1999) 的研究也为并购的“临界规模”观点提供了支持，认为相对规模越大的并购，产生的合并潜力越大，因此，并购绩效越好。他们的研究发现，合并潜力低于平均水平的

31起并购案例中,组织整合(不管是高还是低)对协同效应的实现产生的影响很小。相反,在合并潜力高时,整合程度的影响则相当显著。虽然这并非意味着在合并潜力低时,整合就不重要,但这时整合所能提供的潜在的价值增加会因为并购的协同潜力小而被减弱。

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在选择潜在的目标企业时,相对规模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因为它与合并潜力相关。虽然管理关注论的支持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不管并购的规模如何,只要在整合上花足够多的时间,倾注足够的精力就能使小规模并购取得成功,但很明显,他们单方面强调组织整合,低估了并购中合并潜力的重要性。实际上,合并潜力与组织整合是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研究表明(Larsson, 1999),当合并潜力和组织整合程度都很高时,并购绩效最好。

四、结 论

以协同效应的实现程度作为对并购绩效的衡量比财务绩效衡量更直接地抓住了并购的实质。在本文所探讨的五个因素中,合并潜力、组织整合、员工反应直接影响到协同效应的实现程度,而管理风格的相似性和并购双方企业的相对规模则通过作用于前三个因素而对协同的实现产生影响。除了员工反应以外,其它四个影响因素都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如果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可以发现,在合并潜力、组织整合与员工反应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影响:首先,合并潜力大的并购,将存在更大的有效整合组织以实现协同的需要,因此,可以预期:合并潜力越大,组织整合程度越大。其次,合并潜力会对员工反应产生影响:期望实现的协同越重要,员工的反应越消极。因为并购产生的许多利益和效率都来自于诸如去除重叠性职位与合并结构性层级等活动,而这些活动肯定会影响员工在整合过程中的合作动机。因此,合并潜力越大,员工抵制越激烈。最后,并购双方企业之间的整合会促使员工更积极地抵制变化。当并购企业在目标企业中进行业务与组织重构、合并职能、调整管理程序等活动

时,会使得本来就在怀疑自己的部门和工作稳定性的员工感受到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由于变化可能破坏个人的职业生涯、工作团队和组织文化,所以并购后的组织整合将会遭到员工的抵制和不合作。很明显,组织整合程度越大,员工抵制程度越大。

①例如, Singh 和 Montgomery (1987) 在对 1970-1978 年间 203 家目标企业的案例研究中指出, 关联性目标企业比无关联性目标企业具有更高的超额回报; Shelton (1988) 在对 1962-1983 年间的 218 项并购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横向并购和将相同产品销售给新顾客的关联互补性并购能获得巨额回报, 无关联并购则显示出对绩效较小但却是负面的影响。然而, Elgers 和 Clark (1980) 在对 439 家并购企业和 430 家目标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 与非混并购相比, 混并购可以为并购双方的股东带来更多的财富; Chatterjee (1986)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无关联并购中的目标企业要比关联并购中的目标企业具有更好的绩效。

[参考文献]

- Goldberg, W. H. (1983) Mergers: motives, modes, methods. Aldershot: Gower.
- Lubatkin, M. (1983) Merger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cquiring firm.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8.
- Ravenscraft, D. J. & Scherer, F. M. (1987) Mergers, sell-offs & economic efficien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Jensen, M. C. & Ruback, R. S. (1984)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
- Chatterjee, S. (1986) Types of synergy and economic value: the impact of acquisitions on merging and rival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7.
- Schweiger, D. M. (1990) Executive actions for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before and after acquisi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2.
- Larsson, Rikard (1990) The handshake between invisible and visible hands. Paper presented at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责任编辑: 黄振荣

• 哲 学 •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与路径

◎ 杨 楹

[摘 要] 本文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以解读现实社会生活为根本。文章首先分析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创新过程中主要存在的六大问题;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概括并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精神;最后从四个维度来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价值 问题(群)

[作者简介] 杨 楹,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泉州,362021。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43-06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一系列变迁的内在需要,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理论沉淀与提升。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对变化中的中国现实的理论把握与理想现实构建之必要。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更是如何引动现实生活需要解决的实践操作上的严肃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就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获得了价值定位。

—

从学理上反思、清理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活动中存在的、不利于甚至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诸多理论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可能性前提。在笔者看来,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价值立场。在学理上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必然在实践中简单地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否认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功能。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主要是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来解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试图通过所谓“话语革命”或“话语转换”、“语词分析”等方式与途径将具有内在逻辑、完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肢解为各个孤立的语词或命题,落实所谓语义;并以时代特征变迁为由,通过否定个别命题、个别的理论,尤其是个别的理论结论,抽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语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视为一个知识系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特殊的理论意蕴与价值指归。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并局限于部分、局限于孤立的范畴或个别的理论,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范畴、命题、原理的简单组合体,并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品质、阶级属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陷入了新的“经院哲学”之困境

中。

第二，割裂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的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别于其它哲学的属性特征，但其批判性之价值目标则在于指向蕴涵该理论之中的发展性，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是高度统一、互为规定的。然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索中，却长期存在着偏重或孤立地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特质，而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忽略对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统一性内涵的深入挖掘。我们知道，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了蜕变为一切现存的事物进行解释、说明，甚至辩护的手段与工具，借口发展，本应该加以批判的也都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而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化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现存一切“东西”的理论阐释或理论备注，这只体现了其工具价值的特点，而抹杀了其一切旧哲学的原则界限，从而取消与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革命性意义；反过来，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拆解为仅仅是以斗争、革命为目的的理论，就必然使斗争、革命丧失价值规定、价值判断与价值目标，从而搁置、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中所蕴涵的超越性。在理论内在关联性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割裂，必然给现实的实践带来误导，产生革命与建设、发展的简单对立，导致现实中常常强调批判、革命就忽略发展，反过来，强调发展就忽略批判、革命的两极对峙。这样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后果是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问题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也就必然影响、甚至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

第三，将应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等同的倾向。认真地透视各种应用哲学，其基本的理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来解析具体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在各个不同的领域的贯彻，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迁移”而不是新的发展，使多种应用哲学之基本的范畴、命题与逻辑未有其特

殊领域性。如果对多领域的应用哲学加以还原，则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主要是“教科书式”的哲学原理在各个领域的阐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哲学原理版本的多领域事例性的拓展，是同一个“哲学原理”的“分有”。严格说来这并不是真正的应用哲学，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误认为是创新的应用哲学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应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化、万能化，进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肤浅化、庸俗化。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解析一切问题的通则与有效的知识性工具，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层面上对现实问题进行审视和加以概括的合法性。这种状况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带来的是肤浅化、应景性的结果，这必然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移植。随着改革开放，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可能的资源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中，有的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简单地照搬、移植到中国，形成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实的学术态势。诚然，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其他民族哲学研究所取得的已有成果，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绝对不充分的，更不能以之来取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成果的生成是依赖于西方社会生活的事实，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决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生活的语境。若非如此，那必将忽略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就变成仅仅是哲学范畴的游戏，于中国社会毫无裨益。

第五，“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对立。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政治化的解读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相对而言却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研究与建设，视马克思主

义哲学已穷尽了一切真理，我们的任务就是“应用”。固然，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等同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注脚”是不恰当的，但反过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与现实中国的意识形态简单地独立起来也同样是错误的。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存在样态上分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个体研究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认为官方意识形态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统的，讲坛或学院讲授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附性的、简单注释性的，而研究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个性化与多样化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功能显现多元管道的描述。无论是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学者个性化研究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割开还是简单等同，都不同程度地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品质与根本的价值诉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其“真正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能真切地把握住我们时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它能化为现实，化为生活，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观照。

第六，返“本”思潮，“回到马克思”的倾向。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强调返本，也就是来一个“正本清源”。1921年李大钊先生在发表于《新青年》的《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近年来“回到马克思”以回到文本为起点，严肃地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走向当代与未来中国的生活”等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版本学研究的。针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歧义性，提出“回到马克思”，决不仅仅只是为了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而是使曾经被误读的结果得以矫正，更为重要的是指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该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精神，从而达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共识。惟有如此，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回

到马克思”确实容易引发新的本本主义，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锁定在文辞之中，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现实性。由此，我们提出应该将“回到马克思”与“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相结合的原则，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变化中存在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解析，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新的开拓。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既是创新过程中的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是走出该种困境的起点。透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历程中之所以出现以上的诸多问题，不难发现其中所蕴涵着的偏失。概而言之，直接体现为丢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品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规定与思维方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脉相承的精神；再进一步追究，其关键症结则在于脱离中国现实的变化、脱离中国生活世界的特殊语境，让扎根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退回到书斋，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陷入了概念、范畴的游戏之中。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活动中“一脉相承”中的“脉”到底是什么做出正确、清晰的解读和把握。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前提。

从哲学比较学的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蕴涵于它所解决的问题之中，这些问题简要地说主要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与前途，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人类的未来命运等等。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些问题而运思的。其理论的精神，即“脉”也就体现于其中，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抽象理念的逻辑演绎，也不是抽象的“人本”延伸，而是扎根、立足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整体性地思考如何改变“生活”这一基本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该理论之时，直面资本主义制度的诸多矛盾，

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无产阶级的生活所构成的，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中的基本矛盾或“问题”的生成与转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才真正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成为把握其“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哲学”。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①这给我们指示出一条方法论原则：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不能仅仅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言辞，更重要的是必须严肃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生存世界的生活文本。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始点的原创精神方可以丰盈饱满的形态呈现出来。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抓住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全面异化的生活事实——这一历史性的“问题”，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从而解放“人”，创造新生活的理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紧扣深深镶嵌在时代生活世界的“问题”的活理论。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须臾也不能离开“生活世界”。

第二，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具有双重性。首先是理论的批判。这种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主要是指向德国陈腐的意识形态、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西方哲学传统，也包括对各种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潮而展开的理论，从而实现理论上的超越与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并以这种新的世界观来武装无产阶级的大脑，给他们以正确的解放理念。但对德国理论的批判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第一步，是批判精神展开的内在环节，因此理论的批判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批判的全部。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批判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还必须推进到现实的批判，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实践层面，即实践的批判。由此体现出马克思所言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完整意义。深刻的理论批判是实践批判的指针，是思想领域上的清理，是以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掌握群众的必要前提，是实践批判正确性的导向；实践的批判是理论批判的继续与深

化。批判是开放的，是一个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性是指通过社会主义的运动这样的实践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构成的现实进行物质的否定。这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内在精神——实践品质。马克思有言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别于以往哲学的特质。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的批判是不可剥离的，理论的批判开拓理论的视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域，使理论更具现实指向性，使理论更深刻而具有说服力与更具群众基础；实践的批判则是完成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使生活的世界向活生生的人开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正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从理论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过渡，从而完成双重批判性的扬弃，即通过批判的武器落脚到武器的批判，实现对旧理论的扬弃和对实践的扬弃。再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逻辑路径来看，正是基于马克思哲学观的创新，经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的批判，建构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最后落实到科学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走向，并且通过双重批判，最后完成对自己理论的批判，从这一点可窥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

第三，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马克思有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抽象理论体系的完备而创设的，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现实生存遭遇，改变他们的历史命运，使无产阶级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自发提升为自觉，从而通过解放自己而解放全人类。这一理论品质决定了该理论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张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运动本身，必将成为空洞的理论，同时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同样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运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支撑也就必将沦落为经验主义或先验的理

性逻辑之中。虽然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具体内涵有别，但同属无产阶级自我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环节，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为之提供了精神指导。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创新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自我解放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精神之“脉”是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坚持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这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理论根基。只有深刻体现以上理论品质的哲学创新才堪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才能真正对中国现实发生积极的导引作用。

三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之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加以展开：

第一，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立场，认真学习与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已取得的重大成果，并以此为成功的理论范式，进一步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生命力，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现实需要理论的观照，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基本的理论支撑。这是不争的事实。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已取得的优秀成果，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遵循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发现并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为根本的原则。毛泽东时代所遇到的问题、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江泽民时代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却都是紧紧地围绕着时代“问题”而创始性地给予了回答，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重大成果，并使中国现实生活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遵循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根本逻辑，是我们今天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

第二，正视并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

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关键。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生成的诸多问题或问题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现实动力。只有创新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创造性解决今天我们的生活中所生成的新问题，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切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发挥其真正的价值。

按照这一理路，深入地把握现实生活各领域的变迁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以及在新的特征生成之前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内在要求。反观中国近 20 年的变化，不言而喻，构成中国特色内涵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趋向。简要地清理可见：在物质生活领域，财富的生产方式已超越了简单的小农经济与扩大化了的小农经济（即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格局。单一公有制的产权结构渐次让位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态势；私有制在当下特殊的历史阶段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市场与政府的博弈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功能尤为明显；经济利益正在集团化与分层化。在政治生活领域，如何实现从臣民政治向公民政治，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义务政治向责任政治，无限（政府权力）政治向有限（政府权力）政治，专制、特权政治向分权、民主政治，统治、管理政治向服务政治，神授、世袭政治向选举政治顺利地转变等等，一句话如何通过“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等一系列中介价值手段，达及具有现代政治理念与精神的“法治国家”的终极目的价值，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任务，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重大政治课题。在精神生活领域，文化的跨区域、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多元价值并在的文化生态正在成为现实；官方意识形态与草根文化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心态、文化信念与文化走向。在这些矛盾中，必然产生国人的主导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文化景况。这样，如何直面社会的信仰与文化生活领域的变化，如何消解文化专断，从而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文化宽容、文化

自由、文化的中心与边缘化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睿智解答。在社会生活方面，国家与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社会团体组织）之间的矛盾关系凸显；社会公共领域建设的亟待加强，社会的自由诉求、自由的多向度需求从未如此强烈；私权与公权的关系合法边界需要制度化与法律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这一系列社会生活变化，尤其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所引发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成为检验中国是否能顺利转型而具有真正的现代社会之重要品质的尺度。而能否真正地把握中国现实中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问题群”，不仅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尺度，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获得创新的内在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成为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重要维度。

第三，以哲学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哲学的哲学，即是以生活为价值指归的哲学，但依然遵循着哲学创新的规范原则和独特的方式。这样，同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既然是哲学创新，是一个重大的“哲学事件”，也就必然要求只能以哲学的方式来把握、反映、整合与提升中国的现实“问题群”，而不能是艺术的、科学的、宗教的，甚至是直观的把握。在此，笔者认为，要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为前提，以哲学问题为引导机制，以哲学范畴为承载单元，以逻辑判断为纽带，以系统化为特征，以解决问题为归宿。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然呈现为一种哲学理论创新（理论范畴、理论方法、

理论域、理论结论等的创新）。惟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创新才能走出自己的空间而能与其它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进行有效地对话。在这一环节上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经验主义的传统，贯彻“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法的精神。

第四，建构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之必要。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官方哲学”，其指导地位与合法性不断在中国现实的实践中获得了证明。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与创新也就不同程度地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学术风险，这不仅仅表征为话语系统、话语权的垄断，更为重要的是“哲学话语空间”的萎缩。这就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的、自由的探究的可能性，削弱了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体性。在此，我们是否需要弄清楚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到底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抑或兼而还是一个学术问题呢？创新主体是否只能是领导？还是领导与学者具有不同的分工呢？……就问题本身而言，在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程是绕不过去的。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中，我们认为建构一个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必要前提。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15-16页。

责任编辑：何蔚荣

创新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 马拥军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非哲学的哲学,即生活哲学而存在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语境的转换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关键词] 生活 创新 语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 马拥军, 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副教授、哲学博士, 福建 泉州, 362021。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49-05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实现创新”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后者体现的则是人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观努力。遗憾的是,学者们关注的,大多是后一方面的问题。问题的前一方面更加重要,也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特质,但却少有人关注。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内在地蕴含着创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非哲学的哲学”,即生活哲学而存在的。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与其特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语境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随着地域的转移和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展现出新的面貌,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哲学概念:一是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二是作为对世界的“纯粹”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两种含义具有完全不同的品质:前者产生于特定阶级的特定生活条件,因而随着这种生活条件的

改变,哲学也将通过自身的实现而消灭自身;后者则产生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哲学家的幻想,这些哲学家试图建立一种超历史的理论(即所谓“永恒真理”的体系),作为包医百病的良方,然而正因为这种哲学的“普遍适用”,它也就处处都不适用。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的真理,只存在特定语境下的特定真理。

由于在进入思想成熟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把“纯粹”哲学称作“哲学”,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哲学”已经过时,因此他们常常说哲学“终结”了。我们则把生活哲学称作“作为非哲学的哲学”。生活哲学产生于特定个人的特定生活条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这样的哲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与从哲学出发、经过哲学、终结于哲学的“纯粹”哲学不同,生活哲学是从生活出发、经过对生活的认识、最后落脚于对生活的改造。相对于纯粹哲学,它可以称为“实践哲学”。“纯粹”哲学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哲学是什么”,对实践哲学来说并不存在,因为实践哲学的落脚点是生活的改造,而生活的改造则改变了实践哲学的初始条件,从而也改变了作为生活哲学的实践哲学本身。因此,对于实践哲学来说,问题的提法与其

说哲学“是什么”，不如说哲学“如何去是”，即它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存在条件，来不断改变着自身。

实践哲学的“如何去是”包括三个环节：它要成为什么？它可能成为什么？它将要成为什么？它们分别对应着生活的否定方面、肯定方面和扬弃方面。从生活的否定方面来说，所谓哲学“要成为”什么，意味着它不满足于生活的现状，它不是着眼于哲学已经“是什么”，而是着眼于（相对于人的愿望来说的）它“还不是什么”，即着眼于对生活进行变革，这是哲学的未来向度。所谓哲学“可能成为”什么，意味着哲学变革生活的要求受到既定生活条件的制约。哲学不可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条件，它本身只能产生于既定的生活环境，对生活的变革必然受到这种环境因素的制约，这是哲学的过去向度，它体现既有生活的肯定方面。哲学“将会成为”什么，则是在综合了哲学“要成为”什么和“可能成为”什么之后所做出的权衡，它体现的是哲学从现在向未来超越的向度，即生活的自我扬弃。哲学的“要成为什么”、“可能成为什么”和“将会成为什么”，是一个“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相统一的过程。其中，“世界的哲学化”表现的是哲学中理论的一面，而“哲学的世界化”表现的则是哲学中实践的一面。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作为生活哲学的实践哲学本身既把理论、也把实践作为自身的环节。

这里的“理论”不是对现状的“反映”，而是对现状的批判，正如这里的“实践”不是对现状的复制，而是对现状的改造一样。由于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理论和实践并不是并列关系或先后关系，而是理论包含于实践、生活。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对此作了充分的展开，这里不再赘述。但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柯尔施所作的分析值得关注：如果把“哲学”仅仅视为独立于实践的理论，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哲学、生活哲学就不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确实是终结了；然而，实践哲学、生活哲学本身并没有终结——只要生活还在延续，实践还在推进，它就不可能终结，而只能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实践

中的理论，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实践不是无理论的“行动”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决定了，它是包含普遍的特殊、包含一般的个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特定语境中的哲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去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

二、哲学及其语境

哲学的语境，表面上看，涉及的是哲学与它的时空背景的关系，但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涉及的是哲学家与他的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既然哲学总是特定哲学家的哲学，而特定的哲学家总是特定时空背景中的哲学家，那么任何一种哲学必然都带着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烙印。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以费尔巴哈为例，他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但他借以设想“一般人”的原型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周围的人，费尔巴哈所谓的“一般人”实际上是“德国人”。^②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说他立足于“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但实际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③“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④恩格斯批判杜林，说他诉诸“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而在恩格斯看来，“谁要想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⑤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哲学上对“绝对真理”的迷信是导致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上陷入迷误的理论原因。对空想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但“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

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⑥拿黑格尔来说，“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从“主观知性”方面来说，“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从“生活条件”方面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从“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方面来说，“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黑格尔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⑦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体系。恩格斯明确地说：“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⑧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的只是封闭的体系，而不是开放的体系，或者说，他们反对的是体系的封闭性。

任何理论都必然采取体系的形式，否则不成其为理论，哲学理论也不例外。但“纯粹”哲学是封闭的理论，而生活哲学则是开放的理论。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研究主体——哲学家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它的研究对象——生活的变动性。首先，从研究主体方面来看，“纯粹”哲学从哲学出发、经过哲学、终结于哲学，似乎它的价值就在于能独立于特定条件的哲学家，因此通常哲学家的局限性不被考虑在内；而生活哲学却是从生活出发、经过对生活的认识、终结于对生活的改造，这里的“生活”正是哲学家本人及其所在的社会集团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因此，生活哲学不能是无主体的哲学，而只能是特定主体的哲学。其次，从研究对象方面看，“纯粹”哲学的研究对象被当作是既成的、固定不变的对象，而生活哲学的对象则是处于生成中的、永远待完成的对象。生活哲学对象的开放性和主体的局限性共同构成了生活哲学的语境。

三、生活哲学的超越性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

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⑨“自己”一词体现了哲学的语境意识。问题在于：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哲学是一种不包含普遍的特殊、不包含一般的个别？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是一种特殊的理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语境，特殊不能指导特殊，因此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注意生活哲学的超越性。

“纯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对立起来，认为哲学研究的是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因此它适用于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反过来，把哲学当成不包含普遍的特殊、不包含一般的个别，更是错到了极处。如果是这样，那么哲学与普通人的“意见”、“常识”有何区别？要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考察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在多中寻找一、在变中寻找不变，这样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曾先后被当作特殊中之普遍、个别中之一般、现象中之本质。“纯粹”哲学的用意，就是把这种特殊中之普遍、个别中之一般、现象中之本质找出来，作为“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用以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研究，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即所谓的“世界观”，其实践应用即所谓的“方法论”，于是哲学又变成了所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反对把哲学作为“药方”和“公式”，也就排除了对哲学的这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他们的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却不承认他们的理论是“哲学”，正如同他们承认自己的理论是“自然观”和“历史观”，却否认它们是“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一样。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传统哲学缺乏语境意识。按照传统哲学，一和多、变和不变的关系是固定的，一旦把握了这种关系，绝对真理就得到了，剩下的只是如何把这种真理应用于实践中。可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无论是哲学的主体还是对象都处于生成过程中，因此一与多、变与不变之间，也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关系”。传统哲学认为现象是变动的杂多，本质是不变的纯一，因此所谓“世界观”是在可变

的、杂多的现象背后寻找不变的、统一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本质”自身是在人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因此“世界观”所“观”的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世界，而是特定的个人所面对的特定的世界，即特定语境中的世界、生活世界。随着特定个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生活世界自身也在不断向前延伸，作为“世界观”的哲学自然也就不断地自我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自然观”也应当这样来理解。哲学的“语境意识”内在地包含着它的自我超越性。

生活哲学与常识、意见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把握，后者则是对生活世界的零散的、直觉的把握。在前者看来，生活世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因此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空间结构和“辩证否定”的时间结构。“三位一体”即现实的个人或哲学家本人、他的生命活动和他的周围环境，三者的结合形成哲学家的存在处境和理论语境；“辩证否定”即生活世界的自我超越，它是对生活世界前一阶段的“扬弃”。而在后者看来，生活世界无非是哲学家所遭遇的一切，哲学家就用自己的遭遇来衡量整个世界，因此总是坐井观天，缺乏自我批判意识。如果说零散把握、直觉把握可以满足作为特殊的特殊、作为个别的个别，那么总体性把握就必然是包含普遍的特殊、包含一般的个别。

这样看来，生活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既是普遍又是特殊、既是个别又是一般。就其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来说，它是特殊的、个别的；而就其对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生活世界作出普遍归纳、一般概括并把这些归纳和概括制作成理论体系来说，它又是普遍的、一般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特点是“特定的个人看特定的世界”，而不是全能的上帝看超时间、超空间的世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并从中得出那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后一种“世界观”一经得到，理论活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终结，剩下的只是如何去“实践”的问题；前一种“世界观”既然只是特定的个人对特定世界的把握，那么，随着特定的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⑩这种世界观自身必然要求自我超越。这就是我们所说

的“哲学创新”。

四、创新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哲学的自我超越是与它的创新语境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哲学主体和对象的时空变换，向生活哲学提出了创新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始语境是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活哲学，或生活哲学的历史观。以后随着时空变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向前发展：19世纪下半叶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20世纪上半叶列宁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中国，毛泽东先后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名篇，直到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今天的“科学发展观”。

恩格斯始终非常清楚：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主要是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大科学发现。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根据恩格斯的以上观点，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至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辩证法，在恩格斯那里是从属于历史观的。恩格斯以后，正如柯尔施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被割裂了。在理论上，“辩证唯物主义”越来越突出，终于在地位上超过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变成了研究“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普遍性科学”或“科学一般”。但在实践中，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以历史观语境中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只是他们本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误以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一般世界观”为指导的。比如，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这分别体现出民主革命语境和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而他们所理解的“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实际上根据的并不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

理，而是根据感性（对象、现实）世界第一性、理论世界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物质”和“（感性）存在”的差别、“客体”和“对象”的差别、“事物”和“现实”的差别在毛泽东、邓小平和一般人的心目中并不特别明显，但这一理论上的误差在当时的实践中所产生的后果并没有被人察觉到。

只是到了今天，到了必须“以人为本”的时代，到了“奉献”和“牺牲”必须退居第二位、人必须占据第一位、甚至连自然界也被“人性化”的时代，物质客体与感性对象的差别才变得醒目、乃至刺眼了。马克思曾经批评霍布斯的唯物主义为“敌视人”的唯物主义。^⑪当“辩证唯物主义者”们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当作缺点、而不是优点的时候，马克思对霍布斯的批评实际上也适用于他们，因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认为“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⑫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物质贫乏的年代，是否突出“以人为本”，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在那个年代，阶级重于个人，为集体“奉献”和“牺牲”本身就具有独立的道德价值。正因如此，追求自我实现甚至被当作“小资产阶级”行为来批判，人们追求的是以“阶级”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

这样看来，哲学创新首先是语境转换的客观要求，其次才是人们的主观努力。过去，不能离开“阶级”谈个人，否则就会被指责谈论“抽象的”人；今天则不能离开个人谈阶级，否则就是谈论抽象的“阶级”。这并不是由于过去人们在主观上不看重个人、今天主观上看重个人，而是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年代，阶级和集体的存在是具体的、离开阶级和集体的个人存在是抽象的，个人从阶级和集体获得其规定性；而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才是具体的，离开个人的阶级和集体的存在反倒是抽象的，阶级和集体从个人获得其规定性——这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个人，而非阶级或集体，君不见，甚至集体也被称作“法人”了？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首先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相当多的假问

题就可以避免。关于“中西马贯通”的问题就是这样。现在有许多人在为中国传统哲学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异质的哲学”如何贯通而发愁。实际上大可不必。如果两者在客观上本来就不能贯通，为什么主观上强作“贯通”的努力？如果客观上能够贯通，为什么满足于发号召，而不去亲自实践一下，不直接去做“贯通”的艰苦努力？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本身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早就“贯通”过了，至于“贯通”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毛泽东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等同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问题，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的观点，这不就是所谓的“中西马贯通”吗？人们可以批评毛泽东，说他不该把“实践”等同于“行动”，但不能说“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与“知行关系”不能贯通。

按照我们的观点，由于历史上的东西隔绝，西方传统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确曾是不可“贯通”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去中国人的“比较哲学”大多建立在对西方哲学误解的基础之上。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交往普遍化，中国人的生活已经融入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西方人的生活已经融入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在东方人的“存在”和西方人的“存在”相互交叉、正逐渐融为一体的情况下，还来讨论中西马贯通的问题，说明有关学者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作为非哲学的哲学”，即生活哲学而存在的。否则，中国传统哲学是生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生活哲学，何来“贯通”的困难？

①②③④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75、141、142、77页。

⑤⑥⑦⑧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0、732、737、737-738、374-37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

当代中国道德体系创新的几个问题

◎ 吴奕新

[摘 要]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并在道德建设实践中不断寻求创新与发展,既是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道德建设的创新与发展,应当调整思路,注重观念创新、体系创新和机制创新。

[关键词] 当代中国 道德建设 创新与发展

[作者简介] 吴奕新,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博士,广东 深圳,518031。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54-04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在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深刻地表现出来,呼唤加强道德建设、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根据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道德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应调整思路,注重观念创新、体系创新和机制创新。

一、创新观念

1. 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与传统社会道德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当代中国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道德发展在社会实践中已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二是以信息科学与纳米科技为代表的当代新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三是专业化、职业化、网络化为特征的社会组织管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四是以法治为主要标志的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逐步形成;五是以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在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革推动下,社会主义道德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许多新领域、新特点、新趋势。现代道德与传统道德之间最大的区别,表现在人类社会实践价值追求的自觉程度极为不同,并且贯穿于社会实践活动的性质、内容、结构、过程、效果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中。

在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并在道德建设实践中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道德,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优秀传统,也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还要引导和激发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创造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道德、新观念。在新的世纪,我国道德发展将呈现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是经济伦理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升。在传统社会,经济伦理的地位和作用潜在的、弱小的、偶然的。各种经济行为、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相对来说是简单的、明确的,调整社会种种利益关系的手段主要是权力。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和经济行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一方面促进人们对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另一方面促使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伦理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升了。

二是科技伦理社会化趋势正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改革、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为人们所普遍认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正在迅速、全面、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经济面貌,同时也正在迅速、全面、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精神面貌。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正在成为现代人伦理道德观念中十分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日益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身体力行。

三是公共伦理大众化趋势已渗透到全体社会成员中。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在公共场所、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公共区域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传统的私人概念、家庭概念、单位概念、社会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传统价值观、道德观逐步被现代公共伦理所取代。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公共伦理不断渗透到城乡各个角落，并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必备的基本道德素质。

四是生态伦理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在现代社会里，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普遍引起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环境卫生、环境绿化、环境质量，已经成为城乡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珍惜环境、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意识和观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成为一个民族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

五是家庭伦理个性化趋势日益明显。家庭不仅是社会的细胞，而且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最基本的单位，甚至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中心。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功能、规模、结构、地位，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家庭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既有坚持传统生活习惯的，也有冲破传统，追求个性化生活方式，甚至有的双方财产分而治之，有的按协议管理，有的长期两地分居，有的只求结婚不准备要孩子，等等。如今，除法律规定外，社会已逐步减少对家庭领域和私人关系、私人感情的干预，家庭伦理个性化日趋明显，并逐步被人们所接受。

2. 深刻把握坚持“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法治”和“德治”问题，并把这二者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上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缺一不可，不能偏废。依法治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实践又充分说明，一是单纯依靠德治或脱离德治去实行法治，都不可能建成标志人类先进文明最新成果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的地位和作用，以此来保障、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这种战略要求本身亦内含着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的要求。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要求同一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而这种坚持和斗争，需要运用一定的道德认知、道德评价、道德选择、道德实践、道德规范来实现。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大力普及和不断增强全民族的法律素质和守法意识，努力造就一大批善于依法治国的英才，让社会主义法制深入人心、民主落在实处，具备扎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保证。要达到这些要求，没有干部道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道德建设、社会公德建设以及道德舆论环境的密切配合，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可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内涵本身包含着“德”与“法”、“德治”与“法治”的双重规定性。强调以德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则是实现以德治国的高能加速器。

从操作体系和运行规则上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其操作体系、运行规则和活动范围，既相辅相成，又不彼此取代。依法治国的操作体系是：享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负责制定法律和法律监督；行政机关负责执法；司法机关负责司法。而以德治国的操作体系是：政府树立榜样，媒体进行褒贬，民间社会性组织自我约束。依法治国的运行规则是：权力机关依照立法和监督法运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而以德治国的运行规则是：营造文明风俗和约定俗成的惯例。

从其内在关系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法治的源头是德治，法治的归宿是德治，而德治的辅助保障手段是法治。这些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是早已被历史事实所说明了的。因此，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再把以德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是德治与法治须臾不可分割关系的自然表现，是对古今中外德治、法治并用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从社会现实生活看，把以德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是当前社会现实的需要。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传统的道德正伴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发生剧变，而新的思想道德体系尚未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商品交换的对象既有有形资产，亦有凝聚道德信任的无形资产。换句话说，人们在市场上交换的不仅仅是财产，还包括道德。然而近年来，由于信用严重缺失，极大地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思想信仰到日常伦理，在一些人当中的确存在着危机，可见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以德治国的提出，是应对现实经济社会挑战的必

要手段。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一道置于治国方略的地位，既是历史经验，又是社会现实的要求。

从社会管理看，没有法律、没有刑罚，没有政治管理和强制性的约束，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想要保持稳定，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危害人民、违法犯罪的人，必须要给予法律的惩罚，否则就不足以维护国家的安定，不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样，我们也决不能因此而忽视甚或否认道德的重要作用，因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没有社会主义明确的是非、善恶、美丑、荣辱观念的约定俗成，不但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一些人之所以犯罪的思想根源。

二、创新体系

1. 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规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 WTO 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必然带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会趁机而入。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面临的新的课题。建立健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个相当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应当有世界历史眼光，善于批判地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形成的与之相应的道德体系。因此，我们所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当是立足于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政治关系基础之上的，又能充分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也是能够正确反映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并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道德体系；同时，也要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2. 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道德的新内容。

随着我国加入 WTO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们普遍倡导新经济概念、倡导知识经济。事实上，道德也是一种知识体系，它是运用实践精神把握和改造人类社会的一种知识经济。因此，必须把道德知识经济融入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当务之急是需要尽快培育和确立一些新的伦理观念，如产权伦理观、消费伦理观、行政伦理观、自主自立观、法治观等。

3. 建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由一系列道德规范所构成的。道德规范也是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便形成了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导向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进步，道德的内容和规范是不断变化的。从不同领域看，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依据不同情况特别是要依据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 WTO 的具体情况，及时制定相应的道德规范。例如，在经济交往和经济行为中，应当有讲信用、讲信誉和讲竞争与协作等行为准则；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应当有讲廉政、讲勤政、讲人格、讲纪律和反腐倡廉等道德要求；在文化生活和文化教育活动中，应当有讲文明、讲文风、讲教育和以德治教等道德规范；在各大中小城市，应当有适合自身城市特点的市民守则、社区守则、村民守则等道德制度；在各地农村，应当有结合自身特点，配合本乡本村的乡规民约等道德要求。从社会公德看，在广大城乡的各公共场所，除了要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印发的并在全国倡导的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必须遵循的社会公德外，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地域特点和具体实际，制定具体的本市、本镇、本乡、本村社会公德的规章制度。从职业道德看，各行各业除了要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印发并在全国倡导的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必须遵循的职业道德外，还应当针对各种具体的行业职业，制定不同的道德规范。从家庭美德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它又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家庭教育除了要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印发并在全国倡导的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外，各地区的行政基层组织，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具体实际，进一步对家庭美德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制定更加具体的行为准则，以达到教育所有家庭成员和提高所有家庭成员素质的目的。从不同层次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首先要有共产党员的道德规范，其次是共青团员的道德规范和革命军人的道德规范，然后是科技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等的道德规范，最后才是居民和农民的道德规范。

三、创新机制

道德建设机制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带规律性的模式”。实践证明，道德建设机制影响着道德建设的目标、内容、功能、时空和效应等诸方面，它不仅贯穿于道德建设的全过程，而且体现在整个道德建设的各个环节。

1. 管理机制。道德建设管理机制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最重要机制。道德建设的管理机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道德建设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方式，并通过其有效的管理，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良性运作的基础上，获得最佳的社会成果。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管理机制，包含领导机制、决策机制和协调机制三个方面。一是领导机制。道德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各条战线和企业主管部门，都必须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其中各级党组织应负起主要的管理责任，发挥其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二是决策机制。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领导机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决策机构。决策机构必须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不断变化的情况，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办法或措施，制定道德建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方案，以应对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保证道德建设的顺利推进和发展。三是协调机制。协调机制的基本形式主要通过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来实现，通过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协调形式，来使道德建设的运作从不平衡转化为新的平衡，从不协调转化为新的协调。

2. 教育机制。教育机制是道德建设最重要的社会机制，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核心。道德教育机制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为了使人们遵循其道德准则，自觉履行相应的道德义务，而对人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施加的系统的道德影响。它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使人们懂得善恶、是非、荣辱，更重要的是使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并转化为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

道德教育机制，它包含理论建设机制、教育组织机制和教育实施机制。一是理论建设机制。它是道德教育机制的基础。建立道德理论建设机制，首先，要有一支科研队伍。其次，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要善于把社会丰富的道德建设经验和市场经济内在的客观道德要求提升为理性认识，形成相对统一的社会道德理论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善于把一般的道德准则，具体化为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等的具体规则和要求，使其具有明晰性、实在性和可操作性，以便让社会成员接受和履行。二是教育组织机制。教育组织机制是社会道德教育机制的中心环节。在我国，社会道德教育分为三个方面：即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每一个方面的教育，都应该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机构。三是教育实施机制。教育实施机制是道德教育机制的关键环节。要保证教育的有效性，首先要实现道德教育的制度化。其次，要加强道德教育队伍的建设。再次，道德教育要灵活化。

3. 道德评价机制。道德评价机制也是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社会机制。所谓道德评价，是指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人们，直接依据一定社会的道德准则，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传统习惯等方式，对个人、他人或集体的行为所做出的是非善恶性质的价值判断。社会实践证明，道德评价是一定社会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是实现道德职能、发挥道德作用、进行道德建设的内在机制。

从本质上讲，道德评价就是以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传统习惯为主要评价手段，以人们的品质和行为为主要评价对象，以善恶为主要评价标准，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实现道德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以达到扬善抑恶、褒善贬恶的目的。因此，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各级政府应通过各地伦理道德研究的社团组织，建立健全本地区的道德评价中心，定期对本地区的道德现象作出评估和权威评价。与此同时，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形成以讲道德为荣，不讲道德为耻的扶正祛邪的强大社会道德舆论氛围，使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的人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大力褒扬，使背离社会主义道德的言行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和大力谴责。

4. 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监督机制是道德建设的另一重要社会机制，又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保证。道德的践行，虽然从根本上说依赖于道德主体的自觉性。但是，道德主体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其自律性的养成需要一个由不自觉逐渐转化为自觉，由外在道德要求逐渐内化为内在道德需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的道德监督，是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必须看到，道德主体的成长没有最终的完结点，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各种现实矛盾总是不断涌现，道德主体要保证自我健康发展，不断完善，不仅要依靠自身自觉的修养锤炼，而且还需要借助于外力的监督，才能使这种保证具有主观的依据和客观的基础。

建立健全道德监督机制，在当前我国现实条件下，应主要由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四大方面构成。

责任编辑：思 哲

•政治学•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的若干思考

◎ 李秀潭

[摘 要] 中国探索“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已有半个多世纪，我们寻求这条道路几经曲折，我们坚持这条道路义无反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强调要把改革开放推进到新水平，实质上就是决心把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进行到底。“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理论意义。本文从实践依据、时代依据、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四个层面对这条道路进行了初步的解读和思考。

[关键词] 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和平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李秀潭，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北京，100091。

[中图分类号] A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4) 09- 0058- 08

胡锦涛总书记 2003 年 12 月 28 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总结提炼，又是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的精辟概括，它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是一项牵动全局、具有极大政治意义和理论学术意义的重大课题。

如何全面正确解读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本文试从这条道路的实践依据、时代依据、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诸层面作些初步思考。

一、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实践依据

崛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崛起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过程。如果把安全、发展与崛起同视为国家的战略目标，那么崛起则是最高层次的国家战略目标。

世界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国家能否崛起，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国际条件、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这就已经标志着中国在政治上的重新崛起。

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寻找一条中国

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并继续进行着艰辛的探索。

上世纪 50 年代初，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响，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独立地位，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我国与苏联结成联盟，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成员。60 年代，当苏联试图干涉中国主权时，毛泽东为维护国家尊严，与苏联大国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70 年代，为了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奠定了中美苏大三角的世界战略格局。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大手笔，不仅对改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尤其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主题，就是维护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逐步恢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时，就向世界表达了中国应当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愿望。他认为，“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6 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1961 年他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指出：中国要发展为世界强国，“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②在毛泽东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虽然其间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是终于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两弹一星”，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成为苏美中大三角中相对弱小的一极，在国际政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邓小平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根据世界发展新潮流，制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大战略；以“一国两制”构想处理港澳回归问题，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应当用一百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③然后继续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这是邓小平给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最后定位。在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大变局中，邓小平以坚定清醒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有所作为的策略战略思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拨正了航向，保持了我国稳定快速的发展势头。正是在邓小平战略思想引领下，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并使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开始了成为一个对世界形势具有越来越重大影响的世界性大国的历史进程。

根据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大战略，我国向世界大国迈进的目标已经初现轮廓。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大战略的延续，又是我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拓展。江泽民代表党中央作的十六大报告，贯彻始终的中心词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此开头，以此结尾。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为实现这一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新中国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到 21 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100 周年时，我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大幅度提升。按照人均 3000 美元这一中等发达国家的基本指标，我国的 GDP 将达到四万亿美元左右，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可以预期，我国的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国民素质等各方面会有全面提升。届时，我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

我国探索“和平崛起新道路”已有半个多世纪。我们寻求这条道路几经曲折，我们坚持这条道路

义无反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经常强调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新水平，实质上就是决心把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进行到底。这里不妨以两大历史关头的战略抉择为例。

第一个历史关头的战略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自己起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思考中国问题，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新思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时，正逢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把握住这个动向，作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重大判断，决心抓住历史机遇，把全部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创出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抉择。

第二个历史关头的战略抉择。上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经济全球化同反全球化两股潮流的对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新道路面临严峻考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权衡利弊，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进一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样，就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又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国决定加入WTO，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等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这是又一次历史性的战略抉择。

这两大历史关头的战略抉择表明：

我们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质上就是在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表明，中国之所以要选择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压和蹂躏，深知和平之珍贵，发展之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心理。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根本目的乃在于实现中国13亿人口之根本利益，唯有和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唯有发展，人民才能丰衣足食。

实践还表明，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且发展很不平衡，面临一系列大规模难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加上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国土广袤、市场广阔，具有小国不具备之大规模物质条件，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和平崛起之根本基础。但是我们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耕地少、资源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民族众多；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当代中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清醒地、自觉地把握住中国和平崛起困难的方面和动力的方面，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明确地提出和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有利于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内方面和对外方面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把坚持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和坚持和平的社会主义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向全世界、全人类庄严宣告：中国和平崛起，这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的“中国特色”！这对于我们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争取更多朋友和同情者，化解种种阻力、干扰，应对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时代依据

我们党对国际大局和国际环境的观察，深刻地影响到党的总的理论、路线和战略，深刻地影响到

党的整个事业。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是这样，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实践尤其是这样。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在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 1985 年 3 月 4 日在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那篇谈话中，同时强调：“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党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个大的战略判断是始终坚持的，一以贯之的，决不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国际突发事件而轻易动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没有动摇，海湾战争时没有动摇，科索沃战争时没有动摇，“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也没有动摇。

邓小平在上世纪 90 年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变局，曾经深刻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世界上“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而是“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邓小平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综观当今世界，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后，世界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地缘、宗教和文化等冲突同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南北矛盾更加突出，西西矛盾愈益凸现。人类世界整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对于中国来讲，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本世纪头 20 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也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

首先，从地缘政治环境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否或能否将其全球战略资源集中用于压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二是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否或能否形成牵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包围圈。

实践证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客观上为我国和平崛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一些人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未放弃过；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些人曾经把我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但是，错综复杂的世界矛盾决定了，美国在许多问题上还有求于我。“9·11”事件后，美国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首要威胁，在全球范围发动反恐战争，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缓和与解决，这势必消耗美国大量的外交、军事和经济资源，它将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相反，它将更需要在若干重要方面与我合作。只要我们战略策略得当，不发生中美全面对抗或重大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机遇之一。

地缘战略格局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在总体上也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是中国市场对亚洲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已经与对日本市场的依赖度相当，未来 10 年可能接近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二是亚洲正在形成包括中国在内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其中包括中国与东盟的“10+ 1”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中亚四国和俄罗斯和上海合作组织，围绕朝核问题而形成的北京六方会谈机制等。此外，建立“10+ 3”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已经启动。这些次区域化体系与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体系虽有区别，但并不对抗，有可能获得“双赢”。三是中国与毗邻国界的地区相比，大多处于发展较快的高地平台上，从而形成市场要素向我靠拢的周边向心力。从今后 20 年的长期趋势看，中国将与亚洲国家形成巨大的共同利益，甚至可能逐步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共同体。

其次，从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来看。世界范围以微电子技术和生命技术为核心的新科

技革命的发生、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极有利机遇。新科技革命推动了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这对于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新科技革命带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粗放式、高能耗、高投入、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也具有关键意义。

世界经济长周期规律还显示，世界经济的总体低谷时期往往是新的经济大国崛起的机遇。20 世纪初的美国、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复兴都是明显的例子。特别应当充分估计到，今天新的产业革命导致全球范围的技术转移和新的市场中心，从而有利于产生新的经济大国这样一种特殊历史条件，正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此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还有可能使得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在中国都能获得大范围、长时间、接力赛式的转移，从而既使国际分工体系形成新的结构，又为中国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展提供巨大的空间。

再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最大机遇就是中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和市场途径获得国际分工的重新选择和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必像历史上的后兴大国那样，通过发动战争掠夺别国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崛起。

WTO 体制为中国接受全球的市场要素转移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提供了制度框架。通过参与在这一框架下的合作和规则制定，中国与各国的共同利益将获得制度性的保证，中国与各国的经济磨擦也将获得制度性的调节，这不仅使中国获得巨大的市场机制，而且也是和平崛起的重大机遇。

全球的金融创新和国际资本流动，是中国获得吸纳全球资金的极有利的外部环境。全球性通货紧缩使国际资本急于寻找新的战略投资方向，它们的目标同时聚集在中国大市场。这种运动方向的趋同很可能是全局性的、长时期的。

尽管经济全球化也会带来各种风险，但是与它所产生的机遇相比毕竟是次要的。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和潜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我们比绝大多数国家具有更大的抗风险、抗干扰、抗周期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趋利避害”的道路。

总之，国际各方面条件之综合，就决定了中国在 21 世纪头 20 年，必将在面对种种风险和挑战的同时，迎来一个和平崛起的新的战略机遇期。

三、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历史依据

在占世界人口 1/4 的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与和平崛起；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时代背景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与和平崛起，这是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战略道路。

25 年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新道路的实践表明，我们既摒弃了近代以来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以为离开世界也能自我发展的封闭式发展道路；又摒弃了近代以来世界后兴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我们已经、正在、还要下决心继续走的乃是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兴大国和平崛起之路。

（一）历史比较之一

自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先后崛起并挑战现存霸权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并且都在崛起过程中失败。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度成为欧洲和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和日本在崛起初期都曾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来源，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在短期内迅速成为经

济强国。但是在世界市场被殖民体系所分割的条件下，德、日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同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尖锐矛盾。在世界殖民体系基本确立的条件下，诉诸战争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就成为其主要目标。就这一点而言，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后起大国无法以和平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只得转向非和平手段。战争是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本手段。德国和日本不仅通过一系列战争完成其原始积累，奠定了崛起的基础，而且大大刺激了两国扩张的欲望，两国决策者都制定了征服欧洲和亚洲、直至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走上与英美全面对抗的道路。由战争起家、又由战争而陷入灭亡，这是德、日崛起又失败的主要轨迹。

在制度上，战前德国和日本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基本上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德国先是保留强大皇权的君主制，后是实行绝对独裁的法西斯专制。日本则实行神化的天皇绝对君权和武士道为基础的军国主义体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德、日把扩张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导致崛起失败的致命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又同德、日当时存在着的狂热民族主义思潮结合，从德国的“日耳曼优越论”到排犹主义的种族灭绝，从日本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到“大东亚共荣圈”，使战争、争霸和扩张都带上强烈的种族主义特征。这种制度和文化都使两国的崛起变得极为野蛮残酷。

二次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成为前三位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其再崛起的部分战略目标，但始终是不完整的，第一次崛起的失败阴影始终笼罩着它们再崛起的路径和前景。

前苏联的崛起有其成功的部分。在十月革命后 30 年间，苏联在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等方面超常发展，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为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其中不乏成功经验值得学习。但是从苏联崛起的过程中，就隐含着其失败的基本因素，即高度集权的、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和经济活动的低效率长期得不到解决。这种经济体制和个人迷信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不仅造成苏联内部的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而且使整个苏东集团与世界市场处于割裂状态，难以从西方获得技术和资金，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苏联崛起的内部桎梏，它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经济活力，使崛起过程越来越缺乏持久的内在动因。苏联长期实行专制的极权政治，缺乏民主和科学决策，党的特权阶层长期脱离人民，形成党内利益集团，从根本上瓦解了苏联党和国家的社会基础。在长期僵化、脱离人民的政治体制下，一个大国即使不发生战争等外来破坏，也是无法实现和平崛起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始起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兄弟党的革命援助。但是这种政策的长期化，就逐渐转变为“输出革命”、控制卫星国直到在全球范围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势力范围。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最后拖垮了苏联，酿成国力枯竭以至经济崩溃。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未能打垮幅员广大、资源高度集中的苏联，但是错误的国际战略却可以使苏联走上绝境。

从前苏联崛起失败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深刻教训：一是无论国内资源如何丰富，一旦实行与经济全球化相脱离的封闭经济体制，其国民经济就必然失去活力和竞争力，经济增长就难以均衡持续。因此，开放和竞争是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之一。二是国内制度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保证和平崛起的两个轮子。三是国际战略的正确和适当定位。无论出于什么良好的动机，一旦走上争夺世界霸权、挑战国际体系的道路，就很难再回到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来。

（二）历史比较之二

中国的和平崛起新道路是从中华民族“康乾盛世”以来 200 年左右历史曲折变化中产生的全新战略道路。中国曾经是最强盛的国家。早在明朝中叶，郑和的远洋舰队已经到达非洲的好望角，早于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远航。但是，中国封建王朝只是把这种远航作为播扬国威、四方来朝的炫耀，而不是开拓商路和海外市场的路径。我们因此失去了发现新航路和新大陆、成为海洋大国和贸易强国

的第一次历史机遇。清朝初年，中国的幅员、人口和财富都居世界首位，国民产值占当时世界的 1/3 以上，贵金属储备占世界的一半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但是，清王朝入关后对江南城市的毁灭性屠城，摧毁了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特别是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长达百余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基本上隔绝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同欧洲的贸易往来。我们因此失去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所谓“康乾盛世”，中国的强大和富庶只是几千年封建文明积淀的回光返照，并没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没有科技和文化的创新。在这种封闭和停滞状态下的泱泱大国，其前景只能是迅速衰落，被西方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打败。

由于 18—19 世纪中国的发展游离于世界文明的主潮流之外，同先进生产力的差距迅速拉大，到 19 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主要对象。中国的黄金白银成为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港口成为鸦片输入、白银输出的通道。即使到 19 世纪后期，中国仍然存在着变法图强的机遇。但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专制，中国先进知识界的维新变革被扼杀了，“西学”与“中体”的嫁接失败了。与此同时，日本的变法维新获得成功，中国的周边出现一个最具有侵略性的后起大国，中国遭到空前的掠夺和凌辱。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分别揭示了中国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无法单独承担救国图强的历史重任。在这个时期，中国又失去了一次世界产业革命和世界市场迅猛扩张的历史机遇，成为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邻国的“东亚病夫”，成为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康乾盛世”走向没落的教训警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落后必然导致挨打。而近代以来世界几个后兴大国，比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后期的苏联，其发展历史又突出地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是依靠扩张、侵略以至发动大战，还是依靠冷战、对抗来谋求国家崛起都是行不通的，争霸必然黷武，称霸必失人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并明确要求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坚信，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争霸、不称霸，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才能解决 13—15 亿人口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难题。

四、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理论依据

150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始终是在同时代、科学和实践发展的紧密联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研究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系，需要放到这样一条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长河中去考察。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以蒸汽机的使用为代表的，人类在 18 到 19 世纪出现生产力大飞跃、科学技术大飞跃、经济社会化大飞跃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脚，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此而来的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多方面矛盾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应运而生，并且形成了关于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大体同时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条重要战略道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以电力、内燃机、化工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新的大飞跃基础上，经济全球化进到新的水平，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帝国主义。而资本帝国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过程中走向反面——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接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使经济全球化在发展中出现了逆转和断裂。结果战争引起革命，由此产生

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产生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新的历史大变动结合起来，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抓住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俄国），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用革命手段主要是革命战争夺取政权，把国家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逆转和断裂相联系的新的战略道路。

二战以后，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信息革命开始，特别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出现了通过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强劲地促进交通、通讯和国际金融一系列的超高速化发展，而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国际经济联系愈益紧密起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新浪潮。与此相联系，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巨大变动：首先是，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汲取 30 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教训，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多方面的改革调整，延伸到创造和运用一整套适应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科技、经济社会化和世界市场得到长足发展。其次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以后，固步自封起来，停滞在“计划经济”模式上，并且陷入同美国争霸和进行军备竞赛的误区，未能对形势的新变动作出科学的分析，应对战略错误，后来又从僵化走到自由化，导致一大片社会主义江山不战而亡。第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和严重挫折的基础上，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新的历史大变动结合起来，开创出一条在改革开放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战略道路。

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与民族振兴的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与世界发展潮流的结合，同时体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相互借鉴的结合。

过去 25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经历了多次考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基本事实有力地表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永不争霸，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这样一些深刻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和执政理念之中，深深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已经形成为和平崛起战略道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25 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有智慧、有办法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21 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实践，还将继续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中国和平崛起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和平崛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性，自觉地把握和坚定地实践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中国的和平崛起就一定能实现！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241—242 页。

②《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 1173 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3 页。

政府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理念、宗旨与体制基础^{*}

◎ 李习彬

[摘 要] 由于社会与文化背景及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不同,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难以在中国简单地复制。为了切实全面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中国政府需要实现从国家本位、官本位到公民本位的理念转变,从整体系统论到总体系统论的管理哲学转变,从传统政府管理到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的体制转变。论文最后给出了一类中国现实政府管理问题的上述理论的实证分析。

[关键词] 公共服务 公民本位 民主政治体制 总体系统论

[作者简介] 李习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中图分类号] D6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66-05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已将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同任何重大的改革一样,这一顺从民意的重大决策的落实,也不会一帆风顺。这主要是由于公共服务的概念和理论来自于西方,虽然中国定位的公共服务职能与西方国家基本相同,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政府职能赖以运作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以及经济与政治体制不同,故履行公共服务职能遇到的问题和阻力也会差异很大。对此若没有清醒地认识,进而采取正确而有效的策略途径,这一职能的落实就有可能走样变调,事倍功半。

概括说来,中国政府为了切实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的理念需要实现从国家本位、官本位到公民本位的转变,政府管理哲学从整体系统论到总体系统论转变,政府管理体制从传统政治行政到现代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体制转变。

一、政府管理理念实现从国家本位、官本位到公民本位的转变

这一命题的等价表述是,政府管理的概念基础实现从中国传统的“公”到现代“公共”的转变。

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主要是对社会进行统治与管制。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概念基础是公共行政,政府必须为公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由基于民主政治的公共行政的本质决定的。因此,需要探讨西方国家建立公共行政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基础,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公共服务”职能与我国传统政府管理的为“公”的重大差别。

近代西方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中的“公共行政”概念,首先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在“私域”和“公域”充分分化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基础上,奠定了公共权力(公权)由个人的部分权力(私

*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70273007)

权) 转让而来、公权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为私权服务的政治理念基础, 同时奠定了“(公共) 权力来自于公民、服务于公民”的“公共”概念的本质含义, 奠定了政府必须为公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 同时也奠定了公民追求个人利益正当化的西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文化基础。

而在我国, 虽然早就有“公”的概念, 且一直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社会道德和行政伦理标准, 但这一“公”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共”概念迥异。

中国传统的“公”与“官”等价, 是指作为统治机构的“官家”。这种“公”, 以“君权神授”为基础, 将整个国家、包括所有老百姓都看作是最高统治者的私有财产, 正所谓“家天下”——“国”与统治者的“家”等同。“国家即朕, 朕即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将中国传统的“公”的本质含义表述得清楚明白: 所谓的“公”, 实际是统治者的“私”, 在统治者那里公私不分, 是一回事; 统治者代表“公”而老百姓都是“私”; “大公无私”、“公而忘私”, 为统治者剥夺老百姓提供了冠冕堂皇的道德基础与合法的操作途径。皇权本位即国家本位, 而各级官员都是皇权所赐、是代表皇帝统治臣民的, 故到下面必然是官本位。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学习西方的民主革命以来, 中国大地上“公”的概念开始朝着西方的“公共”意义转化,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这种转化的名副其实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 由于民主革命、特别是反封建的不彻底和照搬苏联经济、政治与行政体制的失误,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 30 年时间里, 这种转变曲折反复, 总的趋势是南辕北辙。如由于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建立, 在忽视公民个体利益方面更有所发展: “私域”成为了限制并逐步消灭的对象; “公”与国家 and 集体(实际上是由政府管理和控制的国家的一部分) 概念等同, 为“公”(国家利益) 成了全体国民(不仅仅是政府官员) 唯一合法的行为目标; “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从道德要求变为行为准则, 追求个人利益不加区别地称为“个人主义”, 并被视为万恶之源。虽然也一直提倡“为人民服务”, 但这里的“人民”逐渐从原本意义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个体演变为抽象的“人民”整体, 与国家、即“公”等同。在每一个管理层次上, 领导者代表“公”而其他人都都是“私”, 官本位盛行。在这种情况下, 共和国建国纲领明确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领导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的理念, 在一定程度上倒退到封建社会的官民关系: 一些官员高高在上, 自视为民众的解放者和救星, 无偿剥夺老百姓的财产、无故加罪于民众都心安理得, 用老百姓的钱(税收) 为老

百姓做一点实事都要老百姓感恩戴德。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多元所有产权制度的确立, 私域逐步合法化与明确化, “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等概念正是在这种经济与社会转变的基础上引入的。但是, 由于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 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监督难以到位, 政府公务人员的荣辱、升迁与去留主要由上级领导者决定, 使得一些公务人员不是将手里的权力视为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的权力) 并利用来为社会提供服务, 而是利用转轨时期大量的体制与机制漏洞, 用来设租和寻租, 并导致某些方面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因此, 为全面、准确地落实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需要准确理解“公共”的本质含义, 政府职能定位, 实现从中国传统的“公”到现代“公共”的转变, 政府管理的理念, 实现从国家本位、官本位到公民本位的转变。

二、政府管理哲学实现从整体系统论到总体系统论的转变

要全面地、持久地落实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仅有管理理念和职能定位的转变仍不够, 还需要实现政府管理哲学从整体系统论到总体系统论的转变。

政府管理哲学决定政府管理宗旨, 进一步决定政府决策与政策制定的目标与原则确定。计划体制下, 政府决策与政策制定中, 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 虽然一方面说要“兼顾”, 但由于对难以兼顾情况下(应该说这是更为普遍的情况) 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或集体利益”, “为了国家或集体利益, 个人应该做出牺牲”确定为普适原则, 甚至提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国家和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口号。在国家 and 集体利益无条件优先的原则指导下, 任何个人的政治、经济权益和人身自由, 随时可能受到以“国家整体利益”名义的无端侵犯, 这种情况改革开放以来也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从社会系统科学理论的角度分析, 可以归结为囿于整体系统论的思维束缚, 对社会系统组织整合存在绝对化的片面认识。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整合原理, 即部分通过组织整合而导致新的整体功能或属性涌现, 揭示了自然界进化规律的真谛, 也揭示了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下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何以会奇迹般地快速增长, 指出其重要基础是由于工厂制度的出现, 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对“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普遍性的认识, 出现了以系统整体功能最大化为目标, 以实现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完全整合为手段的整体系统论。整体系统论, 一方面为人类社会从国家到企业各个层次的管理

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人类社会中滋长了一种整体神秘主义和整体崇拜，而在管理实践的最高层次、即管理哲学层次，则形成了整体本位主义。按照整体本位主义的思路，国家作为一个由政府组织管理的社会系统整体，只要能够对其所有组成部分进行充分地整合，通过“ $1+1>2$ ”的机制，就能够实现整体功能的最大，并因此能够最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正是这种整体本位主义，导致了从限制到消灭“私域”的社会管理目标，建立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经济与社会的运行则是由政府、且主要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计划体制，而政府管理决策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和集体至上。计划经济体制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人们已认识到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但对旧的过分集中统一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产生的根源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并因此导致改革开放中新的方案选择论证时常常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

实际上，由于人的需求的广泛性、无限性和动态变化，而系统整体功能总是有限的，加之组织设计与运行管理中的有限理性，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政府整合满足一切个体的一切需求，非完全整合现象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对个体和子系统来说是必要的，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也是有益的。非完全整合现象的存在，就使得一般社会系统（组织）中总是客观地存在着密切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两种功能和利益：其一是由系统管理者对其部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组织整合而形成的整体功能和整体利益，它由管理者直接控制；其二是部分所具有的未被整体组织整合的相对独立的功能和特殊利益，系统管理者不能对这些功能与利益实施直接控制。这就是说，全系统对外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称为总体功能，为整体功能与所有部分的相对独立、未被整合的功能之总和，即

总体功能 = 整体功能 + 部分独立功能之和
从利益角度看，则是

总体利益 = 整体利益（公共利益）+ 局部特殊利益之和

这样也就自然可以得出，社会系统的管理中，除了考虑通过组织整合所实现的系统整体功能和利益之外，正视未被组织整合的部分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功能和特殊利益，且把部分所具有的独立功能和特殊利益视为系统总体功能、总体利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便是自然的、应该的和有益的。我们将以非完全整合现象的必然存在为基础，将社会系统的功能、利益区分为整体功能、整体利益和总体功能、总体利益的认识，称为总体系统观。以总体系统观为基础对社会系统管理的模式，称为总体系统论。由于系统总体功能（或总体利益）中包含

了整体功能（或整体利益），所以整体系统论只是总体系统论的特例，即仅仅考虑系统整体功能（或整体利益）、组织整合而不顾及非完全整合的特殊情况。显然，政府管理，以总体系统论为指导，由于包含了整体系统论，既关注发挥对部分进行整合产生“ $1+1>2$ ”效应的整体性优势，又突破了整体系统论的局限性，能够同时兼顾和利用非完全整合的积极作用，更充分地发挥组成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能够使系统实现更多、更大、更完善、更合理、成本更低廉、效益更好的总体功能。

非完全整合原理否定了计划体制与无限政府的合理性，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总体系统论指导下，“为了整体利益，局部应该做出牺牲”，便从整体系统论思维下的普适原则，转变为有特定适用条件的具体原则。总体系统论既关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称之为公共利益的传统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关注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带来具体利益的物品与服务的提供。因此，总体系统论为政府管理真正贯彻公民本位、为一个个活生生具体的公民个体服务提供了系统理论方面的科学解释。此外，总体系统论还可以为我国改革开放中一些已为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改革方案的进步性，提供超越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

三、从传统政府管理到现代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体制的转变

全面地、持久地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仅有管理的理念和宗旨转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政治与行政体制的改革，完善民主政治体制、建立公共行政，构建组织上的保证。这主要是基于社会的多元化利益格局和人性的复杂性，包括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其特殊利益，都有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获取自身利益的可能。因此，为了保障公共权力不被滥用来谋取非法利益、甚至反过来侵蚀公民利益，建立约束公共权力的政治与行政体制是完全必要的。这一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体制建立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的，已为古今中外无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实。

“谁决定命运，将听命于谁”，这一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对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同样适用。我国目前政府管理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唯上”、“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现象，根源就在于没有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公共行政体制。因此，通过完善选举制、罢免制和任期制等一系列制度，建立健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和公共行政体制，真正体现各级官员的权力的公共权力属性（由公民授予、监督和掌控——随时可以依法罢免），明确一切

公共权力机构（不管是立法、司法机构还是行政机构）的公民管理国家的代理者地位，使宪法明确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宗旨落实到具体操作途径，这是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保证。

必须指出，仅仅明确政府及公务员的代理者地位、完善公共权力的公民授予机制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一些公共事务决策的公民直接参与和监督。这主要是公民利益、意志和意见的理解、表达和沟通，以及不同利益、意志和意见的协商、妥协，代理者的作用总是有局限的，而且由于代理者常常利用政务活动中的信息优势谋取自身利益。因此，重大的和一些具体的公共事务决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公民直接参与和监督，是绝对必要的。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必须与我国传统的“民主”概念和观念决裂。中国传统上也有“民主”，但其含义与现代西方民主概念（公民自己当家作主）截然不同。中国传统上的所谓“民主”，是指“民之主宰者”，是指当官的“为民作主”。直到现在，这种将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和监督仅仅视为政府管理的辅助手段、坚持民主是“为民作主”的观念和行为仍顽固地存在。许多官员自诩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他们以中国老百姓“素质”为借口，不认为普通老百姓有能力自己当家作主，甚至不认为普通老百姓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需要由他们这些“精英”代表公众的利益并为其作主，相当普遍地发生本应由公民和企业自主决策的事情而政府部门越俎代庖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与政府管理的国家本位和官本位相适应，传统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机构与岗位设置、行政程序与规则等广泛地存在着政府本位，即不是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民社会出发，而是从方便政府内部管理、方便官员自上而下的内部控制和方便政府对社会进行管制出发，这对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也是很大的障碍——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响应慢、效果差、效率低、成本高。因此，在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与业务及其流程的重组。

四、现实政府管理问题的实证分析

上面提到的三种转变，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性变革，政府管理理念与管理哲学转变，也不仅仅是观念性的，由于其理论的明晰性，也应该成为政府管理问题的可操作的分析工具。下面以我国政府管理的一类现实问题为例，对本文论述的政府管理理念和哲学作一实证分析。

最近几年，这类事情层出不穷：许多城市以危房改造、旧城改造为名，对居民房屋强行拆迁；各地以优化

投资环境或实际开发（搞开发区，建高尔夫球场，建商品住宅楼区，拓宽马路等）为名，强行侵占农民耕地；以帮助农民致富或建设小康农村为名，强迫农民按照政府的意愿种植、养殖和进行农村规划；还有花样繁多、数不胜数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是：公民（农民或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伴发大量的官商相互勾结的腐败案例。

这类事情决非仅仅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在中小城镇、在大城市都同样存在着，有的甚至非常严重。少数人将这些问题的发生归结为干部素质问题，稍有头脑者就会指出根源在于体制，在于决策缺乏民主参与和监督，在于现有干部任用制度使得许多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因此正确地指出，问题解决的根本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角度做出更深层次的分析。本文的第一、二两节，给出了将问题分析引向深入的理论框架。

以徒有其表、无实际功效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例。政府管理理念，实际上给出了政府行为的目的性，而政府管理哲学，关系到政府政策的目标与决策原则确定，这些给出了从冠冕堂皇的表面剖析其实质、判别其正误的分析思路与框架。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无疑都是打着为“公”的旗号。明眼人都能看出，这种“公”，实际上与有关官员的升迁、与他们从开发商那里拿到回扣的经济利益密不可分。这就是第一节中所指出的政府管理理念问题之所在：中国传统的“公”与“官方”等价，在官员那里是公私不分，常常是官员个人（或群体）私利的包装。我国政府管理的概念基础，必须实现从中国传统上以统治者的私为“公”向公私分明的现代“公共”转变，这一论断启示我们，在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分析中，必须对名义上的“公”的实质内容进行剖析，剥掉一些假公济私的伪装，还其真实面目。

这些工程中，为什么有关当局敢于对公民的切身利益进行公开地侵犯？显然是整体本位主义、公共利益至上、“为了国家或集体利益，个人应该做出牺牲”这些似是而非的原则在起作用。这些原则使得侵犯公民利益者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而被侵犯利益的公众反倒有口难辩，在“私心太重”、“不识大体、顾大局”的指责面前，显得理屈词穷。如果从整体系统论的思维转变为总体系统论的思维，公众维护自身利益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现实中许多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都会受到置疑并需要依据新的原则重新检验。

当然，为什么徒有其表、无实际功效、还有许多是败絮其中（腐败）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能够在政府立

项并获得通过？为什么有关官员敢于侵犯群众利益而无所顾忌？为什么群众的切身利益难以表达、群众的维权行为阻力重重？这些，都可以从现有政治与行政体制的缺陷找到明确的答案。

因此，要政府全面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是核心、是关键，这点是无疑的，而政府管理理念与管理哲学的转变是基础、是前提，也必须清楚地认识。上面的分析表明，是整体本位主义和整体利益至上的管理哲学，为以公的名义侵犯公民个体利益、即所谓“化私为公”提供了合法渠道，而含糊的、传统的“公”的概念和官本位，为某些官员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创造了机会。没有政府管理理念与管理哲学的转变，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难以推动，也不可能成功。遗憾的是，许多人目前仅认清了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对其在中国国情条件下需要的理论创新前提，即政府管理理念与管理哲学必须实现的转变，至今缺乏清醒、清晰的认识。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的困乏，也是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难以深化、新的社会矛盾不断产生、集聚而难以化解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李习彬：《超越传统的“公”和西方的“公共”概念

——中国政府需要实现的管理理念、目标和原则的重大变革》，《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 年第 5 期，第 6—10 页。

李习彬：《深化改革与政府管理创新的系统思考》，《唯实》2000 年第 4 期，第 49—54 页。

《辞源》1988 年修订本（合订本）第 920 页。

李习彬：《社会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载许国志主编《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517—528 页。

李习彬、李亚：《政府管理创新与系统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李习彬：《社会系统复杂性研究》，载顾及发主编《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Research Information Ltd.（UK），2000 年，第 12—16 页。

“总体”与“整体”概念的明确和科学分化，最初见于王浣尘：《总体和整体》，《系统工程理论 and 实践》1986 年第 4 期，第 79—82 页。

李习彬：《从整体观到总体观：深化体制改革需要实现的政府管理哲学转变》，《中国行政管理》2000 年第 11 期，第 22—24 页。

责任编辑：雨 童

论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演变

◎ 聂静虹

[摘要] 政策传播影响着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效果。本文探讨了传统体制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特点和产生原因,认为随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一系列外在因素改变必然引发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变化,并从公共政策的人性化、传播主体社会化、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制度规范化和反馈渠道多样化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演进的趋势和特点。

[关键词] 公共政策 传播机制 演变

[作者简介] 聂静虹,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公共传播系讲师,广东 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 G206;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71-05

公共政策的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对于信息传递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准确的信息可以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和盲目性,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从而提升政策效果,达到政策目标。历史地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由于公共政策价值的取向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机制特点。传统社会中高度一元化的公共政策传播机制,建立在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传播形态之上,其他传播方式几近没有生存空间。这些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有着内在的价值冲突。当代公共管理观念的转变,在政策取向上不再是单一的集合利益,而是分散的、惠及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利益,因而,随着公共政策的转型,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完善,注重发挥公共政策传播的作用,创新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成为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传统体制下的公共政策传播机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是个典型的总体性社会,政府垄断资源的配置,并以行政手段实

现了高度的政治整合。在这种背景下,政策的传播主要以组织传播为主,辅之以其他类型的传播方式。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策传播机制的主要特点

首先,政策信息的流向是自上而下的,呈现出明显的单向特征。在中国,传统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对社会实施控制,社会必须受制于这个中心,公民必须服从于政府的管制,政府与公众是命令与被命令、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公共政策通过各级行政部门层层下达,最后传至政策对象。因此,信息的流动是单维度的,不可能也不必要存在公众对政府的信息反馈机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意见很难进入政府的决策和执行部门,错误的决策经常难于得到及时有效地纠正。显然,在高度整合的社会,这种单向的信息传递方式效率虽高,但公众充其量只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和承受者,政治参与度很低。而且,这种以科层制为依托的层级推进的组织传播模式,使得信息只能在纵向、垂直的传播

体系内流动，会造成信息的梗阻、截留、曲解等种种失真现象，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党和政府是政策传播的主体。党和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承担着对政策的宣传和解释义务。“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体制，主要由行使公共权力的各级国家机关和执政党的各级组织构成。在多数情况下，党的有关组织拥有政策的实质性决定权”，“政策问题的提出，主要不是来源于公民的政策诉求，而是来源于决策机关内部建立的制度性信息收集系统”。^①在中国，大量的政务特别是关乎全局的重大政府行动，往往是各级党委与有关的政府机关共同推动并组织实施的，党政系统在实施重大决策的方式和步骤方面形成一整套相对稳定的程序和自成系统的做法。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开传播网络几乎独一无二是官方的（国家或党的）事业，其内容和管理都受中央政治权威的控制……不管管理的来源和级别如何，所有这些媒体都受制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总体控制 and 政策”。^②组织传播的途径主要是会议和文件，即所谓的“一靠会议，二靠决议”，作为辅助手段的大众传媒只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的。这种对政策的强势宣传与不可质疑性，曾对我国动员有限资源赢得社会运动的巨大成功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政策信息的传递渠道以体制内传播为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实行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的治理模式。金字塔般的组织结构，迷宫似的行政运作程序，使得政府与外界的沟通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行部门看重自己的“私利”或本身对政策存在误解，极易造成对信息的歪曲；再者，我国长期以来的党政双轨行政结构所造成的党政不分、机构重叠、部门林立、职能交叉，也会导致政出多门、政策冲突的现象，使得政策的接受者无所适从。

（二）高度一元化政策传播体制出现的背景

高度控制下的组织行为，传播的效率往往非常高之高，在政治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政策通过组织系统可以在不利用或较少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情况下，迅速达至政府

基层，甚至每一个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即相关的政策对象，真正做到了“统一行动、令行禁止”。这是过去长期以来党政不分、党政一家现象的必然的组织传播形式。在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着一个以党的系统为主线，政治上可靠，线路上通畅，可以直达每一个“单位的党政组织”的信息传输通道。分析这个通道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结构，即“单位制”、“差别户籍制”、“行政身份制”^③构成了社会组织化系统的基础，形成了基本涵盖一切领域的巨大的科层制组织网络，保证了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信息的畅通。当然，这也潜伏着很大的破坏效率机制和信息失真、决策失误的危险。

这种高效而单一的传播，是与当时我国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经济上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在政府机构涵盖不到的地方，无处不在的党的组织机构可以进行补充，因此党和政府基本上全面控制了社会，包括社会经济自由。社会的横向结构分化很低，突出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高度重叠，政治控制了经济、文化。整个国家以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文化；整个社会呈现“泛政治化”的倾向，没有政治不能波及的空间和领域；经济完全成为政治的俘虏，企业成了政府的附庸。

与此同时，政治权力还对个人生活进行全面的控制：一是差别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对全社会成员进行空间定位，并与粮油供应结合起来，控制了人们的生活资源，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二是单位制。单位制“是一个人工作的地方，但它也是政治、社会和居民的实体”。^④把个人纳入“单位”的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将利益统治与强制性统治结合于一体的统治形式和工具”。^⑤借助于单位这一新型的特殊组织，几乎全体公民都不同程度地纳入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也正是凭借单位制度建立起来的高效的动员机制，党和政府能够运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有效地组织动员群众，成功应对建国之初政治和经济的内外压力。三是行政身份制。个人的行政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社会地位，政府的干预

行为深入到一切社会群体之中。这三种制度互为补充，基本上使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网络覆盖并控制起来，从而保证了政府的政策实施。

总之，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我国形成并一度强化的高度一元化的政策传播体制，是在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户籍制、单位制、行政身份制的共同作用下建立起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对有效动员民众以保证国家政策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播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需要，构建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机制成为必然。

二、政策转型引发传播机制的必然变化

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政治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出较大步伐。在此背景下，高度一元化的公共政策传播机制已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生活的需要，一种新的公共政策传播机制应运而生。

首先，组织传播无法确保公共政策的全覆盖，新的社会结构导致组织传播的分化。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有三：一是单位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大量的无组织无单位人员，如个体和家庭的劳动者；出现了大量有组织无单位的人员，如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员工等，他们与其组织不存在单位制的依赖关系。同时，曾经是单位制“堡垒”的国有部门内部也同样发生了变化，普遍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即新招人员采取“聘任制”，老员工仍沿袭了“单位制”的管理办法。二是户籍管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开始逐步消除城乡壁垒，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加之农产品生产的增长和供给的充足，使得户籍对社会流动的限制有所松动。三是行政身份失去了原有的作用。随着社会流动频率的增加，价值观的变化以及社会地位获得方式的多样化，行政身份愈来愈失去原有的魅力。上述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导致社会上为数不少的人失去了获得政策信息的主要通道，原来高度一元化的组织传播已不

再拥有涵盖全社会的力量了。

其次是无法再依凭中央的高度集权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传播。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公共政策的有效传播是以中央高度集权为前提，以限制甚至可以说是牺牲地方的生机与活力为代价的。改革开放后，中央逐步开始向地方下放权力，地方利益渐趋强化。“当中国步入改革时代以来，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党和政府从‘行政人’向‘经济人’的转变”。^⑥为了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一些执行人员不惜扭曲政策信息，导致了信息的梗阻和失真。各级政府部门实际上是信息垄断者，透露与否、透露多少完全取决于其自觉。在“经济人”的角色冲动下，政府官员或是为了使自己的不当行为得到保护，或是为了便于对下属及社会的管理，经常递减政策信息。于是官场上形成了欺上瞒下的行为传统。^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众根本无法主动与政府沟通，更谈不上有效参与，这样就无法对政府形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在发展和转型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很大，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随意性也很大……。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往往只有政府的一个声音，而无民间的不同声音……”，^⑧一元化的传播体制已不能有效地沟通政策信息。

最后是政策环境的根本变化。(1)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背景下的政策治理出现了新特征。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客观上要求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政府对公民的限制，客观上要求公民社会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能。当代政策科学出现了逐渐以“行为者”概念取代传统“决策者”概念的变化。公众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地位提高了，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政策对象，而是政策制定的主动参与者。(2) 政策对象主体意识呈现不断回归与逐步增强的趋势。公众已不再满足于被告知“做了什么”，还要求被告知“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么做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已不再满足于做政策的“冷眼旁观者”，还要求扮演特定政策积极的“利益持有者”。(3) 政策问题具有更加复杂与难缠的性质。根据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观察，在全球

化背景下，社会运行中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公民社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复杂的、难缠的问题。(4) 政策传播环境有了显著变化。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瞬息万变，被马歇尔·麦克卢汉形象地称之为“地球村”的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信息技术一日千里，传播工具不断革新，封锁与屏蔽信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公共政策的“黑箱操作”在现代传媒环境里开始变得不合适宜。顺势而变，及时转变、适度调整监管传媒的方式，更好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就成为明智的选择。毕竟，“得民心者得天下”，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舆论环境对于一个需要赢得公众信赖，从而有效实施其政策的政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三、政策传播机制的演进趋势

在新的政策环境里，我国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既面对严峻的挑战，也具备难得的发展机遇。其发展趋势如下：

第一，公共政策的传播主体日益社会化。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国家治理，一方面为建构多元的公共政策传播网络提供了资源保证，另一方面也为其作为“行为者”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政策传播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虽然政府仍然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是政策传播的主体，但已不再是信息的垄断者和唯一的传播者，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都可成为公共政策的传播主体。

第二，公共政策的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效率，原来大一统的传播方式被打破，公众接触政策信息的选择性与可能性大大增加。比如政府上网工程作为典型的政府行政与大众传播技术的嫁接方式，打破了权力部门对信息的控制和专享，完成了政府与公众对政策信息的共享，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为政策信息的平等交流和互动沟通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平台，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双

赢”。也就是说，“政府上网”工程改变了传统“科层制”政府信息流动的曲折性，极大地缩短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距离，使得政府变得更亲和、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从政府的角度看，它是政府公关传播沟通的有力工具，有利于政府机构准确把握自身、社会环境及公众的真实信息和相互关系状况，为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从公民的角度看，政府与公民借助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建立的新型沟通网络，打破了时空、部门与层级之间的限制，有利于公民及时了解政府的施政意图、方针和政策，有利于政府及时准确地反映公民的要求和呼声，提高政府治理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力。当然，仅凭新媒体新技术来保持政府与公众的全方位沟通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对所有媒介形式和沟通管道进行有效整合。

第三，公共政策的传播制度日益规范化。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是公众“知情权”的基本要求，也是公众参与政治过程的起码前提和根本保障。信息的顺畅流动不应仅凭主观意愿来推动，而应靠制度建设来规范。根据我国当前公共政策传播的实际，加强制度建设首先要尽快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将政策信息的公开内容、范围作为一项义务来要求政府的各级部门，规范和制约政府人员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随意行为，达到增加政府行政透明度，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目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已于2003年1月1日起生效实施。该项规定的出台，为我国制定全国性的立法或其他地区的地方立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与此相联系，要修改和完善保密法和档案法等相关的法律，科学、合理地界定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使政府的信息公开既有实质性的内容，又不会损坏政府和国家的安全利益。其次要尽快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展现政府能力和形象，既是通过发布信息来引导舆论的有效方式，也是政府公关尤其是“危机公关”的一条有效途径。新闻发言人通过权威的信息发布来规范媒介报道，遏止流言蜚语，使事态始终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目前，许多国家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我国不少政府部门甚或

企事业单位也都设立了专门的新闻发言人，但初创时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再次要尽快建立政府政策制定的咨询制度。鉴于政策问题的难缠性质及政府精力、时间等方面的局限，科学决策必须凭借“外力”，让“利益持有人”来参与有关游戏规则制定，国外大量存在的“智囊库”以及我国近年出现的“听证”制度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第四，公众反馈渠道更加多样化。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政府仅靠强制权力和政治动员来推行政策的做法已明显失效。因为“政策接受者并不是所谓‘顺从的目标群体’，也不是被动的‘政策客体’或‘政策对象’，而是能够自觉认识到政策目标和措施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并做出积极反应的主体，即政策接受主体”。^⑨在此情况下，政策反馈机制已明显触及到政策实施效果。因此，拓宽公共政策制度化的反馈渠道，重视大众传播等非制度化的搜集与反馈信息的渠道，成为回应公众呼声的有效途径。比如，网络这种互动式的大众传播工具就可以为公众提供一条了解信息、倾诉心声的便捷途径。再比如，风行一时的市长热线、政府接待日、社会协商对话等等，都是政府了解民意、公众反馈信息的路径。

最后，公共政策的传播更趋人性化。(1) 更注重政策对象使用媒体的个体差异。在公共政策的对外传播中，政策传播的效果直接取决于目标群体吸纳信息的意愿与能力。由于目标群体并非整齐划一，他们对政策信息的接受并非完全被动，“而是根据各自的需要、兴趣、知识、经验、观念、价值观、习惯等”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接受”。^⑩这种目标群体对信息选择的自主性，一方面表现为对不同媒介的使用偏好。现代大众传播已进入了一个小众化阶段，不同的媒体都是针对着特定的人群“量身度作”的，“量身度作”的媒体信息较之其它媒体，在特定的人群方面无疑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欲影响某个特定的人群，必了解其偏好的媒体。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不同信息形式的需求。政策对象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素

质参差不齐，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有些群体可能乐意接受严谨的信息表现形式，有些目标公众可能乐意接受轻松活泼的信息表现形式。当然，信息渠道的选择，还要考虑物质因素的制约问题。例如，对那些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目标群体来讲，拥有先进的传播工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有鉴于此，与其相关的政策信息的传递，就不能选择那些他们根本就不会接触到的媒体。当然目前的政策传播，更关注信息传递的强势性，不曾更多地考虑信息能否顺利到达目标群体的问题。(2) 公共政策的传播开始引入“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更注重公众的感受，更关注公众的利益，更多地从公众的视角来解说政策、评点政策。政策的传播方式更加生动、灵活，不拘一格，通过全方位的展现来促进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和接受。

①引自白钢、王君：《简论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3年卷，第273页。

②引自（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③引自李培林：《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社会政策选择》，见刘溶沧主编：《中国：走向21世纪的公共政策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④引自（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⑤李汉林、李路路：《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⑥咸台灵：《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⑦引自赵凯农、李兆光：《如何贯彻执行公共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3页。

⑧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⑨引自胡平仁：《政策接受主体及其集团化趋势》，载《行政与法》2000年第5期。

⑩引自廖为建：《公共关系学简明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当代西方国家市场化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 卢荣春

[摘要]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在理论上可以吸取西方国家市场化行政改革的优点,但由于国情和体制的不同,而且由于西方行政改革本身的缺陷,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能模仿西方市场化模式,而必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

[关键词] 行政体制 改革 西方国家 中国 启示

[作者简介] 卢荣春,中山大学行政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76-05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配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进行行政改革之前,往往缺乏比较现成的理论,在改革启动后,也缺乏有理论深度的研究和总结跟进,这是我们对行政改革缺乏研究所导致的,也与改革实践者不重视开发理论和利用现有的理论有关。这或许是中国政府行政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很多方面缺乏成就的重要原因。因此总结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经验对我国行政改革理论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1978年以来西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与治道变革趋势

1978年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公民压力以及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各种原因,纷纷开始了行政改革。这些改革的趋向可以

用治道变革来概括。治道变革的具体内容,从大的方面来说,包括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公共事务引入内部市场机制等;政府行为的法治化主要是解决法律管制过分,从过分的法制回归法治的进程;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主要表现在在传统普选制度、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基础上实现政府行政日益公开化、提高政府公共政策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等;政府权力的多中心化,主要表现在执行局部变革、提高地方自治水平、还权于社群等。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思潮和模式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已经构成了“行政改革理论的丛林”,根据盖·彼得斯的概括,大致可分为市场模式、参与模式、灵活政府模式以及非管制型政府模式。然而,“政府管理传统模式的替代方案中,最为政治家所熟悉和青睐的就是市场模式。”^①(当代西方市场化行政改革有其自身的学

术渊源即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或称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即所谓“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作为“公共行政的传统规范与工商企业管理方法的融合”，公共管理典范主张“政府有限”，必须以市场解救政府失灵现象。可见，无论是公共选择，抑或是管理主义，其都崇尚市场力量、市场作用、市场机制。

具体言之，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市场化的特征体现在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中。

1. 顾客第一主义。顾客第一主义，就是服务为本、顾客驱动、顾客取向 (Customer Orientation)。质量和顾客满意是 21 世纪公共管理的主题。公开竞争，包括客户竞争和内部市场竞争。前者旨在打破垄断性的集中配置、划片服务及客户分割，实行公共服务的分散化，给客户以自由选择的现实权利，迫使公共部门为赢得客户而不得不展开竞争。内部市场机制的核心措施在于引入新的内部核算机制和价格机制，推动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竞争。公私竞争，包括合同出租 (contracting-out) 和市场检验 (market-testing)。合同出租，亦称合同承包、竞争招标 (competitive tendering)，指的是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对外承包给私营企业或非盈利机构，中标的承包商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用财政拨款购买承包商的公共产品和劳务。市场检验，即“对内部和外部服务承担者进行比较以检验资金的价值过程”。^②在市场检验中，目前正在由内部承担的活动向竞争者开放。不论最后的结果是合同出租还是继续由内部承担，市场检验能够保证公共服务以最佳的方式提供，从而实现公共资金的最大价值。公共服务小规模化 (down-sizing) 或适度规模化 (hght-sizing)。其要求为便于控制、利于提高效率、政治代表性和体现地方自治。

2. 绩效取向。西方各国纷纷进行了体现“结果为本”、绩效取向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围绕其使命进行绩效管理，采用目标管理 (MBO)、全面质量管理 (TQM) 等手段，强化政府对议会和顾客的双重责任；实行成本核算；加强财务控

制，完善信息反馈，实行绩效预算。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有英国的雷纳评审 (Rayner Scrutiny Programme) 和财务管理新方案 (FMI) 等。具体到工资制度上，就是打破统一的薪酬体系，推行绩效工资。如澳大利亚改革了原有工资结构引进了高级文官绩效评估；丹麦设立了灵活的工资制度，配置了更多资金；芬兰进行了业绩奖励实验；爱尔兰在一些高级管理职位引进了业绩工资制；荷兰发展了其原有的灵活工资体制；葡萄牙实现了工资体制理性化；土耳其努力建立业绩奖励制；英国建立了业绩工资制和灵活的工资结构。

3. 放松规制。私有化首创自彼得·德鲁克，原作“重新私有化”。E·S·萨瓦斯认为，所谓私有化，意即“更多地依靠私营部门的制度安排，而较少地依赖政府去满足社会需要”。但是，必须指出，关于私有化，“政府移交的是服务项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务责任的移交。”^③私有化更倾向于放松规制 (deregulation)。所谓规制，指社会公共机构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的经济主体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制约和限制。放松规制包括放松市场规制、放松社会规制和放松产业规制，但重点是放松市场规制。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放松规制的领域和国家日益增多，达成高峰。“市场和竞争就是主要的规制”成了西方各国的流行口号。

4. 以私补公，打破政府垄断。政府采用说服、宣传、表彰、政策优惠等手段鼓励私人资本投入到原来由政府包揽的事业中去，如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廉价住宅建设、医疗服务等领域，以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同时，打破政府的独家垄断，克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局面。

5. 公私伙伴关系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它与合同出租不同，政府不需要购买私营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而是以政府特许等形式吸引中标的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私营部门有投资收益权，即通过向消费者收费来收回企业成本，追求投资回报。^④公私伙伴关系，既借助社会资源提高了公共服务的

生产能力，又通过价格机制显示了顾客的真实需求。

6. “评估国家”的出现。“评估国家”的出现反映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对评估活动的极端重视。组织绩效是当代政府管理的核心价值。然而，要改进政府绩效，你必须首先了解目前的绩效水平究竟如何。改革中的评估首先广泛应用于改革的试点单位及示范项目。美国的“重塑试验室”和人事改革示范项目，都产生了大量的评估文著。美国和德国都制定了所谓的“日落法案”，规定不得推广没有经过评估而确认其效果和成本收益的示范项目。改革中的评估还应用于监测和阶段性地评价具体改革措施，如英国的雷纳评审。在“财务管理新方案”、“下一步行动方案”和“公民宪章运动”中，有关部门都进行了多次评估。

7. 分权化。分权化的政府抛弃了层级节制的传统集权模式，力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分权化的政府实行参与管理，分散部门权力；分权化的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层级简化，易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分权化的政府致力于公共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使之有能力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所以面对国内外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形式，我们有必要将竞争的因素引入公共服务领域。

二、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与启示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经历了四次大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基本经验是：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要体现中国特色，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稳定大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配套进行，要着眼于民主政治建设，加强领导，上下联动，循序渐进。虽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总的看，仍属于阶段性和过渡性的改革，还需要不断地深化。

当今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正面临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与新的要求。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配套进行。二是经济全

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加入 WTO，对中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三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对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实现公开化以及廉政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必须肯定的是，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尤其是其中的市场化倾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合理性，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对象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必然要求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推出，否则无法解决管理的效率低下问题。实际上，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与西方国家有共同之处，因此，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可以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 在政企关系方面，政府绝对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2. 在政府管理的方式上，一些政府部门仍然习惯于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事务，不善于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政府仍然包揽过多，社会中介组织还没有充分发挥有效作用。

3. 中国政府必须按照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达成的多边协议以及世贸组织的规制办事，使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之相衔接。

4. 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惯例，改变公共服务的垄断现象，开放某些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5.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履行监督行政公正与效率的途径必须清晰，其合法行为必须得到有效保证并进而巩固现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6. 加快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落实依法行政；要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抓紧对一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特点的行业进行改革。

7. 加快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系统清理各种审批制度；在其基础上取消和简化行政性审批，对保留下来的审批事项，要明确程序、时限和责任，增加透明度，健全监督机制，提高审批效率。

8. 完善公务员制度，造就高素质的专业化

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要在总结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公务员法》；在巩固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实现机构、编制、人员和工作程序法定化的同时，加强对公务员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提高公务员的政治素质和行政能力，从而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

十六大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我们认真学习吸取西方市场化行政改革的有益性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其不足之处。

第一，市场化体现了西方政府对市场价值、市场机制的极端推崇。与政府机制一样，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的功能劣势。这突出体现在市场本身具有的几个界限：(1) 市场有政治界限。尽管政治民主可以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与民主并无直接联系。(2) 市场存在分配问题上的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分配，因为它不能阻止纯租金的出现。(3) 市场有一定的社会化界限。企业关心的是短期的经济变动，它们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感兴趣。(4) 市场有伦理界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并创造了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种制度并不是市场机制的产物。(5) 市场有生态学界限。从人类的生存、发展看，必须坚持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的立场。(6) 市场自发的消极和破坏因素。市场会自发地产生一些消极和破坏因素。事实上，无论世界发生了何种变化，人们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市场的根本不信任。以市场机制解决公共问题基本上违背了政府存在的目的。

第二，是公民还是顾客？市场化行政改革以“顾客”（消费者）概念取代了“公民”概念，期望通过“消费者主权”机制缓解公共部门的变革压力，解决日益严重的“公共悖论”。换言之，即让顾客具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以驱动政府按照社会需求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公共服务中的“提供者/消费者”明显地比一般市场中的消费者面临更复杂的交易；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不仅

仅是“消费者”，他们更重要的是公民，这对于交易有一系列独特的内涵。公民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顾客是市场契约的一部分。公民位居顾客之上。^⑤新公共管理完全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现代法政理论，作为政府权力的委托人和最终所有者，公民是政府的唯一真正主人，政府是社会民众的公仆。因此，从终极意义上讲，公民是高于政府的。然而，顾客是一个基于市场交换关系或契约的概念，而市场交换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交换双方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下之分。可见，市场化行政改革以顾客代替公民，实则不是抬高而是降低了公民的宪政权利和法律地位。

第三，公私部门之间有无本质差别？市场化行政改革强调以私营企业的精神和机制重塑政府，建立“企业化政府”。但是，它片面照搬私营部门的经验、方法与原则，极大地忽略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本质差别，因而具有一种“新泰勒主义”的倾向。事实上，公私部门之间是有着本质差别的。私营企业被想当然地奉为公共部门的楷模，这是把教科书对私营企业的理想描述与其现实混为一谈。由于私营企业的表现在许多方面不尽人意，“私营部门神话”可能会把行政改革引向歧途。因此，简单地以私营部门的精神、技术和机制“重塑政府”的企图，注定会在现实中受挫。

第四，私有化真的那么卓有成效吗？私有化进程意味着政府的资产转移到政府的关系户手中，他们在该过程中暴富起来。即使是由专家推行的私有化方案，其结果也意味着在社会内部重新分配财富、权利和地位，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极端不稳定。即使是重塑政府理论的创始人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通过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重塑政府的市场化行政改革的考察，也不得不指出：“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政府将某一项活动私有化，例如把垃圾收集或监狱管理承包给私营公司时，结果反而把这项活动变成了一种私人垄断，成本和效率越弄越糟。因此，私有化是答案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答案。

可以断言，作为对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一次

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市场化行政改革的未来将取决于对上述四个问题做出何种解答。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第三部门也不能承担大量的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的职能。甚至作为工业时代的科层制在中国都未能真正建立，因此，中国行政改革只能走自己的路，在完善官僚制的前提下，采取公共管理的模式，适当的引入市场化的因素，加强行政体制的施政能力。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最终做到“管得着的看得见，看得见的管得着”。

① [美] 盖·彼得斯：《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新思维》[A]，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②⑥ [美]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M]，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年，第102、529页。

③ [美]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24-25页。

④ Armstrong, Michael (1994),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p. 60-61. 转引自周志忍：《公共悖论及其理论阐释》[J]，第14页。

⑤ Politt, C. and Bouckaert, G. (1995), 'Defining Quality', in Politt and Bouckaert (eds.), *Quality Improvement in European Public Services*, pp. 6-9. 转引自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587页。

[参考文献]

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C]，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

[美]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M]，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年。

方克定：《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序》[A]，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

[美] 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OECD (1990), *Public Management Development Survey: 1990*, Paris: OECD, pp. 9-10. 转引自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

陈东升：《面对“入世”，政府准备好了吗？》[J]，《中国公务员》2000年第4期。

[荷] 瓦·基克特：《荷兰的行政改革与公共部门管理》[A]，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

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罗波特·黑顿：《官僚制结构和人格》[A]，彭和平、竹立家等：《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美]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毛寿龙、李梅、陈幽泓：《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于军：《英国地方行政改革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雨 童

•历史学•

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西欧 寡妇状况探析

◎ 林中泽

[摘要] 从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西欧的整体历史发展看,寡妇群体无疑在不断扩大,这既与频繁的社会震动所造成的人口变化有关,也与中世纪城市经济兴起后婚姻结构的变化有关。由于圣经传统的影响,教会法和蛮族法在经济上的鼓励,再加上社会习俗给再婚设置的诸多障碍,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许多寡妇往往选择终身寡居,她们中的多数人宁愿在为教会服务的繁忙工作中默默无闻地了却残生。

[关键词] 寡妇 中世纪 宗教改革 教会法与蛮族法

[作者简介] 林中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1。

[中图分类号] K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81-07

俞金尧先生近年曾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欧洲寡妇作了有益的探讨,他指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寡妇改嫁的比率较高,再嫁者守寡时间较短,他认为这一现象既与欧洲较开放的文化舆论氛围有关,也与寡妇自身的财产权利及现实生活的艰辛有关。^①这无疑是智者之见。不过,俞先生尚来不及注意到当时欧洲事情的另一面,即在不少寡妇纷纷再嫁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寡妇选择寡居生活。本文将在这一方面做些补充,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行家。

一

巴巴拉·J.托德在考察近代早期英格兰阿宾顿地区(Abingdon)寡妇的生活状况时发现,该地区寡妇的再婚率呈直线下降的趋势:16世纪下半叶的再婚率为1/2,17世纪下降为1/3强,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初更下降到不够1/4。托德

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中正在出现一种逐渐增长的趋势,即人们害怕财产被分割,因而总是想方设法把财产作为一个整体保留在一个家庭中,这使得丈夫们在遗嘱中加入了对于遗孀再婚进行处罚的条款;托德还认为,妇女工作机会的日益增加、各种济贫机构的出现也使妇女独立生活的能力大为提高。^②托德的这一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我们不妨把该研究的结论拿来观照16世纪早期及其中世纪的整个西欧。虽然16世纪早期及其以前的相关材料更加支离破碎,但是在把这些材料拼接起来之后,一条朦胧的坐标线仍然能够被识别出来。

我们手头没有有关中世纪西欧某个特定地区寡妇生活的系统材料和数据。据J.科斯娜透露,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每4名成年妇女中就有1名寡妇。^③S.奥茨曼也告诉我们,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妇女总数的40%是单身,其中的10

- 20% 是寡妇；在 1400- 1700 年间因被控以从事巫术及有害魔法而被处死的 10 万人中有 80% 是妇女，其中大多数是年龄较大的处女和寡妇。^④ J. 哈灵顿更是认为，在早期近代欧洲的某个特定时期里，妇女人口总数中的 20% 是寡妇，而鳏夫在男性总人口中的比例则与寡妇持平或更高。^⑤ 这些数据虽然无法说明更深层的问题，但它们至少向我们表明：在 15 至 16 世纪间的欧洲，寡妇在妇女中的比重并不小。为什么中世纪和早期近代的欧洲有那么多寡妇？对此，J. 曼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他指出，中世纪的妇女常常与年龄较大的男人结婚，因为中等阶层的男人、尤其是城镇里的男人，都要等到继承财产或在事业有成之后才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男人在同龄女性中便再也找不到尚未订婚的对象，他们只好把目光转向刚刚到达青春期的农村姑娘；此外，中世纪妇女生育期较高的死亡率也使男人需要多次结婚，当这些丧偶的中年男子作出另一次婚姻抉择时，他们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乡村的少女，因此，许多妇女的第一次婚姻的对象往往比自己大 10- 20 岁。^⑥ 这种“老夫少妻”的搭配，其自然结果便是造就了大量的寡妇。

当一名妇女在丧失了丈夫之后，摆在她面前的出路不是再嫁就是寡居，当然她既可以寡居一段时间后再出嫁，也可以选择世俗方式的终身守寡，还可以选择修道方式的守贞（即入居修道院或干脆成为修女）。丧偶妇女的生活道路的选择，从较小的方面来说是取决于其特定的生活环境和追求，而从较大的方面来说则受制于文化传统、社会时尚及思想观念。其中，文化传统方面的因素常常能够从宏观上解释一般寡妇生活选择的大体走向。

我们从新约得知，耶稣对寡妇素有好感。他曾经用奇迹让一位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⑦ 他谴责犹太文士肆意侵吞寡妇的家产；^⑧ 他还当众由衷地称赞一名穷困寡妇的施舍行为，称她所捐出的两个小钱实际上比众人还多。^⑨ 至于寡妇能否再嫁，我们从耶稣那里得不到任何确切信息。不过耶稣在宣道时所用的一个比喻却值得注意，他认为撒播出去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结

果：有 100 倍的，有 60 倍的，还有 30 倍的。^⑩ 根据杰罗姆和奥古斯丁等人的解释，耶稣所说的撒种实指守贞，即守童贞者可获 100 倍的报偿，守鳏寡之贞者可获 60 倍的报偿，守一夫一妻之贞者只得 30 倍的报偿。^⑪ 如果真是那样，耶稣应是主张寡妇守贞不嫁的。

使徒保禄对寡妇的态度则是比较复杂的。他在解释犹太律法对人的管束作用时以女人作比喻：“……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⑫ 可见在这里他认为寡妇改嫁是天经地义的。他后来更加明确地宣称：“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⑬ 不过，在另一场合里他则采取了两可的立场：“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意为守贞不婚——引注）。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⑭ 在保禄看来，真正守寡的老年寡妇是应受到尊重的。他规定，终身只嫁过一次、年满 60 而又有好名声的老年寡妇可以在教会登记入册，由教会资助奉养；至于年轻的寡妇，保禄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拒绝她们入注教会资助名单，“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挨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禄之所以主张年轻寡妇再嫁，是因为害怕她们遏制不了自己的情欲而犯奸淫罪。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对于寡妇的出路问题，明显存在着“伦理偏严，法律偏宽”的现象。著名的神学家杰罗姆、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等，均从圣经中引申出寡妇守贞不二的理论，力倡宗教禁欲主义。明末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8- 1640 年）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义时也力主寡妇守节。^⑯ 他

还引用了一个西方寡妇守节的例子教训中国听众：“△勒里亚，贤妇，丧夫居节。或劝之嫁，答曰：夫虽已死于人，未死于我。”^⑦不过，中世纪的教会法却要通融得多。例如12世纪著名的《格列西昂教令集》就规定：“为了避免出现通奸，第二次婚姻是被允许的。”“第二次婚姻，第三次婚姻，甚至接连不断的婚姻……都不应受到谴责。”显然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有男子，也有女子。^⑧

在寡妇再嫁的问题上，世俗法律均抱宽容态度。如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规定，离婚、死亡、被俘或任何其他种类的被加以任何一方身上的奴役均为导致婚姻解除的合法理由。^⑨这意味着任何寻求缔结新婚姻的寡妇均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过，许多世俗法律都要求当事人在度过一段服丧期（tempus luctus）后才考虑嫁人。如罗马法规定寡妇的服丧期为一年。中世纪的蛮族法大体模仿罗马法的做法。如国王埃瑟雷德（Aethelred）的法律规定：“一切过着体面生活的寡妇，都应享有上帝及国王的特别保护，她们每一个人都应在丈夫去世后过一年单身的生活，然后她便可以自己作出决定。”国王卡纽特（Canute）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依照同一法律，在丈夫死后一年内便结婚的女人将失去其守丧礼物及所有她从前夫那里得来的财产，她的新任丈夫将失去对国王及任何其他领主的受害赔偿金（Wergeld）。^⑩盎格鲁-撒克逊法则说得比较含糊：“寡妇在某个合适的守丧期之后可以依自己的意愿拥有自由结婚的权利。”^⑪这个守丧期到底有多长，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种服丧期的规定在教会法中却很少见，例如《格列西昂教令集》便宣布寡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行订婚仪式和婚礼。

诚然，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领主对其领地上所属人口的司法管辖权的确曾经是妨碍寡妇作出再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封建惯例，封建领地内的各种依附人口的婚姻均必须取得领主的同意，而且还必须向他交付一笔数量不菲的结婚税，想要再婚的丧偶妇女自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物价的

不断上扬，领主按习惯征收的固定数额的结婚税也在迅速贬值，到13世纪以后，结婚税对于一般的农户来说已经算不上是沉重的负担。根据J.哈彻尔对13世纪的英国庄园的研究，当时的领主很少阻挠农奴的婚姻，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其配偶是否处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为了保证依附人口的家庭占有地能够被有效地经营并能按期按量偿付封建义务，领主甚至百般纵容寡妇们结婚，如果她们拒绝或拖延，就会被罚款。^⑫

二

既然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均为寡妇的再嫁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封建领主又赞同寡妇的婚姻，多数丧偶的妇女本该以出嫁为依归。可事实上还是有大量的寡妇宁愿选择独身生活。我们虽然无从知道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终身守寡的妇女占有多大的比例，但通过一些零星的资料，仍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根据12世纪末期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直属封地上的一份档案，国王封地上佃户的遗孀，都宁可守住丈夫的产业而不谋求再婚。档案中列出了15个女人的名字，其中大部分为寡妇，她们中最大的50岁，最小的只有18岁。她们的共同之处是：至少嫁过一个丈夫，拥有成年的或未成年的儿女，从先夫那里继承了一定量的土地、牲口和其他动产。^⑬15世纪著名的法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告诉她的女同胞：女人从出嫁的那天起，就应当为未来的寡居生活作准备，因为这是早晚要碰到的问题；为了面对这样的必然结局，即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独自生存下来，妇女必须得到教育。她同时还以一名正统的女基督徒的口吻劝告寡妇们不要再婚，因为女人再婚违背了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准则。^⑭

相当数量的寡妇之所以愿意过寡居生活，首先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对于再婚关系的确认过于繁难。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财产所有权的继承与转移的惟一依据是家庭亲族关系，而家庭关系是由合法婚姻造就的，既然婚姻牵涉到当时人视之如生命的财产，那末在处理婚姻问题时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寡妇再嫁，实际上是在一个（或两个）原有家庭的边沿再造一个全新的家庭，

这意味着亲族关系将更加复杂，亦即将有更多的权利主体参与财产的再分配过程。因此，一名寡妇是否再婚，不仅仅取决于该寡妇的个人意愿，还取决于有关亲属对个人利益进行权衡利弊的算计。例如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坎特伯雷教区，寡妇戈伦·艾伦爱上了里查德·图斯顿，而且他们已经获得了戈伦的堂兄托马斯·斯波洛特的支持。可是由于托马斯的兄弟约翰·斯波洛特的妻子的反对，戈伦最后竟嫁给了另一个她所不爱的男人西门·安舍尔。^⑤这桩婚姻显然违背了戈伦的个人意愿，它表明在寡妇的再婚过程中，能够作出关键性决定的是亲属而不是当事人，因为寡妇有过以前婚姻的经历，她的行为和决定便涉及到一个更加宽广的家族和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数量更多的人对一种新的婚姻拥有个人的切身利益。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许多寡妇对未来的选择，在她们看来，与其和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一起过受束缚的生活，不如维持自己的自由身份。

此外，西欧社会中由来已久的独身主义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寡妇们的选择。独身主义未必是教会政策的产物，因为世俗社会的独身风气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很盛行。不过，后来天主教会推行教会人员的独身制，并对民众的修道运动采取支持的态度，这对世俗社会的独身风气，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普遍相信，独身风气渊源于古代的厌女症（misogyny），中世纪的宗教独身主义，则是这种古代厌女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到了中世纪末期，瘟疫、战争、歉收及人口爆炸使大半个欧洲陷入严重的骚乱，对现实的极度恐惧也触发了两性间的对立：人们把生活的不顺利轻易地归咎于婚姻，并进而把个人婚姻的不愉快与配偶的异性特征联系起来，而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妇女，更成为男人发泄不满的替罪羊。根据 J. 诺斯的说法，到 16 世纪初，战争使单身女人过剩，她们中的许多人被迫去从事繁重的工作、乞讨和卖淫；在这种情况下，厌女症发展到极致，婚姻成为生活的陷阱。如在 1527 年的欧洲，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警句：“无约束的女人最好，无妻子的男人最富。”^⑥马丁·路德曾愤恨地断言：“婚姻已经广泛地落入了可

怕的不光彩境地。”德国的新教牧师卡斯帕·居提勒也抱怨说：“不管花了多大努力，婚姻总是被与焦虑、痛苦、烦恼及劳作连结在一起，人们甚至不敢向一条狗推荐婚姻。为了把自己的孩子从婚姻中挽救出来，人们把婚姻交托给撒旦而迫使自己的儿女进入修道院。”^⑦宗教改革以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根据 J. 哈灵顿的调查，对婚姻生活的讥讽和谩骂的作品，在 16 世纪后期的戏剧中比在宗教改革以前更常见。^⑧这种社会氛围必然使寡妇们对再婚的前景更加望而却步。

三

不过，最终使寡妇们得以守素安常的仍是经济因素。如同许多当代西方学者所承认的，寡居的妇女在管理丈夫的产业方面的确有更多的独立性，这可能是许多妇女选择寡居生活的最直接的理由。其实，即使在婚姻持续期间，西欧的妇女在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由来已久的。例如，日耳曼的习惯和法律要求，在结婚时丈夫必须当众宣布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和财物（住宅除外）的一部分（通常是 1/3）作为“丈夫析产”（DOWER）^⑨赠与妻子，以便她在寡居时能够维持余生。13 世纪的诺曼第公国的法律规定，丈夫析产甚至可以包括非主体部分的住宅。该法还硬性规定小土地所有者的遗孀必须拥有已故丈夫的土地的 1/3 作为丈夫析产，如果丈夫生前没有留下土地而只有住宅，则该女人也应得到住宅的 1/3 的份额。对于城市市民也是如此。^⑩同一时期的西西里法甚至允许丈夫赠与妻子的析产可以超过 1/3。^⑪不过，寡妇只能利用丈夫析产上的产出和地租，不能出售析产上的树林或砍去灌木丛林；在她死后，丈夫析产应归还给丈夫的继承人。^⑫根据西西里法，如果拥有析产的是—名农奴的妻子，那么在丈夫死后，寡居的妻子必须向丈夫的领主发誓效忠，以此换取领主对其拥有和使用析产的权利的保护。13 世纪的马格德堡法律规定，丈夫死后，寡居的妻子除了可以获得丈夫析产的支配权以外，还可以获得丈夫所有的绵羊、鹅、柜子、戒指、手镯等等。^⑬如果丈夫在生前没有给妻子留下任何析产，那末她的孩子们就必须负责赡养她，直至她再嫁为止；如果她

丈夫留下了绵羊，这些绵羊便属于寡居的妻子。^④由此看来，马格德堡法已充分考虑到寡妇在寡居期间的生活问题。根据诺曼法，在受到强暴的情况下，一名寡妇与一名妻子所受的法律保护既有相同的地方——受害人的亲属均须通过与犯罪嫌疑人的决斗来决断后者是否有罪；又有差别，即如果没有人愿意为寡妇出面与犯罪嫌疑人决斗，领主也可以把犯罪嫌疑人关进监狱，直到他洗心革面并得到宽恕为止。^⑤这表明法律在维护妇女权利方面还是考虑到寡妇的特殊处境的。

到中世纪后期，寡妇所赖以生的经济基础除了已故丈夫赠送给她的析产之外，还有她结婚时带入新家庭的嫁妆。日耳曼蛮族法中没有“嫁妆”（DOWRY）的概念，因此在中世纪早期的世俗法律中新娘的嫁妆很少被提及。嫁妆这一概念来自罗马法，如公元3世纪的乌尔比安法就明确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一名将要出嫁的女子承诺或给予一笔嫁妆。^⑥从12世纪开始，随着罗马法的复兴，嫁妆作为一个新家庭的生活来源的地位日见重要。J. 科斯娜的研究表明，在12世纪的意大利，当丈夫濒临破产的时候，为了防止妻子的嫁妆和祖传遗产受到侵害和损失，妻子被明确地批准去收回她的嫁妆或坚持在婚姻期间对其丈夫的财物拥有同等的权利，她还被允许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去从其丈夫的债权人那里捍卫自己的权利。^⑦虽然按惯例和法律，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拥有对妻子嫁妆的所有权，但是在丈夫死后，嫁妆的所有权和用益权均理所当然地落入了寡居的妻子手里。因此，13世纪的诺曼法规定，如果丈夫生前曾经把妻子的嫁妆作担保抵押了出去，那末在丈夫死后寡居的妻子也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把这部分财产要回来，因为她不对已故丈夫的行为负责。^⑧

在城市里，寡妇的生活也常通过立法获得一定的保障。中世纪的不少行会均负有抚养会员遗孀的职责。^⑨13世纪巴黎的漂布者行会章程规定：漂布者行会的行东死后，其遗孀在寡居的情况下，可以继承已故丈夫的职业，继续经营漂布业，可以把技术传给后代；如果她嫁给本行业人员（即使是帮工或学徒），也可以继续从事本行

业；不过如果她改嫁给非本行业的人员，她便自动丧失了从事本行业的资格。^⑩根据J. H. 曼迪的调查，在14—15世纪的法兰克福，约有33%的手工匠人和商人完全是女性。^⑪这些女性的主体部分必然是寡妇，因为根据中世纪城市的习惯，拥有丈夫的妻子和未成家的女子是不可能独立从事工商业的。

然而，寡居女人无疑也存在一些不利的条件，其中，社会歧视是影响寡妇公共形象的最大因素。中世纪的西欧与古代中国一样，人们对寡妇的性贞节提出了超乎寻常的要求，因而对这一特定人群的监视更加严密和苛刻。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本人作为一名寡妇，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寡妇们务必要守贞。她说，一个女仆压倒一切的职责就是保护其女主人的贞操，如果女主人生下了私生子，女仆应主动承认是自己所生。^⑫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出，皮桑的所谓贞节，不过是包裹在淫欲发泄狂表面的虚伪外衣而已——她告诉我们，一名女人无论其内里的欲望有多么狂热，其体面的外表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维护。摆在我们面前的材料常常贯穿着两种各执一端的意见。一方面，当时的人们指责16世纪的寡妇们生活作风极不检点，许多寡妇在丈夫刚刚死去后便迫不及待地与情人住在一起。例如在1561年，德国茨维布吕根（Zweibruken）的教会法庭抱怨说，它所管辖的地区的大多数寡妇均未经举行结婚仪式而与情人姘居。^⑬而在另一方面，后来的人们又抱怨时人对寡妇的性贞节投入了太多的注意力，她们特别容易为各种谣言和无端的指责所伤害，她们甚至要把每一名来访者均报告给地方当局，如被怀疑作风有问题，就会立刻受到制裁。例如德国巴卡拉赫（Bacharach）有一名寡妇于1613年受到讯问并被关押，理由不过是她的举止“像一名公娼”，她在深夜时与轻薄的男伙伴一起外出，而更为可疑的是，她拒绝了一名她认为“太虔诚”的求婚者。^⑭其实，某些寡妇的出轨行为与公众和当局的指摘是互为因果的，因此上述两种表面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协调起来的。按皮桑的说法，教会当局对寡妇们的指责应是可信的，寡妇们利用自己在婚姻关系上的自由身份去

勾引单身男人，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也许是引起公众注意的重要原因。不过，不可否认，公众和教会当局对于寡妇们的越轨行为也未免过于敏感，他们的许多防范措施常常造成了适得其反的后果。

寡妇们不仅仅在性贞节方面要受到严密监视，她们的经济地位有时也要受到来自先夫亲属的严峻挑战。11-12世纪时有一名叫吉伯特·德·诺肯特的法兰西贵族在自传中谈到了他母亲的寡居生活。当吉伯特只有半周岁时，其父亲老诺肯特因参加对英国的战争被俘，死于狱中，留下了寡妻和一群儿女。此时吉伯特的叔伯们因觊觎老诺肯特所留下的大笔遗产，多次逼迫吉伯特的母亲再婚；这位母亲则靠着对丈夫的坚定不移的爱和对上帝的矢志不渝的信，终于挫败了叔伯们的阴谋，维护了自己及其子女的合法权利。^{④5}这不过是成功寡妇的个别典型例子。可以想象得到，在争夺遗产的尔诈我虞的家族斗争中，身单力薄的寡妇，纵然有法律的保护，其胜算的机会也是不可能太多的。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寡妇都喜欢在儿孙们的簇拥下尽享天年并终老于自己的家园。实际上，许多寡妇更愿意参与教会的社会工作或呆在修道院里，用辛勤劳动和祈祷了却残生。B. 波尔顿告诉我们，12世纪时，位于奥顿主教区的圣休女修道院（St. Hugh），其成员中就有许多是寡妇。^{④6}公元6世纪时，高卢的阿尔主教恺撒里乌在为修女制定的生活规则中，提到寡妇在成为修女前必须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捐献出来，^{④7}这说明早在中世纪的初期就有大量的寡妇进入修道院。除了进修道院以外，更多的寡妇，尤其是生活于下层社会的寡妇，常常将自己的余生投入到教会的社会工作中去。按当时的惯例，这部分寡妇必须加入某个修会或宗教团体，其中，身体健康的年轻寡妇应在修会的组织下，以自己的劳动——协助教会宣讲福音、扶贫济困和救死扶伤等——换取教会的生活资助，而病弱的寡妇则能得到教会无偿的供养。此外，教会对这类寡妇的贞操，也有严格的规定，即她们必须发誓终身守贞。公元441年的奥兰治教会会议规定：“寡妇

一旦穿上由主教赐予的衣服，就证明她已经在主教面前表白了要过献身于教会的守寡生活的决心，任何背弃了自己的表白的寡妇和任何诱骗这些寡妇的人，都将受到永远的谴责。”公元533年的奥兰治会议重申了这一规定：“任何接受教会祝福的寡妇，如果违反教规而再婚的话，她将受到绝罚。但是，如果她在其主教的警告之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解除了婚约，进行了忏悔，她将会得到宽恕。”^{④8}

①见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②Barbara J. Todd, 'The Remarrying Widow: A Stereotype Reconsidered', See: Mary Prior (ed.), *Women in English Society 1500 - 1800*, Methuen & Co. Ltd, London & New York, 1985.

③Julius Kirshner, 'Wives' Claims against Insolvent Husbands in Late Medieval Italy', See: Julius Kirshner & Suzanne F. Wemple (ed.), *Women of the Medieval Worl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④Steven Ozment, *When Fathers Ruled: 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1983, p. 1.

⑤Joel F. Harrington, *Reordering Marriage and Society in Reformation Germa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1.

⑥J. H. Mundy, *Europ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1150 - 1309*, Longman, 1973, pp. 212-213.

⑦Luke 7: 11-15.

⑧Luke 20: 47.

⑨Luke 21: 1-4.

⑩Matthew 13: 3-8; Luke 4: 2-8.

⑪Pierre J. Payer, 'Early Medieval Regulations Concerning Marital Sexual Relations', See: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6, 1980,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⑫Romans 7: 2-3.

⑬I Corinthians 7: 39.

⑭I Corinthians 7: 8-9.

⑮I Timothy 5: 11-14.

⑯高一志：《警学》，载《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二），台湾学生书局，1972年，第591页。

⑰高一志：《达道纪言》，载《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二），台湾学生书局，1972年，第717页。

⑮Gratian, 'Canon Law on Marriage', See: Emilie Amt (ed.), *Women's Lives in Medieval Europe — A Source-book*,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p. 81.

⑯' Laws of the Roman Empire', See: Emilie Amt, pp. 33– 35.

⑰Angela M. Lucas,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Religion, Marriage and Letters*, the Harvester Press, Boston, 1983, pp. 78– 79.

⑱Eric Josef Carlson, *Marriage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4, p. 10.

⑲John Hatcher, 'English Serfdom and Villeinage: towards a Reassessment', See: *Past and Present*, February 1981, No. 90.

⑳' The Roll of Ladies and Boys and Girls', See: Emilie Amt, pp. 155– 157.

㉑Beatrice Gottlieb, 'The Problem of Feminism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ee: Julius Kirshner & Suzanne F. Wemple, *Women of the Medieval Worl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㉒Diana O' Hara, 'Ruled by my friend: Aspects of Marriage in the Diocese of Canterbury, c. 1540– 1570', See: *Continuity and Change*, 6 (1), 1991,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㉓Julia Nurse, 'She— Devils, Harlots and Harridans in Northern Renaissance Prints', See: *History Today*, Vol. 48 (7), July 1998.

㉔Steven Ozment, *When Fathers Ruled: 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1983, pp. 3– 4.

㉕Joel F. Harrington, *Reordering Marriage and Society in Reformation Germa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69– 70.

㉖我不把它译为“寡妇产”，是因为该项财产在妻子尚未寡居时就有了法理上的效力。

㉗' Norman Laws', See: Emilie Amt, pp. 53– 54.

㉘' Laws of Sicily', See: Emilie Amt, p. 65.

㉙' Norman Laws', See: Emilie Amt, pp. 53– 54.

㉚' Customs of Magdeburg', See: Emilie Amt, p. 72.

㉛' Customs of Magdeburg', See: Emilie Amt, p. 71.

㉜' Norman Laws', See: Emilie Amt, p. 57.

㉝' Laws of the Roman Empire', See: Emilie Amt, p. 33.

㉞Julius Kirshner, 'Wives' Claims against Insolvent Husbands in Late Medieval Italy', See: Julius Kirshner & Suzanne F. Wemple (ed.), *Women of the Medieval Worl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㉟' Norman Laws', See: Emilie Amt, p. 53.

㊱' Parisian Guild Regulations', See: Emilie Amt, p. 194.

㊲' Parisian Guild Regulations', See: Emilie Amt, p. 196.

㊳J. H. Mundy, *Europ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1150– 1309*, Longman, 1973, p. 216.

㊴Beatrice Gottlieb, 'The Problem of Feminism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ee: Julius Kirshner & Suzanne F. Wemple, *Women of the Medieval Worl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㊵Joel F. Harrington, *Reordering Marriage and Society in Reformation Germa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2.

㊶Joel F. Harrington, *Reordering Marriage and Society in Reformation Germa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54.

㊷' Autobiography of Guibert de Nogent: Life of His Mother', See: Emilie Amt, pp. 146– 148.

㊸Brenda Bolton, *The Medieval Reformation*, Edward Arnold Ltd. London, 1983, p. 82.

㊹' Caesarius of Arles: Rule for Nuns', See: Emilie Amt, p. 222.

㊺' Church Council Decrees', See: Emilie Amt, p. 220.

责任编辑: 郭秀文

西欧中世纪的女性观浅探

◎ 贺璋璐

[摘要] 西欧中世纪的女性观, 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1. 教会的女性观。教会的女性观主要渊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禁欲主义的内容; 二是犹太教、基督教(尤其是保罗的观点) 中对女性的负面评价。2. 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马利亚成为理想女性的代名词, 使得女性不再是等同于夏娃(堕落女性) 的单一形象。3. 骑士爱情。骑士爱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两性关系, 正是在这种全新的两性关系中培养出了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骑士传统和绅士风度。

[关键词] 西欧中世纪 女性观 教会 圣母马利亚 骑士爱情

[作者简介] 贺璋璐,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职博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631。

[中图分类号] K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088-06

尽管从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女性研究已在欧美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学术领域, 但对女性的看法与观念其实一直存在于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以来的西欧文化传统中。这种作为文化遗产的女性观甚至仍在今天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考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女性观, 对于我们理解女性的过去与现在, 理解历史、宗教与文化对于女性或两性关系的影响, 有着重要的意义。

西欧中世纪的女性观, 主要有教会的女性观、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骑士爱情中对女性的看法等内容。

一、教会的女性观

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女性观,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禁欲主义等内容。柏拉图哲学是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一个主要来源, 它的基础是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灵魂与肉体相对立的二元论哲学, 其中理念世界与灵魂高于感觉世界与肉体。基于这种二元对立, 柏拉图的哲学宣扬一种鄙视肉体的灵魂不朽论。柏拉图认为感觉世界是不可靠、不真实的, 肉体 and 现世的物质生活是不值得留恋的囚笼; 灵魂或精神虽然可以达到理念世界, 但只有在挣脱了肉体的束缚之后才能真正达到这一目标。

罗马帝国初期的新斯多葛派, 更是发挥了鄙弃肉体追求灵性生活的思想。新斯多葛派认为人分为神圣的肉体的两部分, 其中神圣的部分是与“宇宙理性”相联系的, 是属神的一部分。人的理性应顺应神或宇宙理性。而肉体的存在使得人成为其自身的囚犯。一个有德的人必须克制来自肉体的种种激情和欲望, 倾心于神, 唯有这样灵魂才能与神合为一体, 才能达到善的境界。而为达到这一目标, 人们应该苦行与禁欲。上述希腊、罗马的这种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观应用在解释性别关系上, 就是把男人与精神、灵魂相联系, 女性与肉体、欲望相联系, 既然精神、灵魂高于肉体与欲望, 因而男性也

必然高于女性。

古希腊的哲学家不仅把女性与肉体相联系，而且还认为女性是弱者、是标准人（男人）的低劣版本。因而在政治上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就是一种主动与被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质的缺乏。他在《论动物生成》一书中指出，在生殖中，雄性是主动者和运动者，而雌性则是被动者和被运动者，“对于生成之物来说，作为运动本原的雄性比作为质料的雌性更为优越，更加神圣”。^①基于这种生物学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就天赋说来，夫唱妇随是合乎自然的，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事例”，也正因为男性是主动的、积极的，女性是被动的、消极的，因此女性不适合自由和担任任何政治行动的职责。他说，“男女间的关系自然地存在着高低的分别，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原则在一切人类之间都是普遍适用的”。^②丈夫就像执政官，应终生受到妻子的尊重。在社会地位上，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高于奴隶。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从政治上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作了辩护。

2-5 世纪，是西欧的“教父”时代，教父们全盘继承了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们对于女性的上述看法，并且在《圣经》中找到了同样的理由，《旧约·创世纪》中有关夏娃的故事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对女性的负面评价的根源。夏娃出生的最初理由就是给男人做伴的，上帝之所以造女人，仅仅是因为那个男人亚当“独居”不好。而且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做成的，因而是男人的变异与正常状态的偏离。不仅如此，人类最初的堕落就是因为夏娃偷吃禁果所致。夏娃的故事，被夸大为女人的“原罪”。是女人最先受到诱惑并诱惑了男人，因而受到上帝的惩罚，她是使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罪魁祸首。因此她必须受丈夫的统治并忍受分娩的痛苦。

旧约中有不少贬损女性的言论。例如，耶和華让摩西晓喻以色列人云：“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③“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④在这些论述中有两个值得重视的观念：第一，女性的行经和生育是不洁的、污秽的；第二，生女孩比生男孩的污秽程度加倍。宗教上的“不洁”在古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犹太教中的一些禁欲的教派如库兰宗派，就认为婚姻中的性关系将导致宗教礼仪上的不洁，他们主张夫妻在性交之后均须行洗涤礼，以免因不洁净而玷污别人并由此而损害群体。上述看法因而也成为女性是卑贱的、应受男人统治的理论根据之一。

从女性是卑弱的、不洁的、女人以其肉体妨碍了男人与精神世界的联系观念中必然会导致对婚姻的蔑视，导致禁欲主义的兴起。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中全面阐述了基督教的婚姻观，他的主要观点为：1.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2. 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3.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4.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5.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上帝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6.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⑤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保罗没有提到孩子，也许在他看来，婚姻的目的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生儿育女，而是为了防止私通之罪。婚姻的好处就在于使得那些软弱的人免受诱惑。因此反对一切婚姻之外的性交行为是新约中的一个新内容。保罗的这种结婚是为了避免奸淫的观点是中世纪教会婚姻观的一个直接根据。《旧约》也禁止婚姻以外的性行为，但主要指的是与已婚女子性交。而按照保罗的观点，一切婚姻以外的性交都是不道德的。不过相对而言，婚姻内的性关系总是好过婚姻外的性关系，因为

婚姻是一种发泄性欲的合法出路。不过，如果一个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就应像保罗一样过独身的禁欲生活，把灵魂献给上帝；如果自知定力不够，那么就过一种道德的婚姻生活。总而言之，男女间的肉体欲望与性关系是阻碍灵魂得救的障碍，独身才是保持圣洁、通往灵魂得救之道。

保罗的上述观点被教父们全盘接受且夸大了。在教父们看来，作为被造物的一部分，性、肉体、女人、婚姻等这一切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人的经验或体验中，性又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动，常与人同神圣性相联系的精神追求处于冲突之中。教父们固执地认为，女人的性欲往往比男人强烈得多，女人是性欲的代名词，正是女人刺激起了男人性欲的冲动。因此女人对男人的肉体堕落负有最主要的责任。男人若要与神圣性相联系，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女人，独身禁欲。德尔图良认为女人是“邪恶之门”，是最先抛弃神的律法的人。他后来拒绝与妻子过性生活，并公然抛弃了妻子，甚至还写信劝告妻子压制性欲过独身生活。哲罗姆说，“永远贪得无厌的并不是妓女或奸妇，而是女人的爱。……它消磨男人的意志，使他们沉溺于性欲之中”。^⑥他鼓吹严格的斋戒和肉体折磨，赞成独身。哲罗姆还将结婚、守寡和未婚童贞分别用来解释福音书中关于收获量的30、60、100倍的比喻，未婚童贞在他看来是最值得称道的。

奥古斯丁是最有影响的西方教父，他曾系统阐述了婚姻的目的与性质，认为婚姻至少有生育、忠诚和圣礼等好处，声称夫妇间为了生育而进行的活动并不是罪过。在奥古斯丁看来，追求婚姻快乐总还是一桩可以宽恕的罪，但他对女人、肉体、性欲等仍抱有偏见，他说：“女人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她是死亡之门，是毒蛇的信徒，是魔鬼的帮凶，是陷阱，是信徒们的灾星。她腐蚀圣徒，那危险的面孔使那些就快要成为天使的人功败垂成。”^⑦他认为性欲是人类邪恶中最肮脏、最不洁净的、最能表明人对上帝意旨的不遵从。它能彻底摧毁理性和自由意志，是人所驾驭不了的最普遍、最基本的邪恶。^⑧他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物比女人的拥抱和肉体的结合更能使男人的心堕落。而没有这些，男人则不会娶妻子。”他认为一个男人应该珍爱自己妻子的灵魂，但应像憎恨敌人一样憎恨她的肉体。^⑨奥古斯丁同样认为情感是肉体，理性是灵魂；女性是肉体的化身，男性是灵魂的化身，灵魂高于肉体，两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世界的秩序，即男人在女人之上，根据这种秩序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者才是可称道的。

中世纪的西欧教会全盘接过上述教父们的女性观，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教会对于身体与性欲的否定，必然导致教会对“女性”这个性别的否定。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日耳曼部落也逐渐接受了基督教的女性观。而且日耳曼部落在入侵时，带来了他们更为原始的、更具有性别歧视的风俗习惯。毫无疑问，中世纪教会的关于女性的观念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基督教《旧约》与《新约》的有关思想、日耳曼蛮族人的习俗与观念等等的综合。罗马教会所做的工作是赋予上述观念更加正统的权威色彩，并力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解释和实施它们。

如前所述，女性是与肉体相联系的，她是男人追求精神生活与灵魂解脱的障碍，因此，这一时期的教会一方面的强调神职人员的纯洁之身，并不断在宗教会议上提出要求，或以教令、宗教法规的形式使神职人员的独身合法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对婚姻加以种种限制。神学家们认为，在夫妻当中，妻子对禁欲应当负有特殊的责任，她们应该为自己恪守妇道，“为了夏娃的缘故，她们应时时感到羞赧，应处于永久的忏悔之中。如果她们在禁日与丈夫同床，就应视同犯罪。”^⑩在教会看来，结婚只是个万不得已的办法，它是对人类弱点的无可奈何的一种让步而已——人类需要伴侣、性和孩子，因此婚姻只要能达到为上帝增殖基督教人口的目的就足够了，任何超过这一目的的行为和意念都是罪过。教会规章甚至对教徒作出明确规定：新婚之夜，神父应向一对新人宣讲性爱的罪恶；新婚后三天之内，夫妻之间不得发生性关系。教会的规则书甚至详细罗列了夫妇在一年中应该回避性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名目花样之多，几乎占去了全年中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教会还将圣母马利亚与圣约瑟的婚姻树为精

神婚姻的典范，据说他们的婚姻生活是没有性关系的。中世纪许多有关圣徒的传说都赞美这种精神婚姻，如7世纪英国的圣埃色德瑞达与诺森伯利亚的国王结婚12年而没有失去自己的贞洁，忏悔者爱德华在婚后就与王后商定相互过一种虔诚而没有性行为的生活。^⑪

12和13世纪是西欧的经院哲学发展到最鼎盛的时期，教会的正统神学家们再次肯定了古希腊哲学中灵肉二分的二元论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并且竭力贬低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地位和权利。如13世纪基督教权威人士、著有《神学大全》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同亚里士多德一样，把女性的肉体看成是男人精子的孵化器，把女性看成是有缺陷的男人，是由于性交失误而生下来的男人。他认为，“男性比之女人天生就被赋予了更多的逻辑与辨别力，所以男性是同理性和精神相联系，而女性则同性与物质相联系。虽然女性的灵魂中也有理性的成份，但即使女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她仍然要比男人低下”。^⑫阿奎那还认为，当一个女性在作宗教起誓时，她实际上已经响应了上帝的感召而否定了自己作为女人的天性。主张女人不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讲道，因为她们既没有权威，而且缺乏智慧，但却可能激起男人的淫欲。他还说女性是成长得很快的杂草，是不完全的人类。女性的身体，说到底只是一个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再生产的工具而已。至于人类的其它活动如工作等，男性将由其男性伙伴或男性助手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这些理由，女人自然要从属于男人。托马斯·阿奎那甚至认为，女人比男人在道德上、意志上的力量更加薄弱，因而更容易受到诱惑，更迷恋奸情。他完全同意奥古斯丁的所谓“合法的不道德”的概念，在他看来，虽然娼妓就像宫殿里的下水道，充满了肮脏，但若取消了卖淫，人们会发现地上将充斥着鸡奸等等污秽。^⑬

由上可见，对肉体的否定，对婚姻的贬斥，禁欲主义的盛行，这些都是造成女性在中世纪地位低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正如罗素所说，“基督教的道德由于注重性的纯洁性，所以极大地降低了妇女的地位。由于那些道德家都是男人，所以女人都成了妖妇……既然女人都是妖妇，所以我们应当减少她们引诱男人的机会。结果，那些有地位的女人越发受到约束，而那些没有地位的女人则被视为是罪恶的，受到极大的鄙视。”^⑭

二、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

中世纪的西欧对女性的看法除了上述占主导地位的来自教会方面的令人感到阴郁沉闷的看法外，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这便是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在中世纪早期，马利亚在西欧基督教的日历上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天使。9世纪时，西欧的一些地方零星地出现了对马利亚的崇拜。12世纪时，对马利亚的崇拜渐渐流行起来。这与十字军东征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讲希腊语的拜占庭教会，圣母马利亚一直是被崇拜的对象。十字军东征的一个结果就是把拜占庭的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带回到欧洲，并使得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在西欧各地迅速兴起。

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的兴起，使得人们渐渐相信：圣母马利亚是远离罪行的，上帝所有的恩典都通过她才赐福到人类身上，正如安瑟伦所言：“圣母拯救了夏娃的罪过，如同这种使我们蒙受损失的罪行源于女性一样，我们的正义之父和救赎之父也由女性生育。”^⑮无可否认，圣母马利亚成了邪恶的夏娃的对立面，在人们眼里马利亚是受人爱戴的圣母，而夏娃却是魔鬼的工具，马利亚在神秘的光环里闪耀，而夏娃则被视作女巫。马利亚体现了夏娃所没有的一切优良品德：贞洁、谦卑、恭顺和屈从，马利亚成了完美的化身。

当时西欧许多著名的大教堂都是以圣母马利亚的名义修建的。圣母马利亚的名字无人不晓，她的事迹更是有口皆碑，马利亚成为那个时代艺术、雕刻和戏剧的中心主题之一。人们普遍相信：圣母引导罪人忏悔，在基督徒和异教徒中施行奇迹，并由此得以保护前者，引导后者归于上帝的怀抱。人们只要口念着她的名字就会使身上的病痛与邪恶消退。马利亚在上帝造成肉身的过程中是一个全程参与

者，是人与上帝之间的调停人，就像雅各的梯子一样，她连接着天堂与尘世。^{①6}因此许多饱受疾病折磨的人虔诚地向马利亚祷告，希望能治愈他们的疾病。有的教堂除专为马利亚摆设祭坛外，还有专门的女士祈祷室。那些大小教堂里的身着白色服装的修道士们非常虔诚地向马利亚表示敬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利亚的崇拜的流行最初主要来自于民间的大众百姓而不是来自教会的倡导，正是大众百姓的崇拜使得马利亚成为最受人们尊敬的人物，也正是大众百姓对马利亚的崇拜影响了教会，后来教会还制定专门的节日纪念马利亚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事件，星期六就被规定为对马利亚的崇拜日。

圣母马利亚是神圣的，她有着特殊的地位，她拯救了夏娃的罪过等类似于这类观念的发展，无疑使得人们对女性的看法逐渐有所改变。到了13世纪，抒情诗人和行吟诗人们更是把圣母马利亚与尘世的高贵女性相等同，把宗教的爱情与世俗的爱情相混同，圣母马利亚成了一个高贵的纯洁的女贵族的形象。在方济各会的修士们的渲染下，马利亚又具有了“悲苦的母亲”的形象，她是一位富有同情和怜悯之心的“母亲”。因此，马利亚既是母爱的伟大象征，也是“理想女性”的代名词，这使得女性不再是等同于夏娃（堕落的女性）的单一形象。可以说，在此前的好几百年中，西方教会把女人等同于夏娃，她应对人类的“原罪”与人类的苦难负责；而在12、13世纪以后，马利亚的形象越来越光彩夺目，她承担着拯救灵魂的使命。

对圣母崇拜的兴起或多或少将使所有的女性大受其益，尤其是对上层贵族女性地位的提高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对马利亚的崇拜是12、13世纪发展起来的骑士观念的来源之一，它为骑士把女性理想化提供了一种宗教上的例证。

三、骑士爱情中的女性观

中世纪西欧世俗社会的女性观虽受到教会的女性观的影响，但由于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的不同，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不同身份的人的女性观其实是不同的。在中世纪早期，世俗贵族们毫无顾忌地接过教会关于女性的观念，盲目地认同教会关于婚姻、夫妻生活的规定，强调的妻子对丈夫的服从。妻子如果对丈夫不服从的话，就该受到武力的惩罚。

到了12世纪以后，贵族们对于女性的看法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开始尊重、甚至赞美女性。这除了与骑士们对贵妇人的崇拜是与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有关外，这种变化显然还与女性自己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1世纪末以前，她们一直完全依赖于父亲、丈夫和儿子，神也把她们认作是不需要担负责任的配角，因为神坚持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应当在他的监督之下对她们负责。但在十字军远征期间，许多离家的丈夫必然得把照料庄园的任务委托给自己的妻子。而妻子们不久就发现，财产管理、税收、什一税、甚至政治，远远不像她们所一直认为的那样具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性。”^{①7}她们表现得非常能干，把庄园里的一切事物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些远征归来的丈夫们不得不对其妻子的成就大大叹服。妻子们对家庭内外事物的处理充分证明了她们能力，因而使得她们在法律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巩固。“正是战争、宗教和十字军远征本身，在使粗野时代的妇女转变成骑士时代的女士这方面，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①8}

“骑士爱情”是12世纪和13世纪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也是上流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骑士爱情的主角通常是地位比较低的粗鄙骑士与出身高贵、举止文雅、高傲的贵妇人，虽然通常这种爱情不会有婚姻的结果，但在那些浪漫的骑士看来，灵魂间的交往比肉体的交往强上1000倍。在骑士爱情中，被骑士所爱的女性都具有一种理想的光辉，在骑士们看来，那些美丽、优雅、有教养的贵妇人不是和男人同样的肉身，她们简直就是仙女，男人能够崇拜她、服侍她、为她献身是莫大的光荣。因而骑士对自己所爱的人都是毕恭毕敬，他们保护她、爱护她，在她面前温顺得像一只绵羊。显然，这种爱情

“把女人抬高到一个纯洁无瑕的境界，从而把一切肉欲的污点从她们的爱情中清除出去，让爱情自由地翱翔，上达精神领域”。^⑮这种爱情纯粹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它所得到的也许只是微笑、亲吻等之类的回报，不过即使没有任何回报，却并不影响骑士对自己心中的偶像的“爱”与“忠诚”。这种“浪漫的爱”的本质在于把爱的对象视为一种极难得到而且十分珍贵的东西。因此，人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去赢得所爱的对象的爱，或是用诗，或是用歌，或是用武艺，或是用其它所能想到的、最能取悦女人的方式”。^⑯一个低阶层的骑士爱上一个高贵的女性，他就要努力奋斗以求配得上她。追求的过程本身就变成了骑士升华自己的心灵和精神境界的过程。

尽管骑士爱情“是昙花一现的情感，是血统高贵的女士和浪漫的护花使者之间的一种理想恋爱，是一种打发闲暇的美丽的白日梦。然而，它却引入了一套新的行为准则，这套行为准则对妇女的地位有直接、有力的影响。”^⑰这是因为骑士爱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两性关系，在这种两性关系中，女性的权利高于男人，女人可以支配男人，让其为之服务，女性在这种全新的两性关系中第一次被放到了一种优势地位。换言之，骑士爱情使女性找到了一条可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它对于女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尽管它有许多缺陷，有许多荒唐可笑、神经过敏之处，但它毕竟开始了改变妇女地位的尝试”。^⑱正是中世纪的骑士爱情，才使得浪漫的爱成为人们普遍承认和向往的爱的方式；也正是中世纪的骑士爱情，使得尊重女性成为贵族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逐渐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综上所述，西方中世纪的女性观对于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女性这个“性别”确实具有某种启迪意义。

①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生成》，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0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见吴寿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15页。

③④《旧约·利未记》12：1-5节；15：19-24节。

⑤《新约·哥林多前书》7：1-9节。

⑥Joyce E. Salisbury, “The Latin doctors of the Church on sexuality”,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2 (1986), North-Holland. p. 280.

⑦G. G. Coulton, *From St. Francis to Dante*, New York, 1968, P. 97.

⑧詹姆斯·A·布伦德茨：《中世纪欧洲的法律、性和基督教社会》(James. A.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芝加哥，1987年，第80页。

⑨⑩D·L·卡莫迪著，徐钧尧、宋立道译：《妇女与世界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3-134、134页。

⑪缪勒利尔：《家族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影印本，第335页。

⑫克里斯托弗·N. L. 布鲁克：《中世纪的婚姻思想》(Christopher N. L. Brooke, *The Medieval Idea of Marriage*)，纽约，1989年，第53页。

⑬⑭⑮Hahar, Shulamith: 《The Fourth Estate -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P. 24.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3.

⑯⑰伯特兰·罗素著，靳建国译《婚姻革命》，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2、46页。

⑱⑲⑳㉑坦娜希尔著，童仁译《历史中的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75、272、281、276页。

㉒莫尔顿·亨特：《情爱自然史》，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223页。

责任编辑：杨向艳

汤若望私生活之争议考

◎ 金国平 吴志良

[摘要] 耶稣会会士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系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科技史乃至明清正史上的著名人物, 曾为明、清两朝修订历法, 铸造火炮, 有“耶稣会之二雄者”之誉。在耶稣会神甫的誓约中, “贞洁愿”排第二位。早期天主教教会的教父们认为: 生理欲望 (尤指性欲) 是罪恶的根源而应视作禁忌, 提倡以宗教独身生活制度战胜性欲, 以便专心事主。严格的禁欲理论在教徒中很难得到遵守, 即便在神职人员中, 贯彻也不完全。教会史上, 教士违反独身制教规的情况亦不少。汉语文献中, 尚未见到对传教士在近女色、男色方面的确凿记载, 但外语资料中这方面的纪录则有案可稽。数种耶稣会史料涉及汤若望的私生活, 透露他是双性恋, 即好女色, 又猎男色。但是, 中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绝无仅有。笔者拟以耶稣会史料为基础, 对此问题引发争议的来龙去脉做一试探。

[关键词] 耶稣会 汤若望 禁欲

[作者简介] 金国平, 葡萄牙东南亚研究中心硕博课程客座教授; 吴志良, 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4) 09- 0094- 07

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系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科技史乃至明清正史上的名人。^①作为西洋宠臣, 他曾为明、清两朝修订历法, 铸造火炮。陈垣将其比作与利玛窦并驾齐驱的传教伟人, 称之为“耶稣会之二雄者, 若望也。”^②在清初权力之争中, 他也扮演过十分特殊的角色, 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盖顺治议立嗣皇时, 曾询若望意见, 若望以康熙曾出痘, 力主之, 遂一言而定, 即鼎孽所谓直陈万世大计也。”^③利用在清廷的特殊地位, 他有力地推进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 保护了许多教士, “实明末清初圣教会绝续安危之所系, ……”^④

汤若望系《清史稿》中有传的少数传教士之一。他于1592年5月1日出生在德国科隆一贵族家庭, 1611年10月21日在罗马入耶稣会, 1617

年在罗马晋铎。1618年4月16日从里斯本起航, 1619年7月15日到达澳门,^⑤两年后入广州。1623年1月25日初次来京, 1627年赴西安传教, 1628年7月31日在西安发末愿。^⑥1630年下半年, 他再次进京, 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 (Jean Terrenz) 之职, 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制造天文仪器。1639年, 曾获崇祯皇帝特赐《钦褒天学》匾额一块:

“崇祯初, 日食失验, 光启上言: ‘台官用郭守敬法, 历久必差, 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 设局修改历法, 光启为监督, 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光启卒, 以李天经代, 奏进汤若望所著书及恒星屏障。叠与台官测日食, 候节气, 并考定置闰先后, 汤若望术辄验。庄烈帝知西法果密, 欲据以改大统术, 未行而明亡。”^⑦

1644年6月7日，在李自成撤出后，多尔衮率师入京，旗兵圈地占房，驱赶城中居民。汤若望临武不惧，据守在宣武门内天主堂（俗称南堂）。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一日，他上书摄政王，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理由是未竣历书版片、天象仪器、书籍和教堂礼器等甚多，无法在三日内悉数搬迁，且损坏后难于修复。“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⑧十一月授汤若望钦天监监正，负责修历并于次年颁行新历。

年青的顺治帝，钦佩汤若望的学识，对他十分尊重，允其“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入内庭，不循常例”。而且，顺治帝先后几十次亲临教堂，垂问教理，了解十字架等物的含意，观赏西洋奇器和绘画。顺治帝曾启用汤若望任“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敕曰：‘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閎、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于历法代有损益。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锡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⑨亦常赐金银绸缎等财物，并尊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意为“祖父”）。

1661年，顺治帝病逝。康熙以冲龄践祚登基，但大权旁落。辅政大臣鳌拜等力主恢复祖制，反对西洋学说。杨光先趁机告汤若望等传教士罪状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如果不是太皇太后

（顺治之母）的干预和随之而来的北京地震事件，汤若望几遭杀害。年愈古稀的汤若望虽被释放，但已病人膏肓。出狱两月后，即1666年8月辞世。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鳌拜，亲执政权。当年冬，即为逝世三年多的汤若望平反昭雪，赐银500两追办了隆重的葬礼。葬礼上，特派官员宣读了康熙的亲书祭文，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利类思（Louis Bugli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年）等传教士跪拜聆听，感激涕零。不久，康熙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携朝中大臣，亲临墓地，按照中国礼俗悼祭汤若望。

汤若望初掌清钦天监时，或为求稳固其在监中的地位，且为避免与保守人士产生无谓的冲突，对中国式的术数之学多采循务实的宽容态度。自顺治五六年起，以安文思为首的部分教士连续撰文，抨击汤若望担任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神贫”的誓约，且称其所编制的历日中含有不合乎天主教教义的迷信内容。耶稣会为了保护天主教在中国宫廷的地位，不得不将此事提交梵蒂冈解决。1644年4月3日，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作出口头裁决，鉴于当时的情况，特准汤若望在发第四愿后，在京廷为宦。^⑩四盛式立誓的内容是：“三愿”或称“三绝誓愿”，即神贫愿（不具私产，又称绝财）、贞洁愿（不结婚，又称绝色）和听命愿（服从长上，又称绝意）。耶稣会传教士还必须发第四愿，即服从罗马教皇。^⑪

在耶稣会神甫的誓约中“贞洁愿”排第二位。早期天主教教会的教父们认为：生理欲望（尤指性欲）是罪恶的根源而应视作禁忌，提倡以宗教独身生活制度战胜性欲，以便专心事主。

中世纪后，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天主教对禁欲主义有所松弛，但从制度上，教会仍要求传教士禁欲，不近女色，这是基本的教规。强调纪律的耶稣会尤其严格于此。传统的禁欲主义把男女性关系的功用定义在人类的繁衍上，反对以此求得肉体之快乐，因而强调一夫一妻制。明末清初许多士子在政见、学问、伦理、信念上都很倾向耶稣会士，但终未入教，不愿服从这一教规是个重要原因。从耶稣会会士的信件中，我们可以

看到许多华人在休妾后才被接纳入教的例子。严格的禁欲理论在教徒中，很难得到遵守。即便在神职人员中，贯彻也不完全。

教会史上，教士违反独身制教规的情况亦不在少。汉语文献中，尚未见到对传教士在近女色、男色方面的确凿记载，但外语资料中这方面的纪录则有案可稽。

数种耶稣会史料涉及汤若望的私生活，透露他是双性恋，即好女色，又猎男色。但是，中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绝无仅有。笔者拟以耶稣会史料为基础，对此问题引发的争议的来龙去脉做一试探。

最早揭露汤若望私生活问题的是在京供职的与汤若望同时代的安文思及白乃心 (Jean Grueber) 二神甫。礼仪之争期间，铎罗 (de Tournon) 特使的秘书安格里塔 (Marcel Angelita)^⑫又旧事重提^⑬。

20 世纪初，耶稣会会士布鲁克尔 (Joseph Brucker) 反击了对汤若望的指控。^⑭稍后，在同世纪 30 年代，耶稣会会士费赖之根据士布鲁克尔之说，对此问题略有考述：

“南怀仁《熙朝定案》载有一奏疏，涉及若望之义孙。其人名汤士弘，原姓潘，曾为钦天监员，足证若望有子之诬。诬其有子之说，盖出于枢机员铎罗 (de Tournon) 之书记安格里塔 (Marcel Angelita)。一七五八年安格里塔死后，其说始布。据云：若望晚年不与同会士往来，在赐第中蓄有一妻，生二子。乃在礼仪问题辩论之中，若望之敌未见有一人举此事，而在诸会士中，亦无有人在私函中提及此事，足证其出于安格里塔之臆测也。案若望义孙乃其门下潘尽孝子，其人盖姓潘。同会士在一六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信劄中曾言尽孝颇见信用。若望临危时曾言其对尽孝过于宽容，致有取其子为继孙事。此固为若望之一缺点，然距诬罔之说远矣。”^⑮

赖氏当年未见耶稣会有关史料，故有“而在诸会士中，亦无有人在私函中提及此事”一语。

1962 年，耶稣会会士邓恩 (Dunne) 为汤若

望作了全面的辩护。^⑯

1964 年，方济各会会士思特雷特 (Streit) 将对汤若望的指控直斥为“一起真正的心理变态事件。”^⑰

1979 年，伊列内·皮 (Irene Pih) 在一本关于安文思的专著中，披露了安文思指控汤若望的档案资料。^⑱

1993 年，康密斯 (J. S. Cummis) 在一本关于礼仪之争的专著中，再次为汤若望全面辩护。^⑲

2001 年，耶稣会自己编撰的《耶稣会 (传记 - 主题) 历史词典 (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Biográfico - Temático)》中《汤若望条》对此问题有叙述，并且放弃了一向的辩护立场。^⑳

从耶稣会的资料来看，汤若望与潘尽孝正式关系是主仆，同时，又是义父子关系。据康密斯说，此种义父子关系是因为汤若望过继了潘尽孝的儿子为义孙，所以潘尽孝“自然变成了汤若望的儿子”。^㉑至于潘尽孝其人，安文思神甫向上级汇报说：

“既然说到此人，也让阁下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本是一个东鞑靼人^㉒同一辽东汉妇的儿子，最喜欢惹事生非。他曾被汤若望神甫告死罪，差点砍脖子。但他和礼部花了大笔银子，获免一死，把他调离了钦天监。后来汤若望神甫出于不可告人的爱恋，不听教徒的劝告，启奏皇帝说，这个鞑靼人有关系，皇帝可以利用他。皇帝批准了奏摺，下令让他在钦天监当差。他的任务是当刺探，将汤若望神甫的一切情况报告礼部。汤若望神甫很害怕他。神甫自己也这样说。这些事情是一个当官的鞑靼大人对我说的。”^㉓

“且不说这一切，我仅仅要说的是，此仆人是本基督徒社区的害群之马，弄得汤若望神甫神魂颠倒。汤若望神甫当着基督徒、鞑靼人和汉人的面口口声声叫这个仆人是儿子、相公。神甫对他说，为他可抛弃一切。神甫只相信他，他是他的高参。据说，他爱仆人，仆人也爱他，将此人在爱情、忠诚及

一切方面凌驾于本会神甫及修士之上。他说神甫及修士不可信，因为他们都谎话连篇，那些发了愿的神甫是发了撒谎第五愿。这个仆人是本住院、基督徒和汤若望神甫之间明争暗斗、懒散、事端与不快的根源。南堂中，惊雷、地震无日不无之，不啻俗市。”⁴³此文影射二人之间存在同性恋关系。

这一史料证明尽孝是汤若望的义子，与《清史稿》上《汤若望传》互为印证：“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余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汤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皆凌迟处死；故监官子刘必远、贾文郁、可成子哲、祖白子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皆斩。’”⁴⁴

潘尽孝之子后过继给他作义孙。“（顺治十八年）九月初，奉特旨：汤若望系外国之人，效力年久，原无妻室，不必拘例。其过继之孙，著入监。钦此。”⁴⁵在此点上，就连为其辩护的人也认为是汤若望所犯的一个错误。⁴⁶

对此，陈垣评论说：“惟汤若望所得荣典，亦有为木陈忞等所无者，则诰封三代一品，荫一义孙入太学是也。此事人或以为荣，吾独以为否。夫既标榜不婚不宦矣，则何需此义孙？何贵此诰封？且此种荣典，并非得自勋劳，凡庸俗官僚仕至若干阶级者皆得之。以此为荣，失教会之尊严矣。当时不闻以此施之僧人，而独以此施之教士，则其根本未明了教会之精神，及不以教士待汤若望可知也。”⁴⁷

陈垣还认为：“尤奇者，教士不婚不宦，学道离家，乃清廷既授之以官，更强予以此间之三代一品封典，十八年康熙登极，复强令以一异姓

为孙，荫入太学。”⁴⁸

汤若望的义孙名汤士弘，⁴⁹在顺治时已过继。“世祖章皇帝，念汤若望矢志贞修，终身不娶，孑然羁旅，苦独无依，令其抚养一幼童，作为义孙。”⁵⁰陈垣的“强加论”⁵¹可能以此为据，但他将此误为在康熙朝。据当时在京的安文思称：“在会院内、弥撒里、饭桌上，甚至常常在汤若望神甫的床上有两个孩子。他们是他的仆人的儿子。神甫称他们为孙子。对此众人愕然。您有目睹，可以作证。”⁵²受荫入监的汤士弘应为潘尽孝的长子，时年5岁。⁵³汤若望正式过继了一个义孙，实际上，他有两个义孙。

耶稣会会士“不婚不宦，绝色去家”的做法近乎和尚，有违“孝”道，不遵纲常，致使中国士人对此产生疑问。“木陈先信而后见，若望见后而仍疑，是乌足以行其道哉。”⁵⁴是说顺治曾对汤若望的私人生活有所怀疑。为汤若望作传的魏特言：

“皇帝本来一位教外人，对于教士无家室的独身生活，殊觉费解。因此他一开头时，在白昼任何一个时刻，甚至在深夜，遣派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体面内臣，到若望住宅中，藉词或此或彼地咨询，然而实际上却是暗自查究他的私室行动。这些黑夜来客，在若望住宅中，不曾发现有丝毫可指摘处。皇帝对于若望的贞洁生涯，确切访明后，他才选他为他的师友，为他的亲信顾问。”⁵⁵

这可能是事实。初期，汤若望的私生活并无不轨，对其的指控可能是在其得宠、荣华富贵之后的事情：

“最令人难过和痛惜的是，教徒们补充说，如果说以前汤若望神甫是贞洁的，现在世人皆知他的好色名声。也就是说，他有非分之欲，不仅仅喜欢女色，还沉迷男色。阁下原谅我们在此写不该写的东西，但出于我们对汤若望这位好神甫的信誉、我会的名声及上帝圣法的尊严义务，我们不得不写。

我们问教徒们从何听来，如何得知这类事情？回答是，即便我们不信，但汤若望神甫的光景和做法使我们不得不有所考虑。此

外，他们还说，教徒们和 Chu xin pe^⑦（这是一个徒有基督徒名的人，是汤若望神甫手下的官员，是他的参谋之一，最喜欢惹事生非。前几天差点被杀头。）都说，汤若望神甫在汉官处的名声很臭，在满官处的名声不知如何。说完，他们列举了对汤若望神甫有所考虑的理由如下：

1 从汤若望神甫与其仆人尽孝的做法与勾当来看。

2 因为见到汤若望神甫深夜宴会归来，带着他的仆人尽孝同骑一马。似乎此乃有此罪恶的人的习惯。

3 因为他让仆人尽孝与其同桌共坐。今年在我们的陵园奠祭时，他也这样做了，当时有许多基督徒在场。在汤若望神甫的衙门钦天监内，一次满官 sim yam^⑧宴请汤若望神甫。在排座次时，他也给汤若望神甫的仆人尽孝安排了座位并不怀好意地说：汤老师的管家，请坐，请坐。这如同打了愿意并同意这样做的汤若望神甫一记耳光，因为中国无此礼节。汤若望神甫忍受了，让他入席就餐。

4 因为外人也会像给汤若望神甫送帖一样，给尽孝送来请帖或回帖，例如今年来此的徐（光启）阁老的孙子就是这样做的。

5 因为汤若望神甫给王爷、官员送礼时，会派他仆人去。许多情况下，为了让他的回礼多些，为了让他高兴，得利，汤若望神甫会从自己的那份中取出一些，加到仆人的份内。

6 因为尽孝不仅穿戴丝绸，而且还身着有龙的衣服，脚登黄靴，即一种黄色的细牛皮靴。在中国从未见过仆人如此穿戴。一天这个仆人去见一个官员。在他走后，官员发问说：刚才来的是什么人？周围人回答说：汤若望的管家。官员接着说：模样也好。汉人以此词语影射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

13 一天，当着利类思神甫和我的面，汤若望向一个仆人出示了一张男人阳具的画，

问他那是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此事奇怪，见他神情严肃，转过身去，然后说：以此一试仆人是否质朴。

14 汤若望神甫向来宾出示秽画，例如印度妓女。黑女的脖子上挂着男人的阳具。当着我们的面，他还让他的仆人尽孝拿给其他人看，但不知是谁。这些画都在荷兰人初次来印度后写的一本书里。

.....

16 汤若望神甫对那位天文生和仆人们多次说到，我是大官，有这房子，园子，荣华富贵，我床上没有女人就算给众神甫们面子了。

17 今年皇帝将汉人与汉官赶出京城内城时，大家不与汤若望神甫过话，也不理睬他，他气得要死，说了一大堆话。有人说，一天，汤若望神甫喝醉了酒（当时他赴宴归来），失去了控制，说了许多胡话，最后竟然说：让诸位神甫，副省长神甫来接管，保管他的家，住在那里，我马上带着我的鞑婆到城外去。

18 我还在四川（饱受了许多苦难）时，带我来的王爷^⑨向我谈起了汤若望神甫在钦天监中的所作所为，王爷说了许多现在因我的罪孽而目睹，当时还不相信的汤若望神甫的事情。一次，王爷对我说汤若望神甫有女人，而且还说（这是原话）生了两个。当时我不相信，现在认为王爷所说不无道理。他的人品自有公论，除了上述那点，汤若望神甫谈起此道，滔滔不绝。

如果我们看看这位宗教好人汤若望神甫的人品，我不知如何说他是怎样恪守誓言的。在贞洁方面，他的做法明若观火。尽管我们不知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只是将人们的传说及他的引起人们怀疑他误入歧途的种种做法向上级作一汇报。”^⑩

据安文思的指控，汤若望不止同尽孝有同性恋关系：

“汤若望神甫（或如同人们怀疑的那样假装训斥他）当着一个人指控尽孝犯了法官员

的面训斥他的仆人，可他不愿下跪，官员又训斥了他一顿。他对汤若望神甫说：老爷有了心上的人，不要我了吗？华人以‘心上’来暗指那些不干不净的事情。这懒人好像是影射一个汤若望神甫留在家里的仆人。传闻汤若望神甫与他也像与尽孝一样有不好的勾当。”^{④①}

“若望常曰，淫乐是危险最大的”，^{④②}但不知为何其同僚的纪录却恰恰相反：“上帝惩罚他们（基督徒）以死亡、监禁、衰老、疾病和困苦，而却给我收入、房子、园子、银子、荣誉和官爵。鞑靼人找我，尊敬我；所有人待我好，我无所不会。……只是不会娶一个老婆。”^{④③}

安文思虽与汤若望不和，^{④④}但作为传教士还不至于凭空捏造诬陷汤若望。而且前引安文思信件是致耶稣会日本和中国省视察员神甫，转总会长神父的正式文件。这不能不引起史学界对此问题的应有关注。如果说安文思出于个人恩怨，诬陷汤若望，但未见耶稣会内部对此有何查办。耶稣会对这一争议采取了“特别沉默”^{④⑤}的态度。

涉及此事者不仅安文思一人，汤若望的同会士白乃心也曾致函上级明确指控汤的不轨行为说：“至于贞洁愿，尽管未有公开的罪孽，但他的不良表现确有实据，他多次犯罪，罪孽深重，可以怀疑有更严重的事情。”^{④⑥}对此，邓恩认为白乃心刚刚来华一年，是受安文思的影响。^{④⑦}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证据，因此说服力不足。白乃心在京可能也有所耳闻，而不仅仅是听自于安文思。

据安文思说，当时被囚禁在京的郑芝龙也对此有所耳闻，且发表过评论：“郑芝龙曾说道，汤若望神甫根本不像其他神甫们那样是一位耶稣会神甫，就连一个澳门的世俗葡人都不如。”^{④⑧}

考虑到这一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天主教教会的声誉，对神职人员私生活方面的缺点，只要违禁者不公开他们的性关系和子女，教会向来持默许、掩护的态度，至今如此。从教皇亲自对汤若望为宦一事的裁决来看，出于维护在华传教事业及教会的整体形象，且考虑到汤若望在京廷的特殊地位，^{④⑨}将此事压下淡化的可能性是存在

的。本文所披露的档案资料之可靠性并非确凿无疑，但毕竟是时人遗墨。迄今为止的有关著述先是说“出于安格里塔之臆测也”。在安文思等人的指控信件面前，又以出于个人恩怨诬陷为解释。此类著述不无以护教心态为汤若望开脱之嫌。《耶稣会（传记—主题）历史词典》放弃了传统的辩护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为此百年争议的探讨解禁。汤若望是否是一个自身清白、修持自谨而从无生活劣迹的人，尚为一历史疑团，有待汉语史料的发掘才可作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

①魏特（Alfons V-th, S. J.）1933年出版的《汤若望传（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 1666）》虽已问世70多年，仍不失为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1991年的再版补充了研究书目（第381- 395页）及有汉字注释的反查索引。关于此书的评价及汉译出版的情况，可见王冰：《中国有关汤若望科学活动的记述与研究》，载Roman Malek “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1592- 1666)”，Sankt Augustin: China - Zentrum: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8,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35, 第2卷，第1091- 1092页。中国学者撰写的汤若望传记有：张奉箴：《汤若望：耶稣会传教士》，台北，光启出版社，1992年；李兰琴：《汤若望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及陈亚兰：《沟通中西天文学的汤若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此外还有[德]斯托莫（Ernst Sturmer）著；[德]达素彬，张晓虎译《“通玄教师”汤若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及[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基督教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关于其生平事迹研究的回顾，可见顾为民：《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汤若望介绍与研究（一七九九~ 一九九一）——纪念汤若望诞辰四百周年（一五九二~ 一九九二）》，载“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1592- 1666)”第2卷，第1097- 1117页。前引书收入了大量的中外学者的新近研究论文。

②④⑧⑨⑤⑥④②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80、81、503、80、501、501、511页。

③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香港公教真理学会，1970年，第2册，第11页。

⑤《耶稣会（传记－主题）历史词典（*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Biográfico - Temático*）》，罗马－马德里，2001年，第4卷，第3514页。

⑥第四愿，即传教士必须服从罗马教皇。

⑦⑧⑨《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0019、10019－10020、10020页。

⑩⑪⑫《耶稣会（传记－主题）历史词典》第4卷，第3515、3998－4000、3515页。

⑬全名 Giovanni Marcello Angelita。铎罗使团第4号人物，职务是秘书兼司库。铎罗在澳门逝世后，出任使节至1710年。1711年离开澳门。1717年回到罗马。

⑭C. P. Platel Norbert,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es affaires des jésuites avec le Saint Siège* (《关于耶稣会与教廷问题的历史回忆录》), A Lisbonne: chez Francois - Louis Ameno, 1766, vol. I, p. 8.

⑮Joseph Brucker,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天主教百科全书》), Volume XIII, 1912, pp. 522 - 523.

⑯费赖之 (Louis Pfister) 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上册，第176－177页，注释3。

⑰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s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在华史》),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p. 317 - 339.

⑱Robert Streit, Johannes Dindinger, *Bibliotheca Missionum* (《传教文库》), Bd. 6. Missionsliteratur Indiens, der Philippinen, Japans und Indochinas, 1700 - 1799, 1964, p. 136.

⑲Irene Pih, *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ècle* (《17世纪在华耶稣会安文思神甫》), Paris, Centro Cultural Português, 1979.

⑳J. S. Cummins, *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礼仪问题：闵明我神甫与在华耶稣会》), 1993, pp. 124 - 130.

㉑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礼仪问题：闵明我神甫与在华耶稣会》), 第124页。

㉒㉓㉔在南堂任厨师，参见 *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ècle* (《17世纪在华耶稣会安文思神甫》)，第336、326－327、336页。

㉕《清史稿》，第10021页。

㉖黄伯禄：《正教奉褒》，上海天主堂重印，1894年，第41页。

㉗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礼仪问题：闵明我神甫与在华耶稣会》)，第124页。

㉘《正教奉褒》中作汤士宏，以避高宗弘历之讳。

㉙《正教奉褒》，第41页。

㉚台湾学者黄一农曾提出异议，见《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中国文化》第7期（1992年11月），第163页及第168页，注释49。

㉛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ècle (《17世纪在华耶稣会安文思神甫》)，第356页。

㉜Generations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在华史》)，第229页。

㉝汉名待考。

㉞满、汉名待考。

㉟肃王。

㊱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ècle (《17世纪在华耶稣会安文思神甫》)，第326－330页。

㊲同上，第340页。

㊳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ècle (《17世纪在华耶稣会安文思神甫》)，第276页。

㊴原因的分析，见 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礼仪问题：闵明我神甫与在华耶稣会》)，第124页。

㊵同上，第130页。

㊶ARSI: Jap. Sin. 143, 148 - 149. 1660年7月5日报告的全文载148 - 159页。

㊷Generations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在华史》)，第330页。

㊸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ècle (《17世纪在华耶稣会安文思神甫》)，第337页。

㊹当时汤若望设法营救囚禁北京的安文思和利类思，便是出于不危及自己地位的考虑，参见 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礼仪问题：闵明我神甫与在华耶稣会》)，第124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港澳研究•

关于香港发展高增值服务业 的理性思考

◎ 郑鼎文

[摘 要]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香港经济持续衰退,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港英政府没有抓住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及时引导、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导致香港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这是根本原因。香港经济的出路,在于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高度,加快推进港粤合作,走高增值服务业之路,其突破口是解决香港经济的腹地问题。

[关键词] 香港经济 港粤合作 高增值服务业

[作者简介] 郑鼎文,任职于深圳市政府办公厅、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广东 深圳, 518000。

[中图分类号] F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4) 09- 0101- 05

近些年来,香港社会各界和许多关心香港发展的专家学者对香港经济发展疲软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如认为是“1997 年前积聚的经济泡沫爆破所带来的后遗症”;或认为是经济转型的结果;或认为港英政府开支过大导致特区政府财政困难,香港过于优越的福利制度严重影响了社会效率等等,不一而足。凡此之说当然都有其道理,但是总有论述不深、说理不透、似是而非的感觉。我们认为,要找到转型期香港经济发展的新路向,必须从历史、理论基础等方面的问题分析入手。

一、对香港产业转型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支柱行业的不断变化,而不像后者具有单一性和长期性。在工业社会,每一次新的科技革命都推动了国际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美国学者刘易斯认为,国际产业转移开始于 19 世纪后期工业先行国与农业国的国际分工的初步形成。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产业转移是从二战后开始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更为突出。20 世纪后半段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50- 60 年代美、英(60 年代日本、西德等国家也开始)把以传统机械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如纺织、食品工业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70- 80 年代发达国家把部分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如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家

用电器等产品生产转移到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90年代以来当代发达国家迫于激烈的竞争，为了形成比较优势，把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最先进的技术产业，如电子通讯业中非核心技术、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当然这里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升级的过程，现在部分技术研发、客户服务环节也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遇。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都得益于此。

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从贸易转口起步，后来抓住发达国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机遇，适时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新加坡先实行“进口替代”，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后才转向“出口导向”），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启动了工业化进程，推动了经济起飞，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都发展成为亚太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相比较而言，80年代以前香港的出口工业还领先于新加坡，因为香港直接进入“出口导向”，出口工业占了先机之优，使之纺织、制衣业获得更多的配额，长期保持着竞争优势。

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加坡抓住发达国家转移部分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机会，及时公布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报告，以推动制造业升级。通过各种奖励措施，吸引高科技外资产业的进入，建立起以炼油、石油化工、造船、航空等为主体的制造业。新加坡在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并先期进入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产业领域，90年代后更是紧跟新一轮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步伐。政府制定了国家科技计划，并成立国家科学与技术局，以执行该项计划；设立国家研究中心，以支持策略性高科技产业。此外，提出建设“科技走廊”构想，在新加坡大学研究机构附近开辟科学园区，新投资的高科技企业大都进驻园区，大力发展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使新加坡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一样，在八九十年代也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机遇，推动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到后工业化时期并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台湾比新加坡更早触及高科技，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就对科技发展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提出“科技升级”的口号。1979年，台湾成立科技咨询委员会，公布“科学技术发展条例”，1980年新竹科学工业园正式开园，1982年提出“生产自动化推动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991年提出要“厚植产业潜力”，即增强工业发展潜力，把发展高技术新兴工业作为重点，并采取三项措施来保证计划的施行，包括：（1）积极培育工业技术和重视人才；（2）加强技术研究能力，鼓励民间从事研究发展；（3）改进基础设施。通过这些措施，使台湾的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为台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台湾信息产业取得骄人业绩，其电脑年产量占全世界的10%，而其中的60%就是科技园区生产的，其集成电路产业的年产量居世界第四。

对比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香港先是对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如钢铁、汽车、造船、石油、化工等产业的转移视而不见，没有做承接的尝试和努力；后来对以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革命和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反应迟钝，没有及时引导和大力扶持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一代的高新技术产业，也没有积极地运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甚至连制造业北上后香港的定位和作用都未详细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香港制造业鼎盛时期，适逢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大举北上，获利颇丰，这些利润完全按资本的本性任其追逐利润，用来炒楼炒股，使香港楼市股市都创造了10年上涨的神话，价格背离价值；而没有被引导用于技术研发工作，推动制造业升级。结果，等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一代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来、引领经济潮流时，香港制造业（包括转移到内地的）由于技术落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败北；同时，随着内地全面开放，特别是沿海省市经济发展，迅速的产业升

级及与美国、日本、韩国、(尤其是) 台湾地区 IT 产业间形成的全球加工产业链, 使香港作为内地联系世界的唯一窗口的地位不复存在, 香港贸易中心、传统产业运营中心、资本中心的地位大打折扣, 从而使香港的服务业失去了支撑。这是香港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香港产业转型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我们提出港英政府没有抓住世界产业大转移趋势, 及时引导、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导致香港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 这是香港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也许有人会质疑说, 香港是自由港, 港英政府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港政策, 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仅在市场失效时政府才进行必要和合理的干预, 并把政府职能重点放在提供服务上, 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故香港自 1994 年以来连续被传统基金会评选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经济在历史上多次的转型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香港经济人为因素较少, 其兴源于此, 其衰也源于此,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香港既然享受了它创造的辉煌, 也必须承受其带来的问题。

近代以来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看法有多种不同的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经济达到均衡状态, 无需人为地指导或政府干预, 把政府的职能局限于“守夜人”作用。亚当·斯密的观点后来由经济学家萨伊加以发展, 形成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能达到均衡, 能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状态, 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萨伊定律成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金科玉律, 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理论在其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例如它没有办法解决市场失灵的痼疾。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 在繁纷复杂和相当不平等竞争的经济生活中, “看不见的手”不再像以前那么灵巧, 而日益受到批评。我们用不着提凯恩斯, 即使是当今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 他们也丝毫没有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愿望, 有新自由主义领袖之称的弗里德曼指出, “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①即使以反对计划经济著称的哈耶克, 也认为“‘自由放任’一词是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②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复杂性, 严格意义的自由经济在实践上也是极为有限的, 正如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所指出, “在出现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之后, 政府和决策层所发挥的中心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③诺姆·乔姆斯基则从历史的角度发现, “权威的经济史料告诉我们, 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④美国政府对启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 推动美国经济十多年快速发展起的积极、重要的作用, 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 我们认为港英政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如果仍固守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是值得讨论的。

经济领域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地方, 一个小小的因素时常会产生很重大的结果, 比如, 17 世纪土豆从秘鲁传入欧洲, 这是一件极为微小而偶然的事情, 但后来土豆竟成为如此重要的食品, 以致 1845 - 1846 年的土豆歉收引起了爱尔兰人的一场大饥荒, 迫使成千上万人移居美洲; 15- 16 世纪几支小小船队的冒险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 而这竟撬动了地中海世界商业中心的地位; 1969 年,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等研究计划所组织开发了 ARPA 网, 它仅是军事部门与大学研究人员的一个技术平台, 但在 90 年代美国启动信息高速公路后, 它发展成因特网, 从而引发了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 如此等等。经济领域的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一种理论来加以解释, 即混沌学所揭示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它表现为, 小的不确定性或小的改变导致较大的不确定性或较大的改变, 如小的误差引起灾难性后果。这一特征最初由法国科学家彭加勒所认识, 后来洛伦兹将其加以系统的表述, 并戏称为蝴蝶效应: 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 一周后美国得克萨斯州就可能出现龙卷风。引发蝴蝶效应的初始条件有三个特征: 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别促成了最后的极大差别; 看似随机却有着内在联系; 非线性因素 (偶然因素) 介入成了必然结果的起因。经济领域存在的这种偶然性, 由于全球化和第三次技术革命而更为典型。

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影响加大；新技术使经济领域变化加快，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这两者使经济领域更为复杂。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政府必须对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实行有限干预政策，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和健康发展。

所谓对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实行有限干预政策，其基本的含义是：我们认为经济领域应该以市场为主导，或者说，在经济领域应该尽可能让市场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不仅可以使经济得到健康和良性的发展，而且使社会和谐，“广泛地使用市场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⑤政府应尽量避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把主要的工作用于诸如制定经济规则、保护公平竞争、维护社会公正等问题上。但政府的职能仅限于此也是不够的，而是应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并对初始条件进行各种手段的干预，使经济发展符合世界经济潮流，向着健全、稳定、可持续方向运行。由于这种干预是局部的、少量的和非持续的，故称有限干预政策。

从对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实行有限干预政策的观点来审视港英政府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这样说，港英政府在上世纪 80 年代没有看到高科技（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对 21 世纪的影响，没有把它的地位上升到初始条件的高度，及时把握时机，积极引导、大力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而满足于眼前的辉煌，使香港经济的发展没有后劲。对比台湾和新加坡这段时期所作的努力及其成就，港英政府的失误就更为明显。

也许有人会怀疑港英政府是否有条件能够引导、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香港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甚至在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上也很相近。新加坡原有的本土工业并不比香港强。80 年代新加坡重视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升级，但主要完全靠引进外资；后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等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通过引进跨国公司，当地企业的贡献很小。新加坡原有人才也十分奇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靠引进外国技术工作人员，借用跨国公司的智力和脑力，一直到 1990 年，其社会中 20% 的重要职位、40% 的重要决策都不是新加坡人作出的，李光耀总理曾很自豪地说“殖民主义没有给新加坡留下排外倾向”。结果，一个自身科技水平并不高的国家被认为是运用当代科学技术来完成“赶超”战略的典范。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被动，主要是放任市场机制的诱导；新加坡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主要是新加坡政府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结果。比照新加坡，我们有理由认为港英政府当年如果主动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积极引导、大力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也一定能够成功。为什么港英政府当年没有这样做呢？客观原因当然很多，可能受英国古典经济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认为只要建立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能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繁荣；还可能是受伦敦这一世界性经济大都会模式的影响，以为香港可以像伦敦一样，没有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也能通过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更主要的是，当年港英政府没有认识到以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革命和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会对当今世界经济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没有对代表时代最新技术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初始条件实行有限干预政策，失去了引导、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好时机。我们在这里不是批评港英政府当年的经济政策，更没有批评香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道路的意思。香港当年没走新加坡的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因为香港有着广大的内陆腹地，可以专心走服务业的道路，也可以说是存在就是合理。我们只是想说明 20 世纪末香港经济问题更深层面的原因。

三、走高增值服务业之路

香港经济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但其又没有技术先进、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基础，对外界因素

有较强的依赖性。20 世纪 80—90 年代初期香港经济发展繁荣，主要得益于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同时又把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联系的唯一的窗口。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全面推开，香港的“唯一窗口”的地位不复存在了，香港经济的内部矛盾就爆发出来了。因此，香港特区政府从港英政府接过手的是一个烫手的芋头。面对香港经济的困境，香港特区政府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阶层意见，提出了种种解决经济衰退主要的方案，包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粤港合作、发展本土经济、发行债券、公务员减薪等等。但香港经济的根本出路在哪里呢？

作为国际性、洲际性经济中心城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该城市既拥有自己的高新技术制造产业，又有高度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如上海、新加坡；另一种是该城市虽然没有自己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但现代服务业高度发展，并拥有广大的经济腹地，周边的制造业产业基地承认其作为中心城市地位，接受其提供的服务。由于香港当年没有抓住机遇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产业，成为第一种类型的中心城市的可能性已较小。因此，我们的观点是：香港经济的出路，在于站在全球化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高度，以港粤合作为背景，走高增值服务业之路，并把解决香港经济的腹地问题作为突破口，努力使香港成为第二类型的国际性、洲际性经济中心城市。这种思路不仅切合香港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实际，而且也是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必然结果。解决香港发展腹地问题，不仅要使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大珠三角这个区域内畅通无阻，还必须让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信息、律师、会计、行业管理等中介服务真正辐射、服务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这样才能保证香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繁荣昌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欣喜地看到，特区政府的思路日益清晰，港粤合作在积极推进；中央对香港问题一直高度重视，2003 年 6 月 29 日《关于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正式签署，为港粤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础。只要我们从全球化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出发，充分发挥港粤的各自优势，我们就可以把港粤建设成为亚太区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区。这也是香港的真正出路。

① ⑤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6、25 页。

②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81 页。

③ ④诺姆·乔姆斯基：《新资本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15 页。

责任编辑：黄振荣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历史 发展与现代启示

◎ 陈才俊

[摘要] 香港图书出版业始于1843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的三次重大发展,现已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位居世界前列。其历史发展与经营现状,可供中国迈向世界出版大国提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香港 图书出版业 历史 现状 启示

[作者简介] 陈才俊,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 G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106-05

一、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几次重大飞跃

1842年香港割让给英国后,水陆交通逐渐展开,居港人口日益增加,商业流通随之活跃,包括图书出版业在内的文化教育事业亦为社会发展之需应运而生。1843年11月,基督新教伦敦教会便将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①及其印刷所搬至香港,其主要印刷设备(如印刷机、铸字机及铅字等)全部折迁至香港新厂,原来的印刷负责人与骨干也一起来港,并继承传统以出版中文《圣经》及其他宗教读物等为主,也配合学校教学出版一些读物。清同治九年(1870年),英华书院停办,曾在该书院及印刷所工作过的中国人黄胜和王韬购买全部印刷设备及铅字,并于1871年合伙在香港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办的近代出版企业——中华印务总局。^②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历史虽然并不短暂,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一直都是英国出版物的海外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香港,殖民思想浓厚,商业气息颇重,文化氛围极差,绝大多数民众生活教育水平低

下,学校课本以英文教材为主。这些教材大多来自马来西亚及英国本土。当时出版社的出版物以英文为主,香港本地的中文出版物只有武侠小说、通俗小说及历史、星相算命书籍等,略具规模的书店陈列的中文读物,包括中文教材等,大多由中国大陆供应。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在荷里活道,自上环东街至中环嘉咸街一段马路的两旁,集中出现了一些书店,全盛时期竟有三四十家。当时最有名的华文阁、聚文阁(均创办于清朝末年)等贩售中英文书籍,并兼营批发,促进了书肆的形成。至此,香港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包括文化教育事业在内的商业转口港。^③

1. 第一次飞跃:母体文化的导入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最初兴旺,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大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和出版机构迁港,而导致这些精英云集香港的主要原因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对进步民主人士的迫害。^④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鉴于局势严峻,遂有计划地把一些进步文化工作者与民主人士从各

地疏散到香港。此时到港的知名人物，如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萨空了、廖沫沙、张友渔、陈翰笙、胡绳、杜国庠、乔冠华、恽逸群、金仲华、胡仲持、俞颂华、戈宝权、宋之的、金山、章泯、蔡楚生，还有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等不下数百人。这批精英到港后，使香港的文化生活有了变化，也给香港的新闻与图书出版业带来了生机。当时的新知书店与文化供应社合办南洋图书公司，由吉少甫主持，翻印出版解放区和大后方的书籍与杂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合作开办光夏书店，由邵公文负责。《华商报》的出版部出版邹韬奋的《抗战以来》，万人争购，几个月内印了五次。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真正兴起是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的。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驱使大批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再次流亡至港，又一次使香港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段时间，生活书店、新民主出版社等出版了邹韬奋的《韬奋文录》、李达的《新社会学大纲》、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冯玉祥的《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张铁生主编的《新民主实用百科辞典》等优秀中文书籍和一些世界名著的中译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出版的一本《初中精读文选》十分受欢迎，被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侨校采用为课本。胡愈之、夏衍在新加坡受此启发，策划出版了一套现代南洋中小学教科书，完成了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建设基础工程。^⑤

1949年至1953年初左右，上海、广州等地陆续有出版界人士携带大批书籍及纸型，来港开设出版和经销机构。除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百新书店、大公书局、南光书店、上海书局、正兴公司（即世界出版社前身）等外，其他香港本地出版机构均在此时期开办，如上海印书馆、学林书店、文渊书店、励力出版社、文光书局、万象书店、南洋图书公司以及太平洋图书公司等。这些出版机构以青少年为对象，出版文学作品、译作、学生补充读物、科技及工具书，其中相当一部分仍以国内旧版书为蓝本，重排或照原书翻印。而原开设在香港的书店如世界书局、永经堂

书局、五桂堂书局、开明书局、民生书局及祥记书局，除继续出版标点小说、尺牍、武术、医卜星相及历书等之外，也开始出版其他书籍，包括文学艺术、学生补充读物、字典辞典等。英文课本因来货太慢，价钱又高，所以本地的一些老字号书局便组成集团在澳门翻印来港销售，利润十分可观。当时香港文化教育水平颇低，学生人数仅约10万人（小学生占极大部分），加上工商业尚处于萌芽状态，出版的书籍一般每种只印1000~1500册。而且，香港销量有限，主要运销东南亚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而中文教科书几乎全由香港从国内进口后向各地供应。

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先后出现了人人出版社（以翻译世界名著及出版现代作家的文艺作品为主）、友联出版社（综合性文化机构，集研究所、出版社、印刷厂与发行所于一体，出版刊物、文艺作品、青年读物及电影文艺作品等）、高原出版社（出版学术论著、文学作品及青少年课外读物，名作家徐速的长篇小说创作便在1953年由该社开始出版）、亚洲出版社（以出版文学、翻译、学术书籍及人物传记等为主）等几家著名出版社。至50年代中期，新派武侠小说兴起，著名作家梁羽生、金庸相继在报章刊出新武侠长篇，风靡一时。1955年，伟青书店首先出版新武侠小说（也出其他读物），三育图书公司、环球出版社跟着大量出版武侠小说，并出版《武侠世界》月刊。新武侠书不仅畅销香港，而且远及世界五大洲有华侨的地区，其中尤以泰国为销量之冠。50年代下半叶，香港经济不断发展，引起社会各类行业的良性互动，文化教育带动社会进步，出版事业也随需要而节节前进。此时，各类书籍的出版逐渐增加，原本主要以行销国内母公司出版之书籍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亦在香港自行印行书籍；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各类知识性读物及文艺作品；上海书局除出版教科书外，还大量出版文学艺术作品、语文读本及全套共100种的《现代儿童丛书》，十分畅销；广智书局出版了普及本古典小说；艺美图书公司出版了一般知识性读物；泰昌书店、侨光书店出版了幼稚园读本；大中书局出版了中外地图；南国出版社出

版了文学及语文读物；大光出版社（其前身为学文书店）出版了文学、科技图书；中流出版社也出版了文学、语文书等。至 50 年代最后一年，万里书店以崭新姿态出现，开始有规模地出版实用性新书，为香港出版界开辟了一条可行的新途径。至此，香港图书出版业渐具规模，开始走向阔步发展的道路。^⑥

20 世纪上半叶的香港图书出版业能够在此“文化沙漠”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祖国文化的适时导入。

2. 第二次飞跃：本地市场的占领

20 世纪 60 年代初，香港人口、经济和中文教育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本地出版物的迅猛勃兴。中文出版物日益增多，逐步占领市场销售的主导地位。此间，万叶出版社、上海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了大批青少年儿童读物。上海书局还设立了中流出版社、日新书局、大中书局等子公司，显示了自己的雄厚实力。此期，香港教科书的出版和供应已有好几家了，不但出版中文书，也出版英文书。同时，外国出版商如朗文出版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联邦出版社、海涅曼教育图书有限公司和时代教育出版社等，也先后在香港设立发行或出版机构，大大改善了英文教科书的供应。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到数十万，学龄儿童进入学校的比例逐年提高，儿童书籍的需求量随之大增，原有的出版社在这方面供应不足，新雅儿童教育出版社便应时成立，专出儿童益智读物及幼稚园辅助读物。今天，该社已是一家有名的专业性出版社了。在外语进修方面，1963 年开始出版第一本英语学习读物的大家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广为职业青年和学生欢迎的英语读物和当时资料最新的英汉双解和汉英辞典，又出版了前所未有的英文注释中文字典，为学校大量采用。

60 年代中期，由于东南亚各国纷纷采取以当地语文为主的政策，中文书籍的销售重点遂从东南亚移回香港。到 60 年代后期，中文书籍的销路日益增加，香港出版物逐渐代替了长期占绝大比例的外来（国内）书籍，不仅品种数量增加，而且印制质量也不断提高。随着出版物的日益增

多，图书的流通便出现了新的难题。于是，第一家专营代理发行书籍的利通图书有限公司应时于 1966 年 1 月成立，担负大部分繁重的发行工作，成了出版社与书店之间的桥梁，对推进出版、发展文化起了积极作用。至 70 年代后期，该公司已把发行范围拓展至亚、美、欧、澳的 10 多个国家 20 多个城市的中、外文书店，初步达成了把“中华文化推到世界各地，让海外华人保持并延续优秀的中华文化，也让外国人认识中华文化的精髓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的企业理念。从此，出版与发行开始分工，既可节省经营成本，又能发挥推销效力，互助互利，把图书出版业推向新的、更有利于发展的途径。

60 年代末期，中国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内地来港图书几乎绝迹。可是，香港社会文化的需求却有增无减，这样，香港的出版机构便大量出版各式各样的实用书籍，以满足这方面读者的需求。本地出版物占领了主要市场。同时，台湾出版物也趁此时机打进香港市场。^⑦

3. 第三次飞跃：国际空间的拓展

20 世纪 80 年代初，香港不但工商各业、进出口贸易以及地产建筑业的发展登峰造极，而且已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经济、科技的革命性振兴，更使香港的图书出版业有了划时代发展，一跃而成为全球性的三大中文出版基地之一。此段时期，香港出版事业更加繁荣，图书市场更加活跃，图书经营范围已扩展到港版、内地版、台湾版及世界各国出版的图书。香港的图书市场除满足本地读者需求外，也面向海外。据统计，每年图书出口值达几十亿港元。另一方面，随着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及香港确立了在亚太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许多国家财团及世界性的大出版企业，也纷纷来港设立机构，使香港图书出版业逐步迈向了国际化。

80 年代末期，一种便于携带的“口袋书”在香港大行其道，^⑧其内容不论为消闲或实用，均普遍受到读者欢迎；其后，系列性的书籍多走这条道路。

进入 90 年代，以出版多样化读物的聚贤馆文化公司和以出版财经小说著称的勤+ 缘出版社

相继登场。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子科技的高度发展,光盘印刷技术的出现与Internet这个最大的国际电子网络的急速普及,一个崭新的电子出版行业已在香港稳步形成。

此时,原有的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除了出版大批实用书之外,还进入出版中学教科书的行列;三联书店也不断推出各类新书;中华书局则跳出框框,不再以古籍书为主;现代教育出版社除小学教科书外,同时出版一般性学生课外读物;新亚洲出版社除小学课本外,也出了有分量的文学书;朗文出版公司出版了一系列最新英文辞典及一些中文学生读物和中文课本;其他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等,都竞相出版中文课本。而1988年9月1日成立的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统领20几个出版、印刷、唱片、报馆及置业公司等,成为香港最大的出版集团。由于大出版社的刻意经营,注意培养人才,加上图书出版业渐趋国际化、多元化,吸引了不少文化界专业人士加入此业。经营企业化,管理科学化,既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又提高了产品质量,对推动图书出版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⑨香港图书出版业的第三次飞跃,实现了该产业国际空间的最大程度的、空前的、全面的发展。

香港的图书出版业发展至今,已非常发达。它不仅是全球三大中文出版基地之一,也是世界文字传媒中心之一,还是世界第四大印刷中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它拥有近500家出版社、近5000家印刷厂和数千家图书进出口商、图书批发商以及以售卖图书为主的零售商。香港每年出版图书万余种,仅中文图书销售额就达26亿港元。所出版图书,80%~90%为中文出版物,10%~20%为英文出版物。中文图书主要满足本港需要,也销往香港以外的华人地区;英文图书主要进口外国原版书,专供出口外销。

香港的中文图书市场由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争雄,与一定的营销机制密切相关。香港图书出版业的营销机制可分为三种。第一,在港出版机构自主营销。现在香港的图书出版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台湾在港开设的“香港书城”、“集成”、“无

华”等出版社,这些出版机构除以弘扬中华文化、普及民智教育为宗旨,还发展成为兼出版、发行、读者服务、展览等多元化业务的综合性文化机构。

第二,出口和转口出版物的营销。香港现有书刊进出口代理商100多家,主要经营外国出版物的进口和转口业务。英、美等出版大国的出版集团在港设有子公司,经营向亚洲销售出版物的业务;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出版机构亦在港设立分支机构,从事出版书刊的进出口业务。香港出版物的主要进口来源是英国、美国、日本和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中国其他地区,主要销往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省。

第三,灵活多样的零售营销。香港图书的零售主要是通过分布在全港的数以千计的大中小型书店和图书销售点进行。大型书店的面积一般为1000平方米左右,常年流通图书品种约在5万~7万种。特别是大型连锁书店,以其丰富的图书品种、较大的阅览空间、完备的企业化管理,在香港独树一帜。中小型书店亦称独立书店,一般专营某类或某几类图书,以特色取胜,有的还兼营文具,在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图书销售点则指设于地铁站的连锁便利书店、超级市场或百货公司中的商场书店以及遍布街头的书摊。另外,“二楼书店”在香港也十分流行,装修简单,但品种特别丰富,常年都有折扣。近年来,随着香港高新技术的发展,图书营销已进入网络时代,网上书店亦在港蔚然兴起。

二、香港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启示

香港的图书出版业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飞跃式地发展,快速步入世界强手之列,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确属奇迹。不过,这个奇迹的出现与香港特有的政治背景、经济体制、地理环境乃至文化氛围是密不可分的。其一,香港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条件,与世界经济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互动关系,已成为一个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聚散场所。它的交通通信设施完善,法规健全,国际语言通行。香港人勤奋工作,有优良的职业训练,他们拥有诸多手段和能力来适

应现代社会多方位的要求。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在香港能很快得到反映。这些都是香港图书出版业成功的要素。

其二,香港拥有非常优秀的印刷设备及技术力量,印刷质量精良,许多国家的出版商都到香港印书。日本还在香港建立了现代化胶印厂,将业务扩展至大陆。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华商务印刷厂无论规模上、技术上和产品质量上,都享有国际盛誉。香港的印刷业很发达,其印刷产品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如何借用香港经验,促使内地印刷质量上一个台阶,值得内地出版界认真思考。

其三,香港地方虽小,但它的发行网络健全,具有优越的运输条件,图书流通快捷。香港书店将经营门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北美洲的纽约、华盛顿、温哥华等地,开设分店,逐步建立全球性行销网络格局。香港出版集团新书资料库建立较早,将内地每年出版的10万种新书选出2万种,编出书目,供读者在网络上选购,效率甚高。

其四,香港举办过多届书展,促进海峡两岸和香港图书出版业的交流;组织同业参加台北、新加坡、意大利等书展,推动图书出版业扩大海外市场;联络内地出版工作者举行“华文出版联谊会”,在出版贸易信息等方面进行有益的交流。香港有充足的出版信息及业策企划手段,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又有较丰富的与国际出版交流的经验,懂得运用科学方法去探索消费者的需求,能使出版物满足世界的读者群。他们有规划市场的经验,满足供应不同地区的需求,还懂得发展财产权的边际效应,结合不同行业,共同创造利润。^⑩这正是内地图书出版界的薄弱之处。

其五,香港图书出版业主要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因此,追求图书的精美、新颖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嗜好。其出版的图书无论从选题、编辑、封面设计、纸张选用到印制装订,都十分考究。港版图书在封面设计上多使用一些广告性语言,有的加上醒目标题,有的引证权威人士的推荐,十分引人注目。另外,为便于读者携带,

出版者还设计推出了大量可放入衣袋或可在车上阅读的不同版本的“新潮”读本。这些都值得我们的内地图书出版同仁学习。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与政治背景,香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保护居民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因此,香港的出版商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经营观与意识形态观。他们往往视获取经济利益为第一动力来发展自己的出版事业,可以接纳不同政治倾向、文化背景和人生信仰的出版物。除对淫秽、不雅书刊有明确禁令外,政府一般不干涉出版业的运作“自由”,事实上,对影响“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及有损国家尊严的出版物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色情、暴力等不良出版物的极度泛滥,严重影响了整个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形象与健康发展。这种不良现象,则是内地出版产业应引以为戒的。

①马六甲英华书院于1818年11月11日奠基于马六甲,创办人与最高决策者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首任院长为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该书院在马六甲的25年一直是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办的对华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迁至香港后英文名曾改为Anglo-Chinese Theological Seminary(英华神学院),中文名不变。

②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2页。

③⑥⑦⑨沈本瑛、马汉生《世界出版业——港澳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1页、2~3页、3~4页、5页。

④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7页。

⑤王仿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香港出版业》,《中国出版》1997年第6期;赵晓恩《香港出版风雨记略》,《中国出版》1997年第7期。

⑧其实,这种仿照英国“企鹅丛书”开本的口袋书形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上海书局出版的《现代文丛》已经采用,其后万叶出版社的《南斗文丛》以及台湾的《文星丛书》均先后采用此开本。

⑩参见喻建章《香港回归为出版业走向世界提供的有利因素》,《中国出版》1997年第7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文学 语言学•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 进化论时间观

◎ 刘 忠

[摘 要]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主要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但长期以来,在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进化论时间观利用人们“趋时附新”的心理追求,对现代转型进行了多种阶段性命名,如阶级革命、文化革命、整风运动、大跃进,造成了“转型”意义的搁浅。其实,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与文学本体的确立是一个互证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另一方面文学本体观的深化又加快了现代文学的转型进程。

[关键词] 现代转型 进化论时间观 人学 审美

[作者简介] 刘 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副教授,北京,100732。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111-05

一、现代转型的话语表述:过程与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是晚清的文学革新,它虽然不是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转型,却是一个在全新语境中展开的变革行为,这语境就是危机背景下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吸收与排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①这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时提出的经典性口号,从这些反复提及的“新”字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出,晚清文学革新是建立在新战胜旧的进化论基础上的。《天演论》中,严复一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法古尊圣传统,公然提出“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新价值观,标举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时间观念。虽然这种价值观忽视了历史演进过程中退化、循环、交错的复杂现象,有将新与旧、古与今简单

对立起来之弊,但是它毕竟将国人从泥古不化、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精神视野和思维模式,并潜在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

相对于晚清文学革新来说,“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现代转型。它不再仅仅把文学看作政治变革的工具,时间链条上孤立的一环,而是深入到文学本身的语体层面,要求文学存在形式的变革。发难者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等主张,^②直接把变革对象指向文学的审美本身——语言形式;继之,刘半农、钱玄同、吴虞、鲁迅等人或以争辩方式为之助阵,或以创作“实绩”为之“呐喊”。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体变换,看起来是一个文学“工具”问题,实际意义却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理解范围。每个人都是通过语言来认

知世界的，语言先在地制约着使用者的思维逻辑和情感价值。文言文和白话文体现的正是这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明显不同的思维逻辑与情感体系。“晚清以来，白话文之所以伴随西学浪潮而逐渐盛行以至渐成时势，恰是因为现代理性的逻辑难以用文言文来圆满显现，甚至连西学的一些概念都无法在文言文中找到对应物”。^③语体革命在解除文化输入带来的语言危机，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加速了文学的现代转型。

与语体革命同时展开的还有“人学”主张的提出。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把“人”的文学表述为“对人的发现和辟荒”，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接着，他对人道主义又作了如下释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有关的缘故”。^④他使个体价值的重要性获得前所未有的强调。关于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陈独秀认为：“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若丧失，他何足言？”^⑤李大钊认为，中国必须改变“不尊重个人之权威与势力”的立国精神，“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⑥胡适也认为，“救出自己，解放和发展个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⑦当然，在一种倾斜的历史背景中，这种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价值观最终又是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现代国家作为目标指向，“五四”文学在确立文学的“人学”本质的同时，也把“革新政治”作为现实追求。^⑧两者既保持着某种内在的张力，又获得了很好的统一。

如果说“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是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那么过程与结果的悖论存在则是“转型”的具体展开。转型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学现象的过程，如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分期”问题，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受”问题，抗战文艺与当代文学的源流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关系，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与日常生活化关系等等。面对这些复杂过程，现代文学转型更多地意

味着如何给这些过程与结果以合理阐释。

将“过程”与“结果”联系起来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我们看到以下两种话语表述。一是历时态的“现代”自我。谈论“五四”文学革命功绩时，郁达夫曾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⑨人的发现开启了人的文学，他们是狂人式觉醒的知识分子、阿Q式麻木朴拙的农民、林道静式逐渐成长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凤凰苗寨养育的翠翠、荒蛮封闭鸡头寨土生土长的丙崽、深陷围城困境的方鸿渐，甚至是烦恼人生的印家厚、一地鸡毛的小林……。这些人物在历史的交替转型中，负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学面影，他们从传统桎梏中走来，裹挟着欧风美雨反客为主，但又在双重夹击下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自我、现实、存在的困惑，“现代”自我的真正内涵由此得以凸现。二是共时态的“现代”精神。这种精神的体现，一方面是人们面对现实的忧患与焦虑；另一方面是面对自我的苦闷彷徨，甚至是精神分裂。从鲁迅忧愤深广的国民性思考到张爱玲苍凉的世俗传奇，到余华凝重的形而上追问；从郭沫若的女神豪情到徐志摩爱的欢歌，到沈从文的田园牧歌，再到张承志的执著坚守，文学世界不断交织着亢奋、激越、呐喊、彷徨、抑郁、混沌的复杂情感。这种精神，一方面是以不无激进的方式参与、见证社会变动，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提供认知基础；另一方面又以怀旧、保守心态审视、反思现代性进程。保守派和国粹派自不必说，就是从那些激进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反思现代性的情感意向，它们是以非常隐蔽而微妙的形式存在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如鲁迅小说的乡土记忆，梁斌《红旗谱》中的伦理乡仇，陈忠实《白鹿原》中的宗法制温情，这些记忆表现了与现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鲁迅、梁斌、陈忠实们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关于乡土中国的命运——那些始终在历史进步与历史变革之外的人群的命运。

于此，我们看到，现代文学的感觉方式经常

与它的观念本身相矛盾，激进的革命浪潮遮掩不了乡土记忆的深厚凝重，进步的革命文学始终摆脱不了自怨自艾的小资情调。不仅“现代”一词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文学”概念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诠释中，也被赋予许多超出自身承载的额外功能，启蒙、革命、反帝反封建、改革开放、寻根、身体……，任何一种理解似乎都有逼仄、偏狭之嫌，不能揭示中国文学之于“转型”的真正内涵。

二、进化论时间观的确立与终结

在现代文学的转型进程中，进化论时间观利用人们“趋时附新”的社会心理需求，在转型的每一个阶段都给出了命名、划界，宣布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传统文化的时间观是循环轮回的，“大道周天”、“无往而不复”、“投胎转世”即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时间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着内在目的的单向度运动。如此，时间在意味着历史自然推进的同时，也暗示着空间上的距离感。这距离感在现实中是落后的东方文明与先进的西方文明之间的距离；在集体无意识中是一个衰败的天朝大国和想象中的世界强国之间的距离；在未来学意义上则是一个阶段性目标与一个更为宏大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之间的距离。

在新旧时间观转换中，进化论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不仅是摧毁传统文化时间观的利器，而且也是新时间观形成的内在依据。与其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把激进思想引入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在内的现代文学开拓者的文化与历史视野，不如说是赋予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现代“时间”观。新时间观以“进化”维度将历史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既然光明在前、曙光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含义，唯独过去成为一个负载落后、愚昧、黑暗的包袱。如果说这种进化论时间观在批判封建礼教、专制，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它与近代以来国人的激进心理相契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心中的现代性焦虑，革命浪潮一浪高于一浪，阶级革

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运动接着运动，新文化运动、工农兵运动、整风运动、大跃进……，那么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不断宣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新时期”以至“新纪元”。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也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制高点的占领，每一个类似宣言的出现，实际上都是在重复着一个信念。这种信念一旦与事业上的巨大成功结合起来，就会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一个又一个革命运动。

面对进化论时间观，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持无条件认同取向。新文化运动时，陈序经主张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武断地将东西文化的差异概括为“保守”与“进步”，“落后”与“先进”，并宣称弃绝传统文化、全面接受西方的“新”文明是中国走向民主、科学、独立的唯一之路。“西洋文明在今日，就是世界文明”。^⑩“革命文学”主张刚一提出，郭沫若便著文宣告浪漫主义的终结，无产阶级文学却正当时。^⑪其他如田汉、何其芳等人也曾有过为“趋时附新”而否定前期创作的言论。从未来预支了话语权力的现实与对未来的狂热期待相互支持，历史就会突然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它始终在遥远的“前方”招手呼应，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追赶它，至少不为其抛弃。

当下，以“后”、“新”为前缀的各种主义、思潮，同样承继着进化论时间观的余绪，后现代、后启蒙、后结构、新写实、新人类、新历史、新左派等思潮、流派背后，一方面是变换视角，拓展思路，推进文学研究；另一方面是沿袭线性、前方的时间观，通过重新命名“占领价值制高点和话语制高点”，充当计时员和裁判员角色。文学创作及其发展有自身独特的时间方式，这方式一再被所谓“推陈出新”的进化论取代。关于时间，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说，“真正的时间”是由自由的、向上的、创造的生命冲动所支配，由心理状态所决定，由“意识的绵延形式”所呈现的，而非事先设定的、向前的、趋新的、线性单向的。^⑫这也许是对以标榜生命本体论、语言本体论著称的“后主义”者的一种绝妙的反讽，是对割裂时空关

系，一味强调进化论时间观的一种解构。

表面上看，现代文学转型是一个文学史分期的古、今之别。从深层意思上看，它回答的却是现代转型的价值尺度、时间特性等本质问题。首先，转型考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的宏观视角，看世界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新变，尤其是现代意义的萌发、生成与转换，而不是时间的单一维度。关于此，评论家王铁仙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他说，“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范围现代性文学潮流”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意义在于人学观念的确立。^⑧对于这种阐述我们可以做以下理解：一方面，世界文学的“全面在场”，使中国文学身不由己地发生了从“道学”向“人学”的转变；另一方面，个性主义潜流的存在也为人学观念的确立提供了文化支持，并使其在现代文学中得以体现。其次，古代文学的分期较为模糊，比如一提起唐代文学，我们便习惯性把它与唐诗联系在一起，而现代文学不仅没有产生发达的、成熟的文体，甚至在学科范畴上也呈“断裂”态势，有“移置”、“西化”倾向。为了能够“还原”现代文学的后发性和本土性，我们在取得现代文学转型的时间跨度——晚清到“五四”——共识的基础上，也需警惕进化论时间观的幽灵。我们在说“五四”文学是人的文学和审美的文学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学中就没有“人”的地位和“美感”存在，其实，朴实的“国风”、绚烂的“楚辞”、醇厚的“乐府”、清雅的“小令”，不仅有“人”的情思在、个性在、风骨在，尺牍之间也流泻出无限的诗美；而是说现代文学参与了现代启蒙思想的营构，接受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影响，将古代文学即已存在的“人学”内涵加以确认、扩大，并走出“文以载道”的窠臼，廓清“道统”、“政统”对文学本质的遮蔽。同时，人学观念的确立和文学的现代“转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现代性的步伐时常受阻、搁浅，甚至是中断。比如革命文学的“革命+ 恋爱”模式、抗战文艺中的口号宣言、“文革”中的“三突出”等非审美、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与渗透等。这里不存在时间的断裂，有的只是时间的连续与对接。

三、现代转型与文学本体在当下

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与文学本体观的确立是一个互证互动的过程。前者以人的自由为“最高旨趣”，将文学从传统的“道”、“奴”主宰中解放出来，还文学以人学和诗学的本来面目。后者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批判标准，从理论上讲，它对任何时候的文学都可以起到范式作用，但实际上，文学本体常常处于缺席和错置状态，比如，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建国后的政治图解、“文革”中的“三突出”原则。以“五四”为肇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在精神上体现了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并以鲁迅、郭沫若、沈从文、郁达夫、老舍、曹禺等的创作实践确立了它的“现代”品格——人学与审美。

“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人情、人性、人道……，一句话，文学是对自我的一种确认与安慰。并且，不管这确认与安慰是希望还是绝望，它总是以人为指归，始终是心灵在场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不是站在人学的立场，那么通过文本表现的就不会是人在活着，而是观念在活着，本能在活着，欲望在活着。作家只有把文学创作建立在人的生存意义上，而不是建立在语言、观念、物质、欲望等非本原因素上，文学的人学价值才不会迷失和旁落。当然，在强调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审美之于文学的生成意义，尤其是爱的浸润与美的烛照。正是因着“爱”和“美”的君临，文学才会与科学实践、社会伦理、宗教道德等的区别中，体现出自身的存在价值——将人类导向不断地思考、追问乃至忏悔。然而，文学本体时常处于遮蔽和错位状态，整个文学史，除了屈原、李贺、李白、苏轼、曹雪芹、鲁迅、沈从文、老舍、胡风等几个迷人的段落外，文学极少站在人的维度上写人，过去是专制主义、群奴主义左右作家，文学沦为政治、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婢女，现在又是语言迷宫、身体把玩占据作家心灵，在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大沼中陷落。忠君意识、虚无观念、逍遥自适的人生法则等非人学成分充斥文坛，而真正的人的生存遭遇、心灵渴求却被轻易地忽略了，作家的头脑要

么盛满封建主义的礼数，要么沦为尼采所言的“他者”思想的跑马场。立足于这一点，我们说，现代文学的转型是一个远未完成的命题。

作为文学本体的另一个构成，审美就是要文学凸现自身规律，从意识形态的外部指令和某种工具性中脱离出来，进入作为艺术的美学维度。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疑具有表达社会政治思想的功能。但是文学毕竟是以语言艺术的身份进入意识形态的，因而文学所要表达的政治思想必须融入到文学的审美形式中。回望“五四”，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持守文学的审美性，以一个艺术家的清洁精神，为我们创作了《呐喊》、《彷徨》、《野草》、《边城》、《迟桂花》等鲜活的文学景象。进入新时期，王蒙、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以语言、叙事、结构等美感因素的先锋书写，触及了文学审美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形式。但娴熟之后，他们的艺术使命却终结在这上面，无法继续在人类精神的内部行动。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美将拯救世界”，阿诺德说“诗歌拯救世界”，其共同的意思是，我们生存的世界离不开审美。反过来说，也即文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审美。当然，这里的审美是与人类的生存向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呵护的是正义与良知，拥抱的是艺术固有的诗性品质和理想精神。

当前的文学，先锋已经终结，新人类的私人写作正方兴未艾。写作要么成为远离现实境遇的理念阐发，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向故纸堆、历史古迹、博尔赫斯的迷宫、普鲁斯特的书房逃遁；要么沦为商业性的身体展示，执着于眼前经验和感受的表达，其中身体语言的恣肆更是另类十足。这两类写作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对生活的疏远与轻视，“生活在别处”和“生活在当下”构成了他们创作的两大基点，唯独没有心灵的参与和理想的烛照。阅读这些文字，我们在为文学本体失落慨叹的同时，不免对文学的救赎功能产生了怀疑。当艺术作为人类自救的最后一个屏障被轻易拆解之后，谁来填补因意义缺失而产生的空白呢？是灰暗的绝望、死亡？还是身体中膨胀的欲

望、罪恶？……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一点，文学迷失了本体，迷失了由抒情、美丽和爱共同构成的圣洁光环。当前的文学只代表人类的哭泣声音，而丧失了神圣的歌唱高度，这是文学本质的一次彻底迷失，将心灵、精神、价值等人之为人的东西确立在虚无、欲望上，然后迅速地向欲望、残酷、死亡、性等动物性景象滑行。

人的生存是需要神圣的期盼来支撑的，神圣一旦消失，人就只能把堕落后的灰暗景象加以神圣化，以此来填补心灵的某种空缺。心灵的危机只能交换给心灵，文学必须承担其心灵慰藉和追问功能，因此，文学的人学本质和审美品格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需进一步张扬。

①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胡适《建设的革命文学论》，《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8年4月。

③许纪霖、陈凯达《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1页。

④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1917—192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⑤陈独秀《一九一六》，《青年》第1卷第5号，1916年9月。

⑥李大钊《宪政与思想自由》，《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

⑦胡适《易卜生主义》，《中国现代文论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5页。

⑧茅盾《关于“创作”》，见《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版。

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⑩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1页。

⑪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

⑫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5页。

⑬王铁仙《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现代化语境下的六朝文学观念

◎ 刘绍瑾

[摘要] 六朝文学观念在20世纪上半期得到了历史上少有的正面评估,中古文学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富有收获的发展阶段。文选派虽然在五四时期被当作“妖孽”看待,但其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新的阐释而融入当时的文学思潮中,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六朝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六朝文学构成了当时文学批评史最为重要的内容,文学批评史的学科体认以及“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提出亦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与此相应,从审美的角度看待六朝,人们也得出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结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把六朝美学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关键词] 现代化 六朝文学观念 文选派 文学自觉 六朝美学

[作者简介] 刘绍瑾,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116-06

六朝文学自唐代以后便与诸如绮靡、彩丽、绮丽、丽指、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尽管清代阮元提出“文笔论”,在推崇骈文的同时也张扬了六朝文学,但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文以载道”传统观念的挤压,六朝文学观念难以获得正面的认可。

处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20世纪上半期,在反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封建旧传统,建立具有现代色彩的学术范型的时代背景下,六朝文学观念得到了历史上少有的正面价值评估,中古文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富有收获的发展阶段。在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包括“国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从研究对象的选择到意义的阐释,都被融入到那个时代文学思潮、学术风气的大势中,从而使那时的纯学术研究带上了浓厚的当下人文关怀。因此,考察六朝文学观念在20世纪前半期被阐释、受关注的历史,将为我们

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

一、从“选学妖孽”说起

20世纪上半期,在反对封建、张扬个性、提倡科学精神的时代氛围下,有三大传统资源被接收、消化、融会到那时的文学思潮中,这就是民间俗文学、明清性灵派和六朝文学。前二者体现得较为显型。民间俗文学的重视与白话文学思想相应,个性主义思潮则导致了明清性灵派的张扬。而六朝文学呢?五四新文化喊出了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选学”即文选学。《文选》不仅产生于六朝,而且可以说代表了我們所说的六朝文学观念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弄清六朝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就需从这一要被打倒的“选学妖孽”说起。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在《文选序》中萧统提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论批评原则，认为文学应该具有“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审美特点，从而把作为“篇翰”、“篇什”的文学作品与经、史、子著区别开来。即使是史书中的部分“赞论”、“序述”，也只是因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而获甄录。《文选》的编辑，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选本的方式明确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不仅是对曹丕“诗赋欲丽”、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所体现的唯美倾向的一大张扬，也是当时文坛文笔论思潮在选体批评上的具体化。《文选》的编辑及其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凸显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独立自觉意识和崇尚声色的唯美风习，可以说是六朝文学观念的重要代表。

但《文选》所体现的上述精神在以后的阐释、接受史上，却越来越表现为文体意义上的骈、散之争，区别于经、史、子著的文学独立自觉意识和文体上的骈、散之争纠结在了一起。六朝骈文因其“气转于潜，骨植于秀。振采则清绮，陵节则纾徐。辑类新奇，会比兴之义；穷形抒写，极绚染之能”（孙德谦《六朝丽指》），故最集中、最纯粹地体现了《文选》所代表的纯文学美文理想。再加上否定六朝骈文的唐代古文运动的某些矫枉过正，使得对抗桐城派取法韩柳古文的清代文选派在骈体与文学之间划上了等号，即所谓“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①把区别于经、史、子著的文学独立自觉意识和具有文体意义上的骈、散之争纠结在一起的这些争论，就为《文选》及其所代表的六朝文学观念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打入了一个楔子，因为五四时期关于文学定义、文学界定的讨论，有很大部分是与文体相关的。

在深受西方科学精神和文学观念影响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界，对任何文学问题的研究，首先面对的就是对“文学”（Literature）的界定问题。正是在这里，文选派及其与之相对立、相争执的传统思想获得了与当时涌进中国的西方思想进行对话的空间。在那时的文论研究中，人们在讨论“文学”定义而称引西人戴昆西

（De Quincey）、亨德（Theodore W·Hunt）、文切斯特（C·T·Winchester）时，似乎也无法绕过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对文学所下的定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氏的这一主张，曾被胡适称为“推翻古来一切狭隘的文论”。与章氏的意见相佐，渊源于六朝、提出于清代的阮元、由20世纪初刘师培等继响的文选派，则强调藻饰、对偶、声律为文的主要标志，也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狭义但却关注文学自身美学特征的一路。引人注目的是，刘师培所代表的文选学以辨析文笔、分别骈散的形式极力凸显了文学不同于其他形态的特点。在《文章源始》中，刘氏强调“文也者，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者也”。于《论文杂记》中，他亦重申“汉、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降及唐代，以笔为文”，是以背谬。在其名著《中国中古文学史》中，刘师培通过“考之史籍”，更提出“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②在《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论》中，刘氏认定“美术以性灵为主，而实学则以考核为凭”。^③对文学独立自足性的坚持，是文选派大师刘师培文学批评中一大支点。

刘师培关于文学特点的看法对新文化运动主将周氏兄弟影响甚大。鲁迅不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中对刘氏中古文学研究称引、推举颇多，而且在其中中国文学史建构中特重文采、藻韵，不同意其师章太炎过于宽泛的文学定义，而主张“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周作人则在写于1908年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痛贬“治文章而心仪功利”的中国文人通病，而认为文章的真正出路在于“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④周氏兄弟的这一思想，就与刘师培所强调文学“别为一体”、“别于众学”、“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在理论观点和逻辑理路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有人更明确指出：“周作人走到了当年‘选学妖孽’的位置”，“从阮元到刘师培到周作人，同一传统资源在一百余

年间被三度使用，历史在这里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⑤在反对儒家传统的现代语境下，与秉承“文以载道”的桐城派相对立的文选派的理论主张，在很多地方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些人的同道，这是很自然的。

文选派尽管在五四时期被当作“妖孽”，但实际上却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提倡白话的新文学运动大潮中，文选派因其文言载体而与桐城派等作为传统旧文学被列入打倒之列，而且其用典故、讲对仗，末流更写出许多捧优伶、赞娼妓的下流文字，称之为“妖孽”，时人认为也不为过。但它所代表的文学观念，一则因其产生的时代正是儒家正统思想相对薄弱、思想自由空气相对浓厚的六朝，二则因其代表了重视文学自身特点的倾向，故在很多地方能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讲究学术规范的现代学者所接纳，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获得了新的阐释而融入当时的文学思潮中。在学术研究上，此“妖孽”不仅未被打倒，反而在20世纪的前半期，出现了一个关注六朝文学，研究中古文学的热潮，以刘师培、黄侃、鲁迅、罗根泽、陆侃如、逯钦立、王瑶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留下了令人景仰的业绩。即便是被列为“妖孽”的“文选学”，也有黄侃、高步瀛、周贞亮、骆鸿凯诸学者涉足耕耘，并取得可观成就。

二、“文学的自觉时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史识之眼

由于文选派渊源于六朝，而六朝文学批评极为兴盛，产生了“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因此文选派的追随者们便很自然地通过阐释、研究六朝文论来宣扬文选派的理论主张。这样便在20世纪初出现了研究以《文心雕龙》为主体的六朝文论的热潮，如被鲁迅称为“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的刘师培之《中国中古文学史》、李详的《文心雕龙补注》等。黄侃尽管不是纯粹的文选派人物，但他与刘师培亦有师承关系，其《文心雕龙札记》也受刘氏影响不小。这成为20世纪兴盛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先导。

六朝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推动，不仅表现为六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构成其最为重要的内容，而且还特别体现于学科体认、史识之眼上。

这一时期最为人们关注的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说法。这一说法最早的版本是鲁迅1927年夏在广州的一个著名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论曹丕“诗赋欲丽”时提出的，认为曹氏“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⑥关于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魏晋的说法，近来始有人“发现”这一思想实则最早出自日人铃木虎雄。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于1925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后由孙俔工翻译，改题《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分上、下两册于1928年由北新书局印行。如果我们熟悉20世纪前半程的学术历史，就会发现在30年代的著述中早已有人把这一说法的提出归在铃木虎雄名下。如老舍于30年代初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一书，在论到文学的“自觉时代”起于魏时，就注引自铃木虎雄的《中国文艺论史》。^⑦但不管此说最早由谁提出，以下两个事实却不容忽视：一是这一说法与文选派刘师培“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的观点暗合，且鲁迅在那篇讲演中对刘氏称引颇多，推崇有加，“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说法与文选派可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二是这一说法极大地凸显、抬高了六朝文学的地位，并且成为此时中国文学批评史建构之眼。

1927年，陈中凡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批评史著作，陈著非常注重对学科本身的定义探讨，也就是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批评的论述。因为“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是外来语，中国古代尽管有相关概念（如“文”、“文学”）与之对应，但不完全重合。因此，在科学意识深入人心的世纪之初，文学研究界也就自然要对文学观念作一番定义式的探究，这里蕴含了中西文论的比较意识。陈著在开篇即立专章讨论文学之义界，发现“汉魏以

前，文学界域至宽”。至晋宋以后，“是有情采声律者为文，无情采声律者谓之笔。故文学之界画，自南朝而始严也”。降及唐人，古文运动掎击六朝，“文章之界，又复漫漶”。面对以往“异议纷起”的文学定义，陈钟凡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很有价值的处理方法：“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他取章炳麟法式之外壳，融文选派注重辞藻、声律之精髓，而以西人亨德之说为骨干，提出了自己认可的“文学”定义：“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⑧陈中凡的这一文学义界，显然是以西方文学观念传入所形成的现代视野而对中国古典资源进行的深刻反思，也承接了世纪初文选派、朴学派的理论思考。陈中凡的文学定义，成为其批评史著作在选材、评鹭上的一个基础和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陈中凡的批评史对掎击六朝的唐代文学观念以“漫漶”评之，尽管略带贬意，但与之相对的晋宋以至南朝的文学界画，只概之以“始严”，并无明显的推崇之意。但到了1934年出版的更有影响的郭绍虞之同名著作，六朝文学观念就不仅被作了正面价值评估，而且成为其批评史建构中的史识之眼。

郭绍虞把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三大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为文学观念的“演进期”，隋唐五代和北宋为文学观念的“复古期”，而南宋以至清代则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而所谓的“演进”与“复古”，是郭绍虞深入分析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提出的重要概念。在“演进期”又分为三阶段：周秦以文章博学即广义的文化为最初的文学观念，两汉则开始区分“文”与“学”、“文学”与“文章”而渐次演进，至六朝则有“文”、“笔”之辨：“‘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始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亦相似。”这样，经过从周秦到南朝的演进，文学观念逐渐由混沌渐至明晰。但到了隋唐、北宋，由于反对六朝骈俪文风，复兴儒家传统文学观念的复古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的主张又回复到广义的文学观念，“于是传统的文学观得以

形成，而且亦始有其权威”。至此，郭绍虞认为，中国文学观念基本完成了一个从“由混而析”到“由析而返于混”的“圆圈”。

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精神的影响，郭绍虞认为六朝人所建立的“由混而析”的文学观念是“渐趋正确”的，而以否定六朝文风为开始的唐代复古思潮则“不甚了解文学之本质”，被定性为文学观念演进史上的一种“逆流”。^⑨郭绍虞这一文学史观可能受惠于铃木虎雄，该氏就有六朝文学观“渐次进步”、“至齐梁而达于绝顶点”^⑩的说法。但文选派的影响，则可能更为直接。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即云：“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为古文者，……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前述刘师培《论文杂记》亦有类似的提法。郭绍虞偏爱六朝，因为那时的批评风气“较偏于艺术方面而与道分离”，“反容易使一般人认清了文学的性质，辨识了文学的道路”。^⑪以此学术观念来论述刘勰，郭著就没有充斥于解放后批评史著作的那些“对不良文风的批评”内容的阐发，而是把他列入“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的整体中进行论析。可见，郭绍虞所谓的“渐趋正确”、“逆流”的说法，体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批判精神，并且充分显示了其批评史架构受到文选派影响而崇尚六朝的特点。一个极为有趣的对照是，郭绍虞在50年代“左”的思潮影响下改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思维模式来撰写批评史，六朝因是形式主义而成反现实主义逆流，而唐代复古思潮则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而具有“进步性”了。对六朝文学观念价值评估的这大大倒转是很值得玩味的。

1946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傅庚生之《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开篇亦首列“文学之义界”章，把六朝定性为“文学观念之进步”，而唐宋则是“文学观念之漫漶”。这一认识显然受到了陈中凡、郭绍虞的影响。

三、“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现代美学家的“六朝情结”

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建构中，六朝或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或被定性为文学观念“渐次进步”、“渐趋正确”的时代。这在批评史著作以外的文论研究中也有表现。如许文雨的《文论讲疏》，就“收载中国历代各体文论，颇以表彰自然英旨之作为主，藉覩纯粹文学之真谛。其他基于社会观点立论者，少录；基于伦理观点立论者，不录。”^⑫从所选 14 篇来看，体现了沉思、翰藻的六朝文论就占了其中的 8 篇，其推崇六朝的意图十分明显。而郭麟阁的《魏晋风流及其文潮》更是那个时期少有的断代文学思想研究专著。该书归纳魏晋文艺思潮之特点为：一独立观念之成立，“至魏晋论文之专著日多，文学之意义遂日渐确定矣”，之后文笔之区分，“文学不仅独立，且变为唯美至上主义之纯文学矣”；二自然山水之情绪发达，认为魏晋文士最大之贡献，即引导爱自然之情趣于文学中也；三悲观享乐，诗人善感，人生无常，非自魏晋始，但至魏晋更甚。^⑬对魏晋以至南朝纯文学观念的发展、唯美风习的滋长，偏爱、玩赏之意，溢于言表。

文学批评与美学相邻。看待六朝，从审美的角度与“基于社会观点立论”、“基于伦理观点立论”的角度，必然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和价值评估。与文论研究极称六朝的学术思潮相应，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更是把六朝美学推到了一个至上的位置。或曰“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或曰“不让位于浪漫运动之于西方”的辉煌时期，这使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朱光潜、宗白华身上或多或少带上了某种意义上的“六朝情结”。

朱光潜受克罗齐、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美学思想影响很深，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同样深刻地哺育并影响了他。庄子的逍遥恣肆，陶渊明及魏晋人的超凡脱俗的人格境界，都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并成为其美学体系建构中的重要成分。在朱光潜早期的美学著作中，写成于 30 年代的《诗论》与中国诗学关系最深，堪称 20 世纪前半期有关中国诗学研究的有数经典之作。朱光潜自己

也特别看重这本书，他在 1984 年北京三联书店重版的《诗论》“后记”中说：“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而《诗论》中对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最有意义的，是该书对中国诗走上律诗道路所进行的美学、文化的分析。这一方面的内容也是朱光潜本人最为看重的。该书以世界艺术与美学为参照，从诗与乐关系之合、分历史的考察，深刻揭示了“中国诗脱离音乐而在文字本身求音乐”的美学精神，从而对中国诗学具有重要地位的“声律”说的历史因缘和美学意义进行了极富学理的解说。正是在这一美学的考察上，朱光潜极其重视并高度评价“声律说”形成的六朝。他说：

一般说诗的人颇鄙视六朝，我以为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六朝是中国自然诗发轫的时期，也是中国诗脱离音乐而在文字本身求音乐的时期。从六朝起，中国诗才有音律的专门研究，才创新形式，才寻新情趣，才有较精妍的意象，才吸哲理来扩大诗的内容，就这几层说，六朝可以说是中国诗的浪漫时期，它对于中国诗的重要亦正不让位于浪漫运动之于西方诗。^⑭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之类的著作中最早以“现实的”和“浪漫的”来概括中国文学思想主潮的朱维之，也认为“从魏晋到盛唐五百年之间的中国文艺思潮史可说是浪漫的思想底胜利史”。^⑮朱光潜从“中国诗脱离音乐而在文字本身求音乐”论述六朝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的意义，从一个新的内容和维度丰富了那个时期推崇六朝的学术话题。

而对于魏晋美学，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 1940 年《学灯》）可以说穿透了 20 世纪的中国美学、中国文论学界。此后的诸如中古文艺思潮、六朝美学研究，宗白华的这篇论文以及产生于 40 年代末期的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成了难以绕过的经典。在中国文学批评这一学科草创的 20 世纪上半期，对产生《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的六朝给以极端重视，这本不奇怪。故此，几本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都以最大的篇幅

论及六朝，对六朝文学观念中的个性主义和唯美风习也多采取正面的评价。宗白华的魏晋美学研究，也是这个时代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宗白华的独特与卓异之处在于，他紧紧抓住魏晋这一中国美学历史重要转折时期，深入分析这个时期士人心理、言行、精神，对其所说的“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美、个性价值之发现、山水审美的展露、清谈与玄理、人物品藻、艺术境界等现象，作了极为精彩的整体审美文化透视，揭示了晋人在“把玩现在”的同时追求“事外有远致”的超越的时代审美文化精神。宗白华云：“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又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这堪称是对此一时期审美文化历史背景的经典表述，为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相关论著所广泛称引。

①阮元：《文韵说》，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04页。

②分别见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5、236、66页。

③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夸饰》篇“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④参看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第三部分，

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见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⑥见吴中杰编选、导读之鲁迅撰《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7-188页。

⑦《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5页。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写于1930-1934年间，由齐鲁大学铅印，1984年曾由北京出版社印行。

⑧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第3-6页。

⑨以上见郭绍虞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重印本，第5-13页。

⑩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孙俍工译，北新书局，1928年，第140页。

⑪郭绍虞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重印本，第97页。

⑫许文雨《文论讲疏》之“例略”，南京中正书局，1937年。

⑬郭麟阁《魏晋风流及其文潮》之“结论”，重庆红蓝出版社北平分社发行，1946年。

⑭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73-74页。该文写于30年代，1984年三联书店重印《诗论》时，作者把这篇旧文附录于《诗论》相关内容之后。

⑮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第73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

◎ 卢盛江

[摘要] 《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和嵯峨天皇及“一多后生”有关。空海和嵯峨天皇交往密切,《文镜秘府论》强调文章济时拯世,亦适应嵯峨时期教化百姓的政治需要。空海可能通过嵯峨天皇利用了宫中所藏资料,空海向嵯峨献表谈到调声、避病、格律等《文镜秘府论》的重要内容,这对引发《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会起到某种作用。“一多后生”的“一多”,指《周易》变化成卦“两少一多”的少阴之数即32这个数,可能指“后生”的年龄。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在817年左右,实慧正好32岁,因而“一多后生”当指实慧。

[关键词] 《文镜秘府论》 空海 嵯峨天皇 一多后生

[作者简介] 卢盛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122-04

空海《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有三个阶段:入唐前为一个阶段,804年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入唐为又一个阶段,而806年回日本之后是最后一个阶段。本文主要讨论空海入唐回日本之后引发编撰《文镜秘府论》的动因,而讨论这个问题,有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是嵯峨天皇,一是“一多后生”。

—

空海与嵯峨天皇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是政治上的。在嵯峨天皇与贵族代表藤原氏的斗争中,空海布道弘法,明确以“镇护国家”为号召,全力支持嵯峨天皇。就在嵯峨天皇平息藤原氏之乱的次月,弘仁元年(810)10月27日,空海上《奉为国家请修法表》,请求念诵仁王经、守护国界主经等,以“摧灭七难,调和四时,护国护家,安已安他”。^①据《本朝通鉴》卷11载《息灾修法》:

十月廿七日师上表曰:顷日祸乱不溢而磷,虽国家兹康未洗兵法雨,恐剩秽气或发凶殃,请为国家报修供。帝乃纳其仪,于是从十一月一日

剋一七日,开念诵道场修仁王经守护经佛母明王经法,国消不虞之灾,宫举大和之风。帝悦优赏。^②

从此,他们相扶相倚,天皇借助宗教之力稳定民心,镇护国家,而空海则借助政权之力合使真言密教日益隆昌。弘仁二年(811)11月,空海得补山城国乙训寺别当。弘仁七年(816),得敕赐纪伊高野山,作为传播真言宗的基地。弘仁十四年(823),再得敕赐京都东寺作为又一传教基地。

空海密教正是在这一点上,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思想同样表现在《文镜秘府论》之中。天卷序说:“夫大仙利物,名教为基,君子济时,文章是本也。”又说:“至如观时变于三曜,察化成于九州。金玉笙簧,烂其文而抚黔首、郁乎焕乎,灿其章以馭苍生。然则一为名始,文则教源,以名教为宗,则文章为纪纲之要也。”把文章看作是纪纲之要,强调的是文章济时拯世,化成九州,抚黔首、馭苍生的政治作用,同样适应了嵯峨时期教化百姓的政治需要。

第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密切交往。嵯峨多才多艺，书法与空海并为“二圣”，加上橘逸势并称“三笔”。他好尚汉诗文，在位之时，敕命臣下编有二部日人汉诗集，一是《凌云集》，敕命小野岑守等于弘仁五年（814）编成，二是《文华秀丽集》，敕命仲雄王等于弘仁九年（818）编成。嵯峨自己对汉诗也有很深的造诣，《凌云集》收其御制诗22首，《文华秀丽集》也收入他很多诗作。嵯峨于汉诗各体俱擅长，既能七言律诗，又能五言律诗，还能七言绝句。空海和嵯峨天皇有不同寻常的文学艺术上的交谊。他们有诗作交往，《本朝通鉴》卷11弘仁五年3月条下载：“敕使内舍人布势海赐绵一百屯兼七言诗于僧空海，空海诗韵不改奉谢恩赐。”嵯峨天皇赠诗载《凌云集》，空海回赠诗载《性灵集》，诗序比嵯峨为中国之魏武唐文，说：“彼魏武唐文岂得比肩乎。”空海入唐携回的诗文集，回国后未即献给当时在位的平城天皇，却事隔五年之后奉献给了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6月27日，书《刘希夷集》四卷献纳，并献王昌龄《诗格》一卷、《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弘仁三年（812）7月29日，献《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王智章诗》一卷等；弘仁七年（816）8月15日，又献《古今诗人秀句》二卷。他还献书法作品，如弘仁二年（811）8月，献欧阳询真迹等，弘仁三年（812）6月7日，奉献狸毛笔和真书、行书等，弘仁五年（814）闰7月8日献王羲之兰亭碑等。^③

嵯峨天皇好尚汉诗文，加上平安时代日本学人本来就追慕唐文化，嵯峨时代创作汉诗文更是蔚成风气。《文镜秘府论》编入大量中国诗文论著作，为日本士子提供诗文创作之格式，应当和平安时代特别是嵯峨时代这种好尚汉诗文创作的风气有关。

第三，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还有可能通过嵯峨天皇，利用了宫中所藏的某些资料。编入《文镜秘府论》中的诗文论著作，有些是空海自己亲自从中国带回来的，有些是前人带回来后藏于民间，但应有一些携带回来后呈献于天皇后

藏于宫中。空海自己就有不少内外典籍献呈于天皇，如前面提到的《刘希夷集》、王昌龄《诗格》、《古今诗人秀句》等。这当中，有些是重抄本，如《刘希夷集》四卷，有些则未说明是重抄本还是原本。如果是原本，当时又只有空海将这些典籍带回日本，既已呈献天皇，那么，后来他编撰《文镜秘府论》，就只有到皇宫利用这些著作了。还有另一些编入《文镜秘府论》的著作，如沈约《四声谱》、刘善经《四声指归》、《河岳英灵集》、《帝德录》等，我们不知道空海从中国带回内外典籍中是否有这些书，也不知这些书是否藏于民间。那么，空海有没有可能通过嵯峨天皇利用皇宫的藏书呢？

第四，也是更为重要的，空海和嵯峨天皇应当讨论过文学问题，讨论过诗文作法问题。以他们不同寻常的交谊，以他们共同的文艺兴趣和修养，这是很有可能的。空海奉进之书，都是嵯峨天皇敕命索要的。这些书，有些后来直接编入了《文镜秘府论》，如王昌龄《诗格》，又如《古今诗人秀句序》。他们是不是就有关的问题讨论过，各自表示过某种看法呢？《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④王昌龄《诗格》是直接编入《文镜秘府论》的一部书，这里强调“近代才子，切爱此格”，空海这时是不是有了某些与《文镜秘府论》有关的想法，有意无意把这种想法呈告嵯峨，而嵯峨得到王昌龄《诗格》之后，是不是发表过什么御旨呢？空海献表谈到的调声、避病、格律等问题，是《文镜秘府论》的重要内容，他们不一定直接谈到过《文镜秘府论》，但与嵯峨的文学交谊，对引发空海编撰动机会不会有某种间接作用呢？

二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多后生”。

《文镜秘府论》天卷序空海自述写作缘起说：“虽然，志笃禅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文镜秘府论》撰述的直接动机，在于“一多后生”热心文笔，恳请大

师撰述。

“一多后生”何所指，各家理解不同。空海《三教指归序》：“爰有一多亲识，缚我以五常索，断我以乖忠孝。”这里所谓“一多亲识”，指空海外舅阿刀大足。而所谓“一多后生”，一说指一人及多人，一说指一个优秀的后辈，一说指一多法界说之后辈。^⑤

按，《论语·子罕》：“后生可畏。”邢昺疏：“后生，谓年少也。”所谓“后生”，指年少之人。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之时，身边的年少之人，应当是他的弟子。空海有十大弟子，实慧、真济、真雅、泰范、智泉、真如、道雄、圆明、杲邻、忠延，另外还有好几个付法弟子。那么，在这些弟子中间，哪一个或说哪几个更有可能呢？

小西甚一以为可能是真济。他提出两点：一，“《文笔眼心抄》的笔迹让人想到在正仓院御藏僧纲状的真济的书风。根据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想到真济。”二，“真济是《性灵集》的编者。”^⑥确有可能是真济。大同四年（809），真济就比较早地师事空海，是空海最得意的弟子，空海弘法传道之时，他一直在空海身边。除编过《性灵集》外，他自己也有不少著述。他后来也欲步空海之迹入唐求法，因海上遇险而未果。

但是，也有可能是实慧。他是十大弟子之首，出生于讃岐国，姓佐伯氏，与空海同国同姓同族，其祖和空海是同系的佐伯氏。空海入唐之际，与实慧住于同寺，这样推测，空海入唐前，实慧大德可能就与空海有较密切的关系。空海回国弘法创业，实慧一直是得力的助手。弘仁三年（812）12月，被空海择为整理高雄山寺寺务的三纲之任。弘仁七（816）年，空海奏请在高野山建立真言宗修法道场之时，实慧大德受空海之命赴高野山察看地形，进行草创工作。弘仁十四年（823）嵯峨天皇敕赐东寺作为真言宗根本道场，实慧大德又协助空海经营东寺。承和二年（835）空海圆寂后，实慧为东寺长者，居于统辖全宗的位置，时太上天皇赐予哭空海的诗章，是实慧大德上表致谢。《御遣告》说：“以实慧大德吾灭度之后可为诸弟子依师长者缘起。”^⑦这一材料如果

可信，则空海实际是把后事托付给实慧，实慧实际是空海继承人。以最信任的后继者，劝说空海编撰一部书，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谨遣弟子僧实惠，谨随状奉进。”^⑧空海较嵯峨天皇年长12岁，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空海向嵯峨天皇献书总是派其弟子前往。派去向嵯峨天皇献书的弟子，从现有资料看，只有实慧。前面我们分析过，向嵯峨所献之书，不少是文学和诗文论著作，有些直接就被编入《文镜秘府论》，比如《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的这一次，向嵯峨天皇奉送的除《刘希夷集》之外，就有王昌龄《诗格》。王昌龄《诗格》是空海很看重的一部著作，被编入《文镜秘府论》。受派遣向天皇献书，所献之书后来又直接编入《文镜秘府论》，把这些联系起来看，不能不让人想到一些问题。比如，实慧献书，应当接触到了与《文镜秘府论》相关的材料，如王昌龄《诗格》等，在接触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萌生某种想法，尔后劝说空海用这些材料编撰一部书呢？又比如，实慧受命献书，应当有可能直接见到嵯峨天皇，天皇读到王昌龄《诗格》一类诗文论著作，有没有可能萌生某些想法？又有没有可能和空海派来献书的大弟子谈起这些想法？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实慧有没有可能从嵯峨天皇的想法中受以启发，或者直接就是转达嵯峨天皇的旨意，回来后劝说空海编撰一部书呢？

还值得注意“一多”这个词。“一多后生”怎么解释？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以为指一个优秀的后辈，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以为指一多法界说之后辈。“多”字作“优秀”解，不妥。如说一多法界之后辈，则其人甚众，到底指谁呢？我认为，“一多后生”的“一多”，可能用解《易》大衍义的用语，指变化成卦的少阴之数。《易·系辞上》“十有八变而成卦”孔颖达疏：“十有八变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变。谓初一揲不五则九，是一变也。第二揲不四则八，是二变也。第三揲亦不四则八，是三变也。若三者俱多为老阴，谓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第二第三俱

得四也。若两少一多为少阴，谓初与二三之间，或有四，或有五，或有八也，或有二个四而有一个九，此为两少一多也。”^⑨所谓“一多”，就是“两少一多”之数的少阴之数。这个数是多少呢？宋程大昌《易原》卷7说：“一多者，谓三大揲之间通奇扚，有四有五而又有八，则十七也，或时有两个四，一个九，亦十七也，奇扚既为十七，则存而为策者三十二也。”^⑩宋方闻一《大易粹言》卷67也说：“世俗所谓两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则得四八三十有二。”^⑪就是说，“两少一多”为17，大衍之数49，去17，则存32。《易》大衍义的“一多”应当指32这个数，空海“一多后生”的“一多”也当指这个数。那么，这个数在空海这里指什么意思呢？我推想，应当是指劝说空海的这位“后生”当时的年龄。就是说，劝说空海的这位后生当时应当是“两少一多”之数，即32岁。如果这一推测尚有道理，那么，更可能是谁呢？我认为在空海弟子之中更可能是实慧。真济小空海27岁，生于延历十九年（800）。《文镜秘府论》在弘仁十一年（820）之前已经编定，应当还更早一点，即使是弘仁十一年，真济也才20岁。而实慧比空海小12岁，生于延历五年（786）。实慧劝说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在弘仁八年（817年）左右，弘仁八年实

慧正好32岁。“一多”这个词如果可以是指某个数字，如果可以是指32这个数，则既可以印证劝说空海的“一多后生”是实慧，也可以印证《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时间在弘仁八年。

①④⑧（日）空海：《性灵集》卷4，《弘法大师全集》第6卷，日本东京筑摩书房，1984年。

②（日）守山圣真等《文化史上的弘法大师传》第7章，日本东京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1990年。

③以上分别见《性灵集》之《书刘希夷集献纳表》、《献杂文表》、《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奉献杂书迹状》、《奉献笔表》、《献梵字并杂文表》。

⑤见（日）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日本东京大八洲出版社，1948年；（日）中泽希男著《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日）群馬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篇第4卷，1955年；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⑥（日）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同上。

⑦《文化史上的弘法大师传》第25章《弟子传》。

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⑩文渊阁《四库全书》12册58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⑪文渊阁《四库全书》15册65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责任编辑：王法敏

从格理论的变迁看生成语法的发展

◎ 何晓炜

[摘要] 格理论在生成语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通过对格理论在生成语法不同时期的分析和对比, 阐述了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特点和动因。

[关键词] 格理论 生成语法 管辖约束理论 最简方案

[作者简介] 何晓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语言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126-05

生成语法的发展经历了数个不同阶段, 由“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到后来的“管辖约束理论”(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 简称 GB), 再到现在的“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 简称 MP), 每次的发展变化都涉及到理论框架及具体分析技术的发展变化。格理论是生成语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格理论在生成语法不同时期变迁的分析, 可以追踪生成语法发展的轨迹, 探究生成语法发展的规律和动因。

一、传统语法中的格与生成语法中的格

格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语法范畴, 在传统语法中, 格是指发生了形态变化的名词、代词或形容词, 用来表示这些词类与其它词的语法关系。例如在有些语言中, 同一个名词由于担任的语法角色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是作主语就是主格, 是作宾语就是宾格。有的语言的形态标志较为丰富, 如芬兰语就有主格、宾格, 所有格及部分格等十五个以后缀形式出现的格; 俄语的名词就有主格、宾格和所有格等六种标记; 阿拉伯语也是一种通过加词缀的方法来表示不同格形式的语言。

不过, 自然语言中格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并不限于词缀。不同的语言采用不同的形式表明一个词与另一个词之间的关系。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来看, 具有丰富格标记的语言(如: 俄语、芬兰语、德语等)是一个极端, 而所有名词性成分都不带格标记的语言(如: 汉语、泰语等)则是另一个极端, 所有自然语言实际上可能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任何一点上。

生成语法中的格理论是对自然语言格标记系统的一种模仿, 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概念, 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语言中用形态标记所表示的格, 不一定能够同自然语言中的格形态标记一一对应。其理论认为, 不同的自然语言采用不同的格表现形式, 这些表层形式属于个别语法的特征; 而各种语言深层的格关系都是一致的, 这些关系属于普遍语法的属性(徐烈炯, 1988)。在英语文献中, 一般用小写的 case 表示自然语言中的不同形态的格, 而用大写的 Case 表示理论语法中抽象的格。本文接下来讨论的格就是指生成语法中的抽象格。

二、管辖约束理论中的格理论

乔姆斯基(Chomsky, 1970)曾提出用两对

属性 [±N]、[±V] 来区分名词、动词、形容词和介词这四大词类。[+ N] 表示具有体词性, [- N] 表示没有体词性; [+ V] 表示具有谓词性, [- V] 表示没有谓词性。把这些属性搭配起来, 就可区分名词 ([+ N, - V]), 动词 ([- N, + V]), 形容词 ([+ N, + V]) 和介词 ([- N, - V])。其中动词和形容词都有 [+ V] 谓词特征, 这一点在汉语中是很明显的, 赵元任 (Chao, 1968) 就把形容词包括在动词之内。具有 [+ V] 属性的动词都可以在句子中作谓语, 而具有 [- V] 属性的名词和介词不能做谓语。具有 [- N] 属性的语类动词和介词如果作中心语, 可以为其补语赋格。这在英语、法语中无法体现出来, 因为这两种语言名词的格没有形态的变化; 而在德语、俄语这类名词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中格形态却很明显。虽然像英语、汉语等语言中的名词没有任何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来表现格, 乔姆斯基认为格在整个语言的生成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范尼奥 (Vergnaud, 1974) 所提示的格鉴别式 (Case Filter) 的基础上, 乔姆斯基 (Chomsky, 1981) 发展了比较完整的格理论, 使它成为管辖约束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管辖约束理论的原则大多以理论模块的形式出现, 各理论模块在句子生成过程中各司其职, 在不同阶段控制生成或转换的过程。句法推导由词库开始, 先生成深层结构 (也称 D 结构), 经过移位转换再生成表层结构 (也称 S 结构)。从 S 结构往后分两路, 一路通向语音式 (PF), 另一种通向逻辑式 (LF)。就名词性词组而言, 它在 D 结构得到题元角色 (θ- role), 在 S 结构被赋予特定的格。D 结构主要表达句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 而 S 结构表达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根据格理论, 进入句法推导的名词性词组 (NP) 必须有格, 格是这个 NP 在句法推导中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任何处在特定结构位置的 NP 如果没有适当的格, 这个 NP 将被排除。格理论不仅解释了 NP 在句法结构中的分布问题, 而且说明了为什么有的 NP 必须进行转换移位。

(1) We/ * Us/ * Our love* they/ * them/ * the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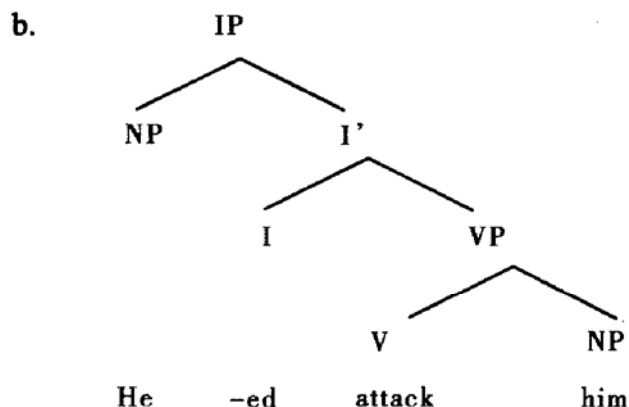
以下例句, 主语应被赋予主格, 宾语被赋予

宾格, 因此作为主语和宾语的语音形态表现, 应分别为 We 和 them, 其它的表现形态则不合法。

- (2) a. Mary loves him.
b. Mary is fond* (of) him.
c. Mary criticized him.
d. Mary' s criticism* (of) him.

如前所述, 动词和介词可以赋格, (2a) 和 (2c) 分别从动词获得宾格。形容词和名词没有赋格能力, 在 (2b) 和 (2d) 中只有加上介词, 后面的词才可以获得格, 因为, 在管辖约束理论框架内, 赋格的条件是被赋格的成份必须受赋格成份的管辖 (government)。请看下例及树形图。

(3) a. He attacked him.



从树形图我们可以看出, 动词 V 管辖宾语, 给宾语赋格; I (Infl) 为功能语类的符号, 是表示句子形态变化的中心语, 它含有时态 (Tense) 和一致关系 (Agr) 特征, I 管辖主语, 因此主语从 Infl 得到格。

我们再看两个由于格的原因而进行 NP 移位的例句。第一个是被动语态的句子, 第二个是提升 (raising) 结构的句子。作谓语的过去分词和提升动词没有赋宾格的能力。

- (4) a. Mary is loved
b. [IP e Infl [VP is loved Mary]]. (D 结构)
c. [IP Mary Infl [VP is loved t]]. (S 结构)

(4b) 是 D 结构, 主语位置是空位 (用 e 来代表), 宾语 Mary 在此不能获得格, 因为过去分词 loved 没有赋格的能力。这样宾语就没有格, 没有格的 NP 在句子中是不能存在的。但主语位置是空的, 可以由 Infl 提供主格。为了获得格, 在 S 结构里 Mary 由宾语位置移到主语位置得到主格, 如 (4c) 所示。我们再看以下提升结构的例子。

- (5) a. It is certain [that John has loved Mary]
 b. e is certain [John to have loved Mary]. (D 结构)
 c. John is certain [t to have loved Mary]. (S 结构)

在 (5b) 中形容词 *certain* 不能赋格, 小句中的功能语类 *to* 是非限定性的 (infinitival), 也没有赋格能力。这样, 没有格的 NP *John* 就移到了主句的主语位置, 因而变成从 *Infl* 得到主格, NP 的移位产生了 S 结构 (5c)。以上提升移位分析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小句是时态句时 NP 不能提升。

在管辖约束框架内的格理论研究, 还涉及赋格的参数变异。有的语言, 如英语, 赋格成分必须与被赋格的成分相邻 (adjacent), 如果不相邻就无法赋格。这就是所谓的格的毗邻原则 (Case Adjacency Principle)。然而在有些语言中, 如法语, 则允许动词和宾语中间被其它成份隔开。例如:

- (6) J' aime beaucoup la France.
 I love very much (the) France.

例 (6) 说明格的毗邻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语言, 因此它被看作格理论的一个参数变异。

另外, 在管辖约束框架内的格理论研究还涉及赋格的方向性, 主要是根据中心语参数 (head parameter), 看某一种语言属于中心词在前 (head initial) 还是属于中心词在后 (head final) 来确定赋格方向。

三、最简方案框架内的格理论

在原则参数框架内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管辖与约束理论 (GB) 对生成语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 GB 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就原则与参数而言, 为了解释语言的共性, 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 而为了解释语言间的差异, 研究者提出了更多新的参数。尽管乔姆斯基等人多次重申参数的数量是有限的, 而很多研究者往往把他们无法解释的语言间的差异设定为某种新的参数, 一时间所提出的参数的数量多到惊人的地步, 而且多数参数的设定没有明确的根据。生成语法的理论目标之一是解释儿童语言习得问题。儿童语言习得就是参数设定。如果要设定的参数太多, 生成语言的步骤太复杂, 就会增

加儿童语言习得的负担, 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儿童能迅速地学会自己母语这一事实。因此, 从 20 世纪 90 年初开始, 在原有的原则与参数理论的框架下, 乔姆斯基 (1993, 1995, 2000, 2001) 陆续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即所谓的语言学理论的“最简方案” (the Minimalist Program, 简称 MP), 其目的就是要遏止语言研究中原则和参数的泛滥和一些武断假设的不正常现象。最简方案的研究目标, 就是要简化语言学理论和探究人类语言如何以简单的操作方式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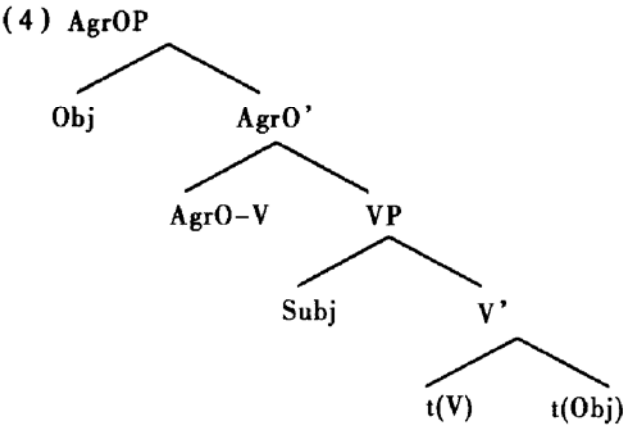
1. 最简方案初期的格理论

在乔姆斯基 (1993) 最简方案的早期版本中, D 结构和 S 结构就被取消了, 任何有别于 PF 和 LF 接口层面的语言结构层次都不复存在。这主要是根据“经济原则”, 句法推导中要减少不必要的表达层次和推导步骤。在 GB 中, 名词性词组的格是在 S 结构中赋予的; 在 MP 中 S 结构被取消了, 词项在词库中就已经带有完整的形态特征, 而不是光杆的词根。就名词词组而言, 在进入句法运算时就已经带有了相应的格特征, 在运算过程中对这些格特征进行核查 (feature checking)。格特征属于形式特征 (formal features), 而形式特征属于语义无解特征 (uninterpretable features), 在推导到达接口层面时必须将这些语义无解特征核查去掉, 因为外部系统无法识别这类特征, 否则句法推导就会失败。在最简方案框架里, 语言机制包括一个存贮声音、意义、结构组织等的认知系统, 即词库和人类语言的运算系统。还有外在于语言机制的运用系统 (performance system)。运用系统包括感觉运动系统 (sensorimotor systems) 和思想系统 (systems of thought)。运算系统从词项出发进行推导, 它与运用系统有两个接口层面: 通向感觉运动系统的语音式 (PF) 和通向思想系统的逻辑式 (LF)。整个感觉运动系统访问一个接口层面, 整个思想系统访问另一个接口层面。在推导过程的某一点有拼读 (spell-out) 发生, 与语音形式有关的特征会被送往语音式, 其余的特征则被送往逻辑式。运算系统所生成的表达式就是给运用系统的指令, 这些指令在接口层面必须能够被运用系统的

两个外部系统识别, 将外部系统所不能识别的特征核查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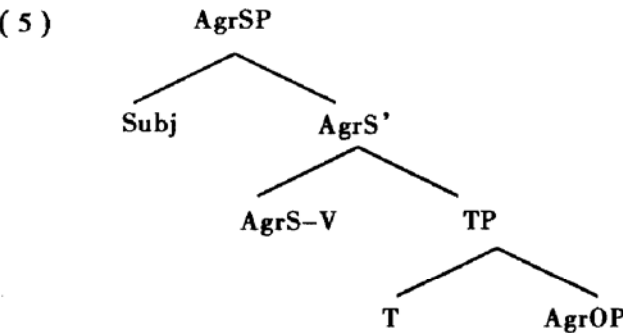
在 MP 的早期版本中, X 阶标理论 (X-bar theory) 发挥重要作用。乔姆斯基采用了 Pollok (1989) 的建议, 将功能语类 (Infl) 分解为一致关系 (Agr) 和时态 (T), 及动词性词组 (VP) 内主语假说, 其中包含句子的功能语 C (Complementizer, 标句成份), AgrS (Subject Agreement, 主语一致), AgrO (Object Agreement, 宾语一致) 以及 T。

我们先看宾格是如何核查的。首先动词和宾语合并, 再和主语合并形成 VP, VP 再和功能语类 AgrO 合并, 通过中心语移位 (head movement), 动词移向 AgrO, 形成 AgrOP (宾语一致短语)。宾语再移到 Spec-AgrOP 的位置, 以上操作可以用传统的树图表示为 (图 4)。



在以上结构中, Obj 和 AgrO 处于标志语-中心语关系 (spec-head) 之中, 在这一关系中宾格被核查掉。

再看主格的核查。以上结构 (4) 再分别和 T 以及 AgrS 合并, 动词移向 AgrS, Subj 移向 Spec-AgrSP 的位置, 下面为部分树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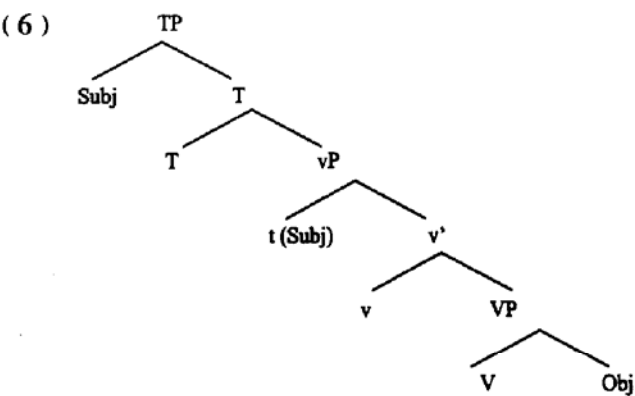
在以上结构中, Subj 和 AgrS 也是处于标志

语-中心语这一关系中, 主格得到核查, 在 MP 早期框架内, 格的核查必须处于这一关系中。

2. 最简方案新框架内的格理论

乔姆斯基 (1995, 2000, 2001) 对早期所提出的 MP 进行修正和发展, 和格理论有关的就是不再将 Agr 作为功能语类, 认为 (Chomsky 2000: 138) Agr 没有语义内容, 它只包含语义无解特征 θ (如人称、性、数等), 这些特征在逻辑式上得不到语义解释, 因此就会产生不合格的句法对象。他指出, 像 Agr 这样的成分不可能存在, 也不可以存在。在 MP 早期的版本中, 格的核查主要依赖于 Agr。如果没有 Agr, 格的核查还需另辟蹊径。

在 MP 新框架内, 乔姆斯基 (2000, 2001) 提出核心功能语类 (Core functional categories) 的概念。核心功能语类包括标句成份 C、时态 T 和泛动词 v (light verb)。在新框架内, 进入运算的操作有合并 (Merge), 一致 (Agree) 和移位 (Move)。从经济原则出发, 乔姆斯基认为, 合并或一致操作应优先于移位操作, 移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新框架内, 为了消除词汇信息和结构信息的冗余, X 阶标理论也被取消了。格的核查主要是靠呼应 (Agree) 这个操作来完成。对词库的操作也和 MP 早期的版本不同。在早期的版本中, 运算是从词项系列 (Numeration) 中取词, 而新框架则是从词汇次矩阵 (Lexical subarray) 中取词。词汇次矩阵中只包含一个语段 (phase) 推导所需的词项, 它们来源于词汇矩阵 (Lexical array)。词汇矩阵中包含一句话推导所需的词项。如图 (6):



以上结构是通过合并和移动由下而上形成的, 在

此过程中各种语义无解特征必须得到核查。其中宾格是通过泛动词 *v* 和宾语 *Obj* 所带的宾格特征的匹配及呼应操作而核查的; 主格是时态 *T* 和主语 *Subj* 所带的主格特征的匹配, 也是通过呼应操作而核查的。这种格特征的核查不需要移位就可以完成, 也不需要处在标志语- 中心语这一关系中。笔者对 MP 新框架的研究证明, 新框架更具解释力, 它能更好地解释语言间的结构差异 (何晓炜, 1999, 2000a, 2000b, 2003)。

四、对格理论变迁的讨论

从以上对生成语法在不同时期的格理论的分析对比,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生成语法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方向, 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事。

其一是经济原则。从 *D* 结构和 *S* 结构的取消, *X* 阶标理论的取消, 操作优先顺序的设定, 格的核查方式以及操作取词的方式等, 都反映了经济原则的思想。

其二, 生成语法的发展, 反映了人们对语言结构差异的深入了解。从最初将语言结构差异归结为动词移动, 及名词为了获得格而移动, 到最新框架中核心功能语类概念的提出, 说明生成语法能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及时反映到句法操作的模型上, 说明语言间的结构差异主要在于功能语类。

其三, 生成语法从自然语言中格的不同表现形态入手, 到将格作为一个特征来处理, 使我们从表面现象的描述进入到了对语言内在机制的研究。和传统语法注重描写相比, 生成语法更注重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如果只满足于表面差异描述和归纳, 就无法进一步了解语言背后所反映的事实。

生成语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每个阶段都对前一个阶段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乔姆斯基不断地否定自己正是为了更好地肯定自己, 让自己的理论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这反映了乔姆斯基的科学进取精神, 应是我们语言研究者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 Chomsky, N.: ' *Syntactic Structures* ' [M], Mouton, the Hague. 1957.
- Haider, H.: ' *The case of German* ' [A], in Toman (ed.) ' *Studies in German Grammar* ', 1984. 65- 102.
- 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 Chomsky, N.: '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 [A], in Jacobs. R. and P. S. Rosenbaum (eds): '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 1970. 184- 221.
-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Chomsky, N.: '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 [D], Dordrecht: Foris. 1981.
- Vergnaud, J. R.: ' *French Relative Clauses* ' [M],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1974.
- Chomsky, N.: '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 '. In '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 ed. K. Hale and S. J. Keyser, 1 - 5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 Pollok, J. Y.: ' *Verb movement, Univesal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IP* '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9. 20: 365- 424.
- Chomsky, N.: ' *The Minimalist Program* ' [M], Mass: MIT Press. 1995.
- Chomsky, N.: ' *Minimalist Inquiries* ' [A]. In Martin et al.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i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Chomsky, N.: ' *Derivation by Phase* ' [A]. In Martin et al. ed.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 何晓炜《双宾语结构的句法分析》[J], 《现代外语》1999 年第 4 期。
- 何晓炜《Chomsky 最简方案的新发展——〈最简探索之框架〉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2 期。
- 何晓炜《最简方案的新框架内的句法推导》[J], 《现代外语》2000 年第 3 期。
- 何晓炜《双宾语结构和与格结构的关系分析》[J], 《外国语》2003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 陶原珂

近年的新词语研究

◎ 邵 宜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新事物的出现,大量反映这些新事物的词语开始出现,数量之多是无空前的。其中部分使用频率相当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际不可或缺的表达成分。如何界定、看待新时期的新词语现象?它们与过去汉语创造新词的规律比较起来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材料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本文对各家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新词新语 界定 特点 规范

[作者简介] 邵宜,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131-04

一、新词语的界定和分类

新词语包括字母词、网络语言、流行语、股市语言等。实际上这些概念彼此之间是交叉的,比如网络语言就包括字母词,流行语又涵盖网络语言、字母词、股市语言等,所以要准确界定新词语实在不容易,但这种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新词语的“新”何以界定?比较中庸的提法是把《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最新修订本没有收录的词语都统称为新词语。譬如以“网”为类语素(或称义类语素)构成的词语中,“网民、网吧、网虫、网恋、网友、上网、联网、触网”等都不见于《现汉》,而这些词语都是目前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从结构上说,这些词语的出现遵循了汉语词语衍生的一般规律,把这些词语纳入“新词语”的范围不会有什么异议。争议比较大的是一些特殊成分,这些成分与用传统模式衍生出来的汉语词比较起来显得非常另类,譬如字母词和数字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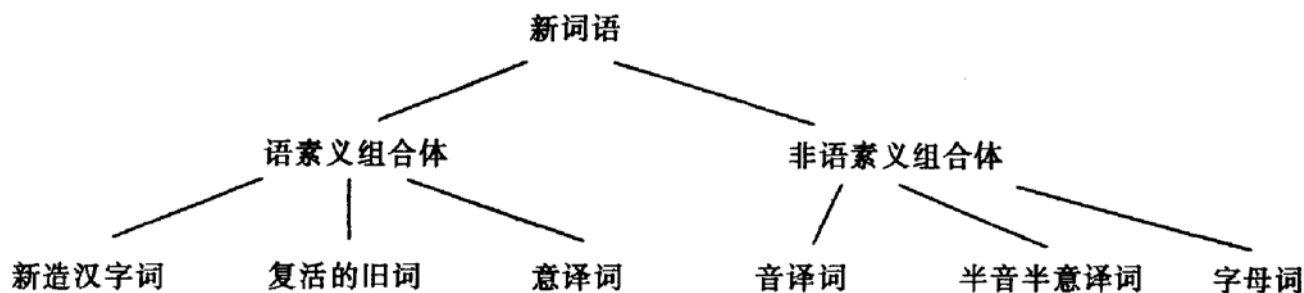
字母词是这些年流行开来的一种特殊现象,例如WTO、VCD、MTV、HSK(“汉语水平考试”三个词首音节的第一个字母)、PSC(“普通话水平测试”三个词首音节的第一个字母)等,这些成分本身表示清晰的概念,有基本稳定的语音形式,所不同的是没有以汉字的形式而是字母的形式出现了。对于熟悉汉字词形的人来说,要

把这些成分称作汉语词语,实在不是一件情愿接受的事情。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人们的语言交际中,字母词已经成了表达这类概念时通常使用的成分,在现代汉语交际中起到了词的作用。

在网络语言中,所谓数字词主要指代替了汉语句子的表达功能的数字串,两者是通过谐音关系系联的,例如“520”(我爱你)、“7456”(气死我了)、“70345”(请你相信我)等。这些数字串只是在网络语境下被临时赋予了一个意思,不懂网络语言的人一般不会在两者之间产生联想。如果把这种表达方式和隐语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脱离了这个特定场合,这类表达不容易被人们会意。所以,和隐语一样,数字化的表达形式只能看作是在特定语境中使用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还不能看作是词。

“流行语”这个概念,按照杨文全(2002)的解释,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社群内被人们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一般为口语,带有一定的方言性,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人们心理活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并在传媒的推动下盛行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杨文确定的流行语来源主要有下面几种:词语语义的增加(如:热、一族等);旧词复活(如彩票、期货、炒股等);大众传媒语言(如:没商量、心太软、闪亮登场等);方言尤其是港

台词语 (如: 生猛、靓仔、靓女等); 外来词语 (如: 酷、秀/骚、人气等); 一些书面语和专业术语 (如: 作秀、双赢、共识等)。杨文把字母词也纳入流行语的范畴, 可能因为但凡字母词都比较流行 (如: @ 一代、卡拉 OK、WTO 等)。还有一些缩略语也比较流行 (如: 三通、福彩、新词语分类图:



流行语从结构类型上说有词、短语和句子三种。词如“酷、下岗、搞定、WTO”等, 短语如“找不着北、实话实说、亲密接触”等, 四字格的较为多见。此外还有一些时髦的说法, 如“很+ 名词”, 这是一种源自于南方方言的表达格式, 如“很女人、很生活、挺戏剧”等。“非常+ 名词”的格式也十分流行, 这里的“非常”不能看作副词, “非常+ 名词”是个名词性的偏正结构, 如“非常男女、非常周末”。至于饮料品牌“非常可乐”则是把两种结构杂揉在一起, 既可以是名词性的 (非一般的可乐), 也可以是动词性的 (非常值得乐)。句子则通常是一些凝固了的格式, 它们或源自于影视剧的名称, 或源自文学作品中的一句话。这些格式具有较强的派生能力, 如“我是……, 我怕谁”源自于王朔小说中的一句话“我是流氓, 我怕谁”, 可以派生出“我是博导, 我怕谁”、“我是学生, 我怕谁”等。短语和句子一般是较为流行的说法, 新词语中的“新语”主要指的是这类成分。

探讨流行语需要关注几个方面, 一是流行区域 (以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为主), 二是流行人群 (以年轻人尤其是大中学生为主)。校园是流行语最容易盛行的地方, 那里生活着世界上最有朝气、思维最活跃、最具有前沿意识、最富于创造欲望的年轻人群, 那里的语言是最活跃和最新鲜的。校园流行语最常见的是“旧瓶装新酒”, 即在旧的语言形式里装入新的含义, 例如用“后

体彩、三个代表等)。这样看来, 流行语是新词语的下位概念。但我们认为, 流行语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类别概念, 它以是否流行作为界定标准, 而且这个标准不容易把握, 所以在如下新词语分类关系图中, 我们只把流行语作为一个参考依据, 不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

起之秀”笑称“爱睡懒觉, 上课总迟到的学生”; 仿照“校花”创造“校草” (校园内被公认为最漂亮的男生或追求校花的男生); 仿照“每周一歌”创造“每周一哥”, 借以讽刺女生换男朋友换得太勤; 仿照“引进外资”创造“引进外婆”, 借喻男生找本系或本校以外的女生做女朋友。大学生是网络使用的最广大人群, 他们不但使用网络语言, 还参与网络语言的创造和传播。

流行语能否成为正式词语, 关键看它是否具备词语的基本条件: 有固定的词形、词音和词义。在特定语境中用修辞方式临时创造新词或赋予旧词新的意思, 严格说都不算新词新义。但如果人们习惯在这个特定语境中使用该说法, 那就可能成为新词新义。

再说说外来词。有人作过统计, 改革开放以来外来词进入汉语的速度加快了许多, 在比较规范而又普遍使用的新词语中每百条就有 3- 4 条新外来词, 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和以往不同的是, 外来词中字母词的出现呈递增趋势, 西文与汉文的混形词大量出现。具体来说, 字母词包括 ①西文的缩略 (如 WTO、MTV、MBA、UFO、VCD), ②字母数字词 (如 MP3、W8), ③西文原形词 (如 call、Morden、internet、dos); 西文与汉文的混形词包括 ①以汉字开头的 (如三 S 系统、卡拉 OK), ②以西文字母开头的 (如 T 恤、B 超、BP 机、IP 电话、IC 卡)。

除了字母词和混形词的出现外, 外来借词的

引入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就是音译的方式重被青睐。外来词在经历了由音译到意译的过渡后,部分又恢复了音译的词形,譬如英文的 Laser,先有音译词莱塞,后有意译词激光,现在镭射这样的音译兼意译词,显然比较受欢迎。其它例子如卡通(动画)、巴士(公共汽车)、维他命(维生素)等。除了旧词翻新外,新的外来词以音译方式出现的越来越多,如爱滋、奥斯卡、比基尼、迪斯科、派对、桑拿、厄尔尼诺、克隆等。值得关注的是,托福(toefl)、脱口秀(talk show)、黑客(hacker)之类的词语,其特点是在音译的基础上尽量用汉字会意。这类现象在商业品牌的译名中最为常见,既能够给人舶来品的提示,满足部分国人崇洋的心理,同时也照顾了本土文化,最大范围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如饮料品牌可口可乐(cocacola)、百事可乐(pepscola),汽车品牌奔驰(benz)、富豪(Volvo)、标致(Peugeot),超市百佳(Parket)、万客隆(mankro),洗浴用品舒肤佳(safeguard)、潘婷(pentine),其它如万家乐(macro)、基因(gene)等。

在外来词的来源上,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两个特点:西文取代日文占据汉语借词的主导地位;方言性借词(主要指粤语借词和台湾国语借词)逐渐占据借词的半壁江山。这些借词不少已经成为汉语普通话的正式成员,如:的士、卡通、巴士、X光、B超、T恤、BB机;有的甚至成为类语素后派生了更多的新词语,如“面的、摩的、货的、拐的、残的”中的“的”。

二、新词语的特点

和以往汉语词汇比较,新词语除字母词和混形词之外,在结构和生成方面还有一些新的特点。

1. 结构特点。在新词语中,复合式合成词仍然是主要的结构类型,附加式合成词的比例很小,还有一种是通过缩略方式形成的词语。复合式合成词当中偏正式是最常见的结构类型。有人对北京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写的1991年、1992年新词语编年本所收入的783条词语进行统计,偏正型词语达602个,占总数的83.5%,这其中又以名词性的为主,共500个,占偏正型

词语的83%左右。动宾、联合、主谓三种类型加起来才117个,而又以主谓、联合最少,加起来仅38个。附加式合成词为数极少,只有15个。以上不论复合式合成词还是附加式合成词,其结构关系都比较清晰,容易理解,但是缩略形式的词语,其结构关系比较复杂。在783个新词语中,这类词语有47个,只占总数的6%。缩略语有偏正式结构的,如双音节的国企、私企、外贸、特首等,三音节的海基会、客流量、自助餐等;有类似数量式结构的,如双音节的双抢、三通、四会(英文会听、说、读、写)等,三音节的四放开、六自主等,多音节的有三个代表、四个坚持、八项主张等。至于字母词,其构成方式比较特殊,处理的办法有两个:将其视作单纯词,看作一个语素;或将其看作若干个语素,并根据原文的结构确定其结构类型。后一种办法意味着不仅将字母词纳入汉语词汇系统,而且将西文字母看作汉语的语素,这将是很大的改动。

2. 生成特点。类推仿造,修辞上的比喻、拟人、仿词等都是创造新词的常用方法,而且能产性很高。体现能产特点的是新词缀的出现(吕叔湘先生称之为类词缀)。这里所谓新词缀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老词缀重新焕发活力,二是新词缀的出现。老词缀包括前缀“老”(如新出现的词语老外、老记、老班),后缀“性”(如新出现的词语派性、塑性)等;新词缀(尤其是前缀)的认定存在分歧,“超”(如超豪华、超现代)、“高”(如高科技、高智商)、“多”(如多媒体、多功能)看作是前缀似乎还说得过去,把“网”(如网恋、网民)、“黑”(如黑客、黑市)、“软”(如软环境、软着陆)、“硬”(如硬环境、硬设备)等认定为前缀就有些牵强。后缀的认定相对分歧较少,如“热、度、霸、风、族、爷、虫、坛”等,它们派生了大量新词,如股票热、外语热、透明度、波霸、吃喝风、抢购风、追星族、工薪族、款爷、侃爷、网虫、车虫、歌坛、足坛等。这些新词语的出现是派生的结果,有语言外部的原因,也有语言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来自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如社会出现各种文化热潮以及随之出现的各类文化群体,导致表现这类现象的词缀“热、族”的出现,有很强的派生能力。内部原因主要指经济的原则,即利用现成的

语素和结构类推产生大量新词。

三、新词语的规范和发展趋势

语言是经常变化的,旧的成分消亡,新的成分出现,这些都会引发语言使用的混乱从而使得语言的规范显得十分重要。

比如字母词除了词形上的异类之外,它的读音也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观点。贾宝书(2000)主张用汉语拼音为字母词注音,即把字母词的读音纳入汉语普通话的语音系统,理由是“字母词并不就是外语词,它是汉语语汇系统的成员。尽管字母词在整个语言中占的比重较小,但倘若语音形式未经汉化,那么字母词就可能会影响到汉语语音系统的完整性,同时也将否认汉语语音系统的开放性。”贾所推崇的注音方式实际上就是汉语音译外来词的方式,就是把字母当作汉字的音节来念,有时是一对一(一个字母一个音节,如T、O、D),有时是一对多(一个字母读成几个音节,如W、X等)。刘涌泉(2002)则主张采用外文字母的读音而不是用汉语拼音去读字母词。李小华(2002)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考察了字母词在语言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大众倾向于用英文字母音读字母词,即使是一些来源于汉语的字母词,如‘HSK’,人们尽管知道是‘汉语水平考试’,却仍然采用英语字母音,并未用汉语拼音。”作者主张外文字母读音,理由有三:第一、国民开放的心理已经成熟,接受不成问题;第二、20多年来外语水平普遍提高,能力不成问题;第三、业已存在的广泛基础和既成事实,推广不成问题。

一些外来词同时有音译和意译两种词形,如“激光”又叫“镭射”;再如最近才出现的“非典型性肺炎”已有“非典”(缩略语)、“沙士”、“萨斯”(二者皆为音译词)、SARS(字母词)等多种名称见诸媒体。这种现象当然应当规范。从发展趋势看,字母词进入汉语词库是迟早的事情。数字化的表达方式要为全社会接受,并成为一种表达手段,可能性微乎其微。是否具有再生能力不取决于词语结构和表达句式本身,而

在于其所代表的新生事物是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譬如“网+语素”或“语素+网”能否持续创造出新词语,取决于网络这种新事物的大众化和日常生活化。随着网络的普及,使用网络人群的迅速增多以及网络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一定会有更多的相关词语继续面世。“语素+族”之类的词语结构,如追星族、打工族、上班族等,它是对具有某一类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概括性称谓。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人们对于个性发展和展现的执着追求和刻意创新,“语素+族”的词语格式一定还会衍生出更多的兄弟姐妹。至于来自于某部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的流行语,特别是流行句式,其生命力因为其格式的结构比较松散而显得相对较弱。这反映了流行文化快速更迭的特点。

总之,新词语带给时代许多新的理念和感受,它承载了新的文化,因时代的需要而生,也将随着时代更迭而离我们远去。

[参考文献]

伍玉婵《当代汉语新词语特点浅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黄集伟、金子《新词语笔记》[J],《语文建设》,2000年第8期。

贾宝书《关于给字母词注音问题的一点思考与尝试》[J],《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3期。

欧阳友珍《现代汉语外来词汉化轨迹及规律初探》[J],《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陈文博《新词新语的产生及其社会背景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邢欣主编《都市语言研究新视角》[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

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0月。

周健、张述娟、刘丽宁《略论字母词语的归属与规范》[J],《语言文字研究》2001年第3期。

刘涌泉《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J],《语言文字研究》2002年第1期。

李小华《再谈字母词的读音问题》[J],《语言文字研究》2002年第3期。

杨文全《流行语的界说和初步描写》[J],《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学海酌蠡•

天然和尚集外诗拾遗

◎ 谢 晖

[作者简介] 谢晖,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110。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135-01

天然和尚(1608~1685), 俗名曾起莘, 字宅师, 广东番禺慕德里司造迳村人, 明崇祯六年举人。崇祯十二年弃官上江西庐山, 祝发为僧, 法名函昱, 号天然。甲申之变后, 天然避乱于西樵, 徙番禺雷峰海云寺, 旋迁栖贤, 更历主福州长庆、庐山归宗、广州海幢及丹霞、芥庵、华首诸刹, 终老于番禺雷峰海云寺, 为曹洞宗34代传人。天然和尚在广东佛门名重一时, 其诗文则为佛门内外所敬仰, 其诗作被辑为《瞎堂诗集》二十卷, 凡1640余首。近年来笔者从天然现存书迹及古籍文献中拾得天然和尚集外诗五篇, 现抄录如下, 以广见闻。

吾友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员朱万章君近年热衷收集天然和尚传世书迹, 连续发表《幽寂的情怀——天然和尚和海云书派》及《释函昱的诗与书法》等文, 揭示了一批天然和尚遗存书迹, 其中有五件书迹保存天然和尚集外诗四首。

①行书《五绝诗》(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为天然晚年归雷峰海云寺后所书):

香暗随风度, 颺颺不欲存。闻香意何限, 花自到黄昏。

②行草《五言诗》(今藏于广州谢氏):

寒色拥千树, 寻香只一枝。何因重攀折, 欲复树上时。

③行书《栖贤山居》(轴两件, 一为香港何氏至乐楼宝藏, 一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珍藏。):

客到无留处, 情乖懒见人。

床前多病衲, 殿角一闲身。

夜色秋旻净, 泉声晓梦真。

昨闻江上信, 又阻白门津。

④行书《七言诗》(今存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是与张骏、赵善和、何元逢、黄衷、黄士俊、梁欽、陈子壮、邝露、陈恭尹、高俨、梁佩兰、王隼、伍瑞隆、朱宝莲、道忞等15人书法合装成册。天然之书成于康熙十二年(1637), 时作者66岁。):

深山一自理清影, 谁向鸾活与里行。

无着岭头空有约, 天亲湖上□知名。

木樨可遂闻香□, 莲社应无□那情。

照就松培解磅礴, 他年须□鹤归声。

年前笔者参与编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善本书目》, 发现馆藏清康熙三十年刊朱载震撰《章江集》二卷, 中有诗作《棲贤寺怀天然大师》诗, 后附录有天然赠诗一首, 亦为天然集外诗。按, 朱载震字悔人, 潜江人。此诗当为甲申之变后天然居于棲贤寺时所作。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章江集》流传绝少, 仅庐山图书馆及敝馆有藏。其诗曰:

野人守拙埋山谷, 楚客相寻入翠微。

论世遂成多劫外, 问交殊觉故人稀。

高谭欲尽平生概, 匹马难留初日晖。

别去岂堪回顾处, 白云流水自依依。

从文化角度看张九龄籍贯

◎熊 飞

[作者简介] 熊飞, 韶关学院中文系教授, 广东 韶关, 512005。

[中图分类号] K8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4) 09-0136-01

关于张九龄籍贯, 历来有范阳 (今河北涿州市)、始兴、曲江 (二县均为今广东省韶关市属县) 三说。这三种籍贯说表面都有很硬的证据。

说张九龄为范阳人者, 有唐徐安贞撰《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 (张九龄) 公阴堂志铭》(广东韶关市张九龄墓掘出, 以下简称《徐志》): “公姓张氏, 讳九龄, 其先范阳人。”唐宣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亦言: “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同时人也把张九龄称为“范阳张九龄”。张九龄自己也自称是范阳人。他不但称范阳宰相张说为“族叔”, 他写的《张说墓志铭》中署上“族孙张九龄”; 在《大唐故源夫人墓志铭》中, 他更自署“宣议郎左拾遗内供奉范阳张九龄”(《唐代墓志汇编》上, 开元030)。《新表》也列张九龄为晋张华第16代孙。

说张九龄是始兴人, 证据也很硬。《旧传》言: “曾祖君政, 韶州别驾, 因家于始兴。”《新表》也称张九龄出自“始兴张氏。”明确说张九龄是始兴县人, 首见宋祝穆《方輿胜览》, 其卷三七言: “张九龄, 祖居始兴县, 今坟墓宅基皆在焉。本传谓韶州曲江人, 盖雄州未建之前均隶曲江, 既又析曲江为雄州, 则九龄乃雄州始兴县人也。今子孙尽在南雄”。此后《明一统志》、《始兴县志》, 最早为明嘉靖十六年 (公元1537) 丁酉本, 也明确记载张九龄为始兴人。其后, 各县志更说张九龄是始兴县清化乡律水人。

说张九龄为曲江人, 更是凿凿有据。《徐志》未明记张九龄籍贯。《萧碑》只说九皋: “晋末以永嘉南渡, 迁于江表; 皇朝以因官乐土, 家于曲江。”《新表》也说: “始兴张氏, 亦出自晋司空 (张) 华之后, 随晋南迁, 至君政, 因官居于韶州曲江。”但《徐碑》说: 九龄“曾祖

讳君政, 皇朝韶州别驾, 终于官舍, 因为土著姓。”以张九龄为曲江“土著”人。此后, 新旧唐书均记张九龄为曲江人。《旧传》说: “曾祖君政, 韶州别驾, 因家于始兴, 今为曲江人。”《新传》亦言张九龄为“韶州曲江人。”此后关于张九龄籍贯的著述, 大都也以其为韶州曲江人。

对上面三种说法, 以现存史料很难作出权威取舍。但从文化学角度看, 富贵还乡, 光宗耀祖, 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故在历史上, 封建君王给臣子封官赏爵, 首先就考虑要跟其故乡联在一起。如汉武帝要给吴人朱买臣封官, 即拜买臣会稽太守, 让他富贵还乡。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年 (公元26年), 拜大将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定封栎阳侯。光武给景丹的解释是: “今关东故王国, 虽数县, 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绣夜行, 故以封卿耳。”唐代人自不例外。唐人的封官赏爵跟郡望、祖籍、故乡联在一起, 这种情况, 在两唐书中比比皆是。

宰相张九龄一生中, 朝廷曾三次给他封爵: 第一次是开元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首封为曲江县开国男, 第二次是开元二十三年三月九日, 改封他为始兴县开国子, 最后一次是开元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又晋爵为始兴县开国伯。又据《萧碑》, 其弟张九皋生前得到过两个爵号, 一是“南康县开国男”, 一是“南康县开国伯”; 另外, 他一生中还可曾作过南康郡赣县令、南康郡别驾, 都与“南康”这一地名相关。天宝十四载张九皋死后, 朝廷追赠“广陵郡大都督府长史”, 其文化意义依然是“首丘归本”。

从文化角度看, 人称或自称“范阳张九龄”, 其范阳为张九龄家郡望, 张家实出范阳方城。这是唐人喜称自

己或他人郡望的一个文化现象。这一点,《徐碑》说得很清楚:“公讳九龄……其先范阳方城人。”言张九龄为“范阳人”或“范阳方城人”,实以张九龄郡望相称。

实际上,张家早就离开了范阳方城,而南迁到了“江表”,萧昕撰《殿中监张公(九皋)神道碑》(下简称《萧碑》)可证:“公讳九皋,其先范阳人也……晋末以永嘉南渡,迁于江表。”“江表”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三国志·魏书》:魏文帝黄初三年“五月,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这里提到了“江表八郡”,且是与“江北诸郡”比并而出,显然指长江以南各郡。其地大约指今江浙和江西、安徽、两湖长江以南地。从文化角度看,张九皋生前两封南康与唐明皇追封扬州广陵郡,实际就为“江表”作了最好的注脚。据《晋书地理志》,南康为古扬州之地,西晋时是扬州所领18郡之一,它原是从汉淮南郡分出豫章郡,又从豫章郡分出庐陵郡,从庐陵郡分出庐陵南部,再由庐陵南部改名南康郡的。所以,张九龄祖上晋末南迁的“江表”,小而言之,为晋扬州所领18郡之一的南康郡;大而言之,就可以说是扬州广陵郡了。

史又载九龄“祖居始兴县”,这与说他的祖籍为南康

相等,指的是同一地。这是政区变化所致。

《旧唐书·地理志》说:“始兴,汉南野县地,属豫章郡。孙皓分南康郡之南乡,始兴置县。县界东峽,一名大庾岭。”根据《旧志》的这个记载,可知始兴县是从南康郡分出。不过这里可能有误。据《晋志》,晋平吴,始改庐陵南部为南康郡;故在孙皓时,还没有南康郡之名。如始兴确实从南康郡分出,则不应在孙皓时:如在孙皓时,则不应从南康郡分出。不管它是何时分出,但始兴县是从南康郡或庐陵南部都尉分出这个基本事实却是不用怀疑的。当始兴县从南康郡分出来以后,张九龄他们家原来在南康郡住的地方又属新分出的始兴县,因此他们家就又成了始兴县人。这就是《新表》为什么称张九龄为“始兴张氏”,张九龄两封始兴,而张九皋两封南康的根据。南康与始兴,一个是古郡,一个是今县。而他们家的祖籍,却没有因这个变化而变更。

曲江县是张九龄籍贯所在地,他们家从四代祖张君政为韶州别驾起就把家从始兴搬到了曲江;张九龄封爵首封曲江,他有私第和先茔在曲江,他父母和自己及弟九皋、九章夫妇也死葬曲江。这都是他籍贯为曲江的最好证明。

《全宋词》注天文错误举例

◎ 吴宗海

[作者简介] 吴宗海,江苏大学,江苏 镇江,212003。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4)09-0137-01

《增订注释全宋词》注释中有关天文错误在十例以上,现举一典型例子。

第三册赵以夫《万年欢·凤历开新》词题“庆元圣节”注:“元圣节:即元宵节。”按:误。“庆元”为宋宁宗赵扩年号,“圣节”指宁宗生日。词句“庆此日,虹流电绕”,注:“虹流电绕:喻元宵灯火之盛。”按:此天文

错误。该二词指诞育圣贤,一般用于皇帝。“虹流”,《宋分·符瑞志上》:“帝挚少昊氏,母曰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即而梦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凤皇之瑞。”“电绕”:《史记·五帝本纪》唐张守节正义:“母曰附宝,之祁(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

本栏责任编辑:陶原珂

•书 评•

初读《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

◎ 曾牧野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经济学会会长)

〔中图分类号〕K29; C09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9-0138-02

修志,是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建设工程。

中华民族自古有修志的习惯。通过修志,记载国家在一定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对历史有重大贡献之人物,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可惜,由于“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干扰,这一工作在1959年以后就停顿了。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国策,给社会主义带来了生机与活力。1983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文化建设工程列入各级政府的工作;1984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处理编纂的日常工作。这标志着我省的修志工作进入新的繁荣发展时期。《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的承修单位是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在各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主编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主席、研究员)、黄明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领导全体编修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历时3年半,100多万字的《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终于在今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问世。可喜可贺!这是繁荣发展我省社会科学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建设工作。

1993年以后,我受“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聘约,与省地方志办公室黄勋拔、陈强、侯月祥,省政府办公厅吴群继、省档案局柯义林、省社科联张江明、梁钊以及《羊城晚报》鲁

阳等人,兼任广东省地方志书之“审查委员”。10年来,经过我们审查、通过的省志约有数十部,形成卷帙浩繁的地方文献资料著作系列,这是全省修志工作者以及出版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一大贡献!在参与这一审稿工作过程中,我们深深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也深切地了解到从事这一工作的艰难:(1)每部志书的章目结构,逻辑安排,颇费脑筋,有时候为找寻一份历史上重要的文件或一张珍贵的照片,就得修志工作者付出大量的劳作与时间。(2)每部志书,要经过一定的审核、修订程序,因此每部志书到最后的完成,一般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中间,有时由于单位领导班子的变动,导致编修人员的变动或人手欠缺的困难。(3)编修工作者不仅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与写作技巧,还要有坚韧的战斗精神、持续工作的耐性。总之,一部志书的完成并付之出版,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对于付出艰辛劳作的编修工作者,我们应该致以崇高的敬意。

初读《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我认为这是一部思路清晰、观点正确、结构严谨、资料翔实的有广东特色的志书。全书以大部分篇幅(从第112-551页),按学科的分类,分别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军事学、法学、社会学与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图书馆学与档案学、教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历史学、岭南文化研究、港澳台研究等11个领域(共安排11章)阐述了各个学科的研究状况(包括重要的著作人及其成果等等),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具

有很强的学术性与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从志书的叙述中我们获得一个判断：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是广东省社会科学事业繁荣昌盛的“大发展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各界分别从各自学科特点出发，捕捉住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实践中提出的理论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双百方针”，大胆探索、创新，以各种研讨会、座谈会、论坛的形式展开争鸣、讨论。其中一些讨论还取得了改革开放理论先行的效果，在全国产生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占有一定的地位。如哲学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讨论，对中国经济特区（还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先导性研究；历史学界对近代史与孙中山的研究，以及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得到如实的反映与记录。特别是全省社会科学界对邓小

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实践的系列研究。我们也从该志书中注意到：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先驱卓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创建人之一的孙孺等学人，受到编纂者的关注与重视，书中刊登的他们的照片更让人回味他们当年当时的真人风采。志书的最后部分还详细附录了广东社会科学界的著作目录，如实反映了广东学者勤奋耕耘的奋斗历程。所有这些都凸现了“盛世修志”的时代特征与时代要求。

从该志书中，我深切感悟到：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始终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要求，转化为采取得力的实际措施，落实 2004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让它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责任编辑：书一前

• 简 讯 •

2003 年度本刊发表的文章被转载情况

本刊讯 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统计，该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108 个社科经济类专题 2003 年共转载文章 22229 篇，我刊被转载 91 篇，排第 2 位。排第 1 位的是《哲学研究》。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服务部的统计，2003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108 个社科经济类专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共计 134 个专题转载的 30187 篇文章中，我刊共被转载 133 篇，排第 3 位，比 2002 年前进 5 位。排第 1、2 位的分别是《教育研究》和《哲学研究》。

《学术研究》能取得如此成绩，与上级有关部门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与支持《学术研究》的作者、读者分不开，与一代代“学术研究人”的不懈努力分不开。值此，向一切关心和支持《学术研究》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雷比璐）

•学术动态•

社科界的 9+ 2: 联动与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社科联负责人联席会议纪要

◎ 林有能

[作者简介] 林有能, 广东省社科联社科规划部主任, 广东 广州, 510050。

[中图分类号] C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4) 09- 0140- 03

去年问世的“泛珠三角”战略构想, 迄今虽未周岁, 但已经从初期概念的“务虚”阶段, 快速地步入了实施合作的“务实”阶段, 上至政府合作的发展论坛, 下及各职能系统的联席会议, 以及实践中的各种框架协议、备忘录的签定, 经贸洽谈会、产品展销会、项目协作会的召开, 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实践层面的举措, 似乎寓含着一个带有目标性的理念——突破贸易壁垒、区内一体化、统一市场、合作共赢——从而形成泛珠三角合作的理想公式: $9+ 2= 1$ 。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大潮奔涌的形势下, 通过理论的阐释, 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提供理论支撑, 既是学术理论界的职责所在, 更是时代赋予学术理论界的重大任务。基于此,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倡议、九省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社科联负责人联席会议”于2004年5月20- 21日在广州隆重举行, 区内各省区的社科联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并宣读了学术报告。广东省委、省政府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的关注, 省委副书记蔡东士、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小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健宏、蒋斌等领导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和部分高校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区内首次理论层面的会议, 有着浓重的理论色彩和探索精神, 着力从学术理论的视角探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相关问题。通过各省区提交的学术报告和会上各自宣示的观点, 对如下一些问题形成了共识:

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构想的诞生, 顺应了形势发展的时代要求, 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和大趋势, 必然带动区域贸易联盟的扩张和发展, 催生新的自由贸易区的问世。中国的“入世”加速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10+ 1)的构建、澜沧江- 湄公河黄金水道和中缅公路、泛亚公路的建设, 正是中国与东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双赢选择。在这一自由贸易区内, 处于前沿地带甚至是与东盟山水相连的珠江流域各省区获得了空前的向西、向南拓展的空间和机遇, 在这一大好的形势下, 加快和加强各省区资源的整合和配置, 形成强劲、一体的区域经济来应对, 这应该说是“泛珠三角”战略构想的时代大背景。

第二, 步入新世纪的中国发展路向, 无论是在观念还是实践方面均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发展理念而言, 中国政府已鲜明地亮出“科学发展观”的旗帜, 在继承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最后共同富裕”的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理念。在实践中, 西部大开发、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CEPA等一系列政策的部署和实施, 推动和开创了中南、东南、西南区域在经济社会各方面互联互通、优势互补以达协调发展和共赢的全新格局。可以说“泛珠三角”战略构想是变化了的

观念和实践的产物。

第三，当今中国的三大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湾的京津塘经济区、大珠三角经济区，以其各自的优势，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在良性的竞争互动中，珠三角战略发展腹地狭窄和资源匮乏的弱势越益凸显，因之，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泛珠三角，是竞争的使然和必然。

第四，珠江流域各省区的共同需求。“泛珠三角”战略构想，首先由广东提出，无庸讳言，与广东省的发展密切相关，经过改革开放 25 年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广东，必然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长的后续发展时间。然而，相对后发的中南、西南各省区，也迫切需要缩小与先发地区的差距，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所以说，“泛珠三角”战略构想，不仅仅是某一单方面的需求，而是区内各省区的共同需求和愿望。这也是该构想一经问世，即得到区内各省区强烈呼应的的原因所在。

二、“泛珠三角”战略构想蕴含着深刻的内涵

当前人们所关注的“泛珠三角”，大多是从地缘和行政区划的意义上进行字面直义的概括，亦即通常所说的 9+ 2（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海南、云南、贵州、四川、香港、澳门），而这次各省区社科界负责人会议的鲜明特色，则是力图从理论的深层次上对“泛珠三角”作学理的诠释：

首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并不仅仅是 9 个省区和 2 个特别行政区的简单相加，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虚拟”的范畴，是一个超越现有行政区划的动态的经济关系概念，是经济触角所延伸的由经济联系密切程度所决定的经济势力范围。

其次，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区，“泛珠三角”既有一般经济区所共有的特点，同时，也独具自身的个性特征。从共性方面而言，“泛珠三角”内含如下要素：（1）生产力区域分布上的一个关联体；（2）处于一定经济空间内的市场联系圈；（3）地域经济合作与利益共同体。总括而言，就是区域间政策的协调性、规划的统一性、要素的互补性和市场关联的紧密性。就个性方面论，其特征是鲜明的。“泛珠三角”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区域的经济贸易合作，从大的方面来说，区内同

属一行政体制、同一基本经济制度、同一关税制度，因而从本质上不同于那种国与国之间通过谈判协议机制实现自由贸易以及实行统一关税制度和贸易制度的跨国经济贸易区。此其一。其二，“泛珠三角”也独有国内其他经济贸易合作区所没有的特征，具体表现于区内的“一区两制”（九省区与港澳实行的两种体制）、“一区三币”（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一区三税制”（九省区与香港、澳门的各自税制）。从这一意义上看，它又具有类似跨国自由贸易区的特点。

总的说，“泛珠三角”的这些特征，既是国内其他经济区所不具有，在国际也鲜见。

三、“泛珠三角”战略构想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当今国际国内形势背景下诞生的“泛珠三角”战略构想，其实践和理论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对促进社科理论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第一，从实践层面来看，“泛珠三角”战略构想是实施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东、中、西互动两大战略的新举措，是一步“活棋”、“高棋”。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从发展的方向上已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力图改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状况，进而带动全面发展的重大举措，经过几年的实践，这一战略已产生了强烈而巨大的效应，但同时也显示出仅靠中央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是有限和难以持续的，必须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行东、中、西互动，充分利用东部发达地区既有的体制、资本、信息、市场等优势，大力推进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市场扩张、体制和信息辐射，这对中西部地区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也可以更好地利用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廉价劳力和广阔市场，增强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所贯彻的正是东、中、西互动的战略意图，且目标也非常鲜明，就是通过发达地区带动后发地区，达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从这一意义来说，“泛珠三角”战略构想对西部和东部乃至全国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科学发展观孕育了“泛珠三角”战略构想，“泛珠三角”战略构想丰富了科学发展观

的思想内涵。

首先,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路向选择的难题,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全新理念,而“泛珠三角”战略构想,则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贯彻和体现,它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诠释了发展的本质和目的,回答了协调发展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它不但为科学发展观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养分,而且为破解当前我们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镜的对策模式。

其次,中国经过20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形成了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距,怎样缩小地区间的级差,达到全面、协调的发展,是各级政府和社科理论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泛珠三角”的适时问世,意图之一就是要把区内不同发展层次的地区“圈到”同一起跑线上,尤其是让次发展地区在合作框架中提升发展的起点,增加发展的机遇,由此来体现“发展权力平等”的思想,因而具有重要的观念创新意义。

四、社科界的9+2:任重而道远

探讨社科界的联动和合作是区内首次社科联负责人联席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会议代表的报告共同表达了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息和期望:“泛珠三角”的战略构想需要理论支撑,区内社科界的合作互动大有可为且任重而道远。

在新的形势下催生的“泛珠三角”战略构想尽管已快速地从“概念”步向实践,但这并不表明理论于此平淡无力,实际上,无论是观念还是实践,均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需要理论的支持和回答。诸如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跨省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如何在“泛”字上做好文章、如何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如何定位政府在“泛珠三角”中的职能、如何认识中央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如何看待CEPA对“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如何发挥企业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积极性,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社科理论界的积极参与。

关于区内社科理论界如何合作的问题,这次

会议取得了预期的积极成果。

首先,在合作的方式方法上,与会代表认为采取分工与合作、点与面相统一的方式,即区内各省区要以服务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加强“泛珠三角”区域社科界合作的出发点,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成果,共同探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带有普遍性和关联紧密的课题。因为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各省区都有自身的定位和目标。如湖南、江西两省的“四地”(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基地、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人才和劳务输出基地、沿海地区旅游休闲基地),海南省的“一省两地”(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热带旅游度假胜地),广西区的承接中国-东盟国际大通道的战略,云南省的资源开发、拓展东南亚市场、发展生态旅游,福建省强调的加强与港澳的合作,贵州省的物流和旅游业,四川省强调的市场开放和发展环境,澳门的旅游品牌和合作,广东和香港强调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区域资源整合、合作机制的创新等,无不反映出各自发展的定位,但要实现各自的目标,则需要区内各省区的共同努力。这就相应地要求各省区社科理论界必须以服务本地的实践为前提,进而加强区内的合作。

第二,“泛珠三角”区内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区内社科界的合作必须要以自愿、平等、互惠为基础,体现公平、公正、互利的精神和原则,以课题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避免在合作中出现某些地区被边缘化的现象。

第三,作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签定了《“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社科联负责人联席会议备忘录》,向区内社科界的合作互动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为今后的合作开展奠定了基础。备忘录中的具体条款——定期召开社科联负责人联席会议、筹建虚拟性的“泛珠三角合作研究院”、建立专题性的网站、出版动态性的简报和通讯、举办专题性研讨会、组织区内社科力量调研和交流、组织“泛珠三角”研究成果评奖、在各自刊物开辟“泛珠三角”研究专栏,等等——不仅反映出社科界强烈的合作愿望、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而且预示了“泛珠三角”区域社科界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前景。

责任编辑:雷比璐

全球化下的区域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广东未来经济走势与产业可持续发展”座谈会纪要

◎ 黄乃文 伦 蕊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9-0143-03

广东经济增长已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其未来经济走势及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是广东乃至全国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2004年3月13日,暨南大学产业经济学学科点组织了一次主题为“广东未来经济走势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层次、高水平专题座谈会。座谈会由暨南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胡军教授主持,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阳胜博士参加座谈会并发了言。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教授、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黄德鸿教授出席了研讨会。

钟阳胜副省长发言的重点是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新情况与广东产业可持续发展。他的话题从他最近读的四本书谈起,这四本书是:《高技术与劳动生产率悖论》(1999年出版)、《美国权力悖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作者是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院长)、《大众媒体政治经济学:制造一致》(爱德华·海曼著)、《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俄罗斯畅销书)。他认为这四本书有一个共同: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都是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作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反思了前苏联解体的教训,认为21世纪的国际竞争是一种硬实力竞争,如GDP的增长等物质实力;另一种是软实力竞争,如文化和价值观、制度、体制、机制等。在信息时代,西方和苏联的媒体发生了变化,媒体的宣传、社科理论的僵化和误导,使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使人们对自己国家的制度产生怀疑,从而造成代际鸿沟(Generation Gap),引起混乱。这种信息心理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和平演变。西方大众媒体通过“制造一致”,促使社会上层建筑、观念形态的变化,实现文化上

的渗透,这就是软实力的影响和作用。由此可见,文化渗透是当今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经济工作者头脑中要有政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坚持。钟副省长的话锋转而切入研讨会的主题。他强调,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去年GDP占全国11.5%,税收占1/7,因此,研究广东未来经济走势、尤其是近期与中期走势,研究广东产业可持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钟副省长说:“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学术问题,应更重视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实际问题相当复杂,研究问题要从实际出发,然后跳出实际,经过研究形成新的理论,作出正确判断,再回过头来指导实际。”具体谈到广东经济走势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时,钟副省长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首先在于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全球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是一个重新洗牌过程,有的在发展中崛起,有的在发展中沉沦。最后,钟副省长对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及其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大家纷纷就广东未来经济走势和发展路径、广东工业竞争力评价、产业可持续发展概念界定、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纵有横,有详有简,气氛热烈。研讨内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广东未来经济走势和发展路径

学者们对广东未来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区域合作上。

冯邦彦教授从CEPA角度强调了广东未来经济发展

中应解决好产业之间的配套问题。他认为,与相对发达的制造业相比,广东的金融业和物流业严重滞后,金融业占 GDP 比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约 3~4 个百分点,与金融发达的江、浙、沪相比已有明显差距。冯教授认为,当务之急,广东应借助 CEPA 的实施,加快金融业和物流业的发展:(1) 利用香港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为广东服务,以配合广东制造业的发展。由于 CEPA 是渐进推进的,广东可考虑在 CEPA 第二阶段降低银行准入门槛,以吸引香港的中小银行能到广东来布点,同时帮助广东的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深圳则可以考虑建立金融保税区。(2) 在制造业全球布局中广东物流业的作用非常重要,而香港物流业相当发达,拥有如香港利丰集团这样的全球著名的物流企业,广东应借助于香港物流业的优势,把香港物流公司引进广东,促进广东与香港物流业的竞争与合作。

张耀辉教授认为,广东未来的经济发展要依托泛珠三角区域,将广东产业转移与泛珠三角腹地地区的闲置生产要素相结合,要着眼于物流业的发展,并充分发挥香港的经济辐射作用。

张炳申教授认为,在泛珠三角区域的未来发展中,广东的关键在于两点:(1) 广东要建立起自由竞争、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包括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秩序。调查表明,目前广东的市场环境不及江、浙,还有待理顺。(2) 广东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要成为资金流量聚集和投融资的中心。

隋广军教授则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广东未来发展,他指出,尽管广东在全国先行了一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发展起一个在全国居于领导地位的产业和企业,这将会影响到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广东这样一个成长型经济中,产业成长至关重要,成长型产业的发展、成长型产业的关联性等都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他还介绍了企业发展研究所正在着手研究的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新产业空间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寻找、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的全新概念。

朱卫平教授指出,在广东工业产业的未来发展中,要解决好投资来源问题和政府职能调整问题。在投资来源问题上,重化工业、装备工业的发展应改变目前的“政府+ 外资”模式,充分调动广东民间资本的雄厚力量,把民间资本引导到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中来;在政府职能调整上,随着市场越来越开放,政府不应再挤占行业发展空间,而应尽快建立产业的自组织机制,以行业协会等自组织方式替代政府部门的许多中观和微观管理职能。

二、广东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工业产业竞争力水平评价

对当前广东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工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做出符合实际的综合评价,是进一步制定出经济良性增长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在这一问题上,与会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层面的工业化阶段判断和微观层面的工业竞争力水平评价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评判结论。

胡军教授认为,广东目前确实具备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某些特征,广东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生产中低档最终消费品向日本的生产高档最终消费品以及德国的生产生产资料的方向发展。广东未来走重化工业道路的路向应该说已经明确了。当然,广东本来就是靠生产中低档消费品发展起来的,这个优势不能抛弃,搞轻工业不等于落后,关键在于要升级,产品质量要精益求精,要能生产出像意大利皮鞋那样的精品。目前广东工业产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广东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培植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广东应大力发展中场产业,即发展处于最终产品装配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之间的零部件、元器件和中间材料产业;二是广东应注重培育“工业精神”,重视理性、重视实业、重视科学、重视创新、重视个性的解放和科学思维的形成,要克服模糊思维的弊端,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黄乃文认为,尽管广东是全国第一工业大省和出口大省,在数量上具有优势,但盈利能力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产品销售利润率 2002 年全国为 5.28%,上海为 6.83%,浙江为 6.23%,而广东仅为 4.73%,可见广东工业产业竞争力拼的还是规模;近年广东工业增长速度已趋于放缓,有被江苏、浙江全面赶超的危险。进一步从形成竞争力的源泉来看,广东受到很大制约:首先,广东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尚处于技术低端,生产模式以代工为主,即使是优势产业也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其次,广东工业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本地人才不足、外来人才流动性大、高级技工短缺的制约;再次,正如胡校长所说的,广东工业发展的文化因素也存在问题,“商业精神”占主流,“工业精神”相对缺失。钟副省长点评说:“广东要持续发展,要形成国际竞争力,不能光靠规模,还要靠领先,领先更加重要。182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远超过英国,可是英国工业革命后,我们就落后了,好比一袋马铃薯,我们用拳头去打总也打不破,人家用火药枪去打一枪就打得马铃薯撒一地,可见竞争力靠的是技术领先。”

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在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把握上,与会学者们持有不

同看法。主要分歧在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更加侧重于对能源、环境的保护，还是应更侧重于发展目标，或者是两者并重。

张耀辉教授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与环境因素，明确指出，广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节能、节水、低耗、少污染产业，作为中期战略目标尤其应大力发展节能型技术（装备）产业，开展关于能源价格与节能周期的研究。

朱卫平教授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还应是发展，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资源之间以及资源内部的替代性问题。钟副省长也强调指出，资源、环境的保护工作很重要，但不能把可持续发展变成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由。

李相银副教授引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的5个变量——工业、人口、粮食、资源、污染——的观点，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还在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只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制约条件。

黄乃文认为：工业产业可持续能力=工业产业竞争力+资源有效利用+环境质量改善，即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应从工业本身的发展和能源环境结合起来考虑，只有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工业行业或企业，才有能力采用新技术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因而也才是可持续的。广东工业发展中还存在产业竞争力在质的因素上尚有不足、人均资源占有少、单位GDP能耗过高以及环保的末端治理等可持续发展问题。

四、广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广东产业可持续发展？这是本次座谈会的最终落脚之处，与会学者们提出的思路是一种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刘汉民教授主张用生态工程的基本原理解决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把产业链链接起来，形成环状链条，对不可再生资源要从经济上、制度上改善使用情况，如对于水资源，可采取差别定价方式，在确定基本使用额度的基础上，以税收形式对超

额部分收取超额费用，此外，还要改变目前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核电。

张炳申教授指出，一般而言，产业可持续发展重头在宏观和中观，所受约束条件不仅包括环境资源的约束、要素配置与更替的约束、技术水平（含营销水平）的约束，而且还有甚少为人注意的产业周期的约束。产业发展是有周期性的，当然，整个产业的大消亡是很少见的，问题主要在于某一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如服装业可以说是永远的朝阳产业，但有一个时尚潮流问题。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指科技发展，也指如何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广东要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关键是产业内部的升级问题，要把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克服严重的地区二元结构和产业二元结构。

李相银副教授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他认为，从新型工业化内涵来看，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是科技和人，具体表现为科技含量高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而环境与资源是制约因素。（2）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一，可立足于自身条件，从科技上突破，如汽车与电的结合，可解决能耗问题与环境问题；第二，通过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集群化，以城镇化与企业集群化的相互促进，解决“三农”问题；第三，通过信息化，大力发展物流产业，降低物流成本。（3）政府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他认为，政府应在教育和科研等基础性投入、制定各种约束性及推动性规则、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等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朱卫平教授指出了政府部门在广东产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的途径，他认为，省一级政府应进一步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全省产业发展的宏观规划，避免不同地区之间、镇级之间的恶性竞争。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不宜过于分散而应适当集中，以强化对企业的扶持和约束。

座谈会上一些观点为广东未来经济走向及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或政策借鉴。

责任编辑：黄振荣

价值转化工程研究十年回顾与新成果

——第三届全国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图分类号〕B018; 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4) 09- 0146- 03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学术研究》和《生产力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以“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为主题的价值转化工程研究十周年暨第三届全国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于7月9- 11日在深圳召开。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

在大会开幕式上,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李恒瑞教授致开幕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黄锦奎区长致欢迎词并做了学术报告;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到会作了讲话。《学术研究》主编郑英隆主持了“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征文颁奖仪式,嘉宾们为12位征文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同时举行了《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黄锦奎编著,76.6万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6月版)一书的首发式。

会议安排了嘉宾发言,《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赵石宝、广东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求是》杂志文化编辑室副主任周溯源、《生产力研究》常务副主编徐则林先后作了讲话。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着“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取得了许多一致性的看法,并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

一、与会者一致肯定了黄锦奎同志在价值转化工程这门学科所做的原创性贡献,并高度评价了他勇于开拓、勤于进取的学术品格

价值转化工程诞生于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是深圳市杰出专家、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黄锦奎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10年前黄锦奎同志在后来获国家图书奖、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优秀社会科学成果特别奖的《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现代价值科学

的新体系,并把价值转化理论应用于实际经济生活中,创造了“价值转化工程”这门新的学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了钱学森、于光远、童大林、张岱年、黄楠森等著名学者的重视和肯定。与会者认为,10年来黄锦奎同志虽然一直忙于行政事务,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价值转化工程这门学科的热爱。他一直坚持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继续在这方面著书立作,又相继出版了《人本价值论经济学》、《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创造财富》以及新近的这本《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等著作。全国性的价值转化工程研讨会已举办了三次,每次从征文的选题到会议的筹备,黄锦奎同志都亲力亲为。可以说,他不但为价值转化工程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石,还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进取,为这门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倾注了许多的心血。

关于与会者对黄锦奎同志的评价,两位嘉宾的发言可以说最有代表性。一位是王京生部长,他评价说:“深圳提出文化立市,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因为深圳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到今年提出的文化立市20多年的实践,基本没有任何的文化积淀,在很多学术文化领域基本上没有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对话的资格,更遑论与‘京派’、‘海派’一争高低。我们这些专家学者这次到深圳来,并且价值转化工程三次全国性的研讨会都在深圳召开,就认定了深圳在这个学科上是有发言权的,它是有原创性的。学术文化水平是代表城市发展水平的核心,在这点上我们确实感谢到来的各位专家学者对价值转化工程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视,更感谢锦奎同志在这个学科之中为深圳争得的荣誉和创造性的表现。所以我为能参加这个会感到荣幸。我和锦奎是好朋友,认识十几年了。10年前我刚开始来深圳的时候,

锦奎还在市卫生局做党委副书记。当时听说他作为一个党委副书记在研究价值转化工程，我非常好奇，就派了记者去采访他。为什么一个党委副书记能创立一门学科，而且能受到大家的关注，受到理论界的注意，是什么动力在支持和激励他的研究？刚才听了锦奎的介绍和看到今天这个研讨会的规模，我知道这个学科在日益壮大，这是很好的事情。锦奎同志是在肩负着很繁重的行政事务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对他这种理论研究精神，我表示深深的敬意。”另一位是赵石宝主任，他是这样评价的：“黄锦奎同志是从事党政工作的，在这样工作繁忙之中能够著书立说，提出一些原创性的学术观点，确确实实应该说在我们政界为数不多；而且他提出来的这些观点、写出来的著作能够得到我们学界泰斗的认同和赞赏，说实在的也是不多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可想而知黄锦奎同志在这方面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艰苦努力。其实这个学科既有学术价值，更有实践价值，也可以说他本人就是价值转化工程的实践者。我也接触过一些领导，一般来说学者型的领导，特别是黄锦奎同志我是非常尊重的。我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第一，同我们的一般理论工作者相比较而言，他的眼界要宽阔得多，因为他不仅从事理论研究，更从事实践工作，他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第二，他比一般忙于应酬的官员要艰辛得多，可以相信他用了很多的精力，挡掉了很多的应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潜心研究上。所以我感到在我们这个知识经济时代，黄锦奎同志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不仅能够处理日常政务，而且能够潜心下来从事理论研究，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官员，也只有这样的官员才能够很好地指导他的实践，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说我对黄锦奎本人开拓进取的精神表示尊敬。”

二、与会者对 10 年来价值转化工程这门学科所取得的成绩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围绕这次会议的主题展开了讨论

被誉为现代点石成金术的价值转化工程，是研究价值转化的特点与规律，并应用这些特点与规律有效地改造客观事物，以最小的代价促进客观事物的价值转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的价值资源，提高客观事物的价值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现代综合性软科学。就此而言，研究价值转化工程，对于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10 年来，经过不少专家学者和广大实际工作者的努力探索，取得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

回顾价值转化工程研究的 10 年历程，我们已经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成功地进行以“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和“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两次大范围的征文活动。价值转化工程已由学科的原创向广度和深度研究发展，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 1993 年的首届全国研讨会，1998 年以“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研讨会，到这次以“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研讨会，均得到了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的响应支持，还有不少从事实际工作的党政干部与企业家参与了研讨会。这些表明价值转化工程研究历经 10 年，已经形成一支专业和业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可观的研究队伍和研究网络，并取得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所说的：“价值转化工程学由黄锦奎同志一人的创立扩展到社会许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参与研究，并取得非常重要的成果，是一门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可以说，价值转化工程研究 10 年，是硕果累累的 10 年。

这次以“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旨在从实践层面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会代表认为：“价值转化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对于我们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对于如何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知识经济时代迫切需要研究的新课题，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它又是一个包含经济学等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含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创新的系统工程，是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感兴趣、愿意共同参与的领域，有利于我们贯彻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原则开展广泛的研究，所以它是一个不断拓展的有发展前途的学科，有希望成为一门显学。与会者认为，要深刻理解和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准确把握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与发展变化规律，加快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先进生产力是现代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力，按价值转化论的观点，也是实现客观物质价值转化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生产力是否先进，主要是看能否加快创造社会财富，以较低的代价高效地实现有限资源的转化，从而提高客观物质的价值创造社会财富的水平。与会者针对先进生产力发展系统的价值转化问题、价值转化模型与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要素的价值转化、技术创新的价值转化、知识经济时代先

进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转化观、价值转化工程与复杂性科学、运用价值转化工程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策略、资本价值转化与发展先进生产力、运用价值转化工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先进生产力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会者认为,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新技术革命推动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新挑战,改革开放 25 年来的发展使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发展水平不平衡,以资源为主的增长方式的生产力还占很大的比重。面对新挑战,我们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进一步深化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的研究,走中国特色的先进生产力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

三、与会者还对价值转化工程这门学科本身的体系建构和理论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和前瞻性的意见

与会者就价值转化工程研究的意义展开讨论,认为价值转化工程是价值理论研究在视角、思路和方法的一个重要转变,它改变、推动了价值理论的基础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徐则林副主编认为价值转化工程研究有三层意义:第一,从理论意义上来看,就是使价值转化工程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价值转化工程学具备了作为独立学科的三个条件:在学理上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价值转化工程学就是研究价值及其转化的特点、规律的;有它自己的学术语言,即有自己一系列的专有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自己的学说体系,在《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一书里,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在第一届会议上大家就已表示同意的了;它需要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解读以及对对象存在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与分析,具备广泛的应用前景。第二,这个新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但又具有边缘性的学科。价值概念纳入人类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最早是从哲学的角度开展的,在这本书里黄锦奎同志也从此角度给予了解读,在理论上价值转化工程深化了哲学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学说。至于实践意义,首要一点是,价值转化工程就是哲学的价值理论和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学院式的研究走向实践性、可操作性的研究的转变。提出和创立价值转化工程这个学科理论为我们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广泛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而且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

可以用来解读经济社会中广泛的实践问题。他认为可以在“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研讨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城市建设与价值转化工程等课题的研究。第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看价值转化工程的时代意义。建立在资源浪费、能源高消耗的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已显露了诸多的弊端,从中央到学界,都对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价值转化工程理论致力于分析解决我们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也就使它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意义。

与会者还对现代价值科学的体系建构以及价值转化工程这门学科本身的理论创新展开了广泛的研讨。一是探讨了黄锦奎同志所提出的现代价值科学、价值转化工程新体系建构的问题。如价值和价值体系的新概念,价值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性理论研究、价值转化的研究、价值利益的问题、价值开发的研究等。二是围绕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进行探讨。包括知识经济时代价值及价值转化的新特点、新问题,特别是知识价值观和知识价值转化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知识经济呼唤新的社会价值观,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应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价值决定的时代。三是探讨了现代价值科学与价值转化工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的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要建立这一学科的“统一战线”,从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以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新的科学发展观等方面全面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特别要重视研究价值转化工程在实践中广泛应用与推广的问题,认为价值转化工程在建立基本理论的同时,还要加强可操作性方面的问题综合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企业服务。要筹集资金,设置课题,组织有实力的学者攻关;建立案例研究与咨询机构,建立和运用相关的档案库,实现资源共享。不少代表提议,要为这一门学科的研究者建立一个平台,在全国价值科学与价值转化工程学会筹委会基础上先建立广东省价值科学与价值转化工程研究会,整合研究力量,进一步推进价值转化工程的研究。曾牧野教授认为,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会三个好处:第一,可以通过研究会团结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充实这门学科;第二,有利于这门学科的普及和宣传工作;第三,有利于我们这方面的学者对外的沟通联系,特别是要跟国际有关的专家、有关的学术团体加强沟通,应该让中国这门很有前途的学科走向世界。

(罗 苹整理)

《学术研究》读者评议表

尊敬的读者：您好！

《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您的支持和帮助,为使我们的刊物能够更好地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对我们刊物的评价和建议。请将以下问卷填妥后寄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学术研究》杂志社(邮政编码:510050),或(Fax)020-83846177。联系电话:020-83846307、020-83846163,电子邮箱:bjb@gdskl.cn

我们将不定期邀请热心读者召开座谈会,对刊物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的读者,我们将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本刊将予以保密。

姓名: _____ 单位全称: _____

地址: _____ 邮政编码: _____

电话(请务必填写): _____ 手机: _____

传真: _____ 电子邮箱: _____

- 1.在本刊所有学科中,您最关注的学科是: _____
- 2.在本期您所关注的学科中,您最喜欢的文章是: _____
- 3.在您所关注的学科的文章中,您在其选题意义、文章内容、学术价值、研究的创新程度上的评价是:

指标	评价
选题意义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文章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学术价值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创新性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 4.您认为本期《学术研究》在栏目设置、校对水平、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方面做得如何?

指标	评价
栏目设置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校对水平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版式设计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印刷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 5.您认为今后《学术研究》还应该增加哪些栏目和内容,或是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 6.您认为《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应表现在哪些方面或今后应该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请继续关注《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编辑部

2004年9月

岭南人文图说之十一——汤显祖与贵生书院

汤显祖(1550—1616年)，江西临川人，明代杰出剧作家、文学家，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官至南京太常寺博士。生性刚直，目睹当时官僚腐败而上书，触犯明神宗，被贬为徐闻县任添注典史。任内见徐闻“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仪”，与知县熊敏捐资创建贵生书院，著有《贵生书院说》、《明复说》等一批诗文，以“君子学道以爱人”为宗旨，宣扬“天地之性人为贵”，对当时社会教化起了很大作用，尊师重教在徐闻从此蔚然成风。

贵生书院坐落在徐闻县城，始建于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书院坐北向南，中轴线上依次为前厅、中堂、亭阁、后厅四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东西学斋各一座6间，分别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12间学斋。

当年，汤显祖被贬徐闻，任添注典史，看到徐闻没有学校，读书人少；特别是看到当地人“轻生，不知礼仪”，不禁发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也”的呼声，并拿出自己微薄的薪俸，与知县熊敏一起创办了“贵生书院”，招收学生读书，传播中原的先进文化、思想。此后，当地中举的读书人逐渐增多，尊师重教也蔚成风气。特别是他的“贵生”说，因充满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引起了后人极大的兴趣。

书院门前大树参天，枝叶茂密；院中花草凝翠，屋宇生辉。当地人说，汤显祖倡导教育，这象征着他的思想开枝散叶，一直影响着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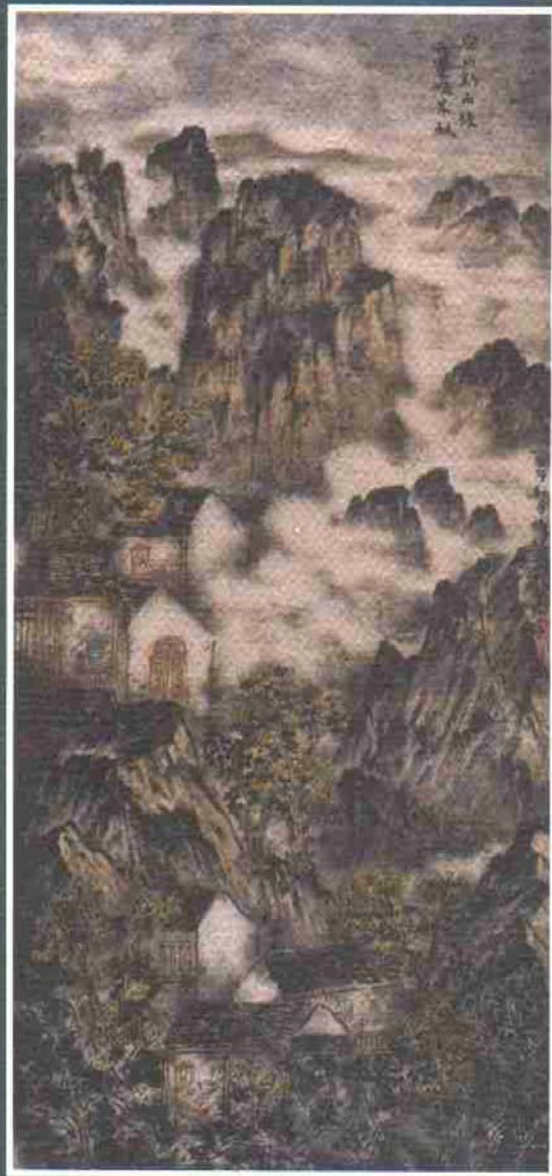


坐落在徐闻贵生书院内的汤显祖塑像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贵生书院依然生机勃勃

Academic Research



天气晚来秋 黄唯理 作

黄唯理小传

黄唯理，1961年6月生于广东连州，惠阳人。1988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曾工作于广州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任研究部主任、艺术收藏评审委员、院长助理、关山月艺术馆馆长、广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广东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二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性美展并获奖。已出版《黄唯理国画集》、《梦山笔谭——黄唯理美术文集》、《二十一世纪广东省中青年美术家国画丛书——黄唯理》等个人作品集。

学术研究

月刊

2004 年第 9 期 (总第 238 期)

出版日期: 9 月 20 日

(1958 年创刊)

社 长: 李恒瑞

主 编: 郑英隆

编辑部主任: 雷比璐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历史 hst@gdskl.cn

哲学 phl@gdskl.cn 文学 lit@gdskl.cn

经济 eco@gdskl.cn 语言 lng@gdskl.cn

政法 law@gdskl.cn 教育 edu@gdskl.cn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 址: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 编: 510050 电话: 020- 83846163

排 印: 广州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网 址: www.gdskl.cn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内总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 46- 64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 399 信箱)

定 价: 8. 00 元

刊 号: ISSN1000- 7326
CN44- 1070

[期刊基本参数] CN44- 1070/c* 1958* m* 大 16* 148* zh* P* ¥8. 00* 3200* 32* 2004- 9